

李可夫文选

人民出版社

李可夫文选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

参加本书编选和译校工作的
有周邦媛、王家华、张海滨。

李 可 夫 文 选
LIKEFU WENXUAN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25 印张 363,000 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300
书号 3001·1960 定价 2.90 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说明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李可夫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之一，1881年2月生于萨拉托夫城一个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里，因父亲早丧，童年生活极端贫困。李可夫靠姐姐资助上学念书，到十三岁时通过私人授课开始自己挣点钱维持生活。他在中学里喜欢数学、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并且抛弃了一切宗教信仰。李可夫的青年时代正值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时期，萨拉托夫当时是“流放犯的城市”，具有革命倾向的小组在那里异常活跃。青年李可夫受到革命运动的鼓舞，在中学里就参加了秘密小组，开始涉猎俄国革命运动史，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以及关于西欧工人问题和工会问题的一些主要书籍，还参加了萨拉托夫出版的秘密杂志的工作。

在萨拉托夫革命小组中的活动决定了李可夫以后的命运。他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进入喀山大学学习后即成为社会民主党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同时领导工人小组和大学生委员会的工作。1901年3月喀山工人和大学生的组织遭沙皇破坏，李可夫被遣送回故乡萨拉托夫。从此，他放弃了学生生活，专心致志地从事革命活动，领导工人运动和萨拉托夫、喀山、雅罗斯拉夫里以及莫斯科党组织的工作。从1901年到十月革命前，李可夫曾多次被捕和流放，一再受到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

李可夫自1905年3月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时起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他对取消派、召回派以及托

洛茨基派采取调和主义立场，191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曾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1917年11月支持建立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因遭到列宁反对，于是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一起签署了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声明。

十月革命时，李可夫是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成立第一届苏联人民委员会时，他担任内务人民委员。1918年苏联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时，李可夫受党的委托领导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1919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1年夏列宁患病期间，李可夫被任命为列宁的副手，暂时免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职务。1923年李可夫再次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时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宁曾赞扬李可夫有管理才能，并认为他擅长做经济工作。

列宁逝世后，李可夫当选为苏联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26年初又直接领导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1928年李可夫与布哈林、托姆斯基等人一起被划成右倾集团头目。1930年被开除出政治局，年底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调任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被开除出党。1938年3月在苏联第三次审讯中被处决。

李可夫担任苏联国家领导人期间，在党和政府的一些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在各种专业性会议上做了许多关于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方面的报告。本书选编了李可夫在1924年至1929年期间所做的一些重要报告，它们涉及的范围很广，谈到当时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发展时期的工农业建设问题，新经济政策的作用，对待富农、中农和贫农以及手工业者的政策，商品流转，市场关系，价格政策，法制问题，对外政策，对外资的利用，提高工人农民以及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和职权问题。另外，有的

报告还专门谈到联共党内的斗争问题，批判了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分裂活动。所有这些报告都分析了当时苏联的国内外情况，引用了一些具体数字，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因此对研究苏联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全书选出的报告大部分是全文，只有少数是摘录、通讯和报导。所有报告均按时间顺序编排。每篇报告的脚注除注明“编者注”字样的以外，都是原来就有的注释。

目 录

关于苏联的国内外形势	1
苏联的经济状况	15
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任务	49
苏联农村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和国际形势	58
基层机关在苏维埃国家中的作用	72
苏维埃建设的当前任务	80
农村工作的新任务	109
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	
报告（摘录）	116
在列宁格勒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27
关于合作社	132
关于合作社的报告的结论	148
农业合作社的作用和意义（摘录）	156
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	166
在莫斯科省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的闭幕词	195
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上的	
讲话	217
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三次地政	
机关会议上的讲话	238
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联席全会的总结	244

在全苏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69
在全苏工程技术人员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75
在苏联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81
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联席会议上 的讲话	304
斗争和建设的十年	307
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336
在苏联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 讲话	359
中央十一月全会的总结	370
在全俄农艺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10
在政府专门委员会讨论五年计划时的讲话(摘录)	416
在莫斯科省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 报告(摘录)	420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429
在苏联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449

关于苏联的国内外形势

(1924年5月在巴乌曼党代表
会议上的报告)

共和国的国外形势。欧洲资产阶级通过社会 民主党政府巩固自己的统治

目前，共和国的国外形势集中在两个焦点上：我们同英国的谈判，最近同德国的冲突。最突出的是在两个政府即苏维埃政府同英国政府的关系方面，第二国际的代表同第三国际的代表发生冲突。第三国际支持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政府，第二国际在英国执政。最近德国的选举说明，德国孟什维克分子又可能参加德国政府。在瑞典，第二国际的代表即布兰亭上台执政。在比利时，王德威尔得可能重新掌权。在丹麦，有一个孟什维克的政府。这种情况似乎应该把以下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这两个组织是否可能哪怕是在最低的、但是切实的、革命的纲领之上达成某种协议。

这将有可能改变欧洲整个的国际政治。但是，第二国际同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存在的极端亲密的关系，将使非工人出身的群众通过社会民主党政府掌握政权，而资产阶级则通过社会民主党人政府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企图使工人群众听从自己的摆布。象德国的孟什维克分子有时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王德威尔得在比利时掌权，实际上这种情况的最主要的革命意义在于，这会加速广大工人群众渡过我国的所谓“克伦斯基时代”的过程。因此，托洛茨

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就工人阶级的政策同麦克唐纳争论时，麦克唐纳为此对他们的那种抱怨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外国报刊把各政党的关系和各个活动家的争论同各个国家的关系混同起来。我们已经同一些纯粹资产阶级的和彻头彻尾法西斯的政府签订了许多条约。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同麦克唐纳政府签订一项令人满意的条约。

关于同英国的谈判

现在，我们同英国的谈判成了整个国际政治注意的中心。这种谈判如果成功，它还会使同其他一切国家建立正常关系成为不可避免的。除此以外，它还将影响到以前签订的一些条约，因为其中有些条约说，以后我们如同意对某一个国家的损失进行赔偿，那么对这些国家也应同意赔偿。我们同英国进行的那些谈判，对俄国国内生活的意义何在呢？其意义就在于，我们同英国（而跟它一起的无疑还有美国）这个拥有大量闲置资本和游资的国家来往，它能把这些钱以借款和投入租让企业等等形式提供给苏维埃共和国。当前过渡时期的长短取决于国家及其经济恢复的速度。而这种恢复可以采取两种途径：一种是可以把国家的这种恢复完全建立在国内的力量上，即建立在近几年来我们看到的那种积累、那种经济复苏和恢复上，这种速度是比较慢的；另一种是在这种恢复中借用外国资本，这样就会加速这个过程。

我们把我国的农业恢复到了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五，把工业恢复到了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三十五。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决不能只把工业恢复到百分之三十五，而必须恢复到百分之一百五十到二百。我们在提高技术和发展经济方面应该取得成就，应该使工人阶级的作用及其人数比十月革命前资产阶级统治时大得

多。现在我们只有百分之三十五，这个数字太陈旧了。我问过最近半年中工业发展的速度，据说可以比过去半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二。当然，我不能对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负责。但这个过程已经很快了。如果我们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那过不了几年，我们的工业就会比战前强大得多，工人阶级的人数也会比战前多得多。为了更迅速地前进，必须对我们的工业和农业投入大量资金。我们本身没有这种资金。这即使从我国的预算状况也可看得很清楚。现在，我国的预算数字约为战前的一半，而且其中还有准备用信贷业务来弥补的赤字。

这一切条件妨碍我们组织和恢复农业。我们能够给予农业需要的信贷只有二千万卢布，这是给予一亿多农民的信贷。这无非是杯水车薪。由于资金不足，我们不能在必要的范围内着手恢复我国工厂的设备、建设新工厂等等。我们如果从国外获得信贷，就能马上做这些工作。因此，我们把同英国的谈判跟信贷问题联系起来。如果谈判成功，那就由我们将借款投入急需的生产用途上，并保证条约的执行。目前，关于英苏会谈工作，正在审查初步的非正式通告内的要求；英方原来的要求为如下数字：战前债款五亿卢布，战时债款四十五亿卢布，私人要求赔偿十七亿卢布。此外，还要加上对这些款项应付的利息。如果说这个数目提得太大，那我们就既不能够承认，也不能够予以满足。对这些要求我们提出了反要求，就是要求赔偿苏维埃俄国由于受外国武装干涉而遭到的那些损失，而这种武装干涉是在英军参加并有英国供应武器和支持的情况下，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在南部和西伯利亚进行的。

你们知道，银行家提出了一份同我们谈判的大纲，它实质上是要取消苏维埃制度。他们要求修改我国的法令、恢复私有制、取消外贸垄断等等。要在银行家所提出的这份大纲的基础上进行

谈判，我们宁肯不谈。在英国的会谈的结果如何，现在还很难说。无论如何，不能说没有获得圆满结果的希望，因为同其他国家的一系列谈判都得到了完全成功。

关于同德国的冲突

我国驻德国大使克列斯廷斯基同志和斯托莫尼亞科夫同志关闭了商务代办处，实行了减少我国在德国的贸易活动的许多决定；拒绝参加莱比锡博览会，把原来运往德国的大批货物转运其他国家等等。

在德国发生的事情，具有比单纯的警察事件远为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因为德国政府完全站在柏林警察局一边。在报纸上已经详细刊载的这件事情的情节本身是很荒唐的。在对我国驻柏林商务代办处进行可恶搜查的整个期间内根本没有编写出任何一个德国法定文件，这就充分证明，在这次警察袭击时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东西。斯特莱斯曼政府的解释根本不能了结这个事件。这种搜查破坏了关于我国驻德机构、商务代办处的工作协定，而这些协定是迄今双方都忠实执行的。警察局对世界唯一的这样一个大国的代表机关进行了袭击，这个国家没有要求德国付出任何代价便同它签订了条约，这个国家不仅没有签署凡尔赛和约，而且从来没有支持过这项和约。这是德国在平等地位上与之建立正常关系的一个国家。德国干出这种勾当只能用下述事实来说明，即由于专家的决定和美英两国允诺给予德国信贷，于是德国政府便匆忙地干出这种勾当来讨好欧洲统治阶级的反动集团。但是他们忘记了，我们也是一个大国，我们决不允许斯特莱斯曼之流利用我们去做出那种讨好英美银行家的让步。因此，苏联政府由于十分清楚地考虑到我们同德国的经济关系曾经是非常活跃的，坚决要求

对整个事件予以圆满的解决。

我们同德国的关系的这种纠葛，没有发生什么军事冲突或使我们受到巨大经济损失的危险。

欧洲的战争准备

在对外政策方面，我还想谈一谈目前在欧洲进行的战争准备问题。你们知道，现在欧洲军队的人数比战前增加了。现在，对人类最危险的不在于军队人数的多寡，而在于军队现在是用上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想象不到的一些杀人武器装备起来的。不久前，我曾看了一个军事专家对将来军事冲突的论述。他证明，在未来的军事冲突中，只要施用小量的所谓化学药剂，就可以有把握地摧毁整个整个的城市和居民区。各国都在争先恐后地从事战争准备。所以，关于消灭战争、爱好和平、1914年的战争是最后一次战争等等的谈论，纯属用来欺骗疲于战争的群众的空话。在欧洲武装力量的这种状况下，我们决定冒险试一试大量裁减常备军，而在一两个月这样短期内组织起民兵来加强常备军，但是我们决不能缩减装备军队的经费。

我们未必能在短期内把我国军队装备得象英军和法军那样，但是我们能把它装备得比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军队不是更坏而是更好。因为当前资产阶级欧洲的独裁者们不是用本国军队作战，而是派遣他们的仆从军作战，所以我们相信我国军队完全能把这些仆从军打败。

苏联争得了巩固的地位

去年，苏联无论是在国际关系方面或外贸方面都争得了巩固

的地位。目前，西欧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以某种形式同苏维埃俄国发生贸易关系。不论在哪一个国家里，人们都可以看到苏联的粮食或苏联的石油、木材、亚麻等等。同西欧的经济联系已经如此巩固，以致俄国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一个极重大的经济因素，而现在要从国际市场上把它排挤出去已成妄想，这尤其因为我们从出口得到的进款大部分都用来从国外购买东西。

国内形势

去年秋天在莫斯科围绕着下述问题进行的争论非常激烈：党组织和工会脱离群众，许多企业中关于工资的争执，销售危机和“剪刀差”，最后，反对派在组织上的形成，反对派在发展并进一步形成威胁着党的统一。在这次争论中接触到了一个问题，即党的老干部和青年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争论的双方之间划了一条大致的界限，并使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因而主要具有分裂的意义。

但正是这个问题，只要派别斗争的气氛一消除，就会比其他问题更快地得到解决。

党用什么来回答这些现象呢？

还在争论前，我们已经就脱离广大群众的问题通过了关于人民民主制的决议，我想这项决议一定会得到实现，此外，我们还发出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号召，通过将近二十五万新入党的工人党员恢复了同工人群众的联系。此外，通过重新审查苏维埃支部的成员，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党员被开除出党（想必是在莫斯科），因为他们脱离了党，接受了新经济政策的消极影响。

为了克服销售危机和工人阶级同农民的隔阂，实行了提高粮食价格和降低工业品价格的广泛运动。在中央委员会的经济纲领

中，把必须通过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来组织市场的问题提到了首位，在价格政策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币制改革

币制改革是国内经济政策一个最主要的项目。我们在讨论时绝没有料到币制改革进展得这样顺利和象事实上所显示的这样迅速，尽管工业机构和工人阶级受到了许多暂时的困难。币制改革虽然暂时停止了工资的增长和挤掉了一些工业贷款，但是它使城乡商品流转和经济核算有可能得到巩固。

不久前，我在下诺夫哥罗德一个有许多妇女参加的街头集会上问：你们是愿意靠无限制地发行新钞票来随意得到资金以满足各种需要呢，还是愿意厉行节约，暂时不去满足大量的哪怕是紧急的需要，而愿意有一个稳定货币呢？

我得到的印象是，绝大多数人愿意有一个稳定的货币。因货币贬值而吃亏的首先是农民和工人群众；工人群众吃亏较小，农民吃亏较大。

由此可见，由于实行稳定货币而感到安定的不仅是国家经济，家庭经济也是如此。劳动群众有保证不会因行情变化而受到空前的巨大损失。据财政人民委员部计算，它在征收粮食税时在行情变化上受到损失，就是说，从收进货币时起到再使用出去损失百分之二十，而农民在行市上的损失为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农民和工人群众因货币购买力下降而受到的损失非常巨大，这种损失在经济学上叫做发行税。目前，由于实行稳定货币，从农民征收的这种发行税也已固定下来。

“剪 刀 差”

当全面提出“剪刀差”的问题时，我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查明“剪刀差”的正常差距，即农业品同工业品之间价格的可比差额。国家计委告诉我，这种差额为百分之一百六十，或为一点六倍，就是说，工业品比农业品的价格约高百分之六十。

目前，这种差额约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五，即比最高计划机关认为是正常的那种差额小得多。有些组织想使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达到战前水平，这未必能实现。不妨以布匹为例。棉布的价格中有百分之七十为棉花的价格、即为我们大量从美国买来而在本国织成布的那部分棉花的价格。我们不可能把国外棉花的价格降低。现在，美国市场上棉花的价格比战前贵两倍，而棉花占印花布价格的百分之七十。既然棉花的价格上涨了两倍，那么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印花布不仅不能比战前便宜，而且应该比战前的价格高得多。无论如何，要采取各种措施达到有利于农民出售粮食和购买工业品的状况。

工 业 和 商 业

最近一次争论是在销售危机时期进行的，当时我们因商品积压而感到困难。而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则是在我们将发生供应危机这种危险情况下召开的，也就是说，这时我们感到商品不足以满足需求。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在这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种供应危机本来通过扩大我国工业的办法是很容易得到解决的。实际上最近查明，我国工业半年内扩大了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二。这种扩大的界限是由我国资金的多寡和积累速度决定的。如果纺织工

厂没有资金或没有原料，那它就不可能发展生产。我们在国外不可能得到贷款，而我们也不可能用本国资金充分贷给工业，因为我国预算是亏空的。从国外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也非常有限。扩大我国工业的可能性之一，是利用我国对外贸易收支顺差。大家知道，在争论时纠缠很久的问题是：国际收支需不需要有顺差。

一些人说需要有顺差，另一些人说不需要有顺差。我国去年对外贸易收支是有顺差的，因为我们输出的数量很大，从输出得到的款项比从国外购买东西用去的多。我们有些余款，其中一部分用来保证苏维埃货币的稳定，但是大部分用来购买我国工业所需的原料，主要是棉花、羊毛、皮革，以及种子、农具等等。

可能还得输入许多成品。在我看过的初步清单中列有布匹和工人用鞋。目前，这个问题正在吸收工会参加讨论，这里主要的指导思想是：需要进口的成品只应是我国感到缺乏的、靠我国工业的发展所不能很快得到满足的成品。

关于农村工作

现在我来谈谈农民问题，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已列入最近党代表大会的议程。我们还没有精确的统计材料来说明农村中富农发展的情况。目前，富农经济的表面标志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过去那些靠统计材料比较容易识别的标志。以前，定富农主要是按土地数量。要是这样，同富农的斗争就简单多了。只要把土地加以重分，把富农的土地没收再交给贫农，问题也就解决了。目前，富农的发展与其说是靠增加土地，毋宁说是靠把马匹、耕犁租给农民或以提供某种服务的办法来剥削农民。富农还可以从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商业中赚钱。我们的市场缺乏组织，贫农和中农很涣散，这就给富农的发展大开方便之门，造成了同

富农斗争的困难。农村富农的发展意味着一般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

因此，同富农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应该把这一斗争纳入党和一切同农村有某种联系的工人组织的日常实际工作。国家拿不出资金来给贫农以必需的帮助。我们在我国关于合作社、税收、种子赊购、贷款等等各种法令中规定给予贫农以各种优待。但是贫农是否能享受到这些苏维埃法令规定的优待则完全取决于富农。不久前，我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关于优待问题的文件，其中谈到，按法令规定这些优待由贫农享受，可是结果，钻到村苏维埃和乡苏维埃的富农，把自己列为贫农，侵占了一切优待，贫农反而一无所得。

贫农没有组织起来，因此不仅我们的基层苏维埃机关在很大程度上为富农所把持，助长了新资产阶级的发展，而且我们的合作社，包括农业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也往往为富农所把持。

起草一份对农民有好处的法令，比实现这一法令要容易百倍。法令即使写得再好，那也不及事情的一半，不及事情的四分之一，甚至还要大大少于四分之一。要实现这种法令，全部问题在于，要保持同贫农和中农的结合，让贫农享受这一法令所带来的好处，使他们感到自己是比农村中任何富农或任何富裕农民更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这个任务党还没有完成。贫农至今不论是在合作社方面还是在整个苏维埃机关方面，都感到自己是受压制的。

目前，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这从最近举行的苏维埃选举中也可看出。有些地方农民的积极性比工人还高。假如贫农表现出这种积极性，那就太好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富农最为活跃，有些地方他们还把持着基层苏维埃机关，借此进一步压迫贫农。因此，在最近的代表大会上将有专门报告谈农民工作问题。毫无疑义，当前的农村绝不象战前的农村，它比战前积极得多，

活跃得多，觉悟高得多。必须有优秀诚实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为农村的文化和经济需要服务。这种知识分子不是跟富农勾结在一起，而是为消灭农村的贫困和愚昧而工作。因此，要解决农民问题还必须解决农民知识分子的问题，即教师和农艺师的问题。

目前，这些农民知识分子对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态度比前几年好得多了。我们对工业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我们应该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那些愿意和我们一起工作的知识分子，吸收他们到苏维埃组织中来，采取种种措施使这种知识分子跟我们保持思想上的一致。在对待农村知识分子方面，至今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从乌拉尔获悉这样一种情况：在乌拉尔的一个地方，有一位来自省城的同志了解了一个村共青团的如下情况，有一个根本不合入团年龄的教师加入了共青团，恐怕连他的孩子都已经超过了入团年龄。这个教师同青年农民和工人一起在村里做了许多文化工作和农业工作。青年们向这个同志提出一个要求：回到城市后对谁也不要说这个教师参加了共青团组织。他们唯恐把这个教师抽调到别的省里去。

近来，在共青团里有一种意见更加根深蒂固了：共青团应该是非常无产阶级化的，就象我们的党一样。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当然，共青团应该努力成为全体青年工人的组织，但是如果我们将农村新一代的积极青年拒于共青团的大门之外，他们就要单独组织起来。这是农村中新的积极的一代，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教育。要知道，这是农村中在没有地主、警察、地方自治局长官的情况下，即在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自由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

在许多村庄里~~除了~~除了~~村青年组织~~和地方苏维埃组织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组织。因此，共青团的工作具有空前巨大的原则性的意义，这特别是由于~~农村中~~出现了阶级分化和富农滋生现象的

缘固。

合作社和私人商业

与此同时，必须吸收农民积极参加商业组织。农村妇女在这项事业中能起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的合作社官僚主义化，或者是我们以官僚主义方式来经营商业，那我们将比谢尔普霍夫和其他许多托拉斯更快地被偷光。

如果我们派一个国营商业人员到一千俄里外的地方去工作，那他就会把东西盗窃一空，我们连听也听不到。因此，必须使农民热心于监督合作社，监督国营商业，不必害怕去组织这种新的社会监督形式。有些同志想把整个农民组织都塞进一些固定的框框内。这还为时过早。要知道我们还没有拟定好农民组织的形式。我们将根据各种具体例子逐年摸索出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它最接近农民，最了解农民的需要并最能为这种需要服务。因此，在这方面的任何狭隘观点都是有害的。在不同的地区应该采用不同的方式。

调动青年和贫农以及中农的积极性的途径之一是把商业组织好，设法使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所出售的商品的价格较私人商业低。我这里想回答一个人们在群众集会上向我提出的问题。有人说，为什么不一下子取消私人商业，组织合作社或国营商业来代替它？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据我看来，如果一下子这样做，那我们将会没有任何商业，造成空前的销售危机。在这方面，行政措施的骤然转变，我看是非常危险的。

组织合作社需要好多年，这个过程将与过渡时期同时结束。组织在合作社里的小生产者，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要存在一段时间。当我们把小生产者在生产和供销方面都组织起来的时候，

那我们组织农民的社会主义工作也就完成了一大半，因为以后只有为技术、为提高技能等等而斗争了。

把小农、贫农和中农组织成合作社，这就为反对农村中的个人主义因素，防止农民分化为各个集团等等，做好了一多半的工作。

同群众的联系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应当中止我的报告了，但是我本来还想谈一点意见。

当列宁领导党时，在我们任何人的头脑中都没有产生过关于从群众运动的观点看来我们会有什么不当之处这个问题。因为列宁同志最能激发群众的情感和兴趣，他能觉察到最广泛最基层的农民和工人的任何进步。他对政治中的每一个转变，主要不是同我们商讨，而是找最下层的庄稼人或工人，详细询问他们的意见，并据此确定自己的看法。

例如，有一次伊里奇在人民委员会上发言，提议立即安排直达货运列车为工人运粮食。他这个意见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秘密出席了一个会议，会上工人们互相谈论粮食问题，于是他就确定了自己的看法。他能根据同农民和工人谈话的个别细节，十分准确地把阶级关系的鲜明图景再现出来。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民运动、人民希望、群众智慧的晴雨表，在我们中间是没有的；象列宁这样的人，要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因此，在这方面要能代替列宁同志，只有靠做好群众工作和改善党同广大群众的结合。因此，工人脱离农民，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工人群众，是最大的危险。同全体劳动者在一起，同工人阶级在一起，我们可能犯很多很多的错误，但是我们也能同他们在一起改正这些错误。但是，如果

各阶层的劳动者各行其是，那这些错误就很难改正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中入党的二十五万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从联系群众和从阶级坚定性上来说，是列宁同志的最主要最出色的接班人。因此，请允许我在这里，在列宁同志不能再出席的代表大会前的这个代表会议上，在结束我的发言时，为庆祝今年我们所取得的最宝贵的成就，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而欢呼！

新加入我们党的工人万岁！

译自《真理报》1924年5月16日。

苏联的经济状况

(1924年11月在苏联工会第六次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我的任务是要介绍一下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并一般地谈谈我们今后的前景和当前的任务。

农村的经济状况

为了说明我们苏联这个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的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首先必须说明在我们苏联占大多数人口的那批人即一亿农民的经济状况。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农村即这一亿农民是我们共和国整个经济的基础，是我们的工业和工人阶级过去和现在据以工作的基础。工业从农民那里获得绝大部分原料，而工业又以自己的产品为农民服务。我们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其中包括重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我们的农村能够消费和吸收多少商品，因为对于工人和工厂说来，农村是最主要的、真正巨大的、具有无限潜力的市场。

英国和许多别的国家的工业主要是靠出口和为别的国家生产而发展起来的，它们使经济适应自己的殖民政策，尽力保持对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奴役，以便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剥削他们。我国的经济只有依靠两个最主要的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了双方利益而合作才能发展起来。我国的工业在其全部工作中时刻

都要记住：它是在一个农业国里发展的。一亿农民是它的具有无限潜力的广大的市场。我国工业以及工人阶级的繁荣、高涨和发展取决于农民的繁荣和农业的高涨。

因此，我在开始介绍苏联的经济状况时先要说明一下我国农业的现状。我要避免引用过于详细的数字，我只告诉你们一些我认为可以说明我国农村经济最主要因素和农村经济发展最主要阶段的材料。

种植面积

实际种植面积有多少，仍然是说明农业状况的最主要的标志之一。最近两年来的种植面积比1922年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即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

值得指出的是，种植面积的增加在苏联各地是很不平衡的。我们现在有一些地区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战前水平。这些地区指的是那些农产品不能自足的地区。这里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1916年（而1916年的种植面积接近战前水平）。这些农产品不能自足的地区的种植面积的增加情况是这样的：同1920年相比，1921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三，1922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1923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1924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种植面积象这样增长或者稍次于这种情况的，在一部分产粮区里也可以发现，1921年的饥荒根本就没有波及到这些地区。

这种情况说明，如果不发生象1921年的饥荒那样的自然灾害，那我们的农业到现在，即到1924—25农业年度的初期，就几乎可以达到战前的水平。曾遭受过1921年饥荒的伏尔加河南部和伏尔加河沿岸的全部广大产粮区，在恢复种植面积的工作上落后于所有地区。今年又是产量不高的一年。今年农民的收获量比去年大约减少百分之九到十。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对1925年的秋播

工作情况作出计算。这些计算表明，苏联全国的秋播面积将平均增加百分之五，而在那些歉收的、今年遭灾的地区，秋播面积甚至将增加百分之十。这是我国政府采取的防灾斗争政策的结果，政府提出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保护这一地区的经济作用，在种籽和社会工程等等方面给予支援，最后不仅把歉收地区的秋播面积保持在去年的水平，而且还增加了百分之十。

农作物的结构变化

在种植面积增加的同时，农作物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黑麦、黍子等等这类所谓的消费作物开始起着越来越小的作用，与此同时，一些比较贵重的商品粮食作物起的作用则越来越大，例如，同黑麦比较，小麦的播种面积从1922年的百分之十五增加到1924年的百分之二十。

全部和主要作为工业用途的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开始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

请看下面的数字：

种植面积（单位：千俄亩）			
	棉 花	亚 麻	甜 菜
1922年.....	52	818	169
1923年.....	165	844	226
1924 年.....	419	1056	320
比 1922年 增加的百分比	804	130	189

由此可见，在这些最费工的、技术性的、在为工业提供原料所必需的农业部门里，播种面积的增加大大超过了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增加。

畜牧业的状况

在畜牧业方面，情况最糟糕的是马匹，这是农业中最主要的牵引力。马的数量还不及战前数量的一半。有些地方，特别是遭灾的地区，无马的农户达到百分之四十。增加马匹的数量和减少无马农户的数量是农业领域最主要的任务。最近两年内，马匹的数量总共增加了百分之十。但是从1922年到1924年，耕牛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即增加了整整三分之一。羊的数量增加到了战前的数量，其他牲畜、猪等等比1922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畜牧业在农户的收入中开始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缴纳单一农业税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不是靠粮食作物、小麦和黑麦，而是靠畜产品，或者说是靠卖牲畜、特别是小牲畜。

农业发展的意义

农业的情况就是如此，现在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1921年发生了饥荒，但是最近两年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增长的趋势仍在继续着，虽然今年的灾荒会削弱这一趋势，但绝不会打断这一趋势。农业的发展和在这一基础上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意义是很巨大的。其意义即使从下面这一点也足以证明，例如去年我们还经历过销售危机。去年工业还苦于找不到买主。今年农业的发展尽管也碰上灾荒，但是形式有所不同，我们现在已经感到商品不足了。工业找不到商品来充分供应农村和农民经济。农业的发展是恢复我国工业、健全预算和我国整个经济过程的基础。它是城市发展、工业发展和工人阶级发展的基本前提。

不能从农业的这种发展中得出结论说：我们已经解除了农民的困苦，农村已经没有贫穷，农民已经不再受罪了。还不能这么说，在个别地区，农民还非常困苦，但是我们走上稳固的、较快

的发展农业和改善农民状况的道路已经有好几年了。

我国工业的发展

我现在要简要地谈谈我国工业的一些发展数字。工业之所以得到发展，是因为有了我向大家讲的那些有关农村的情况。农村的繁荣，农民的繁荣，使我国工业，首先是那部分为农民和农民市场服务的工业即轻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继轻工业之后，重工业也开始恢复。当我们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我国的工业产量只有战前的百分之十八至二十。最近几年中，工业生产一年比一年增长，已接近战前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到今年年初，已达到战前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在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时，我们的产量是百分之二十，现在是百分之五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尽管发展得很快，我们的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

直到最近，每当人们谈到工业领域的成就时，这些成就还主要指的是轻工业。

现在我们可以指出重工业中的某些成就了，尽管这些成就还不是很大。成就特别大的是矿物燃料采掘工作的发展。例如，我们已把石油的采掘量从1920—21年度的二亿三千三百万普特提高到1923—24年度的三亿六千万普特，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六十五。

煤 炭

1921年煤炭产量只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二十七，我们经历的燃料危机一个接着一个。今年煤炭工业的产量为战前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三。但是，今年的煤炭工业推进得相当快，这几乎是我国工业中一个唯一的发展最快的部门，它的产量多到现在我们找不

到销路的地步，所以几乎不得不加以压缩，因为同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相比，它冲得太靠前，顿涅茨矿区有好几千万普特煤作为死资本堆在那里找不到销路。因此，今后燃料工业的发展应该同它的主要消费者即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尽量协调起来。

石 油

石油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可以大力发展。现在石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国外市场生产。去年的石油出口量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五。现在石油工业的平衡表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靠出口来填补的，这种情况对我们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我国的石油出口也是我国工业的一种国际性胜利，所以我们的石油辛迪加就不能不付出巨大的劳动、人力和物力来巩固自己在国外市场的阵地，因为这些市场是被西欧各大石油公司占领着的。我国石油辛迪加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一方面是采取同这些公司竞争的办法，另一方面是采取同个别公司签订协议的办法。现在我们的石油业正在一月比一月更有力地为自己开辟通往国外的道路。

五 金 业

五金工业的情况很不好。我想这一次代表大会将对五金工业的问题给予最大的注意。明年五金工业的情况如何，我现在还没有把握，因为五金工作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但是，目前在全部经济问题中，五金工业问题当然是最主要的问题，不管是从这一行业的无产阶级的就业人数看，还是从主要是它的经济意义上说，情况都是如此。固定资产的恢复、我们工厂的装备、农业的用具，都同五金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根据五金工业的发展情况就可以估计到我国整个经济的生产主力恢复到何种程度，无论在工业里还是在农业里情

况都是如此。现在五金工业大大落后于所有其他工业，更不用说还有采矿业，因为采矿业和五金业挨得最近，它的发展取决于五金业的发展。1921—22年度，生铁的产量总共为一千万普特。我记不准这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几，但是无论如何不会比百分之三更多。

这个数字真是小得可怜。1923—24年度，生铁的产量已经达到四千万普特，也就是说等于两年前的四倍。我们把钢的产量从1922—23年度的三千六百万普特增加到1923—24年度的六千万普特，也就是说一年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钢材产量增加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至于1924—25年度的情况，下一年预计生产生铁六千万普特，而不是去年的四千万普特，但是这仅仅是战前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多一点，而所有其他工业部门（采矿业除外）则平均徘徊在战前产量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水平上。钢的产量计划达到八千一百万普特，就是说一年中增加百分之三十八，这大约等于战前产量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三。我们将把钢材的产量增加到战前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五。重工业方面的情况就是如此。

恢复重工业工作中的困难

恢复重工业工作中的主要困难在于，单单依靠市场是不能使它恢复起来的。在旧制度下，我们的工业是靠国家修建铁路干线、桥梁等等方面的大规模订货而建立、发展和组织起来的。市场上流行的商品对我们大部分大型五金工厂说来，只是一种副产品。

从我们的预算和我们的积累中，现在拿不出资金来修建某种象原来的西伯利亚铁路那样的工程，因此，我们工业的恢复要在比以前大得多的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市场。但是农业现在需要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程度比以前大得不可比拟。我们的工业同样也十分迫切需要恢复固定资本——即需要对我们的工厂设备进行更新和

添补。我国冶金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农业固定资本恢复的速度，而工农业固定资本恢复的速度又取决于工业利润和我国预算捐税项下的积累数额。

我们没有别的资金可以用来解决恢复固定资本的任务。我不知道能有多少外国贷款。我想，我们的英国客人已经向你们谈了借款的可能性，哪怕是在伦敦。我们向别的国家借债问题暂时还没有什么希望。这就使我国五金工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轻 工 业

轻工业是为广大消费市场服务的工业，资金周转快，恢复得也快。我不准备谈所有的轻工业部门。我只谈谈轻工业的主要部门即棉纺织业的情况。1923—24年度，该部门的产量比1920年增加了五倍。1924—25年度，计划把纺织工业进一步扩大将近百分之六十。同战前水平相比，这一部门的产量已经跨过了百分之六十的大关。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棉花，在今后两三年内我们有希望使这一工业部门达到战前的水平。

商品流转和出口事业的发展

工业及其基础——农业的发展也决定了我国经济的所有其他因素即商品流转、铁路运输、商品系统和作为商业的一个部分的私人商业的发展。

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的对外贸易也得到了发展。如果说1922—23年度我国对外贸易的流转额为一百，那么在1923—24年度这个流转额就已达到了二百一十四，或者说一年中增加了一倍多。粮食在发展出口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去年我们出口的粮食达到二亿普特。1924—25年度，预计出口额将保持

和去年一样，甚至可能略有增加，但问题是完全排除粮食的出口，因为显然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再出口粮食了，而且以后也不准备再出口。为此我们打算大力加强石油、锰、木材等等的出口。但是这仅仅是计划，这个问题现在还在研究，我本人不相信这个计划能百分之百地实现，但是我相信由于停止粮食出口而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造成的亏空可以通过增加其他商品出口的办法加以补救，这里主要是增加木材、石油等等商品的出口。

以上这些主要数字就是去年一年我国经济发展情况的说明。不能说经济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是一帆风顺地得来的。

价 格 政 策

为了能够使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去年一年我们所必须加以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两个任务：第一，价格政策问题，第二，硬通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工业和我国农业都不可能指望得到正确的大踏步的发展。去年秋天，随着销售危机的出现，这两个问题显得特别突出。大家知道，为了对付销售危机，我们采取了降低价格的政策，这就使工业有可能利用农民市场，因为很明显，不降低价格，工业品就到不了农民手里。通过我们的价格政策，我们获得了如下成果：1923年秋季发生销售危机、我们的商品过剩和没有买主的时候，我们的“剪刀差”为三点一〇。这就是说，工业品比农产品贵两倍多。正是工业品比农产品贵两倍的这种情况造成了农民对工业的抵制。在政治方面，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工农联盟的破裂。农民不买城市里的工业品，工业找不到销路，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恢复就会进入绝境。由于实行了降低价格的政策，到今年10月，“剪刀差”缩小到一点四六，这就是说，现在工业品比农产品已经不是贵两倍多，而是只贵一半了。大家可以看到，取得的成就是很巨大的。这种改变工业品

价格过高和农产品价格过低的政策为工业和工人阶级赢得了广大的农民市场，需求量猛增，销售危机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变成了商品荒。现在工业对农民市场应接不暇，供不应求，这就是说，工业品的销售前景之广，几乎是无限的，我们通过自己的价格政策必将使市场在以后的年代得到进一步扩大。

硬 通 货

但是，如果不把这方面的成就同前一时期我们取得的其他重大成就即实行硬通货联系起来，那这些成就是不会很巩固的。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商品流转是在货币流通的条件下进行的。

没有硬通货，要使商品从工厂来到农村，或者从农村来到工厂，就没有可靠的途径，因为在货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在这条道路上经常会形成一些陷坑，它们不仅破坏了商品流通，而且常常使它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东西。由于实行了硬通货，我们在商品交换方面就把城市同农村、工厂同农业非常紧密地联系起来，找到了一条坚固可靠的工业同农业交换的道路。我们以布尔什维克式的气魄决定打破苏维埃卢布，并且在很短时间就把它打破了，以硬通货取而代之，当时许多人曾经对我们实行硬通货是否能行得通表示过怀疑。现在大家已经看到，这项巨大的改革作为决定着整个经济恢复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已经完全实施、彻底完成了，而且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完成的。我想在座的诸位未必谁手里还持有旧的苏维埃纸币。危险的是我们在预算里有一些不能不用的开支，可是我们却没有抵偿这些支出的收入来源，那时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发行新的纸币。实际上这样做就又等于回到了贬值的苏维埃卢布上来，因为卢布既然贬了值，那有时我们就得用“印刷制度”即用印刷无数毫无保障的钞票的制度来代替通货制度。

这种危险至今仍然存在着，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存在填不平的赤字，如果我们继续采取发行纸币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会使硬通货遭到破坏。到了今年，我们第一次在不发行纸币的情况下做到了预算收支平衡。如果大家问我，这样的预算好还是不好，那我就要告诉大家说，这个预算是好的，因为它没有再发行钞票，因为它是完全实在的，也就是说预算里说多少就是多少。这个预算是不好的，因为还有很多迫切的需要都没有列入预算，对某些需要的拨款数额太少。

预算和我国经济的发展

你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一点，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经济部门的拨款上，而且甚至表现在我们的高等学校、工农预备学校、保健事业等等方面的拨款上。从这个观点看，这个预算是不好的，因为它不能满足我们苏联在甚至是亟须的开支方面的需要，不能满足广大居民群众即使是在发展学校网和文化机构方面的需要。绝不能认为这个预算是理想的。这个预算从作为更快恢复我国经济的起点来说尚可容忍。这个预算可以实行一年，至多不超过两年，但是如果不顾满足某些非常重要的需要，长期地实行这样的预算，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不过对今年的预算是必须通过的，因为它是唯一可能的，它可以保证我国整个货币制度的稳定，保证我国通货的可靠性，保证我国经济的发展，并可以在这一基础上使我们有可能在今后几年里迅速地扩大预算。所以，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拒绝满足那些人所共知的和合理的需要，而在于把满足这些需要放在下一年或今后两三年内解决，并把这些需要的满足同我们的收入和我国经济的恢复严格地协调起来。

我们的税收比从前减少

在座的都是来自苏联各地的同志，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回答一个在所有集会上人们常常向我提及的问题。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还搞不好，为什么预算的钱那么少，而捐税却比从前多。”我要声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的捐税比从前任何时候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据财政人民委员部统计，我们今年计划征收的和向苏联居民摊派的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在内的全部捐税，按人口平均为七个切尔文卢布。但在战前时期平均每一居民的捐税为十一卢布。而现在的切尔文卢布的价值比战前还低。

至于农业税，根据最近的统计，今年的农业税额大约为农户收入的百分之四。

市场上粮食供应情况差的原因不在于农民不缴税，——税是缴的，但是把粮食收起不卖而从别的什么方面来缴税。这种情况意味着捐税定得不当。我们本来估计随着粮食的大量上市，收的税款会很多，但是我们想错了。有很多地区，比方说北高加索和乌克兰部分地区，是用卖畜产品（牛奶、酸奶油、黄油等等）、瓜类或向日葵（在北高加索）等等得来的钱缴农业税的。另外，有的农民还在把小牲畜拿来缴税，某些地区的小牲畜的头数已超过了战前。这样就造成了肉类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尽管今年的粮价比去年高两倍，但是农民对卖粮食还是非常谨慎。

粮食价格高

我不知不觉地转到去年我们解决了的和今年仍须解决的问题上来了。去年经济政策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剪刀差”、价格政策、硬通货以及预算问题。这些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尽管有某些局部的不成功的地方，但至少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已经前进了一

大步。现在的困难在于粮食的价格高，流动资金不足和商品缺乏。去年9月，地方上农民卖的黑麦为二十七戈比，而今年9月为六十二戈比。去年9月小麦的价格为五十三戈比，今年为九十六戈比。当前的主要经济形势就是如此。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政策的最主要的焦点——工农结合问题和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问题，也就在于此。粮食的价格问题表现了我们在农民方面的政策的全部复杂性。今年的粮食产量要比去年减少百分之九至十。所有的统计材料都说明，对所有苏联居民来说，粮食是足够吃的，丝毫不会有困难。我们制订了一个采购计划，打算在10月1日以前通过我们的各种组织采购一亿七千万普特粮食能来保证城市、工人阶级和军队等等方面的需要。我们只采购了一亿一千七百万普特，即尚差五千三百万普特。从前我们的计划里还包括出口粮食，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放弃了这一项目。粮食的采购价格往往高达一卢布和一卢布二十戈比。在党和工人阶级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对粮食价格很高和越来越高的这种情况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们对此采取了限价的办法，也就是说为国家采购人员规定限价，黑麦定为五十七戈比，小麦定为八十四点四戈比（全国总平均）。

必须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进行协商

粮食价格可以说是需要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进行协商的一个问题。

当然，工人希望粮食便宜一些，而农民则希望粮食贵一些。但是在苏维埃俄国的条件下，不仅非常希望，而也非常需要实行农民同工人之间的合作。必须找出一种办法能使双方都满意。不能接受农民的要求，也就是说不能在1924年使黑麦的价格高于一个卢布。为什么？因为粮食的价格决定着工人工资的很大一部

分。工人的工资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商品的价格。在编制我们的预算时要考虑到粮食的价格。如果粮食价格无限度地提高，我们的预算就要落空，因为这样就会引起工资的提高，引起商品价格的提高，使我们的整个价格政策和消灭“剪刀差”的斗争遭到破坏。

粮食价格是计划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对粮食价格不加以控制，让它自发地和自由地发展，我们就会失掉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主要杠杆。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但是与此同时，农民对去年那样低的粮价表现的不满，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去年9月黑麦的价格定为二十七戈比对农民来说实在低得可怜，根本不会使农民关心农业的发展。必须定出一种价格，使它既能让农民满意，觉得搞农业有利可图，又不致破坏我们的货币政策和预算政策，不造成所有工业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因此我们规定了限价，把所有的粮食产品都平均控制在七十五戈比的限额内，也就是说，在价格上小麦可以略高一些，黑麦可以略低一些，燕麦可以更低一些，如此等等。

同去年相比，我们定的价格是非常高的，但是这样的价格并不会使我们的计划经济、工资和价格政策遭到破坏，相反，它使我们有可能实行降低工业方面的价格的政策，我重说一遍，尽管我们的限价低于粮食市场自发形成的价格。如今在农民中间，到处都在议论关于限价的问题，当然，工会会员免不了要同农民谈论现在条件下这个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每一个工人都应准备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让粮食价格无限制地和自发地提高下去，为什么这样做最终对农民也是不利的。

防止粮食价格过高的方法

今年粮食价格高的主要原因在哪里呢？造成粮食价格高的主

要原因正如上面我讲过的那样，农民不是用卖粮食的办法，而是靠许多其他农业项目的收入来履行自己的缴税义务。在我看来，除了这个原因之外，粮食价格高的根本原因是粮食的数量太少，就是说，收获量比去年降低了，而与此同时，歉收地区的粮食需要量却提高了。第三个原因是秋播的状况不够好，因为有很多地区，包括沃罗涅什省、坦波夫省、奔萨省和萨拉托夫省的部分地区在内，秋播的状况不及平时，这就使农民不得不把存粮留到来年，暂时收起不卖。当然，如果丰收在望，这个原因也就不存在了。最后，第四个原因是扩大播种面积和为了同东南地区的灾荒作斗争，我们不得不从市场抽出三千多万普特种子粮。就是这四个最主要的原因决定着粮食价格提高的可能性。

防止粮价过高的主要方法是扩大播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促进农业的集约化和大发展。我们今年采取的办法即限价的办法只能是一种临时措施。防止以后出现类似今年的粮食价格的情况的根本措施在于增加粮食的产量。尽管粮食价格很高，但是今年我们并没有在种子上少给农民支援，因为种子支援决定着播种面积的扩大和来年粮食的增加。

商 品 荒

目前经济政策中的第二个问题是商品荒。弗·伊·列宁曾经说过，工人阶级应该向农民证明，在工人阶级专政条件下，农民的生活不会比在地主和贵族专政时期坏；工人阶级和苏维埃国家应该向农民证明，国有化工业在为农民的需要服务方面不会做得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差。

现在我们国家出现商品荒，这对于农民的利益是一个沉痛的打击，由于商品荒，我们至今都不能满足农民最起码的需要。起先我们认为这只是偶然现象，多数计划工作人员说商品需求是同

庄稼收完和产品出售有关，一个月后我们将面临市场萧条。但是卖粮的旺季已过，粮食已经脱粒，部分已被售出，结果我们却未见什么市场萧条，商品荒并没有缓和。消除商品荒的唯一可能的办法是扩大工业，目前已在这样做，这一点我在谈到纺织工业时已经讲过了，但是我担心这种扩大未必会很充分，因为我们工业的扩大不仅取决于市场上的需要，而且取决于资金的数量，即要看工业能有多少资金，我们能为工业提供多少贷款。但是这些资金暂时还非常有限。因此，今年可能还会象去年一样，不得不通过某些办法动用我们一部分金币。去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大一部分原料，特别是进口了很多棉花用来供应我们的工业。今年看来还得这样做，这就要动用外贸顺差中的余款。

如果不能很快地用发展工业来满足市场最迫切的需要，那么在发展工业所必需的那段间隔时间里就有可能要进口某些制成品。现在这个问题正在讨论，但是进口什么和进口多少，目前还没有决定。

我们的商业政策

目前我们政策中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到我们的商业政策。休息室里有一位在工人合作社工作的同志来找我，抱怨说最近工人合作社感到了某种“压力”；压力在于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给合作社贷款，即使给，也要以支付百分之五十的现金为条件。从农业合作社那里我也听到同样的抱怨。所有的合作社都要求工业能把它们视为自己的经销处，根据需求量多少把商品赊给它们。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合作社政策在这方面应当同总的政策和总的利益协调起来。

合作社要求纺织厂给它以无限的贷款。但是岂知纺织工业发贷款只能靠自己的流动资金，工业只能从自己的流动资本拿出钱

来作为给合作社的贷款。因此，这种贷款应该是有限度的，至少不要让它成为扩大工业的严重障碍。

工业的流动资金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有限的，每一个工会会员都清楚这种情况，即使从欠发工资这一点也可看得出来。要求工业为合作社提供无限的资金，这不仅意味着限制生产的扩大，而且意味着继续拖延工资的发放。这样做是否应该呢？我认为不应该。至今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之间的差别还是很悬殊的，特别是在私商那里。私商卖的印花布的差价达到百分之七十三，糖——百分之四十七，如此等等（这是今年9月莫斯科的统计数字）。现在这种差价是由下列两个原因决定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生产的商品太少，商品荒。第二是合作社不够发达。但是，在某些地方机关看来，去年实行的商业政策应能做到在两三年内使所有的居民都参加合作社，并为之提供必要的资本。这是一种自己骗自己的想法。要求工业为合作社提供长期的和大量的商品信贷，而这些信贷往往又都不能如数按期归还，这就等于把工业中的大量资金抽出来投入商业和阻止工业的扩大。在工业流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工业投到商业的资金越多，工业也就越没有可能使生产得到发展和进一步扩大，而这种扩大恰恰又是市场需求和农民需求对工业的强烈要求。

关于合作社和私人商业

今后是否可以继续执行这种依靠工业无限制地给予合作社以贷款的政策呢？我认为是不行的。过去实行的那种无限制地为合作社提供贷款和取缔私商的做法是不正确的。我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来到城里要求给予贷款，并且从许多工厂那里得到了贷款，可是他们除了列宁同志写的小册子《论合作制》以外，拿不出别的什么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偿还能力。然而这本小

册子并非商务契约。由于这样一些缘故，我们最近可能在基层合作社发生危机，因为有大量工业资金陷在里面而长期抽不出来。虽然私商用现款买东西，但是许多托拉斯和工厂却把他们拒之门外。在同私商进行斗争中，有时采用行政压制手段，但事后却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战胜了私商。”说这种话的人往往忘记了不应把经济竞争战线和行政战线混淆起来。我们早就知道，政权和行政机关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可是你用经济手段来战胜私商试试看，这就比较困难了。必须改正这些对私商采用行政压制手段的做法的缺点，修改依靠工业无限制地给予合作社以贷款的办法，如果私人资本愿意用现款来发展商业，有时也可以利用私人资本。

我们现在的处境是：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工厂和扩大流动资本，因此我们还不能完全拒绝在商业领域里利用任何私人资本，如果这对工业是有利的话。有人对我提到这样一些地区，在那里虽然消灭了私商，可是却没有组织起任何别的商业来。执行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前一半即“同私商进行斗争”，却忘记执行后一半即组织公营商业，因而在这些地区没有任何商业。对于经济和居民来说，这就是犯罪行为。我再说一遍，今后合作社应该更加具有商业的性质，而不能只把工业看作是取得贷款的无穷无尽的源泉。合作社应该自己筹集资金，应该从居民那里吸收资金，而不应该仅仅指望取自国家。

因此，应该适当地缩减拨给合作社的贷款。当然我们今后还要竭尽一切力量通过党的、苏维埃的和财政的系统来发展合作社，但不能削弱我们的工厂和我们的工业。这是我想在报告中谈的目前政策的最后一个问题。

劳动生产率的问题

现在我简略地谈谈决定我们今后若干年的政策的问题，这就

是劳动生产率问题和恢复固定资本问题。关于劳动生产率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已对你们详细地谈过了。劳动生产率、工厂生产率问题是同整个组织我们的工业和组织新社会联系着的。我们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是组织包括我们工业在内的经济，使它能以最少的劳动消耗提供最多的产品。我们必须提高技术和提高劳动组织。但这不仅仅是当前的问题，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问题。一旦工人阶级显示出他在工人专政条件下能比福特和资本家更好地组织劳动和进行工作，这样他就解决了整个十月革命的主要问题，并以大家都看得清楚的经济实践表明我们的制度在最困难的事业上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一旦我们解决了苏维埃国家全部政策的这一基本的、最困难的问题，我们就有充分的权利说，过渡时期的所有最主要的困难都被克服了。

我再重复一遍，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提高工业生产率问题，是整个过渡时期和整个十月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在若干年内解决的我们全部经济的最重要的问题。按照目前的安排，我们仅仅朝着这个问题的方向稍微迈出了一步，因为它包括改造我们的工业、改进我们的机器、解决使工厂靠近燃料和原料产地的问题以及电气化问题等等。这个问题和恢复工业的固定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我们现在已能做到的个别技术改进工作，只是这个问题所包括的一个部分。但在这一系列问题中，利用我们现有的手段最容易解决的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上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因为我们拥有立即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而其他的一些办法——电气化、用最新的机器和机床重新装备整个工业的问题——则需要花费大量资金，需要积累资本。为了取得这些资本，必须从工人和农民已经掌握的生产基础出发。把剩余资金积累起来，逐渐地增加国家的财富，我们也就能实现所有其他各项任务。

我们现在也正在实现这些任务，不过暂时还做得不够。折旧基金和我们用于恢复工业的拨款约有一两亿卢布，但实际上却需要几十亿卢布，在今后若干年内我们应该把几十亿卢布以累进的速度投入我们的工业，如果我们真想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话。但这种可能性首先取决于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其次取决于我们为了减少非生产性开支和消灭我们经济中直到现在依然存在的许多胡作非为现象所进行的斗争。只有在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我们才能着手解决所有其他各项根本任务。工人阶级专政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一点，因为如果工人阶级专政不让苏联人民、农民、全体一亿三千万居民具体地看到，在工人专政之下工厂工作得到改善、产品价格在降低、在苏维埃制度下生活一年比一年好，那么当然也就无法保持专政了。

怎样实现城乡结合

在结束这个报告时，我要谈一谈最后一个问题即工人群众现在非常注意的城乡关系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谈工农结合，不论我们的经济现在提出什么问题（关于发展工业问题、关于花布价格问题，等等），都必须从工农结合的角度去加以研究。为什么现在必须这样做呢？因为工人和农民一起进行了十月革命。在国内战争时期，农民和工人并肩战斗，战胜了地主和资产阶级。可以说，这在当时是工农两个阶级在消灭战争、消灭沙皇专制、驱逐地主和资产阶级等问题上的政治联系、政治联盟和政治联合。在那时，有许多原因使最落后的农民都能清楚地了解工农联盟的必要性。但是如果你们看一看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时期的农村是独立生活的，无论是在商品流转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几乎都和城市没有联系。例如，1921年的材料告诉我们，工业产品在那时几乎未能到达农民的手里。在余粮收集

制时期，农民的生活异常艰苦。这是农村日常生活和工业、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的时期，两个阶级各过各的生活，互不来往。

现在，这一切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如果可以这样说话的话，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已经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对你们谈过的农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意味着农村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的需求（拖拉机、犁等）都有了很大增长。现在到处都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农民现正全力以赴地恢复农民经济。这项恢复工作只有在城乡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即使从下列的具体事例也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农民派遣青年人到城市和执行委员会去学习什么是拖拉机和怎样驾驶拖拉机。这些新一代罗蒙诺索夫们，因为在农村的范围内解决不了他们面临的问题，所以就从农村来到城里向工人请教。在任何一个文化领域，在苏维埃建设的领域，都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城市和农村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越来越互相交织在一起了。在农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农民渴望提高文化，并且力图实行农业集约化。城乡之间现在已经有了非常紧密而又巩固的联系，所以城乡结合问题更加迫切了。

工人阶级应该领导农民

农民非常关心城市的情况，他们知道工人工作多长时间、怎样生活，他们也知道工人有休养所、托儿所，等等，可是工人现在对于农村，并不如农民对于城市了解得那么清楚。工人为了同农村结合，就必须把了解农民生活和他们的需要纳入自己任务的范围之内。工人阶级、工会、工人组织和党无论在加强对农民的经济援助方面，还是在以知识和文化援助农民方面，都应该在实际上表现出对农民的领导。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就会在越来越增长的、无数的城乡关系的各个环节出现很不正常的现象。因此，

现在到处都在高呼“面向农村”的口号，这是工人阶级农村政策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口号。现在实现这项口号比任何时候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城乡利害关系的彼此渗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必须比过去更加关心农村的生活及其需求。（掌声）

结 束 语

同志们，有几位发言人已就我的报告表示了自己的意见，除此之外，我还收到了几百张条子。有些条子的内容不仅涉及一个工业部门，而且也涉及许多工厂，不仅涉及一些工厂，而且还涉及个别车间。我根本不可能对往往涉及极其局部的个别问题的所有这些条子一一予以答复。我只想说，如果我脱口说出了什么话，使参加这个大会的某个同志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我们认为我们工业的组织制度、行政工作、工厂状况等等，一切都很圆满，——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论在哪里，都有很多工作要做。无论在上级机关，还是在下级机关，不仅有舞弊行为，而且还有错误、不善于工作等现象。

尽管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然而对于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机关和工厂却仅仅做了极少一部分调整机构的工作。我们将来必须做的工作要比过去已经做的多得无法比拟。这就是我应该十分明确地着重指出的。

合作社的不健全倾向

在指出这一点以后，请允许我谈一谈欣楚克同志对我的报告中有关合作社和私人商业的部分所表示的不同意见。如果有人认为我是反对合作社的，那可能是因为我说的话没有表达正确。合

作社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合作社，如果没有合作社的不断发展，我们就不能走向社会主义。所以共产党的纲领和工人阶级的全部政策都要求我们加紧发展合作社的工作。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不容有任何争辩余地，在这方面我们的政策不能有任何变动，如果欣楚克同志说我反对支持合作社，我想那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理解我的话。我提到了我们在居民当中推行合作化工作的个别方面。

我不想宣布说明合作社情况的数字。我只是指出，合作社的债务很大，如果把合作社的自有资本的数字跟它负债的数字加以对比，那就应该着重指出，在这里应有的比例已遭到破坏；在自己的资本和被合作社用来进行工作的他人的资本之间不复存在应有的协调关系。在对比这些数字时使人感到大为吃惊的是，合作社的股本远远少于它的负债额。

不能按期偿还的欠债的百分比是相当大的，关于这一点我暂且不谈。我仅仅提请大家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合作社对我们的托拉斯、工业的巨额债务相应地减少了我们工业本来就不足的流动资金，从而延缓了我们工业的发展，而在现在市场对工业品的需求业已提高的条件下，生产发展的规模完全取决于工业流动资金的多寡。

我并不象欣楚克同志对我指责的那样“主张平等”，主张合作社不得比私人商业享有优越地位。我是主张合作社应该比私人商业享有优越地位的，但是这种优越地位不应该毫无限度，否则就会使我们的工业发生危机。到目前为止，合作社是靠工业的资本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的，工业给合作社提供了资金，但由于贷给了合作社数亿卢布，它自己却不能发展了。必须使合作社处于优越地位，但是如果正当工厂因欠发工资、流动资金不足而在设法筹集资本时，一个偿还能力没有多大保证的合作社来到工厂单纯

要求赎购，同时也来了一个私商愿拿现款买东西，那么我们的工业部门是否应该对这些私商一概拒绝呢？我认为是不应该的，为了保持某些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也可以把东西卖给私商。工业部门不能以过去那样不断增加的数额来给合作社增加信贷。对给合作社增加信贷的做法必须稍加限制，并要求它用现金来支付一部分款项。我看不到还有别的什么办法。

银行纸币发行的限度

某些同志建议可以进一步利用银行发行纸币的方法来增加给予工业、合作社等等的贷款。但是银行纸币我们本来已经发行很多了，如果再增加发行额，那么切尔文的币值就有波动的危险。其实，在苏维埃俄国保持稳定的币值的唯一办法，就是限制银行纸币发行额；无论是银行的暴利，还是投机倒把都会影响我国的币值，只有限制发行额对于我国才是可行的，而又不致影响币值。

交通人民委员部和五金工业

现在我来谈谈同志们提出的个别的不同意见。今天我在这个讲坛上所说的话，正是我每天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在我的办公室和各种会议上所听到的。乌克兰、顿巴斯、南方钢铁托拉斯、乌拉尔以及其他地区任何时候都在竭力证明：只有它们的企业才应该完全承担国家定货。这些机关的每一个代表都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承认他们每个人都是正确的，那么就应该把所有定货发给每一个工厂。不管我们怎样来分配这些定货，一定会使某个人“受委屈”，而且在这些争辩中“受委屈”最多的是交通人民委员部。阿莫索夫同志在这个讲坛上所说“强迫我们向五金工厂定制我们在五年之内所不需要的东西”这段

话是正确的。他指的是由于我们在四年前所犯的错误而从外国进口的机车，这些机车足够我们的运输业在未来的五年期间使用。我们现在所以让交通人民委员部购买它所需要的机车，只是因为我们不想关闭也不可能关闭机车制造厂。要知道我们说的是索尔莫沃、科洛姆纳和其他许多大型五金工厂。如果把它们的机车间封存起来，那么过五、六年之后是恢复不了的。我们向这些工厂发出少量定货，使它们维持现状，以便过五年之后能够展开制造机车的工作。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预算收支相抵，没有赤字；预算所拨的购买机车的资金，从运输业的观点来看，是铁路其他许多方面所需要的。

不久以前，鲁祖塔克同志给我看了一张很有趣的铁路路线图。在这张图上用各种颜色标出了能通过载重列车和重型机车的区段和不能通过载重列车和重型机车的区段。原来，每条铁路线都有这样一些不能通过载重列车的区段。要么必须使列车车辆适应于情况较差的区段大大增加运输费用，要么就必须更换机车或摘掉一部分车厢。

如果我们对所谓线路上层结构进行一次彻底的修理，就能使运输费用大大降低。从运输经济学的观点看，运输业工作者的意见完全正确，但我们不得不推迟所有这些工程的主要部分，这只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拿不出钱来进行这项工程。我们没有钱搞这项工程，也拿不出钱进行刻不容缓的其他许多工程。

关于工业的负债

在条子里和发言里都指出了许多欠发工资的情况。我想，关于欠发工资的原因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这些原因在于：经济工作者有时拿应发工资的款项去增加流动资金，即将工人应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挪用于工业所需要的其他许多项目。这是因为工

业缺少流动资金的缘故。

如果工业的流动资金增加了，这种负债现象就可以彻底消灭。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工业还不得不在极端缺乏流动资金的情况下工作，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和工会工作者应该严格按财务能力来进行企业的工作，更精确地估计财务能力，要量力而行。我们现在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拿顿巴斯作为例子来说吧。在那里，欠发工资的情况很严重，欠发工资的款额很大。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其原因之一就是：顿巴斯没有估计自己的财务能力，把生产搞得比计划所定的规模还大，它所生产的煤比需要的还多。剩余的煤成了呆滞资本积压起来，然而为了生产这些煤却使用了一部分流动资金。

信 贷 和 竞 争

其次，在讨论时有人指出，轻工业得到的信贷比重工业多；有人对比了银行发给纺织工业的信贷和发给南方钢铁托拉斯的信贷，等等。问题的这种提法是根本不正确的。应该指出，重工业现正处于形成自己的资本的过程中。因此，银行说重工业需要的不是商业信贷，而是长期贷款，而银行只能提供小额信贷，从银行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我们不想破坏在市场条件下工作的我们的银行制度，那么，银行自然应该向那些资本周转迅速、信贷周转迅速和信贷有可靠保证的企业提供贷款。因此，在审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时，要算出银行给予某个托拉斯的信贷对于该托拉斯的自有资本所占的百分比，那是完全不正确的。

有人埋怨竞争的现象，这同样是不正确的。有一位发言人埋怨说乌拉尔和南方钢铁托拉斯等等之间在相互竞争。它们相互竞争是件非常好的事。从新经济政策和降低价格的观点来看，从工

人和消费者的观点来看，这都没有坏处。竞争没有任何坏处，尤其是在商品荒时期。人们是在好事方面互相竞争，互相斗争。且看他们当中谁占上风。新经济政策的一个优点就在于：要在市场的条件下、在市场的考验下、在竞争的条件下检验我们的工作。我耽心我们救助得太多、太频繁了。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曾指望实行新经济政策会使市场把我们一些较好的企业选拔出来，同时必然会有一些企业遭到破产，然而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却认为应该做的是挽救这些企业，不是让它们破产。我们现在不是苦于我们国营工业中竞争太多，而是苦于这种竞争不够。

市 场 调 查

其次，拉德琴柯同志指出，我们对于市场的调查工作做得不够好。这个意见完全正确。还在一年以前我就说过，我们面临着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农村市场。我现在还是认为我们不了解农村市场。我们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比在这个讲坛上提到的要多得多。我记得在农业机器制造业方面发生的一件事。在统计机关和经济机关参加下，制定了农业机器制造业的计划。后来发现，这个计划比农民不久以后提出的需求不知要少多少倍。但是，从这里得出了什么结论呢？资本主义国家怎样了解自己的市场呢？经过许多年，才可以弄清楚对哪些商品的需求有了增长。

我们目前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也在经济方面处于一个革命时期。正在恢复的农民经济向我们提出了一些要求，可是我们对这些要求却一无所知。我们每一个机关只会引用战前的数字，并且根据这些数字来判断战后的需要。事实证明，有关战前时期市场需求的资料，对今天已不适用。但是我们还没有别的资料。当我们缺乏这类资料时，可以找出一个别的办法，就是要建立一种可以用来满足突然增长的市场需求的商品储备。但是为了做到这

一点，必须储备大量农产品和其他商品，这就需要很多钱，然而我们却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所以即使在将来，在市场需要的统计方面也很可能有错误。如果指出这些错误，那我们就做对了；但在市场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轮廓即还没有“稳定”和被我们更加详细地了解之前，除了建立商品储备以外，我们再想不出别的办法来。我们的工业正在逐年地越来越与市场的需要相适应，但我认为，我们将来仍然难免犯错误，尽管错误会日益减少。

关于五金工业定货的分配

我只再谈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正确地分配定货、及时制定和批准重工业计划的问题。我应该告诉你们：我不仅荣幸地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而且曾经长期是索尔莫沃工厂的工厂委员会的名誉会员，我很了解这个工厂在它因为分配定货不合理和急剧改变生产计划时所产生的那种不利的、紧张的状态。上级政府机关考虑到这一点，成立了专门的五金工业政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工作了整整一个夏天。我认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其中有省的代表、工会代表，还有象捷尔任斯基和古比雪夫这样一些同志参加——就是它的能够顺利进行的一个主要保证。

劳动与国防委员会日内即将讨论这个政府委员会关于五金工业计划的工作总结。为了更好地组织我们的五金工业，我们派了许多最得力、最能干的干部去充实那里的工作。我们希望在解决发展五金工业和改善它的组织这项最困难、最重要的任务时，也能得到工会方面最积极的支持。我认为由于经济工作者和工会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在改善我们五金工业的组织方面以及五金工业的全部工作方面，必将取得巨大成就。

住 宅 问 题

有人对我指出，我在报告中没有谈到住宅问题。我所以没有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这个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另一个报告里已经谈了这个问题，尽管我在这个报告的提纲里也列入了这个问题。

在许多年之内，我们都要重视住宅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住宅方面的困难情况。在某些城市，一个工人的平均居住面积只有九至十俄尺。为了使城市居民在最低的卫生标准方面能得到保证，我们必须把现有的居住面积增加三分之一。这项工程所需要的钱是我们现在还拿不出来的。我们打算在最近一年里拨出七千万至一亿卢布来扩大住宅建设。这笔款子将由特别住宅税和国营企业利润提成等项下拨付。

政府已经实行许多优待办法（优待计算运价、伐木费办法等等），以促进住宅建设。但是，我再说一遍：这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有大量的拨款，必须有数亿卢布。

恢 复 固 定 资 本

有一张条子对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恢复工业固定资本的情况怎样？你们都知道，在各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里都有所谓折旧费一栏，即恢复固定资产一栏。1922年扣除折旧费七千二百万卢布，1923年扣除折旧费九千四百万卢布，1924年扣除折旧费一亿五千五百万卢布。在这三年里共计扣除三亿二千万卢布，其中一亿二千万卢布已经支出，在折旧基金中尚余二亿卢布。这项基金数额完全不算大，经济工作者现在提出了增加折旧基金的问题，我想，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我们是用建立专门工业基金的办法，还是用别的什么办法来做到这一点，我们都必须着手更迅速地积累资金，以恢复我们工业的基本

力量。

工人阶级负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责任

最后，我来回答对我提出的指责。指责的内容是：我没有强调我们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所取得的那些成就。应该说这些成就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来了。我们降低了物价，缩小了剪刀差。这都说明生产费用有所减少，从而导致物价的降低。但是，成就还不够大。今后，在提高工人的生产率方面和改进技术方面也要采取一些措施。那位说必须尽量强调改进技术和加强技术员责任的问题的同志，是不正确的。

当你同技术员谈话时，他会对你说：必须强调工人的作用，使他工作得更好。然而当你同工人谈话时，他会对你说：必须强调改进技术的作用。在这里，必须强调两方面的作用：提高劳动强度和改进技术。工人阶级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对于全国负有政治责任，它应该注意这两个方面，并力求取得最大的成就。

* * *

对李可夫同志报告的讨论

乌加罗夫同志（乌克兰）谈到按时发放工资的问题时指出：重工业工人的工资迟发一个月或更长一些时间。在乌克兰，工资的大约百分之四十发现款，百分之六十是合作社的赊购品。有时工人从合作社赊购相当于工资百分之百的物品，因而往往发生拿不出钱交纳党费的情况。这些不正常现象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不良影响。据发言人观察，一个工厂每迟发工资一天，就能使生产率降低百分之八。

乌加罗夫同志在提到劳动生产率问题时指出：在他同工人接

触时，并未发现他们对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持反对态度。目前只在一个方面即在靠体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展开了运动。直到现在，还很少注意改善企业设备的问题。

列普斯同志（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在介绍五金工业的现状时指出了全国对于五金需求的增长。南部地区钢铁工业托拉斯提前一年就售完了全年产品，这一事实就是一个明证。列普斯同志认为，其他工业部门的增长取决于五金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许多工业部门都具备了使生产量超过战前水平的条件。但是为了扩大生产必须使设备有一定的改善，只有在非常发达的五金工业的支援下才能取得这种改善。

发言人指出，五金工业生产规划长期订不出来，这就使托拉斯的各工厂不能正常工作。此外，必须着手制订下一个为期三至五年的规划，因为五金工业截至目前为止所执行的五年规划已经完结。

列普斯同志还指出：给五金工业提供的贷款很不够。五金工业去年的资金周转额为三亿二千万卢布，它得到的信贷却只有三千八百万卢布。生产农具的工厂特别需要贷款，因为它们的产品是赊销给农民的，要三年之内才能收回贷款。上级经济组织应该特别注意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拉德琴柯同志（顿巴斯）提请大会注意，我们的工业还没有远景规划和稳定的生产计划。顿巴斯现在积压大量的煤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由于考虑不周，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某些工厂为了生产所接受的定货必须事先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可是别的一些工厂却能立即生产这项定货，而不需要任何准备工作。发言人看到在我们的工厂（例如，普梯洛夫工厂和尼古拉耶夫工厂）苦于无事可做时，却有人向国外定货，他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应该最大限度地缩减国外定货，把这些定货交给我们的工厂

去做。

其次，发言人还指出，在生产方面还没有充分使用工程师和技术员的力量。

魏恩贝尔格同志(列宁格勒)谈到我们企业的劳动力时指出，我国工业劳动力的增长超过了工业的实际需要。这一点对产品的成本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往往有人企图把这个问题的重心转移到增加生产定额和降低计件单价方面去。我们不反对增加劳动强度，但也应该特别注意改善生产设备。劳动生产率问题又提出了训练技术人员问题。这个问题应该通过选拔优秀工人，对他们加以训练后，让他们担任工长、组长等职务的方法来解决。

发言人接着指出，列宁格勒有许多在设备方面极为重要的工厂，可以利用这些工厂为纺织工业和其他重轻工业部门更新设备。我们必须支援这些工厂，并在提供贷款方面特别照顾列宁格勒的工业。

欣楚克同志说，1923年秋季的危机使合作社的状况受到极大影响，但是它仍然能够全部偿还了七千万卢布的债务，尽管并没有恢复对它的贷款。

欣楚克同志不同意李可夫同志所谓的合作社可以通过用行政命令压制私人资本的方法来扩大自己的营业额的说法。欣楚克同志认为各地方的合作社不可能仅仅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使自己的营业额增加二至二点五倍的。至于李可夫同志说的给合作社提供的那些优待条件，我们大会所发的正式文件可以证明：较大一部分的贷款是发给私人商业的，而发给合作社和国营工业的贷款却要少很多。当然我们应该吸收那些可以吸收的私人资本参加商品流转，但是不可以拿我们的资本去扩大私人的营业额。

欣楚克同志指出，没有工会组织参加合作社工作，合作社就不能完成国家交给它的重大任务。

索夫佐夫同志（乌克兰）指出，五金工业直到现在还没有稳定的生产计划，然而对五金工业制品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没有稳定的生产计划，我国就可能发生金属荒。

阿莫索夫同志（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指出，五金工业和运输业之间的工作配合较差。运输业现在发出的五金定货有一亿一千六百万卢布，其中三千万卢布以上的定货是暂时还不需要的五金工业制品，因为这些制品是在五、六年之后才需要的。运输业现在有三千台停用的机车，但是却有人还要在今年向运输业出售价值二千万卢布的一百六十台完全不需要的机车。

现在必须特别注意铁路路线的修整工作，然而直到现在却在不需要的五金方面花了一些钱。路线状况现在很糟。

发言人认为在经营管理方面必须建立更加正确和更加正常的相互关系。对谁定什么货，应该有明确规定。

古雷伊同志指出个别工业部门之间的对立有了发展。例如，乌拉尔的工业把自己的产品调拨到南方去同南方的工业进行竞争。发言人认为，必须消除这种不健全的现象。

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使我国工业与市场的容量相适应。在向国外定货时不考虑我国工业的资源。哈尔科夫机车制造厂把自己的车间改建为制造拖拉机的车间，并将生产机车的计划减少了四十三台，然而直到现在还从国外进口拖拉机。

发言人认为，我国工业的最近发展必将引起高度熟练工的缺乏，并提请大会注意，必须采取提高劳动力熟练程度的措施。

罗森塔尔同志（乌拉尔）认为，必须广泛介绍我们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乌拉尔，我们取得了这些成就。必须让农民和工人都知道，我们在这方面并

不是只说空话，运动已收到一些成果。

必须强调改善组织和技术的问题。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目前还做得非常少。

译自《真理报》1924年11月18日。

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任务

(1924年12月1日在全俄工程师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来发言是为了代表政府向你们表示欢迎，也是为了着重说明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人员在十月革命后所起的重大作用。

十月革命后俄国的任务是组织 社会主义社会

在人类和国家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曾象我国十月革命后这样向科学技术人员提出过如此重大的任务。苏维埃国家自成立之日起就认为自己的最主要的基本任务是把一切科学技术成就变为人民的财富。十月革命后俄国的任务是组织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说我们所组织的经济，所组织的社会以及取得的人类对自然力的胜利，应当能彻底消灭任何饥饿、贫困、不文明和落后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成为自由的人。我们只有善于把科学技术的全部成就用于生活，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组织我们的工业、我们的农业、我们的整个经济，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本身才是可能的。

苏维埃国家为科学技术提出这么巨大而广泛的任务，这是史无前例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建立在比组织资本主义社会更

高的技术基础之上。因此，根据共产主义纲领，根据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纲领，必然出现大力发展科学知识并用之于生活的必要性。而只有照此办理，我们才能加速组织社会主义社会。

锤 砧 之 间

不久前庆祝了十月革命七周年；在我国经济的各方面，在国家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方面，都进行了总结。我觉得，在科学技术人员占最显著地位的知识分子的发展方面，现在也可以作出最主要的总结了。

在十月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曾经处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锤和旧俄的铁砧之间。在那种状况下，知识分子当然饱经困苦并且摇摆不定。同沙皇制度和旧社会资产阶级上层关系最密切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流亡国外。这是历史地完全不可避免的。不必说作为资产阶级或沙皇俄国的思想家，因而成为十月革命的直接敌人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就连广大的知识分子都沾染了旧制度的思想意识，所以久久弄不清楚十月革命的意义，对苏维埃国家的长期存在感到不习惯。

只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大家才明白十月革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对整个人类有着特别深远的影响。最近两三年对知识分子所作的最主要的总结，可以说是他们接受了十月革命。大多数知识分子完全赞成十月革命，对巩固的苏维埃制度已经完全习惯。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科学技术人员。

苏维埃知识分子

在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同工

人们一起在工厂里经历了极其艰难的岁月。我觉得，一般说来，目前可以而且应该把知识分子看作苏维埃知识分子。这一点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明显，当时除了国营经济之外，还出现了私人经济和租让经济。我们在讨论新经济政策并谈到专家，科学技术人员对待新经济政策中私有原则的态度问题时，有些人担心专家会离开我们，担心专家们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会支持私营企业主和租让企业的承租者而反对国营经济和公有经济。实际上，这些人错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指望组织起国营的、公有的苏维埃经济，而指靠其对立面即私有者的只是一小撮。这一小撮人在专家中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我知道，有些工程师对这一小撮人非常蔑视，把他们为私人资本服务看作是背叛共同的事业。我觉得，在这方面已有极大的成绩，这种成绩说明，我们目前实际上正在实现为发展我国经济所必需的一切力量的团结。

你们知道，政府过去和现在都认为科学技术教育事业具有极大的意义。这即使从下述事实也可以看得出来：甚至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时期，还建立了以卡尔波夫同志命名的化学研究所和热工研究所这样的机构。在财政许可的范围内，我们在今后还要帮助高等技术院校开展科研活动。

高等院校将培养出新的技术人员。但是谁也不会怀疑，一个人即使获得了最好的、最出色的高等院校的毕业证书，无论如何还不成其为专家。他应当在富有经验的专家指导下通过实际工作取得这个专家称号，他应当在同老一代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一起工作的同时，经过很好的实习期。你们应当把你们的知识和你们的经验传授给新一代。

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来特别重视吸引科学技术人员自觉地参加苏维埃国家面临的经济工作。在十月革命后的条件下运用科学技术，比其他任何制度都有更大的优越性。每一个电工技师，每一个矿业工程师，即使根据挖掘矿井、敷设电缆和组织电气事业的经验，也都能证实这一点。

在组织新的社会经济的时候，是无须考虑私有权和资产阶级法规的，然而在任何资产阶级社会中，要合理地发展经济，都必须克服由土地、矿藏、交通运输等等的私有权产生的无穷困难。

在组织苏维埃经济方面，科学技术可以直接用来对付自然界的自然力而没有任何形式的障碍。这使苏维埃的公有经济比资产阶级经济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苏维埃制度的另一个优点是由计划经济制度产生的。现在，不仅能安排多年的长期经济任务，而且能够借助整个国家权力机构和国有化的公有经济的全部力量来完成这些任务。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这种计划经济。为了保证使这种计划经济能运用科学技术的全部成就，我们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它在我国经济建设的一切问题上都有极大的影响和极大的作用，并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基本核心是些很有学识的专家和工程师。我们通过这个机构检查我国的全部经济建设。苏维埃制度在实际运用人类智慧的全部成就上的这些优越性，必定会使广大阶层的科学家和专家自觉自愿地参加工作。在目前条件下，他们能在一个大国里以巨大的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简易得多地运用科学技术来组织公共的国民经济。

知识分子和苏维埃社会

我认为，要使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的这种实际工作取得成功，就要解决另一个问题。我习惯于偶尔翻阅国外出版的白卫书籍。侨居国外的人作报告时，通常的一个题目是谈知识分子，说在沙皇时代人们关于知识分子谈得如此之多，知识分子如此受重视，但在发生真正空前变革的时候，知识分子却置身事外，在人民中得不到任何支持，也没有任何影响，正如他们对国家的命运毫无影响一样，尽管他们颇为自负地度过了沙皇时代。这种见解十分正确。知识分子过着非常孤僻的生活，他们在广大工农群众中没有扎根，在同我们敌对的阵营中也没有重大影响。当然，我说的不是以自己的心力和笔杆直接为沙皇制度或资产阶级服务的那些知识分子阶层。那些知识分子阶层过去和现在都是反革命阵营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这种孤僻的生活给旧知识分子造成了这样的结果，那么新知识分子在用技术来适当而又合理地组织经济的工作中，就应当抛弃这种孤僻的生活。因此，我想稍微谈谈知识分子对我们苏维埃工农社会的态度问题。迅速前进的障碍之一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落后和不文明。但是，尽管落后，只要私有者的腐朽的思想影响一消除，那么，维护生产劳动者利益的阶级嗅觉和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就能够而且一定能够使得组织国家和组织社会经济的问题获得大体正确的解决。苏维埃国家就是一种把劳动者组织起来的制度——劳动专政。工人社会是现在这种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恢复我国经济的道路是要通过这种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某些代表人物曾不止一次地向我抱怨说，我们的社会经常具有这样一种特点，即采取不让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有工作机会的做法。我并不否

认有这种情况，我甚至要说，这种社会形式，即广大群众参与管理国家、恢复经济的形式，还没有最终确定，这些形式在许多年间将有变化。但是不能认为，管理苏维埃国家就是参加人民委员会的选举，而人民委员会则照“专政”的方式发号施令。

苏维埃政权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解决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切问题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工人中间也有一些落后分子，他们有时通过苏维埃社会传播自己的落后观点，也有一些工人，他们把本车间的利益看得高于人民的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一切都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工人和农民可以在其中完全根据科学、技术和进步的利益来决定一切的这样一种社会组织起来，那我们就已经是前进了好多好多年了。

应当按人民的本来面目看待人民

毫无疑问，苏联各族人民还在学习，在某些情况下，工人们在决定问题和行动方面，在生产会议上，在工厂委员会里，在其它组织里，都会犯错误，但是，如果把澡盆里的孩子和水一起泼掉，那就冒失了。错误也需要借助这种社会来纠正。应当让越来越多的工人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规模的恢复经济的工作。为了使知识分子不脱离人民，为了使科学技术的好处同人民密切相关，就应当按人民、工人和农民的本来面目去看待他们，并且满足他们对知识的渴望，满足他们改善经济和本身物质状况的意愿。在对专家的态度上大概是有些错误的，但专家那一方面也有错误。我在伏尔加河沿岸的农村旅行的时候，曾见到一些在试验田、试验站工作的农艺师，他们认为同男女农民交往是有损于自己的尊严的，——你们看，他们在试验田里进行科学工作，却不愿同愚昧的农民谈话。当然，科学是了不起的，但是为什么竟不能把

“试验”田的经验介绍给农民呢？农民尽管愚昧，但对农业绝非外行。这是旧日的孤僻生活和资产阶级妄自尊大的结果。在苏维埃俄国，农民是应当而且能够懂得试验田的意义和农艺学的意义的。当然，农妇是没受过教育的、愚昧的，但在苏联的生活条件下，她们愿意成为有知识的人，愿意学习。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中间，有时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但是，须知工人阶级比农民积极和有觉悟。错误是有的，但错误是两方面的——既是某些专家方面的，也是某些工人方面的。然而科学技术的利益和恢复经济的利益，只有在苏维埃社会竭尽全力去实现它们时，才能得到保障。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在一些工作部门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卫生部门。从各工厂和各地区选派代表来贯彻保健措施和改善医疗和疗养机构的工作，这种制度正在产生很大成果，使工人代表并通过他们使工人群众自觉地参与国家的重要工作。

发展科学技术应当是全民的事业

教育事业也应当这样做，摆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面前的也是这条路。发展科学和技术知识并运用它们来发展经济，应当是全民的事业。当人民着手安排美好的前途，发展自己的经济的时候，必须让他们知道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能在这方面给他们以无可估量的巨大帮助。为此就需要有苏维埃社会。英国贵族老爷们是会反对苏维埃的工人和庄稼汉的社会的，但十月革命之后这个社会在我们这里恰恰是苏维埃制度的基础。

在我国条件下，专家、工程师和科技人员对于科学技术问题应当具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完全独立自主精神，在这些问题上，无论是迎合社会，即怕搞坏同工人的关系，还是迎合行政当局，都是不能容忍的。对于每一个真正愿意按照科学资料致力于改造经

济的专家来说，在这方面保持见解的完全独立性应当是必要的。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必须保持见解的诚实和独立性。苏维埃国家承担了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改造整个经济的十分独特的任务。为了正确解决新的技术基础问题，要求专家们在他们所擅长的一切问题上发挥积极性并抱有完全诚实的态度，要求在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中间展开意见争论。如果某个工程师指出我的技术指示（我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曾作过这种指示）是有害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他有权这么说。他是技术专家，而我在技术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可能比在其它任何问题上犯的错误多。因此，建立你们这样的组织，召开你们这样的代表大会，都是有益的，它们提供了在你们最擅长的领域、在技术知识及其应用方面交换意见和交流经验的机会。

专家的作用目前特别巨大

最后，我想着重谈谈你们的工作在目前的特殊作用。

七年过去了，我们该来解决某些问题了，而学识丰富的专家和工程师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作用是特别大的。现在提上日程的是恢复固定资本、经营合理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只有依靠科学技术知识才能合理地解决。我们必须掌握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成就来解决我们面临的任务。因此，工程师、技术人员和专家的作用目前特别巨大。如果我们的状况稍微好一些，我们不怕豁出去犯错误。但是，我们只能靠苏联国内的积累来解决关于改造经济和工业、关于恢复固定资本等问题。

因为这些积累很有限，所以一切都须精打细算，一分钱也不浪费。大家知道，即使从我们同英国新政府发生的纠葛来看，最

近期间也未必能够指望得到西方的支持。我并不认为这些纠葛会导致同英国政府的完全破裂，但贷款问题大概要搁置起来了。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只有英国能够提供借款，因为其余的欧洲国家本身都还需要贷款。

由于我们和美国的谈判还没有开始，而同英国又发生了麻烦，所以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经济和解决我所列举的任务，都应当靠我们善于在我们苏联国内取得资金。

我们今后还要争取西欧的援助，但有两个条件：维护我们国家的全部主权；在十月革命的根本的主要成果上不作任何让步。

照尤兹的声明看来，美国会同意承认我们，但条件是恢复私有制的“神圣”权利，即复辟资产阶级制度。无需赘言，我们当然不会答应这些条件，而且我认为苏维埃制度将比美国现时的制度存在得长久一些。因此，我们应当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目前面临的经济任务。

最后，我相信，苏维埃政权无论在自己的经济建设方面或者在对外政策方面，都将得到知识分子、科学技术人员的支持。

译自《真理报》1924年12月4日。

苏联农村苏维埃政权的 政策和国际形势

(1924年12月15日在全苏农业信贷机关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农业信贷和农民经济

同志们，我今天才能出席你们的代表大会。你们已经听过了许多贺词和舍弗列尔同志的报告。而在这些贺词里，特别是在舍弗列尔同志的报告中，我相信已经讲到关于农业信贷的作用和任务问题所必须讲的一切。因此，为了避免重复，我只概括地谈谈农业信贷和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问题。

这次代表大会是全苏农民的信贷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我现在对代表大会的成员很感兴趣。我看这次代表大会的最大特点之一是，代表大会全体成员有三分之一是农民，即农民群众的真正代表。这还不够多，但是假如我们看看革命前，即沙皇时代召开的有关农业信贷问题的代表大会的成员，我们在那里就未必能找到农民群众的代表。这不是偶然的。我们越是到农业信贷组织的下层去，越是接近基层信贷机关，就会越多地遇到下面农民群众的代表。这表明了苏维埃政权的本质。

当农民到我这里来谈农业信贷组织时，我向他们说明，没有信贷就不能发展农业，无论如何必须组织信贷，但是，如果农民指望单是由政府和政权机关出力来组织信贷，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向农民指出，在组织农业信贷方面农民所负的责任无论如何不少与人民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政权机关所负的责任。

在地主老爷的俄国，大都只能由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官僚和官吏们管理俄国；由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一切权力机关。这种官僚管理方式，最符合地主—资本家制度的利益。在这种制度中为首的是地主和资本家，他们尽力使工农远离政权，尽力使官僚成为一种非常牢固的障碍，以便把工农同政权隔离开来。这种管理方式保证地主和资本家可以从工农身上榨取最大利润。在苏联，国家管理的台柱不能是官僚和官吏，而应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工农把地主、银行家和资本家赶跑，组织了苏维埃这个工农自己的政权。这个政权就其性质来说跟以前的沙皇政权即地主—资本家政权相反，它所关心的不是在管理工作中支持和加强作为官僚们把自己和人民隔离的障碍，而是建立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联系，直接吸收劳动人民管理国家大事。

问题在于，这实际上能做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工人，特别是农民的主动性、组织性和社会积极性的提高，因为正是农民群众迄今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不够。而且毫无疑问，在我们的管理机关中所存在的沙皇时代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特点，这完全是由于工农的社会组织性和主动性不高造成的。只有在人民群众具有巨大主动性的条件下，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创举才能保证得以正确地实现，才能保证这些创举不致被官僚主义作风所贬低和歪曲。这种情况在基层农民组织方面，例如在合作社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农民提出的、而且是提得十分正确的最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粮食同印花布的关系，农业同工业的关系，城市产品价格同农村产品价格的比例关系的问题，亦即农民将如何和按什么价格得到农业机器等等的问题。在工业品价格这个问题方面，怎样组织商

业的问题，即从工厂将商品送到农村和从农村将商品送到工厂的问题，具有很大作用，因为商业部门出售的商品的价格比出厂价格贵得多。我总是向农民说明，只要在农民同工厂之间还有私商——他们控制零售商业的四分之三，——工业品价格就仍然会很贵。我们还不能用国营商业来代替私人零售商业，因为在拥有人口一亿三千万，领土占全部陆地六分之一的辽阔的苏联，无法对国营商业部门的如此巨大数量的干部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只是由于这个原因，用国家商业人员来代替私商就不会有任何好处。

那么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由农民成立合作社，担负起把商品从工厂送到农村的任务，从而成为把城市产品送到农村和把农村产品送到城市的商人。那时商品的出厂价格跟拿到农民手里时的价格之间就不会相差那么大了。苏维埃政府已经并且今后仍将采取从组织上帮助和从财政上支援的种种办法，来促进和加速发展居民、首先是农民的合作化。

在这方面要获得比以往更大的成就，这将取决于农民的组织性和社会主动性的提高。没有这一点，就不能建立合作社，就找不到将商品从工厂送到农村的直接渠道，也就不能办好农民信贷事业，因为办理农业信贷必须依靠信用合作社。

现在我们还要把组织农民这个问题同其他问题联系起来，即同组织苏维埃政权基层机关的工作联系起来。农民往往公正地抱怨说，我们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很严重。苏维埃机关中滥用职权的情况无疑是有的。许多苏维埃机关，特别是基层机关，至今还未能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得足以称为帮助农民和为农民服务的机关。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农民不论对于建立合作社也好，对于建立基层苏维埃机关也好，比谁负的责任也不小。依我看，如果谈到当前我们对于农民的政策，应该说这是主要的一点。

当农民指出苏维埃机关和我们经济组织活动中的大量缺点时，他们是说得完全正确的。可是农民如果认为没有他们的主动精神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只有农民成立了合作社，并且积极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苏维埃政权为改进基层苏维埃的工作，为使基层苏维埃在工作中认真明确农民利益而采取的各种措施才会取得成效。只有在农民的组织性和主动性提高的条件下，才能保证工农政权的巩固，因为没有这种组织性和主动性，私商和富农就会越来越发展，并将由此直接成为旧日的地主。我们整个政策的成就和巩固十月革命成果的必要保证，都在于这种主动性，在于基层群众组织——合作社和苏维埃的巩固。农民不要认为把地主打倒了就万事大吉。打倒地主和获得土地还不够，还必须好好地发展农业，管理国家大事。在这些有益的工作方面，农民至今还没有做到为了全体人民和整个国家的利益，首先是为了农民的利益所必须做到的一切。

农民对苏维埃和合作社的积极性和组织性的提高，会大大促进农业信贷的发展。

我有读农民来信的习惯。毫无疑问，这些信有许多正确合理的东西。我昨天还读了舍弗列尔同志送给我的一些信。其中有些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我读了这样一封信，其中说：“我们由于遭受战祸，现在除了农具以外，连一头牲畜也没有。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用来耕地，可是我们要吃饭。我们这些天生的农民没有马匹就象鱼没有水一样不能生活。请你们来看看我们的困苦生活吧，别让我们到春天还没有马匹。地还没有耕，因为没有耕马；如果我们有马匹，那就可以保障我们全家的生活并为国家做出贡献。”问题提得很有道理：农民没有马匹既不能保障他全家的生活，也不能向国家做出贡献。农民要求得到农业信贷，主要用来购买马匹。在我国一些地区没有马匹的农民占百分之二十以上。我知

道甚至有这样的一些地区，无马农民竟达百分之四十。当人们谈论农民经济正在改善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农民经济还没有改善到足以克服这封信中所提到的那种困难的程度。我再重复一遍，有的农村有百分之四十的农户没有马匹，而农民没有马匹确实就象涸辙之鱼一样。农民经济这两年来有很大的跃进，总的说来当前农业的状况不是比工业的状况坏，而是比工业的状况好，因为农业的粮食产量即使在这歉收的一年也达到战前粮食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多，而这一年工业总产值却只达战前的百分之五十。这种跃进可以从播种面积方面看得最清楚。近两年来播种面积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达战前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八。这是很大的跃进。我想，如果不是 1921 年和今年歉收，那么我们在最近一两年内就可以超过战前的播种面积。由此可见，如果拿整个农业来看，那么无疑地它发展得很快，但是个别地区有一部分农民不能自力更生，因为他们没有马匹和农具。我读过的农民来信说，有些农民连住房也没有。对这样的农民必须首先给予帮助。

投入农业生产的全部信贷都是生产信贷。农民需要很长时期，一年一年地积攒，才能攒够买一匹马的钱。如果能贷给他一匹马，马上就可以使他自立生活，并能很快偿还马款。因此对大部分农民来说，发放农业信贷的问题是使农民自立生活的问题，是对本来有如“涸辙之鱼”的农民有利同时也对国家有利的问题。这只有在农民成立合作社的情况下才能办到。

我还看到另一封信的摘录，谈的是另一个问题。其中谈到了苏申区的一个合作社。信中说：“目前这个合作社的社员都是富农，这个合作社可以叫做富农合作社。在我们镇上有一个小吸血虫，他一年一年地总是被连选连任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他在七年当中干得十分顺当，现在他把所有的亲戚都弄到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里来了，这就可使他保险不受任何检查。现在农

业社的小铺和办公室都设在他家里，他的老婆、兄弟、丈母娘都坐在那里，而且农业社的印章也掌握在他手里。总而言之，他把合作社变成了自己的小铺，由他的一伙亲戚包办了。”

这是谁的责任呢？我看应该由农民负责。无论是我，还是人民委员会、加里宁同志、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当然都不能看到这些情况，而农民则能看到，所以农民应对此负责，他们竟允许富农任意使用国家为帮助贫农和中农所拨付的公款，以之放债生息等等。农民应该百分之百地对这种现象负责。我不知道，农业银行经理处怎样答复这封信。我看应该这样回答：很清楚，苏联农业银行经理处对这种非法现象不能负责，而应由这些村庄的贫农和中农负责，并要求在村苏维埃、互助委员会和党组织的协助下，由中农和贫农取缔这种非法行为。工农进行十月革命，绝不是为了让富农代替原来的地主骑在自己脖子上，让富农用我们苏维埃的和农业社的资金胡作非为。问题在于信贷是给贫农和中农，还是给富农用来恢复经济呢。这个问题的解决完全取决于农民本身的积极性表现得如何，以及能否从组织上排除富农干坏事（象我引述的关于苏申区合作社的来信所说的那样）的可能性。我再重复说一遍，至少政府和农民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阶层，应对发放农业信贷的工作负同样责任。只有在农民成立了合作社，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并警惕地监督自己合作社的工作时，农业信贷才能发挥作用，才能给农民以必要的帮助。

截至目前为止，国家通过国家银行、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其他机构给予农民的农业信贷达一亿二千五百万卢布，而农民本身和地方机构存入农业银行的存款共三千五百万卢布，其中农民个人的存款是五百万卢布。革命前的情况完全不同：据查，截至 1914 年 12 月底止，国家投入农业合作社的固定资本共一亿一千五百万卢布（土地银行除外，因为它跟农业信贷无关），而来自其他方

·面的存款约有八亿卢布。换句话说，以前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从其他方面来的”比国家拨给的多七倍。现在则完全相反。

我想，从这种比例关系做出结论尚为时过早。因为农业银行在今年七月才正式成立，从成立后的经验作出某种结论，期限未免太短。但在最近几年内，国家资金同居民和地方机构的存款的这种比例必须有一个根本改变。国家能够拨作农业信贷的资金非常有限。不能认为国库是货币资金取之不竭的源泉。农民应当知道，我们给你们的越多，我们取自居民的也将越多，也就是说要增加税收。我由于职务关系，常常同时接到两种要求：既要求减税，有些税完全豁免；又要求增加对农民的支援。可是从哪里去弄钱呢？资金主要来自税收，这差不多是唯一的来源。农民越富，人民越富，国库也就越足。为了付出资金，就要收入资金，而要收入资金就要增税，可是现在我们不能增税。必须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使农民手里的哪怕是为数很少的余钱不要藏在钱罐子里（农民至今还有这种习惯），而要把它存入农业银行，存入信用合作社；把钱存到那里非常牢靠，并可更好地用来为农民本身谋利。

因此，农业信贷组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目前的比例改变过来。目前是国家拨款一亿二千五百万卢布，而来自其他方面的资金是三千五百万卢布。要把这种比例颠倒过来，也就是说，要使其他来源的资金比国家拨给和能够拨给的款项多四—五倍。今年我们还要使农业银行的贷款数额增加几千万卢布，但是同时我们必须在农民中加强宣传，使他们参加发放农业信贷的工作，使他们的意识里，使每一个农民的头脑中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在当前条件下，发放农业信贷的工作在同样程度上既是农民本身的事业，又是国家政权机关的事业，或者更进一步说，对这项事业的责任应该绝对是双重的，即既由农民负责，又由政权机关负责。我重

说一遍，整个农业信贷组织工作的成就在极大程度上依靠农民群众的主动性。

目前农民中的积累过程无疑是很不够的。农民的困难很大，应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他们，因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都跟农民问题有关。不改善农民的状况，我们就不能发展我国的工业，就不能改善国家状况，就不能减轻税收，也不能在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方面前进一步。现在我们已处于十月革命后的第八个年头。这是苏联开始在没有地主、银行家和资本家的条件下生活以来的第八年。但是在过去的七年间，我们还没有把人民的生活状况提高到比战前更高的程度。十月革命的任务和工农政权的使命，就在于使工农国家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得比十月革命前不是更坏，而是更好。而这个基本任务必须在最近期间予以解决。在最近两三年内，我们应该并且大概也可能使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变，使人民生活得比十月革命前、比战前、比沙皇时代不是更坏，而是更好。只有逐年解决这项任务才可以证明十月革命是有道理的。农民参加十月革命，打倒地主和得到土地，就是为了比沙皇时代生活得更好。对农民来说，才足以证明十月革命是有道理的。迄今我们还未能做到这一点。农民经受了国内战争和余粮收集制的苦难岁月，他们在最近三年来才开始恢复经济，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信贷应该成为促进农业进一步发展的新的强大推动力。

我们曾想把国外贷款并入我们拥有的支援农民的资金之内。现在我们用来支援农民的资金，只限于税收和工商业与银行的利润这种能从国内积累的资金。

支援农民的另一个资金来源将是国外贷款。我们为了从英国得到贷款，在同它谈判时作了重大让步。苏联政府打算把这笔贷款的大部分用来支援农业。我们作的重大让步是，如果给予我们

贷款，我们同意赔偿英国公民因十月革命——如因废除沙皇政府全部债务，对原属英国人的全部工业和其他企业实行国有化——而受的那些损失的一部分。我们所以同意这种赔偿要求的一部分，是为了取得使我们有可能加速恢复经济的贷款。假如我们能得到四亿金卢布的贷款，我们将从这笔贷款中拿出钱来改善农民经济，至少能增加百分之十二到十四的收入。而按国际贷款惯例，通常支付百分之六的利息。我们同意支付百分之六以上的利息，超过部分是用来补偿英国公民的赔偿要求的。大家知道，目前新成立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拒绝把我们跟英国上届麦克唐纳政府达成的共同协议提交英国议会——英国下议院——批准，主要是不想给我们贷款。我们在以后还将在国外寻求新的来源以便支援农业。但是我认为，应让农民知道，目前从国外获得贷款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国 际 形 势

英国的选举再一次十分明显地证明，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对农民把地主打倒、工人把银行家打倒的国家不会抱好感，因此它们不急于同工农掌权的国家进行友好谈判。因为现在在英国执政的是保守党人，他们大部分是英国的地主，当然他们不喜欢我们这个消灭了地主政权的制度。凡是资本家、贵族和地主当权的国家都是一路货色，而西欧和美洲各国的政府尽都如此。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是唯一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的国家。因此关于借款的问题，从政治意义上说就是：推翻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统治的国家向其他资产阶级和贵族统治的国家寻求借款。我们共和国联盟的国际政策遭到种种困难的原因就在于这种矛盾。不论是法律上或事实上对我国的承认(除美国外，所有国家差不多都

承认了我国），都是迫于历史而承认的，绝不是出于对苏联人民有什么好感或友谊，绝不是诚心想同苏维埃共和国合作共事。每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在法律或事实上承认我国，都只是由于它不能推翻工农政权才这样做的。如果能有另一条出路，那么自然，西欧地主宁愿有一个俄国地主掌权的俄国，而任何西欧的银行家则宁愿有一个俄国银行家掌权的俄国。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府都是被迫承认我国的，因为在当前形势下找不到一条其他的出路。

现在正进行着一场在反对共产国际幌子下反对苏联的大规模宣传运动。而且，新组成的英国政府——保守党人政府，看来正在发起组织一个西欧各国反对苏联的新同盟、新协定。不久前由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先生率领的英国政治家们，曾访问法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政府，明目张胆地商谈这个问题。组织这种反苏同盟的阴谋是否得逞，暂时还很难说，各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结成反苏同盟是可能的，但这种同盟未必能巩固，因为英法之间以及其他国家之间利益的对抗十分严重，以致欧洲近来曾不止一次地存在着爆发新的战争的可能。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这种利益的矛盾，使得它们迄今未能组成反苏同盟。

但是目前出现了一些新现象，促使英国贵族、英国保守党人更加起劲地妄想组织资产阶级反苏同盟。这些新的现象就是：一方面殖民地的斗争激化了，另一方面欧洲的工人运动发展了。后者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英国工会跟俄国工会接近这种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加强方面。资本主义各国正在酝酿革命的工农各阶层，把苏联看成是自己理想的实现，看成是世界史上第一个推翻了富人统治和建立了新国家即劳动人民国家的国度。由此可见，苏联只是由于它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在客观上成为推动西方革命运动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因素。

这是促使英国资本家利用季诺维也夫的假信作为“证件”，促

使英国政府违反英苏人民切身利益而在苏英之间制造种种麻烦的原因之一。

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的殖民政策的危机是各国资本家、首先是英国资本家仇视苏联的另一个原因。在许多东方国家、特别是在殖民地国家，反对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掠夺和压迫的人民群众的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中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子。

苏联这个推翻了富人政权，领导和实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并提出了各民族完全自决纲领的国家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镇压这些国家内部的解放运动的障碍。

英国认为我们苏联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是它在中国、波斯、印度、埃及和其他殖民地国家开展活动的障碍。

这是整个国际政治中的主要之点。在地球上，在其余世界都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同时，存在着一个没有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劳动人民国家所造成的矛盾，目前由于许多殖民地和欧洲国家解放运动的爆发而复杂化了。同英国政府进行的关于所谓季诺维也夫信件、关于共产国际活动的全部外交文件往来，不过是这两个体系之间的竞争的偶然插曲而已。如果没有捏造出季诺维也夫的假信，也会捏造出另一封信。我感到惊讶的是，为什么至今还没有把在埃及的英国将军被刺一事归罪于季诺维也夫或他的秘书。为了制造莫须有的借口来反苏，资产阶级会象捏造季诺维也夫信件一样捏造出这样的事情来。

但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西欧崛起的被压迫阶级向往苏联并想效法它，被英法和其他国家征服的殖民地人民力求自己解放自己。毫无疑问，在过去，在十月革命以前，革命运动就已经有了。但是苏联存在七年这一事实向西欧人民和被压迫的殖民地具体地表明：他们能够夺取政权，因为工农已经在一个国家里夺得了政

权。因此，我们苏联的威望，即使在埃及也绝不是因为埃及人中有许多俄国人或共产国际代理人而提高的。这是因为苏联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了许多民族，而他们埃及人却正渴望这一点。

我们同中国签订了平等条约，而英国则同中国签订了无异于同被征服国签订的条约。中国孙中山提出的纲领规定要在平等基础上修改一切条约，就象苏联所做的那样。要知道，孙中山不是俄国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代理人，不是共产国际的委员，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可是解放中国的愿望使他把苏联看做按平等原则同中国签订条约的榜样。

英国是以主人对奴隶的态度跟中国讲话的。因此中国人拥护苏联，因此我们在中国有威望。我们有威望是由于我们跟他们签订的条约，而不是由于他们那里有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我相信，连英国政府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都知道我们享有威望的原因。如果他们也仿效我们，象我们那样按平等原则同中国签订条约，我们决不反对。但是他们总有一天会看到，由于中国解放运动的发展，有些英国人会受到中国人的小小惩罚。这时他们会仅仅因为中国人同情苏联就把每个中国人都看成是共产国际的代理人。但是在中国和埃及，在其他国家，问题都不在于共产国际的代理人，而在于民族解放运动。

在大战时期，当英法和其他交战国的全部工业都用来支援战争和生产杀人武器时，在其他国家如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却发展起了本国的工业。殖民地人民力图从英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同时力图发展本国经济，为自己工作。因此，殖民地人民运动的成功对帝国主义国家说来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为它们的统治就是建立在对这些落后民族的剥削上的。各种资产阶级报刊上大肆宣扬对苏联的仇恨，其根源就在于此，因为它们认为苏联是所有殖民地一切被压迫民族风起云涌的解放运动的旗帜。不论

把什么信件强加到季诺维也夫身上，也不能抹杀这个根本问题。问题只能靠被压迫的民族和阶级日益汹涌澎湃的斗争来解决，而归根到底被压迫的民族和阶级将获得解放。

当我们向西欧资本家（并向尤兹本人）请求借款时，他们说我们的市场太庞大，是一个有一亿三千万人口的国家；说如果苏联恢复了“神圣的”私有制，即恢复了地主、资产者和银行家，也就是说毁灭了十月革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能在苏联做点什么。在这方面美国政府的思想最为顽固。但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是跟西欧世界达不成任何协议的。

从欧洲对我们的这种态度看得很清楚，农民指望能利用西欧的资本来恢复自己的经济，这暂时是根本办不到的。美国闲置资金很多。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提供贷款，但是它不愿帮助苏联，因为它不同意农民剥夺地主土地、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地主阶级这种主要作法。而农民由于决心不让地主再回来，使土地归自己所有，他们将在我国当前国际政策方面拥护我们，就象在打倒地主、同地主斗争的国内战争时期拥护我们一样。

但是从这里还应作出另一个结论。因为在最近几年难以指望得到西欧的帮助，那么就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国内方面即放在自力更生方面。必须利用一切哪怕是很小的可能性来恢复农民经济；必须尽力支持农民的主动性，支持农民发展和提高农业生产的要求。

今年夏天，我到歉收地区去视察的时候，看到了一件十分引人注目的事情，这件事情表明农民想把自己的经济更好和更快地恢复起来的劲头是多么足。我在一个省里遇到了一些被村里推选出来的年轻农民小伙子，他们带着一封农民要求教给这些小伙子驾驶拖拉机的专函来到了省执行委员会。农民要求把这些小伙子安排到某一个工厂或拖拉机队，使他们在几个月内学会开拖拉机，

然后回到自己的村庄，利用学得的技能来发展农民经济。我在干旱地区看到有一些农户和合作社，它们在今年从每俄亩收获了三十至四十普特粮食。它们所以取得这种成就，是由于应用了农艺学，发挥了集体力量，进行了精耕细作和人工灌溉。我还在同一些干旱地区看到许多农户，它们由三圃轮作制转到多圃轮作制，即使在歉收时期也没有发生任何饥荒。这样的农户在各县和各个村庄都有一些；暂时它们还为数不多，但是它们标志着全体农民所向往的宏伟前景。农民开始走上新的道路，寻求发展农业的新途径；农民已经觉悟到，如果说从前地主把土地耕种得比农民好，那么现在农民就应该做到这一点：使土地出产的粮食比地主时期出产得多。农民懂得了重视农艺师。到我这里来了几个专门请求派农艺师到他们村庄去的代表团，以便让农艺师教给他们如何把农业搞得更好。现在农民缺乏做到这一点的资金，没有犁，又无钱购买，没有资金来购买拖拉机、改良土壤以及采用更完善的耕作方法。如果农业信贷能够掌握农民群众这种想要摆脱贫困的心理，及时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支持他们的这种要求，那么农业信贷就将在巩固十月革命成果方面发挥宏伟的历史性的作用。（掌声）

译自《真理报》1924年12月19日。

基层机关在苏维埃国家中的作用

(1925年1月在苏维埃建设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在你们的会议的最主要工作完成以后我才到会，我想，在全俄首脑、我国农村问题的权威加里宁同志的报告中，在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报告中，已经阐明了这次会议的全部重要意义，因此，我只谈谈有关你们会议工作的若干问题。

我们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极端落后的国度里建设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是在农民的、最自发地经营农业的国度里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种情况下，在革命后的头几年，我们当然具有足够的有文化的人员来组织国家领导班子，但是，我们却未能有足够的有文化的人员来根据我们面临的完全特殊的任务（组织新社会）组织我们联盟的基层管理机关。

如果我们在七年前提出为了建设新社会而适当组织基层苏维埃机构（村苏维埃等等）的问题，我看会是毫无成就的。当时，农民有足够的觉悟来进行土地革命，但是在苏维埃共和国和党的手里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适当组织基层苏维埃。我认为，当前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如此。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已发展得足以建立完全适应我们所提出的那种任务的基层组织机构。如果考虑到联盟境内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十分复杂的情况，就会十分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只要把北方民族，例如亚库特人和萨莫亚人同普梯洛夫工厂的熟练工人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居民阶层间的巨大差别。我们在列宁格勒地区

能找出大量有文化的人员来为列宁格勒本身服务，而且还为该省的大部分地区服务。但是在落后的民族地区，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这种新的力量还只是刚刚开始出现。

现在我们处于十月革命后的第八个年头。这一年的特点主要是，我们正在认真地着手真正实现十月革命所提出的那些宏伟任务。实现这些任务当然首先要靠基层机关。制定法令是一回事，而实现这些法令则是另一回事。从颁发李可夫和加里宁签署的文件（也许这些文件并不都是十全十美的，欢迎大家批评）到在雅库茨克州的一些村庄内贯彻这些文件，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结果还往往适得其反。不管怎么说，从中央这里颁发的法令执行得是否奏效，完全取决于基层苏维埃机关。广大劳动群众对苏维埃政权及其缺点的看法，当然不是根据我，不是根据加里宁，不是根据人民委员会，不是根据党中央委员会，而是根据你们这些基层工作人员产生的。他们要看到我和加里宁很不容易。你们当中许多人大概都有这种切身体会。我们很少见到农民和工人，而千百万群众却经常从基层苏维埃机关旁边经过，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对苏维埃的意见如何，由苏维埃和在很大程度上由党所进行的全国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效果如何，这些都取决于基层苏维埃机关。

农民寻求同城市的联系

目前跟过去时期不同的地方还在于，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是彼此非常隔绝的，农村同城市和城市同农村缺乏足够的联系。现在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建立了。只要看一看这几年商品流转的发展，就可以断定现在农村同城市有很密切的联系。只要观察一下农村文化的发展，就会看出原来的隔绝状况已经完全彻底消除了。此外，农村和落后地区现在需要

解决一些它们自己无力解决的任务，所以它们寻求同城市的联系，要求城市给予帮助。这指的是土地利用和土地规划问题，以及改进农业、教育、政治工作等等问题。

农民的主动精神有助于提高农业

工人阶级和农民结合问题的解决，苏维埃建设总任务的实现，都跟各机关、主要是基层苏维埃机关的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个问题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我们颁发某些新法令，或者对现行法令做某些修改是不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解决我们的工作方法方面的一系列比较重要的问题。我认为，弗·伊·列宁同志所说的我们要在极大程度上不是用命令和强迫的方法，而是用说服的方法去做工作这段话，就是属于这一类问题。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我们靠发号施令办事。我知道当时农业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方案，甚至想用一些命令来规定每一农户应该播种多少和播种什么，并打算据此编制一个全共和国的农业总计划。当时有些同志认为这个计划是领导农业工作的最大成就。实际上这是在农民问题上的官僚主义歪风邪气和过分采用行政手段的顶峰。农民经济的自发性，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妨碍我们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主要障碍之一。现在我们还不是决定收成好坏的主人，农民所生产的农产品数量的多寡，取决于在当前组织农民经济中还无法控制的许多因素；农民经济直接取决于雨水、干旱、虫害、三圃轮作制等等，它的落后性是非常重要的。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不采取措施使农民摆脱至今存在的那种靠天吃饭的局面，就是在工业方面也谈不到真正的计划经济。这项任务不能靠行政措施解决。不扫除文盲，不提高农民

的觉悟，不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就无法解决这一任务。而不解决这一任务，我们就不能摆脱自然力的支配。要提高农民经济，就必须提高农民的主动性。

什么人算是富农

会上已经谈到，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我看农民的积极性还发挥得不够。应该把农民的积极性提得比过去更高。照我看来，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也会影响到富农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加里宁同志有个小小的分歧。我认为我国富农的危险要比加里宁同志所估计的大，同时我在许多地方看到，对富农这一概念解释得不恰当。

在消除农民经济自发性方面应该实际做些什么呢？应该使农民精心耕种土地、发展新的作物、提高畜牧业的作用、实现水利化等等。我在农村遇到过这种情况：歉收地区有的农民由于精耕细作可从每俄亩收获四十普特谷物，而邻近农民却只收获两普特。我认为必须给予获得这种成绩的这个农业劳动组合一笔专门奖金，并以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嘉奖这些农民是利用和经营土地方面的革命家。

当近邻收获两普特时，他们收获了四十普特。我看，这是苏维埃的、革命的行动，因为这会战胜贫困，改善国家的状况。那些由于在耕作方面的先进和革新、由于同农民经济自发性作斗争、由于实行了种种改革而变得富裕的农民，当然是我们苏维埃的优秀助手，无论如何不能把他们列为富农。

应该把那些用某种手段剥削较落后的农户，靠农民的贫困、愚昧和无组织而发财致富的人列为富农。

凡是精心经营土地的人，都不是富农，而是苏维埃的劳动

者。在许多地区总是把这两种概念混淆起来。富农属于新生的地主这一社会范畴，也就是说，他们是靠剥削其他农民而生活和兴旺起来的人。凡是靠精耕细作而生活的人，都是优秀的苏维埃农民，是我们的最亲密朋友。我看应该把这样的农户作为农村的样板而起示范作用，帮助其他农民学习这些先进农户的经验。

农民经济的上升，耕作的改进和作物的发展，使基层机关的工作比以前更加困难了。当我们谈到苏维埃机关发展方面的停滞不前对我们是一种危险时，我们必须从另一方面考虑到，我们的工作每前进一步都将遇到更大得多的麻烦。当然，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善是一个极大的收获。但是这个极大的收获使两方面的工作复杂化了：第一，使农民发生分化；第二，使农民提出了许多我们应该予以满足的新的需求。因此，目前情况的缺点与其说在于苏维埃变坏了，无宁说在于苏维埃落后于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必然在全体居民面前出现的那些需要，其实苏维埃应该走在前面，应该成为这些居民的领导者。

苏维埃应该密切关心农村的需要

我还想着重指出一个我认为有异常重大意义的问题。我遇到过这样一种现象（我想这不是普遍的现象）：苏维埃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上级颁发的法律命令和决定的范围。我由此想起工会的工作。

在当初讨论工会的作用时，我们考虑了工会在满足工人日常各种琐碎需要方面，特别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起的极其伟大的作用。我还记得，当时托姆斯基同志报告说：工人由于某种琐碎需要，例如丧葬问题、安顿孩子问题等等而来到工会，就象来到自己家里一样。虽然常常是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但是向他们

说明了理由。无论如何也要把工会组织成工人自己的组织。

在我偶尔视察的那些苏维埃里，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相反地，我倒看到了完全形式主义地对待农民的态度。例如，从递上来的条子里看到，有的农民有一件小事或者是来谈谈真心话，但被拒绝接待。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应该使苏维埃成为农民的即中农和贫农的组织，就象工人的工会那样。他们可以到那里提出各种需求。我想工会是经常无法解决的，但只要接见了工人，同他们谈了话，使他们觉得是自己人，——这就会使他们感到满意。有一次我听说好象是加里宁同志跟一个农民谈过话。这个农民是因为丢了一匹马而从最基层来到莫斯科的。加里宁同志非常细心地向他询问这匹马的情况，问他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是从哪里弄来的，干活怎么样。这位农民尽管提出的要求没有解决，但是毫无怨言地走了，因为他见到了一位同情他的困难和关心他的事情的人。而我们苏维埃机关则往往缺乏这种态度。我看应该努力做到处处如此，这会改善人民对苏维埃的态度。我们对许多的需要还不能予以满足，但是我们可以讨论这许多需要；同农民谈谈这些需要。我们通过苏维埃同农民建立这种接触，可以从农民身上摸索出许多东西。我看，如果你们没有满足这些需要，但却讨论了这些需要，那在苏维埃方面来说是没有错误的。我看，即使讨论这些需要之后解决不了，那也比保持以前这方面存在的形式主义的作风还要好些。

加强选举制来帮助农民群众组织起来

最后，我想着重指出，必须坚决地加强合作社和苏维埃的选举制，也就是说，吸引大量的农民来参加选举，在选举时发挥农民群众的巨大积极性。

在许多情况下，这也会给我们造成不利的结果（富农把持大权）。但是为了防止富农在农村掌权，必须把贫农和中农组织起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很好地组织苏维埃、合作社、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机关等等，使广大农民把这些机构看成自己的领导者，而不是把富农看成自己的领导者。为此，必须把非党劳动农民吸收到这一切机构中来。

我曾有机会看到新乌津斯克县一个苏维埃的工作。领导这个苏维埃的是一个非党中农。领导互助委员会的是一个党员。村苏维埃主席在大会上作报告，受贫农和妇女拥护的一个共产党员对非党村苏维埃主席的报告作了补充和更正。我觉得，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把贫苦农民组织在自己的周围，吸引积极的妇女参加会议，不参加正式权力机关，而依靠农民群众、农村互助委员会、贫农和中农来指导它的工作，这不论是对党还是对苏维埃有时是更为有利的。

这样的共产党员具有莫大的影响；他是农村贫苦农民的喉舌，他建立贫农和中农的联盟，吸引农民妇女参加工作等等。共产党员的领导不一定只通过官方人员的身份来实现。有时通过组织贫苦农民、妇女，通过吸引非党农民积极参加工作等等来实行领导，要更有利并更好些。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非党人员中物色能干的农民来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并为苏维埃本身提供这样一种工作条件，即苏维埃在进行我们所必需的工作时可以得到全体农民的支持。当然，这种做法不能作为一种通例加以推广，但是毕竟我们在这里有了一个在农村解决共产党的问题的有效办法。

现在我国的雇农有可能由于农村的分化而大大增长。我们的党和苏维埃要考虑到雇农的增长，要依靠雇农，而不依靠雇用他们的人。把雇农和中农组织起来通常是一项比贫农、中农、雇农尚未组织起来时的户籍登记（出生、死亡、结婚等等）更为重要

的任务。非党人员担任苏维埃主席没有什么危险。最大的危险是农村中的中农、贫农和雇农阶层没有组织起来，而富农却已经组织起来。必须在合作社和村苏维埃都实行选举制。

为了防止富农在农村抓权，必须十分注意农村中的社会生活和对贫农、中农、妇女、雇农等等的组织工作。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那么即使苏维埃的工作发生种种偶然的偏差，由于农村有了巩固的、有组织的社会政治基础，对我们也将毫无危险。也许尽管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可是由于农业的发展、农民群众生活状况的改善，由于整个农村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的两极分化仍将继续发展。各个农民阶层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党和苏维埃只有在中农和贫农阶层中有了巩固的基础，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向新的社会组织过渡的任务。（掌声）

译自《真理报》1925年1月11日。

苏维埃建设的当前任务

(1925年1月在全苏第一次教师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苏维埃政权和党在全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跟教师群众直接谈话，这在苏联十月革命后还是第一次。教师的工作和日常生活跟农民阶级、跟亿万农民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依我看，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的这次谈话不是在今天进行，而是在七年前进行，那就会好得多，因为那时无论是十月革命也好，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也好，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也好，情况都有所不同。

总之，那时如果有了你们在这次会议上所代表的这支巨大文化力量的支持，十月革命就更不会出现什么病痛，我们的成就、我们的胜利、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就会更大。

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并没有避免出现病痛和流血。从十月革命到这次代表大会这一整段时间来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三个最主要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起义的人民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时期，即街垒战时期。那时，为了夺取政权，所有的人民力量和被压迫阶级围绕着起义全面动员起来。在第二个时期是起义的人民取得了胜利的时期，那时，起义的人民组织了苏维埃政权，并且

作为有组织的苏维埃国家投入了旷日持久的、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痛苦的国内战争。最后，第三个时期是结束国内战争和开始我国积极建设的时期。我现在就想向你们谈谈当前积极建设的任务。

要理解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即现时期的任务，必须考虑到人民在十月革命时期所提出的并应由苏维埃政府和苏维埃国家予以实现的那些最终目的和长远任务。

当前任何一项任务，只要它不符合十月革命所提出的最终目的，就不能被提到工人苏维埃政权的日程上来。

我们的国家的最终目的，跟十月革命前民主联合政府所提出的最终目的，跟世界各国政府所提出的最终目的，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苏维埃政权要建设一个史无前例的、崭新的人类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苏维埃政府跟现在和过去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任何其他政府的区别正在于苏维埃政府要组织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使得苏维埃政府跟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不同于我们在资本主义政府所统治的任何其他国家所看到的那种关系。十月革命提到日程上来的是组织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将消灭人剥削人的可能性；在这个社会中将没有阶级区分，没有愚昧和无知，人民将依靠各种最伟大的技术成就来充分满足人们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达到文化的空前繁荣。这是一个在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任务。十月革命后，当先进的工人阶级提出这个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任务的时候，在人民群众中当然也有一些阶层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他们从私利出发对革命本身抱着敌对的态度。

教师代表大会是文化工作道路上的 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教师在第一个时期并不总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他们不总是

跟我们站在一起这件事，当然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这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教师与之关系最密切的那个居民阶层的落后性。农民，特别是军队，同工人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在制止战争和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在十月革命时曾经支持了我们，并且直到现在还在支持我们。但是，如果你们问我，农民现在是否愿意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那么我要对你们说：“不，他们还不愿意这样做。”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农民才会适应于组织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作，知识分子跟农民有联系，在他们身上正反映着农民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有机建设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他们看不到在革命本身和达到最终目的之间还有一条漫长而艰巨的道路，即需要人们持续不断地工作，需要取得许多文化和经济的成就。十月革命以后，正象我对你们说过的，人民经受了国内战争的极重大的考验，而现在我们又进行了三年的积极的有机工作。今后我们对这个有机的建设时期也将区分为许多时期和阶段，如果需要从历史的远景来叙述这次代表大会所可能具有的意义，那我就要说，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农村中积极的文化建设道路上的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这次代表大会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十分清楚地预见到了这一点。我认为，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现在还活着，他一定会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为这次代表大会感到高兴。列宁同志比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都更清楚地预见到教师工作在共产主义新社会建设中的全部历史意义。这里是杂志上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中引用的一些话。我现在再来读一遍其中的一段：“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来说，我们应当把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就必须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目的和愿望之一，就是要使教师在组织社会主义新社会方

面帮助人民。现在我们达到了这一目的，而这就是这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掌声）

我国是全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我们必须实现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任务。政权和专政的主要体现者工人阶级在我国居民中占少数。十月革命本身的实现，我们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我们的实际组织工作的成就，过去和现在都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跟农民保持和加强联系的程度。是历史迫使我们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建设新社会的。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阶级不能孤军作战。它必须跟居民中的大多数即农民群众结成真正巩固的联盟，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工农联盟问题不仅是我们的总政策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我们的整个经济建设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教师在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方面的重要性当然不是什么数字所能计算出来的，因为教师是这样一个居民阶层，他们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把建设新社会的一般目的、把我们的一般社会主义任务跟农民的具体利益结合起来；因为只有在改善农民生活方面做出真正具体的工作，只有通过消灭文盲和落后这样一些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例证，才能使农民走向社会主义，才能引导农民去实现社会主义纲领；因为农民是这样一个阶级，他们比其他任何阶级都更不善于、也不愿意理解抽象的议论，因为他们由于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更容易接受具体的事实。所以，在向农民传播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思想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农民的生活小事和农业的建设，——而教师在这方面正可以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

苏联的国外形势

我相信，这次教师代表大会将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并将带

来一个新的苏维埃文化工作时期。

工农联盟的巩固性决定着我们的成就

我已经说过，劳动人民在1917年十月革命和以后的历史时期的胜利，是由工农联盟，即苏维埃共和国这两个主要阶级的联盟的巩固性决定的。关于对外政策问题，也同样可以这样说。

关于对外政策问题，大家已经听了契切林同志的专题报告。他向大家具体地从各个方面陈述了我国对外政策的一些最主要的问题和最主要的成就。我想在教师代表大会上讲的仅仅是是我国国外形势中的一些一般性问题。

我们的对外政策处于现在的形势，大体经历了我们在对内政策上所经历过的一些同样阶段。

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处在同别的许多国家的直接的武装冲突状态。在我们苏联领土上驻有法国军队、德国军队、英国军队、日本军队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等等。我们对外政策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力量进行武装斗争。在这一斗争结束和起义的人民战胜了本国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以后，接着我们又经历了一个抵制和经济斗争时期。只是在西欧国家用武力或经济抵制力量推翻苏联政府的企图遭到失败以后，我们才开始同西欧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后来又建立了政治关系和合同关系。

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西欧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如果不把美国和日本算在内，那么我们几乎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在有一些国家里，我们既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又建立了贸易关系，而在另一些国家里，我们还仅仅是得到了事实上的承认，同时也建立了贸易关系。可以预计，不要很久我们就将同日本结束谈判，建立起和其他一系列国家同样的关系。

但是我要提请代表大会注意，不要以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了我们，它们就会诚心诚意地作我们的朋友，就会因此而承认十月革命或我国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合理性。

这种情况是没有而且也是绝不可能有的。苏联是地球上力图建设没有资产阶级和没有地主的社会的唯一国家。西欧各国当权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当然不会支持苏维埃制度。苏联迄今是消灭了富有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统治的唯一国家。它从四面八方受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包围，西欧国家现在和将来承认我们，它们现在和将来同我们签订合同，这意味着它们是迫不得已，因为经过较量，它们无论用武力手段还是用抵制办法，都推翻不了苏维埃政权。现在的形势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上层来说也算是一种妥协，因为西欧的工人群众是同情苏联的，世界各国人民不愿意再投入一场新的战争。要搞新的武装干涉是办不到的，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很困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竞争，而更主要的是，西欧存在着强有力的工人运动，这样就迫使西欧国家不得不对我们实行政治上的妥协，并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

我们将继续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

如果我们把今年一月的情况拿来同苏联过去，比方说半年以前所经历的情况加以比较，那就可以看到这里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现在又有人在试图组织一个虽然不是全世界性的，也是全欧洲性的反苏联联盟。这个主意来自英国新的保守党政府即鲍尔温和张伯伦政府。英国外交大臣最近的法国和意大利之行证明，英国保守党人和英国资产阶级又重新提出了关于一系列国家组成积极的反苏联联盟的问题。

如果大家注意一下导致保守党上台的这次选举运动的各个主要阶段的情况，那就可以看到，在这次选举运动中，最主要的争

论是关于对苏关系问题。保守党政府刚一上台，它就废除了麦克唐纳政府签订的条约，试图建立一个反苏联盟。建立这种联盟的企图由来已久。但是英国政府的政策还不能说是要对苏联制造新的武装干涉；我认为在最近一年中不致有新的战争危险。为了对付这种组织反苏联盟的企图，我们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和平政策，我们今后仍将继续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并将为此付出我们的全部努力，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不能背叛十月革命，不能放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所实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既然象美国这样的政府提出了要把在我国恢复神圣的所有制即在我国恢复资产阶级制度作为同我们谈判的先决条件，那我们就决不能接受这些条件。除此之外，我们现在和今后都将本着和平共处的目的同一切其他国家举行谈判，尽管在这些国家掌权的还是资产阶级政府。

工人阶级的同情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帮助。英国工会代表团访问了苏维埃共和国，这一行动并未受西欧工人运动建立工人统一战线即统一国际工联的总的前景所左右，这样也就加强了和平的可能性和防止战争的可能性。

“关于国际宣传”问题

现在西欧政策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问题就是共产国际和所谓“国际宣传”问题。近几年来，西欧资产阶级养成了一种习惯，他们总是把殖民地或欧洲本土工人中间的任何不满表现和任何风波，都归结为共产国际奸细活动的结果。只要在印度、中国、埃及、苏丹等国一出现什么问题，统统都要归咎于共产国际的奸细。他们忘记了这类风波在十月革命以前老早就有过。共产国际的“奸细”是使西欧资本对自己在殖民地的统治表现担心的极为深刻的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西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做得完全正确，他们指出，殖民地各国被压迫者中间的风波同苏联和共产国际具有

思想上的联系。这是完全正确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苏维埃共和国和共产党在十月革命期间提出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放各被压迫民族。解放被压迫民族的任务不仅被提了出来，而且已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整个领土上得到了贯彻实施。根据我们联盟的宪法，联盟的每一部分都有权自由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的联盟不仅把各民族的解放作为自己的任务，而且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尽苏维埃和党的全部力量来坚决实现这一纲领。

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占世界大陆六分之一的领土，民族繁多，同东方被压迫民族紧密相连，我国各民族的解放是一个具体的范例，它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解放运动不能不产生自己的影响。埃及人争取独立的运动，埃及各民族争取自主发展的纲领完全全地同我们的纲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适应。

英、法等国最担心印度、埃及、摩洛哥、苏丹等等国家的风波，害怕那里的独立要求，尽管我们是最爱好和平的，尽管我们有最真诚的和平政策，但是我们过去和今后都将永远宣布，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不是寇松和张伯伦，而是要求摆脱欧洲资本奴役和压迫的那些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我们对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原则态度是我们国内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的直接的继续。所谓的季诺维也夫信件和现在各国针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所搞的一系列伪证，都是丝毫无足道的东西。主要是在于现在人类面临着两种事实，两种制度：一种是苏维埃制度及其民族自决政策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另一种是资产阶级制度及其暴力和剥削人的政策。这两种制度的存在不能不使整个世界焦虑不安，不能不把整个人类按照谁同情苏联或谁同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这条线分开。我们毫无办法使寇松得到满足。寇松希望我们不要同情和支持那些纵然受英国压迫的民族。法国和所有其他国家

都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在这方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帮不了任何忙，因为那里发生的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甚至不仅如此，而且我们还知道，无数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发展和自决要求定将胜利，最终一定会使整个西欧资本和西欧帝国主义体系遭到崩溃。

(掌声)

苏联和法国

法国对我们的正式承认和同该国政府即将举行的会谈，是现在对外政策的迫切问题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两国甚至连初步方案还没有来得及交换。我只想指出法国在沙皇时期在俄国所起的特殊作用。会谈的主要问题无疑将是要苏维埃政府承认沙皇对法国所欠的债务和关于赔偿法国所有者的损失——与十月革命有关的损失问题。

法国对沙皇制度来说曾经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并且起过独特的作用。众所周知，它对沙皇制度的资助比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资助都多。不能说它这样做是出自对俄国人民的热爱。它资助俄国沙皇政府是为了保障法国资本的利益，因为根据同法国达成的协议，沙皇的军队实际上是同盟军用来对付德国和其他一系列可能与法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国家的一个侧翼。法国这笔钱大部分是用来建设沙皇俄国的战略要道，加强沙皇制度的军事作战实力。这些借款实际上是法国资本用来保证实现法国帝国主义的策谋的一笔费用。建设战略公路，扩充和装备沙皇军队，实际上同法国资本在自己本国及其殖民地为了保护法国资本主义和法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付出的花费毫无差别。在我们同法国资谈中，沙皇制度同法兰西共和国在财务关系上的这个突出的特点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前不久法国报纸刊登了一批法国政界要人的意见，这些人证明，法国所欠的英国和美国的债务不是什么真正的债务，因为

法国保护的不仅是自己本身的利益，而且是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利益。它的斗争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所有其他国家，所以，尽管账本上记着法国欠英国和美国多少多少钱，但是这笔债务是政治性的，而不是货币性的。因此，在我们看来，法国资产阶级在沙皇俄国的军事武装上所付出的那些花费也同样是政治性的花费，这笔债务不该由我们来承担。（掌声）

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至今处于经济抵制状态。大家知道，共和国联盟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借款，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是战后唯一的一个完全靠自己国内的资金来恢复本国经济的国家。苏联没有从任何地方得到过一分钱的借款，近期也未必能够得到。因此，我们全部工作中的唯一源泉就是我们国内的资源。十月革命以后出现的我国经济的恢复比较缓慢，农民和工人境况的恢复也比较缓慢，其原因就在这里。我们是在一个最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这个最落后的国家又必须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没有任何国家的帮助的情况下建设自己的经济。这一点就决定了国内政策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除了国内的资源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来源，我国对外政策的全部意义，我们在同外国谈判中通过发展贸易和获得政治上的承认所取得的全部成就，都是我们国内工作的结果，都是我国经济恢复和工农团结的结果。如果认为只要采取某种特别灵活的苏维埃外交措施，到现在我们就可以逐年越来越扩大我们苏联的国际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要取得这样的国际地位的前提，要使我们的红色外交卓有成效地工作的依据，就是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搞好我们苏联国内的恢复工作。

苏联的国内形势

苏联的经济状况当然首先决定于农民群众的经济状况。工业

的发展、我国预算的发展、文化工作的规模和速度、教育预算的多少——所有这一切都首先取决于农民恢复自己的农民经济的程度，因为对我国工业（如果不考虑那些通过出口而与国外市场联系起来的极少数工业部门的话）来说，除了农民市场以外再无其他任何销售市场。农民市场的容量是很大的。我们比西欧许多资产阶级国家优越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农民这个共有两千万农户的广阔市场，这个市场能够为我们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就提供无限的可能性。只要计算一下我国工业为了能够合乎人道的、文明地组织这个将近两千万农户的经济，需要有多么大的能力也就够了，那时就会看到，我国工业随着这个国内市场的发展而发展的前景是无限远大的。但是为了使这个具有广阔发展余地的市场变成真正强大的市场，就要让农民有钱买东西，就要让农民有盈余，就要让农民经济不断发展，就要让农民变得更富裕。为了我国工业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为了苏联全体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舍发展农业之外别无他途。因此，农业问题，农业的动态，不能不引起社会最广泛的关注。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仍然基本上是粗放经营的农业，其收成的多少首先决定于播种面积的数量。

农业的状况

从1915年开始，直到1922年，播种面积一直在减少。这使人们对农业的前途深感忧虑。如何刹住播种面积减少的过程和设法获得转机的问题，成了我国整个经济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1923年我们获得了这种转机。那时，播种面积在革命年代第一次不但没有比上一年减少，而且增加了——从五千八百七十万俄亩增加到六千九百九十万俄亩。

这是我国经济中的第一个最重大的成就。

1924年播种面积进一步增加到七千五百九十万俄亩。这个数字为战前的百分之八十八。有些地区（如乌克兰、西伯利亚）的播种面积接近战前水平，而莫斯科省则超过了战前的播种面积。

尽管这一年的年成非常不好，播种面积增长的过程却并未停止：秋播地面积全苏平均增长百分之五，而在歉收地区，由于政府的及时帮助，甚至增长了百分之十。

在过去一段时期减少得非常厉害的所谓费工农作物或特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恢复的速度尤其快。大家知道，这些作物对我国的工业具有重大的意义。我这里说的是棉花。棉花的播种面积从1923年的十六万五千俄亩增加到1924年的四十一万九千亩，即几乎增加了一倍半。由于棉花不足，我们不得不在去年用比土尔克斯坦棉花费得多的价钱，从美国进口了将近一亿金卢布的棉花（这也是我们的印花布的价钱仍然很贵的原因之一）。因此，扩大植棉业是十分重要的。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来尽量加快恢复还远远少于1916年的五十四万五千俄亩的棉花播种面积。在一年期间内，其他作物播种面积的增长数额是这样的：亚麻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大麻增长百分之二十七，甜菜增长百分之四十二。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一些最贵重的农作物，如棉花、亚麻、甜菜等等的播种面积的扩大，要比一般播种面积的扩大快得多。这就是说，增加这些作物的播种面积所增加的收入，要比增加一般作物播种面积所增加的收入多得多，按百分比说也大得多，因为农民从每俄亩棉花、甜菜、亚麻等等所得的收入要比黑麦、燕麦甚至小麦多得多。这就是说，农业正在集约化，或者至少正在十分明显地向这方面发展。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和发展这种趋势，帮助农民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我还要就畜牧业的恢复过程说两句话。不大力发展畜牧业，我们就永远不能提高农民现在从土地上所取得的微薄收入。

马匹数在近两年增加了二百万匹即百分之十，约占1916年马匹数的四分之三（1916年是二千九百八十万匹，现在是二千二百二十万匹）。如果我们考虑到马在农业方面是主要的牵引力，播种面积已经几乎达到1916年面积的百分之九十，而马匹数却只有1916年的百分之七十五，那么很清楚，马匹的情况是很不妙的。牛的情况好一些，两年期间增加了一千一百多万头，即差不多增加了三分之一（从1922年的三千五百万头增加到1924年的四千六百三十万头；1916年是四千八百四十万头）。小牲畜恢复得非常快（例如，羊的数目在两年期间增加了一倍，接近战前水平，有些地区甚至超过了战前）。

上面所说的这一切变化决定了农业商品率的提高（根据我们的经济学家的计算，去年比前年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八）。这些变化也是促进农民购买力提高的因素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说，农民的生活状况现在不比战前好，或许甚至比战前坏。可以断言，我们年复一年所取得的成就，将在最近几年内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比战前、比十月革命前更好。

如果把我国的农业跟先进资产阶级国家比利时、荷兰、丹麦、德国的农业比较一下（这些国家每俄亩的收获量摇摆在一百二十至一百七十普特之间，而我国农业则平均每俄亩的收获量为四十至四十五普特，今年甚至只有三十普特多一点），那就立刻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农业的落后性和原始性。

国家要帮助农民提高文化

在最近时期内，当广大农民群众还处于文盲状态，我国农民经济还极其落后的时候，问题根本不在于农业生产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在于借助国家对农民文化工作的全力坚决帮助，借助于国家通过工业对农民进行的支援，逐年尽快把农民经济搞上去。目

前，我国许多地区有百分之四十的农民没有马，这是目前苏联经济状况的一个极大的缺点。苏联不应该有一个农民没有马，不应该有一个农民没有犁，不应该有一个农民不知道农艺学在农业方面的重要性，不知道他们的福利、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包括全体人民的福利，都取决于农民文化提高的程度。

这就是教师所面临的最伟大的任务之一。

目前我们周围还存在着不文明的状况，还有大批人不识字，还用中世纪的方法进行耕作，农民中间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马和犁，要在这样的条件下，提出农民群众立即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问题，那是枉然的。几百年来，地主和沙皇迫使我国农民处于蒙昧状态，对他们进行野蛮无理的剥削，现在我们要是做到从识字开始逐年提高他们的文化，能够帮助他们加速采用有利得多的新耕作方法（我们一定要这样做，而不惜花一切力气），那将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成就。农民对我们党、对苏维埃的喜爱，将取决于政府、苏维埃知识界和我国工业在恢复农业方面对农民所作的帮助究竟及时和广泛到何种程度。因此，我国工业必须完全彻底地面向农民。

面 向 农 村

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党的整个政策、苏维埃的政策所要解决的任务，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必须使农民迅速摆脱贫困，必须使农民感觉到，他们在苏维埃政府下，在工人专政下，比过去过得更好，因为他们作为我们的同盟者，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的眼睛长得美。他们作为我们的同盟者是因为我们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了农民，他们作为我们的同盟者是因为他们看到，苏维埃政权是唯一的不以剥削农民，而以帮助农民为己任的政府。这就是我们的政府跟其他任何政府根

本不同的地方。

为了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成绩，我们必须先实行一项非常重大的改革——货币改革。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着重指出过，货币改革问题是涉及我国整个经济，涉及我们同农民的关系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在存在着商品货币流通的条件下，稳定的货币、稳定的卢布和稳定的币制是城乡经济联系的基本前提。有了稳定的货币，我们也就有了一个商品借以在城乡之间流转的唯一正常的道路。当卢布贬值的时候，当卢布的价值以空前的速度下跌的时候，城乡商品流转是极其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当时看到过那种所谓自然经济的空前发展。实行货币改革是为在商品流转基础上改善农民生活状况所必不可少的前提。现在这一改革已经完成了。

要求我们集中一切力量加以解决的第二个极其困难的任务，就是使城乡产品保持正常的比价。任务就在于要把工业品尽量便宜地卖给农民。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得到农民的支持，不可能保持工农联盟。因此，价格政策是我们对整个经济和对农民的一般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我们不仅应该有一个廉价的政府，而且我们应该让农民能买到廉价的商品。这个任务不仅已经提出来了，而且大致解决了。如果把一年前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价格差额跟截至这次代表大会开会时止我们所争取到的那个价格差额比较一下，那么可以说，这个任务已经大致解决了，这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现在工业品的价格比一年前降低了很多；这不仅可以从各种物价指数（一年间降低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上看出来，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切身经验知道这一点。我们为了降低价格而必须克服的种种困难是非常大的。这些困难来自帝国主义战争给工业造成的破坏，而且由于国内战争、封锁以及外国资本不再投入我国工业（在沙皇政府统治时期外国资本在我国工业中

起很大作用），困难变得更加严重。必须设法改善我们的生产组织工作，以利于实行降低物价的政策，而又不致破坏维持工业生存的基本原则，即不亏损和低利润的原则；不亏损和低利润不仅可以保证工业的稳定，而且可以保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只要我们不愿意变成殖民地，我们就无论如何必须争取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问题不在于发布一纸命令或制定一项法律，而在于要在改进我国工厂的工作方面采取一整套措施，进行大规模的组织工作，而只有我们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我们才能够降低价格，保持进一步发展工业的可能性。

不消说，如果我们没有解决好货币改革问题（外国教授以及国外的和我国的白卫分子异口同声说我们无法解决这个任务，可是我们解决了，现在连最落后的农村妇女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没有“稳定的货币”，那么显然我们在价格政策方面就将一事无成或者成就极少。

价格政策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的政策。我们在今后许多年里也将象在今年一样，要尽量向农民提供比较便宜的工业品。在这方面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做到的一切。

我国工业的状况

在发展工业方面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呢？我只举几个一般的统计数字。近年来工业状况的特点是工业大大发展和产值大大提高：去年工业产值总共增长百分之三十（近两年来增长了百分之九十三）；约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五十（在新经济政策初期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十八至二十）。

在最切合农民需要的纺织工业部门里，棉布产量1921—22年度为三亿零二百万米，1922—23年度为五亿八千一百四十万米，1923—24年度为八亿三千五百九十万米。总的说来，有着广大的

消费市场并且资金周转较快的整个轻工业，远比没有这种消费市场的重工业恢复得快。但是我们在重工业方面也可以看到无庸置疑的（虽然还不是很大的）成就。大家知道，在燃料方面我们已经摆脱了危机，我国对燃料的需要已经得到充分的保证。我国金属工业的恢复大大落后于其他部门。从金属工业的发展中可以判断出我们离彻底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有多远的距离，因为只有在我国的工业和农业方面改进技术、实行电气化和采用优良的机器设备，才可能有社会主义。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发展金属工业，因为金属工业能够提供机器、拖拉机和犁。如果金属情况弄不好，那就等于我们不能很好地恢复我国工业和农业的基干力量。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已经摆脱了停滞状态。生铁产量在1921—22年度只达到一千万普特，而在1923—24年度则达到四千万普特。跟战前（1913年）相比，这个数字约为百分之十五点五，而整个工业却约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五十。1924—25年度的计划规定，生铁产量约为六千万普特（五千六百九十三万一千普特）。有些工业部门现在几乎已经开足了马力。这些数字足以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我们正在进入开始感到我们在十月革命中“继承”的那些企业的技术设备不够用的时期。我们正在进入许多工业企业和工业部门的工作量很快就要达到饱和的时期。我们正在进入实际提出建设新工厂、建立发展我国工业的新的技术基础问题的时期。

在这以前，我们只是在电气化方面为使工业在新的生产技术基础上得以发展创造前提。我们在这方面正在逐渐取得重大的成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认为电气化计划是组织新经济的基础。他亲自参加了这一计划的制定工作。按照这个计划，我们必须在十到十五年内建设起总功率为一百五十万瓩的电站。计划

规定，首先要建设少数几个电站（沃尔霍夫电站、卡施拉电站、沙图拉电站、红十月电站、巴拉赫纳电站、什捷罗夫电站、基泽尔电站）。到1926年这些电站完工时，它们将给我们提供十六万度的电力。

如果哪怕是把这第一批电站建成，那么经济效果会有多大呢？那时将出现这样的成果：例如，沃尔霍夫电站建成后，可以使每度照明用电的出厂价格（列宁格勒地区）从十九点五戈比降到十二戈比；工业用电将从九戈比降到三点五戈比，电车用电从六戈比降到三戈比。这些数字完全足以说明，我们靠建设电站可以达到多么大的节约，并且将为整个国民经济在新的完善的技术基础上的最顺利发展、为工人劳动的运用，创造多么好的前提。

我们现在下决心要发动一个争取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争取强化劳动日、更好地利用劳动日的运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十分清楚地看到，用这种办法来降低产品成本，降低商品价格，是有限度的。我们工厂的设备落后，在这方面给我们造成了某种局限性。在经济周期的最近时期里，我们将考虑到欧美各国的各种技术成就而实际提出所谓固定资产的更新问题。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我国预算的增长

我现在简单地谈一谈我们的预算问题。本年编制的预算没有用发行货币的办法来弥补赤字，它将比以前的预算提供多得多的资金来满足我国的文化需要。1922—23年度的预算为十三亿卢布，1923—24年度为十九亿卢布，1924—25年度的预算已经是二十二亿七千四百七十三万二千卢布。大家看到，我们的预算从1923年的十三亿卢布增加到1925年的二十三亿卢布。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我们的国家预算除在绝对数字上有

所增长以外，在质量上也有所改进。1924—25年度的预算方案规定，工业不仅要开始不靠国家资金补助而独立工作，而且还要大大支援国家。预算的一项大笔开支即去年为数达六千万卢布的运输业补贴，现在已经取消，对工业的支出减少了（从去年的八千二百万卢布减少到七千三百万卢布）。但是对农业的支出则大大增加了（从去年的五千九百万卢布增加到今年的一亿多卢布）。

可见，我们的预算大有起色。去年，在用税收来弥补铁路赤字的情况下，我们在运输业方面开支了大约六亿八千万卢布。今年，按照我们的草案，铁路将没有赤字，而开支将不是六亿八千万卢布，而是八亿卢布。

预算的这种增长具有什么意义呢？预算的这种增长意味着我国经济、首先是农业的迅速增长。如果有人要我不用数字来说明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发展时期的特点，那么我将说，我国经济的目前发展时期不同于其他一切时期的特点，正如一位同志不久前在一次讨论中说的，是“到处热气腾腾”。这就是说，经济的恢复速度之快出乎许多人意料，以致于工业赶不上市场容量的增长，有时我们不能满足居民对商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不久前，人民委员会讨论了如何分配一笔新的为数一亿四千七百万卢布的意外收入问题。我当时对财政人民委员部说，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批准预算后四个月就贡献出一笔意外的“多余”资金作为礼品，这样的计划经济是不好的，但是钱多出来，总比钱不足好。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这是因为我们从税收和企业方面所得的收入增加了，因为我们在半年以前既没有能计算出商品流转的数额，也没有考虑到预算收入的增长。过去，在编制了预算之后，我们差不多一过了四个月就发现支出的多而收入的少，为了做到收支相抵，于是我便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预算中抽出百分之几，从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预算中抽出一些，各抽出很少的数

目。现在情况变得正好相反。出乎我们意外，我们多收入了一亿四千七百万卢布。这说明整个经济和预算收入都在迅速增长。

还有一个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苏联各地销售新粮的季节总是出现工业品不足的情况，于是我们总是以为，农民变卖了粮食，购买了他们各种必需的东西之后，在冬季将变得没有支付能力，因而我们在冬季将发生销售危机，也就是说东西卖不出去。

许多专家都向我们这样预言。如果我们在七月份问他们，他们就会说：“在八、九月份需求将增长，而从十月份起需求将下降。”在十月份问他们：“下降了吗？”“没有，在十二月肯定要下降。”在十二月份问他们：“下降了吗？”“没有，没有下降，我根本无法告诉你究竟什么时候会下降。”这就是说，供应农民消费市场的恢复已经不象过去那样没有准头了。这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尽管年成不好，我们承认有七百六十万一千多居民遭了灾，有六百三十八万八千俄亩土地因遭了灾而颗粒无收）。现在经济恢复得这样快，说明如果下一年来一次丰收，我们的经济就会有一个比以前大得无比的跃进。我们的经济已经不限于满足起码的生理消费了，不限于农民一家一户自给自足了；我们的经济已经不限于满足工人阶级起码的迫切需要了。这一点也反映了农民经济的商品率的增长。

当农民吃不饱的时候，农民所生产的东西就都在一家一户内消费掉了，而不会拿到市场上去卖。只要两千万农户本身的起码的消费稍微得到满足，超过这个起码要求的多余部分就会投到市场上去，并购买用具来改善农民经济。同时这种情况也就不能不在预算和工业状况上面得到反映。

七年来，恢复我国经济的前景从来没有象今天召开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时这样好。（掌声）

苏维埃政府更关心的是农民还是工人？

由于苏联经济的发展，苏维埃的建设问题成为当前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一谈你们作为农村工作者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苏维埃政府更关心的是谁，是农民还是工人，农民在苏联是否受歧视。农民常常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说农民向我这个人民委员会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时还有些提心吊胆，那么我毫不怀疑，他们向人民教师提出这个问题时一定是十分坦率的。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当我们还实行余粮收集制的时候，我们曾十分坦率地向农民宣布，工人是在向农民借债，因为在国内战争和经济破坏时期，工人阶级不能满足农民的一切需要。人们告诉我，有些农民有时提出抱怨，第一，说我们关心他们不象关心工人那样多；第二，说我们的税比过去重。我已经在全俄工会代表大会上讲过财政人民委员部的答复：现在我国平均每人负担的税是八个切尔文卢布，而在战前是十一卢布，当然战前的卢布要比我们现在的卢布还值钱。但是，我这绝不是想说，我们在税收工作方面没有错误：毫无疑问，某些省例如在征收单一农业税的时候不是完全公平合理的。也许还有这样的错误：有些居民阶层的纳税负担重于其他阶层。应当消除这种情况，设法使税收合情合理。通过直接税，我们可以从农村和城市拿到多少钱呢？1924—25年度的单一农业税（按控制数字）总共约为三亿四千万卢布，而城市的直接税（手工业税、所得税、强制性公债）则为三亿六千万卢布。如果把我们后来对城乡预算控制数字所作的修改考虑进去，那么两者间的差额还要大（这是有利于在苏联一亿三千万人口中约占一亿人口的农村的）。我们在谁身上花的钱更多些呢？无须隐瞒，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我们在工业和运输业方面花的钱是非常多的。要知道，运输业直

到去年还是亏本的。农民说把从他们那里拿走的钱给了工业，他们在这方面当然并不总是不正确的。有过这样的事情。现在运输业已经不亏本了。工业部门，除了金属和煤以外，大都没有补贴了。我们还给金属和煤以补贴，因为要发展为农民市场生产产品的工厂，要发展苏联的整个经济，因而也必须发展这些工业部门。根据我们的计算，工业今年将得到七千三百三十四万八千卢布，而去年则得到八千二百万卢布。而农业，如果把我们对经办农民信贷的农业银行的投资、水利投资和支援歉收地区的款项包括进去，则将得到一亿卢布以上（去年的拨款为五千九百万卢布）。可以看得出来，本年农业将得到数目大得多的拨款，但是对于满足农业的全部甚至最紧迫的需要来说仍然是不够的。下一年在这方面将大大前进一步。应当使农民得到比现在更多的拨款。在本年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恢复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前景证明，明年我们将能够进一步增加预算，包括新工厂的兴建和增加农业开支。

苏维埃建设问题

现在我来谈一谈我们当前的苏维埃建设问题。不能撇开我们的经济来考察苏维埃建设问题，因为苏联的状况、人民的状况和苏维埃的状况，整个说来都决定于我国整个经济的发展。我认为现在基层苏维埃（村苏维埃和乡苏维埃）所面临的问题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革命法制的问题；第二，活跃苏维埃工作的问题。因为我现在是在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基层苏维埃情况的代表大会讲话，所以我觉得无须详细说明必须在苏联全境实行革命法制的理由。同样的，我也不去一一列举在报刊上大量刊载的，以及我从某些教师的谈话中亲自了解到的那些例子。在苏维埃工作这方面，我们必须达到两个最主要目标。首先，必须把各级苏维埃

(村苏维埃、乡苏维埃、县苏维埃和省苏维埃)变成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机关；尽量吸收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参加苏维埃工作，使农民和工人在那里能够真正按新的原则来组织社会生活，建立新的苏维埃制度。应该通过吸收农民参加选举来做到这一点。我所得到的消息表明，在许多地区，农民参加苏维埃选举还十分不够。

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劳动者专政的机关——苏维埃——对农民来说也同样应该是学习国家的苏维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学校。农民必须真正参加选举，把他们要选的人选进苏维埃。

有些人在跟我谈话时指出了来自富农的危险。我比任何人都更不愿意低估这种危险。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有人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看不到在农村中还没有一个足以构成危险的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富农阶级。不久前我听到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同志报告说，他们那里的富农想在苏维埃夺权。有人问这位同志，这个富农有多少牲畜。他回答说，有两头母牛和两匹马。我们一点儿也用不着害怕这种有两头母牛和两匹马的富农，而且应该设法使所有的人都成为这种有两头母牛和两匹马的富农。（掌声）危险是在别的方面。危险在于，如果说富农还没有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阶层，那么商品经济的条件本身却是农村分化出富农一翼的有利土壤。必须采取措施预防这种情况，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作为目前我们许多苏维埃的特点的停滞不前和死气沉沉，也算是这种预防措施。为了同富农作斗争，需要的恰恰是苏维埃的生气勃勃，而不是死气沉沉；需要的是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在苏维埃中和通过苏维埃展开积极的工作；需要的是在工作过程中，首先在经济工作这个主要工作的过程中，使苏维埃成为对富农进行斗争的支柱。不是停滞不前，而是为中农和贫农的利益开展扎实的工作，这才是对富农的斗争，因为中农和贫农占绝大多数。

如果说中农和贫农有时跟着富农走，那并不是因为喜欢他们，

而是在苏维埃得不到帮助，受到冷遇，打官腔，拒绝满足那些往往是苏维埃完全有能力解决的需求。

农民从苏维埃不仅得不到帮助，甚至得不到对自己的困难的重视，他们遇到的是官僚主义，有时甚至是近乎侮辱的拖拉敷衍，于是便到富农那里求帮助和讨主意，甘愿受富农的盘剥。

这种状况必须根本改变，官僚主义，有时行政上的任意妄为必须连根铲除，我们要通过吸收广大农民——贫农和中农——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来做到这一点。在我们现在所采取的这种方针下，很少有可能产生来自富农的危险。有一种危险要现实得多，这种危险不是目前存在的，而是将来可能发生的。这种危险就在于苏维埃将主要为富裕中农阶层的利益服务，而忽视贫农的利益。显然，我在这里是想谈在富裕农民中相当广泛流行的一种偏见。富裕农民阶层有时说，贫农是不愿意干活的懒汉，所以你们关心贫农也是白费力气，他们穷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是因为他们懒惰。我想说，贫穷并不总是因为懒惰，富裕也并不总是因为勤勉。如果以为萨瓦·莫罗佐夫是靠自己劳动赚钱建起自己的工厂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不管你多么干，你也赚不到那么多钱。既然有人在城乡之间跑买卖，既然在我们的农村中还有收购商人，还有富裕农民向贫农放债等等，那就可能滋生富农。如果说商品经济的条件为滋生富裕农民创造了有利的环境，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内战争则使许多地区产生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没有马匹的农民。试问，一个农民没有马而只有老婆（他大概是靠老婆来耕地），那他怎么能摆脱贫困呢？贫穷，占很大比重的没有马匹的农民，这是国内战争和俄国沙皇统治的结果。没有马匹的农民在有些地区占全体农户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而去年在四十八个省他们平均占全体农户的百分之三十点六，——他们不是懒汉，而是在国内战争中和在地主奴役下受害最大的人。苏维埃政权的任

务首先就是要成为这些贫农的政府，就是要优先帮助他们。从经济上考虑也必须这样做，凡是有自觉愿望的人，都应当首先加以帮助。

但是，我们只有通过改进苏维埃的工作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当农民还很少在苏维埃中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苏维埃变成组织贫农和中农的据点，就不能吸收他们参加苏维埃的建设并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我们必须首先设法做到这一点。为此，我们在许多地区宣布改选；为此，必须让农民能够自由地选出他们所希望选的人。在我国按照法律是有这种自由的，可是实际上一些支部和小组有时所实行的提出候选人的办法，使得许多地区的农民不能参加选举或者参加得很少。活跃苏维埃的工作也是在农村建立法制的前提。在下面，违法乱纪的现象还很多。用不着举例，因为在任何一份报纸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种违法乱纪现象不仅仅是基层苏维埃机关的特点，这种现象在较高的机关里也有，在那些本来我们认为应该是官僚主义和行政专断最少而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最文明的机关里也有。据我所知，有许多这样的情况：省教育局没有任何明确的理由就把一个教师从一个学校调到另一个学校、从一个乡调到另一个乡，一年调动了五、六次。如果说省教育局还没有把教师解雇，如果说教师还在工作，那么这种调动就只能是为了彻底搞垮他的生活，表明我们对教师的工作采取不严肃的态度。不久前报纸上刊载过一条消息，说为了查问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就迫使一位女教师徒步走十俄里去见一位官员。这只能说是存心侮辱人。在应该彻底保障革命法制的基础上，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省级机关里也必须展开对官僚主义歪风邪气的斗争。（掌声）

不久前，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加里宁同志主持下召开了一次讨论基层苏维埃机关问题的专门会议。我把这次会议的决

议念两三条，为的是向这次代表大会表明，苏维埃政权的中央机关是何等重视这个问题。决议中写道：“鉴于保证正确贯彻苏维埃法制和加强革命法制原则，是苏维埃政权在巩固工农联盟事业中的基本的和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会议认为必须坚持不懈地对破坏革命法制的人、行政专横行为、官僚主义、贪污受贿、粗暴冷淡地对待公民的行为以及其他滥用权力的现象加强斗争。为此将由农村检察机关建立专门的巡回组织，以便不仅可以在机关里，而且在巡回农村各地时就地接受居民对官僚主义和行政专横行为的控告”，等等，等等。

这次会议认为必须吸收非党农民参加司法机关的工作，同时尽量让更多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当人民陪审员，并提高农村妇女在审判中的地位。农村巡回检察员必须倾听每一个人的呼声，倾听对一切违法乱纪行为的控诉。此外，会议还决定采取一系列其他实际措施来保证基层机关遵守法纪。

教师的物质生活状况

我想再谈一谈教师的物质生活状况问题和教育事业的预算拨款问题。根据我跟教师们的一些谈话，我必须指出，对教师来说目前最紧要的问题不是提高教师薪金的问题，而是他们的法律地位问题，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他们在苏维埃中的作用问题，以及教师的文化设施问题。我是从许多教师那里听到这种意见的。他们都向我表示，有些服务了许多年，已经失去工作能力的教师，现在不是生活毫无保障，就是保障很差。我回答同志们说，教师的生活状况当然反映全体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我国预算的状况。只要稍有改善教师经济状况的可能性，我们就立即予以改善。迄今已经做到的当然只是保障教师经济生活的第一步。教师不仅仅应该有足够的面包和住房。教师是文化工作者，有时甚至

是农村中唯一的文化工作者，他们的薪金数额当然应该精确地考虑到他们的文化需要。（掌声）因此，我们迄今所做的当然是不够的，我们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全苏教师的平均最低工资为二十八卢布。只要共和国的资金办得到，我们就一定尽力提高最低工资额。我认为，必须保证教师在做了一定年限的工作以后不觉得自己是完全被抛弃的。因此，在一个半月以前我们就已开始制定一项关于教师退休金的法律。这项法律现在还没有公布，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在这次大会上宣布一下，这项法律已经由人民委员会一致通过并批准了。按照这项法律，连续或不连续地总共服务了二十五年，其中有五年是在革命后任教的教师，将领到大约二十至二十五卢布退休金。（掌声）我们现在还不能对一切教育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推广应用这项法律。我们只是局限于城市和农村的初等学校的范围之内，局限于其他一切农村教育工作者，如农村图书阅览室和农村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等等范围之内。去年国家预算和地方预算的教育经费总共是二亿一千五百万卢布到二亿二千万卢布之间。今年国家预算和地方预算的教育经费是二亿六千五百万卢布。几天前我们又追加了拨款。从表面数字上看，我们的教育经费已经比沙皇时代多，但是因为现在的卢布币值跟战前的卢布币值不同，所以我们的教育经费实际上还比战前略少。

注意文化战线

毫无疑问，苏维埃政权目前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所谓第三条战线即文化战线，这条战线长期落后于所有其余的战线，尽管最近两三年来教育工作者在千方百计地把这条战线推向前进。从今年起，这个第三条战线即教育和文化战线将成为最主要的战线。整个经济的注意点和苏维埃政权的整个现状都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在教育事业方面，通过消灭落后现象的极其激烈的斗争（主要

是在农村)，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并取得极大的成就，我们就不能继续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

那些把文化开支、教育开支跟经济开支截然分开的同志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显然不能设想，在一个大部分居民是文盲的国家里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最终目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光是读书识字对于实现我们的最终目的来说也还是不够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是在工业方面、经济方面达到人类知识的顶峰，而且是意味着甩掉了愚昧、无知、文盲和迷信的帽子。目前当我们还存在着大量的成年文盲居民的时候，就不仅谈不上在农村组织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也谈不上政治宣传、政治鼓动、政治工作，因为居民不能读书识字，他们就会完全为鬼话、迷信和谣言所左右，不通过报刊出版物，要克服这些东西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吸收农民参加苏维埃工作的问题，在改进农业的初期是跟教育和文化密切联系着的。文化、教育、消灭愚昧无知，对农民来说是恢复农民经济的前提，是推动农民经济前进的前提。这就再一次说明了我们今天出席的这次代表大会的全部历史意义。

我觉得，认为所有的教师现在都已经完全具备了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组织者的修养，这是一种过高的期望。依我看来情况还不是这样。教师本身还需要坚持不懈地下很大功夫，才能胜任摆在教师面前的那些历史任务。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一个野蛮的、愚昧的、迷信的和文盲的农民俄国，改造成为向组织社会主义社会迈进的文明国家。这里所需要的是，教师要有一个实现这一任务和自己学会如何实现这一任务的愿望。

知识分子群众的转变

根据苏联目前的情况，根据各乡、县、省教师代表大会上的

情况，根据两千教师聚会到这里来，一致希望组织起来按照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的纲领开展文化战线工作这种情况，必须得出如下结论：教师的内心转变，教师力求认真搞好这一工作的愿望，这一最关键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已经解决了。苏维埃政权、我们的整个国家都在千方百计地设法帮助教师成为有足够的觉悟和文化的人，以便去完成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教师都从未面临过的那种任务。我们要通过给教师提供测验自己学识的机会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我们要通过使教师能得到他们工作上必要的文献、图书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我们要靠全体工人阶级、各级苏维埃和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做到这一点。（掌声）

最重要的是，在十月革命时期，教师群众受良心驱使开始参加组织新的苏维埃制度的工作，参加组织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过的和少有的现象，现在这个空白点已经得到填补。最近两三年来，广大知识分子已经向苏维埃政权方面转变了，到本次代表大会时应该认为这一转变已经完成。

在经过长期的内心斗争之后，在知识分子当中发生了巨大的思想转变之后，教师已经开始为组织新社会效力了。教师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之前，已经在农民当中，在苏维埃和合作社中做了大量的、艰巨的工作。我们并不是把教师当作被苏维埃政权、被苏联歧视的人邀请到这次代表大会上来的。教师是作为组织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工作的平等参加者到这里来的（掌声），我们对全体过去、现在和将来站在苏联和共产党立场上工作的教师们表示欢迎。（掌声）

译自《真理报》1925年1月16日。

农村工作的新任务

(1925年2月在俄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和
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召开的全苏农村
工作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新的经济政治形势的特点

同志们，我想谈谈我们目前面临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特点。虽然不能把这种特点说成是我们的政策与前几年的新经济政策相比有了某些崭新的、根本的变化，但是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形势本身和新经济政策初期大不相同了。

我看，本年和以往几年不同的地方，首先在于大家目前都已经从经济的普遍高涨和广大工农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中感觉到了新经济政策初期的实际成果。

这就引起了一连串的新现象，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比过去更加复杂和困难了。

这首先指的是我们的农民经济。

农业的初步积累不能不引起农村的两极分化：一头是富裕农民阶层，另一头是雇农和贫农。在我们国家经济工作领域中，农村的两极分化使得一切调整、管理和参与农村经济恢复过程的方法变得复杂了。在农村，即使在办理农业贷款，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劳动组合和机器协作社等等方面，这种情况也直接表现出来。城乡商品流转的增长，要求必须在城乡之间，在工农之间

建立和安排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联系方式。

国内的普遍经济高涨在某种意义上说会促进各种农民思想的形成，因为在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恢复的农民经济必然要使资本主义思想复活，这是和一个新的、暂时人数还不多的资产者阶层在两极的一方出现相适应的。这就使目前时期大大复杂化，使党和苏维埃要担负重大的责任。党和苏维埃当前的责任首先在于很好地注意农民在经济高涨基础上显露出来的一切积极表现。如果经济高涨和各种思想形成的这个过程是自发的，就是说是不通过我们、不通过苏维埃、不通过党的，那么，就可以有许多理由认为，这个过程是沿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路线而发展的。

形势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任务

农村本身按其经济条件来说不具备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前提。因此，十分需要党和苏维埃积极地参与农村经济恢复工作，开展出色的农村经济组织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以便使这一过程按照苏维埃和党的方针发展。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全部主要任务。成长着的新“地主”阶层的敌对思想现在不可能在农村中占主导地位，这至少是因为这一阶层本身人数还不够多，经济上还不够强。现在，它同其余农民阶层不同的地方一般就在于它的积极性较高。富农目前一般是通过向中农和贫农提供某种帮助来奴役中农、贫农这一特殊方法而在农村中起作用的。富农打着帮助的幌子来盘剥农民。因此，为了铲除这个可能滋生富农把持大权的现象（目前这种现象还非常少）的基础，必须在这个阶层的主要一项“工作”上把它顶替掉，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直接去帮助贫农和中农。在这里，光靠改造思想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能用办理信贷、组织合作社

等方法及时帮助农民解决他们在消费、买卖和生产方面的困难，那么，富农就会把小卖店和贷款处都办起来。如果我们不帮助农民在贫农、中农自动组织起来并且跟党和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的基础上改造自己的思想，那么，富农就将取代这个位置，把居民组织在自己周围。

胜券全部操在我们手中。我们手里有国家政权，我们掌握着财政、国营商业、运输业、工业以及组织合作社的条件。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弱点是什么呢？主要的弱点是，缺少同我们一起积极工作的非党贫农和中农。单靠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是完不成这项工作的。只有当富农以外的居民阶层都组织在苏维埃、党和合作社等等的周围，我们才能完成这项工作。所谓组织起来不仅是指在思想上支持我们，而且是指在苏维埃和合作社中同我们一起十分积极地工作，以建设新农村和建立城乡的巩固联系。

必须立刻行动起来，这就是因为在农村中出现了我们的对手，即新生的资产者阶层，他们没有睡觉，而是在活动。即使是农村通讯员的种种遭遇也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报纸上经常刊载迫害农村通讯员的消息。这类迫害事件就整个农村通讯员队伍和整个农村来说，固然是很罕见的，但是，这些事件毕竟说明农村各个阶层已经开始进行的社会斗争。富农怀着敌视我们的思想，开始积极反对农村通讯员的工作。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富农分子有时混得相当好，并且不愿意让步。

我们能在短期内搞好这场运动吗？

认为在一、二年内就能搞好整个这场运动，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把贫农、中农阶层组织在我们的周围——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从事农村政治教育工作的同志们应该首先记住，我们要打赢这一

仗不能不遇到一些局部的失败。这些局部失败的原因在于，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贫农和中农阶层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因为在许多地区，贫农和中农阶层是胆小怕事、没有文化、不识字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提高他们的政治积极性，使他们成为我们的一支真正的政治大军。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千万不要因为遇到一些失败或成绩不大而灰心丧气，要记住，当前进行的运动是极其伟大的政治行动之一，为了搞好它，需要的不是一年，而是许多年。这项工作的整个成绩不仅取决于农村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而且取决于在农村的教育方面、恢复经济方面、组织良好的管理机构方面所采取的一整套措施。如果我们大致经过五年左右能够作出政治总结说，我们已经在半数农村中能够可靠地按照苏维埃的纲领将大多数苏联农民组织起来，在我们的活动中能够依靠他们在苏维埃和合作社中有组织的团结一致来对付农村中新生的资本主义，那么，我将认为这是一项极其伟大的、无与伦比的成就。因为这里问题是要把非常落后的、没有文化的、不积极的、直到现在才刚刚以小生产者和小商贩的身份出现在集市上的、分布在广大国土上的亿万居民组织起来。整个问题的困难在于，工人阶级一定要引导这些小生产者和小商贩参加组织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工作。我再说一遍，任务是异常困难的，不解决它，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成果，以及十月革命的种种成就都将大成问题。

什么人算是富农？

与此同时，现在产生了许多迫切的实际问题，牵涉到应该怎样理解所谓富农和懒汉，以及应该把什么人算做富农或懒汉。农民到处向我提出这些问题。人们在解释富农时往往犯很大的错误。时常有农民这样对我说：“你们支持贫农反对富农，但是一旦贫农

没有了怎么办？你们说，现在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需要贫农。可见，你们会故意保存贫农，好在农村中依靠他们？”（笑声）请看，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富农、中农和贫农的概念本身被很多人混淆了。举例来说，如果把我们的中农和比利时的贫农相比，那么，按照我们的标准，比利时的贫农就会成为地主。人们一般地只是把那些没有马匹，没有农具，即一无所有，全部家当都集中在农舍里的农民算做贫农。这根本不是农民，因为他们不搞农业。

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是，要在很短期间内完全消灭这一农民阶层，使那些没有任何家当，没有任何牲畜，没有任何农具的农民在我们这里不复存在。农业的发展会导致全体农民，首先是贫苦农民阶层物质生活的改善。如果我们想要在争取农业集约化的斗争中取得重大成就，那么，就必须把我们用来衡量贫农和中农财产的标准增大若干倍，并且不是把那些从土地上取得许多收入的农民，而是把那些靠剥削其他农民取得许多收入的农民算做富农。如果农民从他一家耕作的土地上得到大量收入，是不应被列为富农的，因为他们并未剥削他人的劳动，没有把别人的剩余产品据为己有。但是，如果农民用许多居间手法（以“公正的”利率出借工具，贷放种子）奴役和剥削其他农民，损人肥己，那么，这已经是富农在成长了。大家知道，有这样一种情况：某些农民由于既无牲畜又不种庄稼而完全不纳税，但他们实际上是富农。

不能用单一的、事前硬性规定的标准去看待上升中的、在新基础上改建的农业。绝不应该把那些由于采取新的利用和耕作土地的方法、推行农艺措施而获得好收成以及生活比较富裕的农民当作富农。我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如果要按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给什么叫农业上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下定义，那就应该把那些能

从一俄亩土地上收九十至一百普特粮食，而不是一般的收三十至三十五普特粮食的农民算做这样的人。这样的农民提高土地的肥力，采用新耕作方法，提高收成，就这样从事着我们布尔什维克的事业。

关于农业集体化

我还要就此谈谈农业集体化问题。我遇到过一些同志，他们把农业生产社会化看作是共产党员目前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消灭小农生产，这就是他们的任务。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不仅在今年，而且在最近若干年，农业集体化都不能被党当作是一项迫切的任务。新经济政策结束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当然，到新经济政策结束的时候将首先在城市，在工业领域彻底实现集体化。与此同时，将仍然存在着非集体化的小农经济。无产阶级国家将通过城乡结合，主要是通过掌握商品流转，引导农业走上集体化的轨道。农村的集体化将首先沿着城乡商品交换这一流通渠道进行。只有国家在这方面进行调整和领导才能使我们在某些农业生产职能的集体化方面取得进一步的成就。现有的那些少量的土地集体耕作无疑应当受到多方面的支持。当然不能完全否定或者哪怕是低估土地集体耕作目前在按新原则改造农民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做了十分有益而需要的事。但同时也不能对它评价过高，把土地集体耕作当作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必须记住，集体耕作只是个别的现象、少量的萌芽，它们的发展可以补充农业通过流通过程集体化的不足。

应当作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在农村中的基本工作，而目前在农村中必须力争完成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使农村经济恢复的自发过程以及农民积极性、农民新思想的相应提高，不要撇开我们和

背离我们。全党和全体农村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应该利用这一高涨，使这一过程沿着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轨道前进。

译自《真理报》1925年2月21日。

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摘录）

（1925年3月5日）

苏联国内形势

三个基本特点

梯弗利斯，3月5日。现在苏联的国内形势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国家经济的持续高涨已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建立在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上的我国的经济政策，在城乡的经济恢复方面，已经产生了显著的良好结果。

第二，这种持续不断的经济高涨使整个经济政治形势大大复杂化，并且对我国经济某些发展很快的部门之间的衔接和整个经济的安排和管理，造成了一些新的客观困难。新经济政策发展的这个阶段使党和苏维埃在国民经济方面的任务大大复杂化了。

第三，由于上述事实，工农相互关系的这个老问题又有了新的内容和特殊的重要性。作为苏维埃存在的基础，工农联盟这个基本原则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

去年的经济总结

农业的恢复过程

在谈我国政策中的这个中心问题之前，必须首先概括地谈谈

去年的经济总结，即首先应该谈谈整个经济的主要基础即农业问题。

农业恢复过程的基本路线是什么呢？

1922 年开始的农业高涨还在持续。例如，播种面积逐年不断增加，去年全国的播种面积达到了战前的百分之八十。

个别地区播种面积的数字很可观。粮食不能自足的地区播种面积甚至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在乌克兰，播种面积达到战前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五，在西伯利亚，播种面积达到战前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一。

在歉收地区，播种面积有很大的减少。

如果 1921 年不是歉收，那么，现在我们播种面积的数量无疑会超过战前的播种面积。

播种面积的扩大非常显著地表明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农业恢复过程的方向。

最近一年来农业发展的特点是农业商品率的提高，农业结构在朝着与市场条件相适应的方向发生变化。

恢复农业的这条路线可以通过下列事实说明：在播种面积总的扩大中，技术作物和费力作物的播种面积比谷类有更大的增加，而在谷物作物中则主要是发展那些具有市场意义的作物。由此可见，农业的恢复是在按照迅速发展农村商品货币关系的路线发展，即使农业针对市场情况向农业集约化的方向发展。

所有上述发展大田农作物的路线也适用于畜牧业。

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时期，牲畜大量死亡。下面是一些畜牧业的现状同战前情况的比较数字：1924 年马的匹数为 1916 年的百分之七十点八，牛的头数为百分之九十三，绵羊和山羊的只数为百分之八十三点五，猪的头数为百分之八十七点五。

去年一年，马的匹数增加了百分之九点九，牛的头数增加了

百分之十九点七，绵羊和山羊只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一，猪的头数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点六。

连年歉收妨碍了农业更迅速的发展。当然，如果把歉收的全部责任都归咎于自然灾害，那是错误的。

歉收、歉收的原因和同歉收作斗争的方法

自然现象造成了歉收，但是，同自然现象是可以而且应当进行斗争的，办法就是要对农业进行较为合理的经营。

1905—1914 年，每年每一俄亩的平均产量是四十八普特。自 1920 年至 1924 年，我们只有一次超过了这个数字（1922 年每一俄亩产量为五十一普特）。在其余的年代里，每一俄亩的平均产量都大大低于这个数字。

这个情况说明，从不利的自然现象对农业的影响来看，农业是不太稳定的。

鉴于围绕着去年的歉收，围绕着我们苏联暂时由一个粮食输出国变成一个粮食进口国的问题，进行了而且现在仍在进行着相当大的争论，鉴于国外的白卫分子也在这方面掀起反对我们的运动，我打算就这个问题向你们提供几个补充数字。

去年的歉收要求增加额外开支。为消除歉收的后果我们拿出了很大的一笔钱，数额达八千五百万卢布。1924 年的歉收额要比 1921 年的歉收额少百分之七十五。

为了消除歉收的后果，政府建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要扩大播种面积，或者至少要保持原有的播种面积，保证在这些面积上取得尽可能多的收获。

因此，为了保证农民得到春播和秋播的种子，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当这项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的时候，发现秋播的状况大大恶化。

你们知道，今年的气候非常特别。恶劣的天气为秋播带来了普遍的不利影响，相当数量的秋播作物不得不补种。我亲自同一些农学家就来年收成前景进行了交谈，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而且也未必能得出什么答案。问题要看春天的情况。

尽管没有准确的材料说明秋播作物可能报废，政府还是决定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进行了补种，为此拿出了七百四十九万九千二百五十卢布的拨款，即把春播作物种子储备增加了几乎五百万普特。

今年计划投入春播的谷物最后确定为二千二百五十五万六千普特。政府花了很多本钱，因为明年的整个经济形势的命运都同收成好坏联系在一起。

工业形势 由滞销到商品荒

1924 年以商品滞销开始，以商品荒告终。我国工业全年的增长率一直赶不上对工业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工业在市场上拿不出足够数量的商品用来充分满足居民的需要。

我只举几个说明我国工业，首先是冶金工业发展情况的数字。

在去年，工业比战前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一年中工业产量增加了将近三分之一，但是，这种增长在轻工业和在重工业中是不平衡的。

1919—1921 年，我国的生铁产量约为战前的百分之三，钢产量为战前的百分之五，钢材为战前的百分之五点五。这意味着重工业几乎完全停产了。

1923—1924 年，生铁的产量达到战前的百分之十六，钢产量

达到战前的百分之二十三，钢材达到战前的百分之二十。

但是，我国冶金工业在发展上的这种巨大的飞跃仍然不足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政府不久前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扩大冶金工业的生产，要求使产量比早先批准的计划超过百分之十五。

这种现象——市场上工业产品不足的状况——更强烈地影响到轻工业。轻工业与广大消费者密切有关，它的资金的周转要比重工业快些。

1924年10月，轻工业最重要的部门——纺织工业的生产已经达到了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六十八，而1921年1—3月为百分之二十二。

· 货币改革及其意义

货币改革是引起工业品需求量迅速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它无疑会促进商品货币关系在农村的渗透。如果不预先为城乡商品流转打下稳固的基础，要取得许多象现在这样的成就，那是不可能的。

这种改革也使得我们的预算更加健全了。

预 算

外国资产阶级不久前还声称反对同我们缔结租让合同和商业、财政契约，理由是说我们的一切都陷于预算赤字的绝境。

因此，我们的国家预算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关于预算，布留哈诺夫和古比雪夫等同志将专门报告。而我谈及这个问题只是为了用我们预算的资料来说明我国经济恢复过程的速度。

1922—1923年，我们的预算为十三亿三千二百八十一万八千

卢布，次年为十九亿一千七百四十五万五千卢布。

1924—1925年，我们亲眼看到我国财政方面出现的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上一次会议批准的预算控制数字为二十亿九千一百六十四万八千卢布，随后，在进一步研究了预算问题之后，发现实际收入比预算设想超过一亿八千七百二十二万卢布。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大于控制数字的这个预算数字。

过了一段时间，当把预算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审查时，又认为还可以把预算再增加八千一百万卢布。

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呢？

前几年我们的弱点在于我们总是不能把收入计算足，而一味地季季、月月压缩我们的开支。

我们大家终于等到这样一年，我们第一次做到了不仅不压缩预算，而且在追加预算。

可能在下一次会议上我就得向大家报告新的、事实上超过我们设想的收入情况了。

我认为，这种情况是我国经济稳固发展的最显著的标志。这说明，我们的国内形势已经相当巩固了，因此我们已经有可能来减轻人民的捐税负担了。

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预算，在预算的收入上完全不存在利用发行纸币的问题。

只有在我国整个城乡经济普遍巩固的基础上预算才有可能如此增加。这样就可以使我们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提出统一农业税的问题。

减少农业税额

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把统一农业税的问题列入会议的工作计划。

我们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的时间大大推迟，农业税法的通过也可能延缓；第二，颁布农业税法不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只是由它的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来决定，对我们说来是欠妥的，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由于时间的关系，人民委员会关于农业税的建议作为减轻农村捐税负担的一个主要问题并没能够在农民专门会议或地方机关会议上进行仔细的研究。

因此，我请求会议通过一项关于组织专门会议的补充决定，并吸收中央执行委员两院的所有农民成员参加这个会议，以便预先审查这个问题，只有在此之后，再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听取这个问题的报告。

国家和党面临的新任务

随着我国整个经济的高涨，无论在工农业方面还是在对农民的政策方面，我们都面临着一些新的任务。

在工业方面，许多企业的现有技术设备几乎已全部破旧，现有设备能力不足的情况将限制工业生产的进一步扩大。

当前的一项实际任务，就是要从技术上重新装备和更新我国的工业，以便向农民提供廉价产品。

这里牵涉到许多具体问题，例如，在运输业方面是否有可能用内燃机车代替普通机车的问题。

这里还涉及到实现电气化计划的问题。在最近一年内，我们要建成我国的第一批区电站，其中包括沃尔霍夫电站。当前的问题是要开凿连接伏尔加河与顿河的运河；使顿涅茨地区电气化；建设第聂伯电站和斯维尔河上的发电站系统等等。与此同时，还必须制定出建设新工厂的实际计划。

完成了这些任务，我们就几乎可以直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至少是会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物质的和技术的先决条件。

如果说从前是农业超过了工业，那么今年却是工业比农业有更大的跃进。

政府最关心的是要千方百计地保证明年丰收。为此，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直至设置用于补种的种子储备。这样做是为了使农业赶上去，不让它落后。

但是，今后农业可能陷于困境，因为农村人口过剩，农业精耕细作不够，并且缺乏一些辅助农业的工业部门来加工、保存、外运和利用农业原料。

在发展我国的某些经济部门时必须遵循的主要方针是，要保持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协调性以及工人农民之间的协调性。在这方面要体现出工人农民之间的真正结合和真正联盟。

对待农村的新的政治态度

经济形势不仅完全改变了农村的经济，而且还要求对农村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采取新的政治态度。

目前，农民的土地、农户正通过前所未有的无数渠道跟城市、工厂发生联系。

现在，我们在农村除了农村图书阅览室、学校、医院等等以外，还有合作社、信用社、收购机关、机器协作社这样一些机构。农村有大量这样的事例，从古老的三圃轮作制过渡到新的土地耕作制和先进的土地使用方法，等等。

在农村中新的、与战时共产主义根本不同的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农民的政治积极性提高了。

恢复农业有很多困难，因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法则仍然在农村中发挥作用。当我们现在说“面向农村”、“更重视农村”的时候，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变得更仁慈了，而且因为和前几年相比，农村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必须纠正对“富农”这个名词的错误解释

目前还没有任何精确的数字来判断农村阶级分化的速度。“富农”这个名词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些不同的解释有时造成重大错误。现在还很难精确判断农村生活中这些新现象的意义，很难精确判断富农在苏联农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只有明年的全苏普查才能给我们提供有关农村形势的准确数字材料。

但是，在我看来，现在已经可以断定在解释“富农”一词上所犯的许多错误。人们常常把一些善于经营的农民看成富农。一位同志讲，好象在某个农村里，农民是根据抽签当富农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富农抽签”这回事，但是，能讲出这样的故事，就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是做得过火了。

我们现在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恢复农民经济。每家农户都要兴旺起来，变得比现在富裕十倍。我们同饥饿的、不识字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民在一起是永远建不成什么社会主义的。为了达到建成社会主义这一目的，首先必须千方百计恢复农民经济。

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是因为在衡量农村经济水平的变化时，到目前为止是采用战时共产主义的标准，采用绝大多数农民处境十分贫困时的标准。

这个战时共产主义的标准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因为整个国家、全体居民都富裕得多了。

“富农”一词的错误解释必须加以纠正。只有那些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其他农民的劳动为生，用放债、收租、收购等手段来奴役其他农民的农民才是富农。

自己劳动，并且靠家庭的力量重振家业的农民不是富农，不

能被看作富农。这是苏联最好的当家人。

农民经济的商品流转和商品率在农村中造成一种复杂的形势，使苏维埃和党的责任加重上千倍。党和苏维埃力图针对农村的一些新现象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

农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在农村中的作用

假如需要指出所有这些措施的主要经济目的的话，那么，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通过这些措施主动帮助贫农和中农。

因此，农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在农村起着很特殊的作用。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我们农村政策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以前，消费合作社占据首要地位。现在，由于农民中间出现了新的发展情况，农业合作社应该提到首位。必须拨出一批资金由农业合作社掌握，让它能够给农民以真正的帮助。

除此以外，还必须使合作社机关和苏维埃机关成为真正的农民机关。必须吸收大批农民参加这些机关，使他们在这些机关里积极地工作，并且认真地进行选举。必须使基层苏维埃机关和基层合作社机关成为贫农和中农的群众性组织的中心。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比以前富足多了。

这个问题是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问题。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合作社和苏维埃帮助农民恢复自己的经济，如果我们不通过合作社和苏维埃把他们组织起来，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向别处求援。

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下，工农联盟问题是同吸引苏联非党农民积极参予我们的国家大事问题分不开的。

必须依靠非党群众和农民群众扩大党和 苏维埃建设的基础

我们现在正在进入我国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以设想，单靠官僚（即使是最好的、最诚实的官僚），单靠党的基层组织，就能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继续前进。

我们已经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们应当扩大我们党的基础，扩大我们在积极建设我们的社会、积极建设我们的经济和政治时所依靠的那个基础，以便把千百万非党工人和农民直接吸收到我们的工作机关里来。

只有在他们的支持下，我们才能完成这项任务。（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真理报》1925年3月7日。

在列宁格勒省苏维埃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

(1925年4月)

经济建设的成就

苏联的国内形势首先决定于我国一切经济生活部门所取得的成就。李可夫同志列举了许多数字，证明我们在工业、农业方面、在整顿财政、发展贸易和铁路运输等方面，比新经济政策初期有了多么大的进展。工业目前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七十，而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工业只占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十八至二十。大多数工业部门现在都有赢利。

农业恢复过程的特点是播种面积的增长（达战前的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土地耕作的改进，棉花、糖用甜菜、亚麻等费工而又收入最大的特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扩大（例如，棉花播种面积从1922年的六万四千俄亩增长到现在的五十六万俄亩）。因此，尽管今年收成很差，农业总收入不但不比去年减少，甚至还比去年略有增加。

国民经济的壮大使我们能够用国内资金支援歉收地区：向农民提供的播种材料价值达三千九百万卢布，提供的拨款达四千五百万卢布。及时支援的种子使灾区秋播土地面积不仅没有缩减，

* 本篇是报纸报导。——编者注

甚至大大扩大了。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认为，这些地区的春播面积将保持去年的水平，甚至有可能增加一些。

今年的运输业的预算第一次没有超支，尽管其中列入了许多过去是完全没有或者为数很少的支出项目；这些支出项目都与恢复交通的基本建设费用有关。

财政情况的特点是，今年国家预算超出去年百分之三十。尽管如此，在执行国家预算中没有发行货币，而发行货币在去年是起了颇大作用的。

同我国经济进入新经济政策时的状况相比，这些成就是非常大的。但是，从十月革命提出的任务来看，这些成就还是很不够的。要完成这些任务首先必须使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大大超过战前水平。

固定资本问题

李可夫同志在具体说明这一问题时谈到了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城市公用事业中同样尖锐存在的固定资本问题。许多工厂，甚至许多工业部门都处于下述状态：只有建设新工厂或用新设备更换现有设备，才能解决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问题。有些铁路枢纽站的运输量已达到战前水平。农业集约化和改进土地耕作法的问题也是完全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紧密关联的。总之，不管我们拿国民经济的哪个部门来看，我们到处都会遇到固定资本问题。

重新装备工业，建设新工厂，以及用新的、更完善的机器更换旧机器等方面的工作的进展速度，取决于我们积累的速度，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超过消费的速度。

城 乡 关 系

李可夫同志接着谈到城乡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着重指出农村对我们工业的巨大意义。城市在“恢复农田”的基础上恢复工业，而农村是靠城市供给工具来恢复元气。

农村参加商品流转造成了某些崭新的社会关系。现在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农民没有马匹。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必然会出现雇农和产生资本主义关系。自给自足的农村很快就可能走上这条道路。工人阶级、苏维埃政权、共产党必须在这方面采取行动。

我们的农村政策包含着两个因素。第一，必须力求消除农村生活中阻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那些条件。第二，必须尽力用国家和合作社的力量来帮助贫农和一部分力量薄弱的农民。

李可夫同志接着指出农业人口大量过剩这一现象。工业不管发展得多么快，也不能全部吸收农村的过剩人口。必须发展农业，使农村过剩人口能够从事农业劳动。

李可夫同志在列举了调整和减轻农村税务负担的一些措施以后，转而谈到工业品的价格问题。工业应当尽可能降低成本。价格是商品进入农村的主要响导。低廉的价格是沟通城乡的唯一桥梁。在降低价格方面，由于工人的巨大努力，我们去年取得了重大成就。然而，降低价格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应该象过去一样大力开展，因为价格低和生产率高是工农联盟的基础。

合 作 社 和 私 营 商 业

李可夫同志详细谈到了合作社和私营商业问题。在我们的零售商业中，私营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用过去在一些地区

施行的某些行政压制的办法来限制私营商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对合作社的政策应该象以前一样是最大限度地给以优待的政策，是保护政策；但是，合作社和私营商业之间的关系应该仅仅限制在经济竞争的范围内。工农业的蓬勃发展正在为商品流转的发展创造这样的先决条件：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现有情况下，私人资本在商品流转方面仍然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需要尽快将商品从城市推销到农村去，我们应当依靠私人资本的帮助。但是，在这方面并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也不是在推行任何新的政策。不能够不要私商，但是必须向每一个农民讲明白，物价“剪刀差”和加价将随着农民的日益合作化而越来越减少。

对私人资本进行斗争应当只限于采取经济措施。工厂、银行以及税务机关应当根据对待私营商业的方针调整自己的工作，并为私营商业创造比以前更为有利的条件。

至于说农村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关系，那么必须承认，现在这种关系就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着。必须特别注意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它发展起来将会成为对抗农村中新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主要力量。

国际形势

李可夫同志在谈到对外政策问题时指出，由于两种制度——苏维埃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苏联可能经常面临资本主义国家蓄意侵犯的威胁。资产阶级国家在法律上承认苏联，这并未消除这些基本矛盾。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这两种制度，这些矛盾就将继续存在下去。

在谈到恢复欧洲经济的尝试和道威斯计划时，李可夫同志强调指出，当我们拿我国经济冲破重重困难所取得的飞跃发展，跟

资本主义国家为医治帝国主义战争与凡尔赛条约所造成的创伤，为重建所谓欧洲的政治均势而进行的种种尝试加以对比时，我们就能特别清楚地看出我国形势的稳定。

在谈到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对苏联采取侵略行动的问题时，李可夫同志指出，我们没有确切的情报表明存在着这类性质的协议，但是，达成这种协议的企图过去和现在都是显然存在的。这些企图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完全取决于今后国际政治的发展。必须记住，在这种场合，除了资本主义国家共同敌视我们以外，这些国家相互间的矛盾也起着巨大的作用。他们口头讲和平，实际上彼此始终在准备打仗。在最近一个时期里，是它们之间的矛盾占上风，还是在共同敌视我们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占上风，现在还难以判断。不管怎样我们都必须做好应付任何意外事件的准备，为此要关心我们的边防，关心我军的战斗力。如果我们注意到罗斯塔社的那篇关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包括波兰和罗马尼亚）举行参谋本部代表会议的报道，那么这样作就更是时候了。从这一报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人要对我们苏联搞军事阴谋。

欧洲的工人阶级仍然是我们的同盟者。最近英国工会同俄国工会在争取世界职工运动统一行动的斗争中接近起来，这是我们争取和平的斗争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情况。

李可夫同志在结束他的报告时指出，国内经济建设的成就、国家的进一步繁荣和我们红军战斗力的提高，是我们巩固十月革命成果的最好支柱。

译自《真理报》1925年4月15日。

关于合作社

(1925年4月在俄共(布)第十四次
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同志们，提到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日程上来的合作社问题之所以是个尖锐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合作社建设在我们的工作中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而且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的问题反映着党当前所面临的总的经济政治任务。

所以，为了把合作社的任务说得更加清楚，必须概括地阐明我们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时期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得这个时期不同于以前的新经济政策年代。

目前经济发展时期的特点

如果断言目前不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没有发生任何质变，那就未免夸大其词了。

我认为，我国经济的量变，我国经济过去和现在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的增长，在我国的整个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能不引起某些质变。这些质变促使党在策略方面和组织方面制定领导广大群众的新方法。最近一个时期，例如在对待农民方面，在活跃苏维埃方面，党都以这一点为中心进行工作；针对这个新的（也许是转折的）关头，发出了其他一系列指示；因此，合作社的工作也应当与此相配合。

这个新时期的特点是什么呢？

固定资本的再生产

我认为，这些特点一方面应当到工业发展方面去寻找，另一方面应当到农业发展方面去寻找。我国工业现在的特点是：恢复过程的高速度使我们在资产阶级一沙皇俄国遗留下来的旧技术设备方面挖尽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我们面临的整个任务就是：扩大固定资本的再生产和重新装备工业，以便使工业能完全满足国内市场日益增长的需要，把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群众吸收到工业里来。最近几年中，我们只有依靠扩大固定资本、建设新工厂和重新装备旧工厂才能增加某些工业部门（例如纺织工业）的产量。

以前，工业力图通过使停工的旧工厂开工的办法来提高自己的发展速度，以适应日益增长的需求。这样需要的资金和时间都较少。在扩大和更新固定资本的基础上发展工业，需要的资金就要多得多，需要的时间也要长得多。顺便说说，这种情况一定也会影响到我们进出口业务的作用的增长。如果国内市场的容量也以同样快的速度，或者即使以较慢的速度增长的话，那就不仅必须要比以前更加大量地进口工业设备，而且必须进口制成品了。

固定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应该同建立技术经济基础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问题结合起来，应当列入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总计划。这个任务的实现同社会主义积累的速度是完全分不开的。我们在各个方面都需要有真正能够保证扩大工业、从而真正能够保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命脉的那种积累速度。

这一切将为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发展农业和组织整个经济造成一个与以前不同的新局面。现在，农村的生产力是在我们通过十月革命夺取来的无产阶级经济专政的顶峰大大增加工作“负荷”的

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以前，即在革命最初几年，工业刚刚实行国有化，银行刚刚收为国有，它们几乎还没有工作。现在，无论是工业还是银行和国家预算活动，不仅仅成了我们的所谓“法律上的权利根据”，而且也成了调整苏联整个经济生活的真正杠杆。

现在的局势不同于我们前几年的局势，这就有点象一家空空如也的国营商店不同于商品满架的国营商店那样。执照和字号虽然未变，但是实际内容却不同了。

从法律观点看来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农村，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恢复经济的。实际上，农村正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发生一种量的增长，在我看来，这种量的增长已经接近于农村生活的质变。

提高农民经济的商品率

目前农村的生活可用两个特点来加以说明。第一，农村中有所谓相对的农业人口过剩现象，有大量在生产上没有得到利用的劳动力；第二，农村竭力要在提高自己经济的商品率的基础上转入积累的阶段，而且一部分已经转入积累的阶段。当然，关于这种积累的规模，以及关于这种积累是否靠农民的“工资”收入形成，或者在农民的某些阶层中是否靠剩余产品形成，对这些问题是可以争论的。我认为，根本问题并不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虽然农村有过剩的人口和大量没有马匹、没有农具的农户，但对工业品的需求，不只是对个人消费品的需求，而且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逐月都在增长。这一点不能不表明，农民经济有了积累。认为农村的这种经济恢复将不通过个别的、个体的农户的不同发展途径，而是通过二千二百万农户同时的、一律的、均衡的上升的途径，那将是十分荒谬的。在存在自由商品流转和小资产阶级农民经济的条件下，有一些农户发展较快，另外一些农户发展较

慢，再有一些农户停滞不动或者衰落下去，这完全是必然的。有一些农户将比别的农户恢复得快一些，它们必然要同过剩的劳动力和闲置的土地打交道。因此，农业的恢复必然会引起农村中雇工现象的增长和租佃土地的发展。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对于为了恢复自己的经济而利用农村过剩人口中的闲置劳力的农民阶层，应不应当采取非经济的、直接的、立法的和行政的斗争手段呢？

依我看来，对于在农业中靠雇工和租佃土地来发展农村生产力，没有任何必要设置行政障碍。我们掌握了我国经济的最主要的杠杆，牢牢控制了主要的经济命脉，工人阶级手里有了政权，因而用不着害怕资产阶级关系在农村中的发展。但是，除此之外，主要的一点是：必须创造一个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局面。认为此时“从法律上禁止”农村资产阶级关系的必然发展是可行的和适宜的，那是极端错误的。

关于富农问题

富农问题也应当从这方面来考察。

现在，从村会到党的省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似乎都在讨论富农问题。关于这种讨论必须指出：有些懂得农村资产阶级关系发展过程的必然性的同志，往往用掩盖问题实质的方式力图把这一过程说成是合法的。拉林同志曾指出，用这种方式来为这一过程辩护的做法，同在斋戒日里想吃肉、因而把肉当作鱼来加以赞美的和尚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他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我认为，想把富裕农民和富农两者对立起来，那是完全错误的。

从这种观点出发来进行讨论，就等于在搞烦琐哲学。在这里划一条明确的界线是不可能的，认为使这两者对立起来，这个十

分重要的政治问题就解决了，那就是传播有害的、危险的幻想。

顺便说一句，加里宁同志就是使两者对立起来的捍卫者之一。他引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来证明自己在“富农”定义问题上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请允许我从弗·伊·列宁的著作引用一段话（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版第139页）^①。

“按照民粹派的通常观点，‘富农’和‘殷实农夫不是同一经济现象的两种形式，而是彼此毫无联系和相互对立的两种现象——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民粹派的偏见之一，这种偏见甚至从来都没有人想通过分析确切的经济资料来加以证明。经济资料所说明的恰好相反。不管农民是雇用工人来扩大生产，还是买卖土地……或粮食，也不管是买卖大麻、干草、牲畜等等，还是做金钱交易（高利贷者），他们都是一个经济类型，他们的业务基本上是属于同一种经济关系。”这就是列宁同志对这个当前使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的见解。他把所谓经济关系理解为占有别人的剩余价值。

我认为，只要承认在当前恢复过程中农村资产阶级类型的关系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承认对这个资产阶级农民阶层确定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是必要的，那么，关于“富农”和“殷实农夫”的大部争论就都可以作为十足的空谈而予以勾销了。我们对待这一阶层的态度，应当同对待城市工商业界的私人资本的态度一样。我们现在不应当采取行政手段来同私人资本进行斗争。国家同私人资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经济竞赛和竞争的基础上的。

我们同农村中的资产阶级阶层也应当建立起这种类型的关系。必须停止对这个阶层施加行政压力。如果我们希望保证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话，就必须为完全合法雇工创造条件，为租佃

① 《列宁全集》第3卷第154页。——编者注

土地提供方便。

因此，我特向代表会议建议：允许这个农民阶层参加合作社的建设。以前规定的限制办法，完全把这个阶层拒之于合作社的大门之外，现在应该加以废除。但是，同时必须采取措施，保证党对合作社的领导权不致落到资产阶级农民阶层的手里。此外，如果我对农村发展前景的展望、我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无论是从合作社方面或者直接从国家方面都应当采取一些照顾贫农和中农的补充措施。十分清楚，如果首先不加快发展农村的积累，其次不把这种积累纳入国家和合作社的轨道，那么，即使经过很长的时间，我们也无法使百分之四十的没有马匹的农民变成有马匹的农民，无法供给他们农具，等等。

如果为富农经济的自由积累提供了条件，整个经济积累的速度就会加快，整个国民收入就会更迅速地增长，给予力量薄弱的贫农经济以实际经济支援的物质条件就会更好，吸引过剩人口的可能性将会扩大，最后，就会为发展合作社和把农民积蓄纳入合作社的轨道创造更为有利的局面。

对贫农和中农的帮助

这就是在讨论合作社建设问题时必须十分重视的一个根本问题。特别困难而又无论如何必须做到的主要一点，就是在农村容许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我们要比以前更多地面向贫农和中农。在对农业执行这条政治路线时，我们不能低估由于农民可能把我们的政策解释为转向新的农民资产阶级而产生的危险。因此，在消灭“战时共产主义”在农村的残余，给农业恢复过程的充分发展创造切实的条件，并扩大使用雇农和租佃土地的机会的时候，必须做到使贫农和中农比以前更加感觉到我们就是他们自己的政

权，从我们这里得到比以前多得多的真正的物质援助。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谈论贫农比较多，但是帮助比较少。

如果我们在农民政策方面实行上述转变时能够避免粮价波动的话，那么这同对农村富裕阶层滥用行政手段相比，是一种更加切实得多的反富农斗争，是一种更加切实得多的保护贫农措施。

我们通过合作社把商品流转 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

现在让我来谈谈合作社建设本身的问题。按照党中央事前的决定，除了我以外还应当有四个人就各种不同的合作社来作有关合作社建设的报告。现在却使我成了唯一的报告人。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来详细介绍合作社的状况，详尽地分析每一种合作社所面临的实际任务。对于这一点，我事先请求与会代表予以原谅。

在说明合作社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原则意义和联合小农经济的基本途径以后，首先必须提出关于这项工作的最主要方法和合作社建设的当前任务问题。

既然发展农村生产力，根除“战时共产主义”的领导农民群众的方法，保证我国整个经济体系最迅速地朝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所以，使广大农民阶层合作化的工作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整个过渡时期的一个中心问题，即关于农民小生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前的、部分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向社会主义经营方式进化的可能途径和性质的问题，是同农村合作社的工作分不开的。

合作社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主要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杠杆。随着农村向积累阶段的过渡，我们将面临这样一项实际任务：

要确定这种积累朝着什么方向、沿着什么道路发展——是沿着日益成熟的社会主义体系的渠道向前发展，还是沿着另外的渠道向前发展？

农村中开始发生的商品化和积累的过程，无疑的是以很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的，因而农村会向我们的工业提出特殊的要求。

通过合作社集中起来的这种积累，可以按照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来加以利用。如果这种积累不是通过我们的体系，那么我们就会遇到两个互相竞争的体系（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各自独立的中心，就会在国家领导和调节全国经济生活方面遇到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正确解决农业发展现阶段的合作化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党从哪方面并且应当怎样着手把农村经济纳入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城市的轨道呢？

在经济的商品率不断提高的条件下，从联系城乡的基本环节着手，即从商品流转方面着手，这在实践上是可行的，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因此，基本的途径是通过流通领域，而使农民合作化的任务就在于把他们作为商品生产者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有一种相反的观点，即认为使农业生产过程直接社会化（共耕土地，共同占有牲畜、农具，等等）是最主要的任务。这种观点是不太正确的。在农村目前情况下，我们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国家和党要用什么办法把对具有农业生产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农村经济过程的监督和调节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沿着使农村和城市联系起来的途径把农民经济组织起来，也就是说，把农民作为商品生产者组织起来，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即使从另一种观点来看，也就是从决定农业命运的基本农民群众的观点来看，这一论点也是正确的。这个基本农民群众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中农，在目前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中农还要

长期地留在集体农庄之外。

在这里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赋予商业多么重大的意义。他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写道：“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①

农民的生产联合

应当鼓励农村各种形式的集体联合组织的发展。这些联合组织的作用今后不断增长。但是在目前，千百万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农民的合作社组织，是农民的大规模联合的基本形式，是使农业组织起来的主要道路。不能设想我们在最近一年或最近几年里就能把集体农庄建设成为在我们的整个经济体系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的一种生产形式。我们必须通过发展和巩固合作社来做到使我们能够对小资产阶级的农业生产过程进行调节和监督。

各种农业集体化形式的发展问题，应当在我们的工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对这个问题要比以前给予更多的关心。但是党同时还应当考虑到农民大规模合作化的基本过程必须沿着商品流转和信贷的途径前进。然而，如果以为我们在农民合作化方面的工作只应限于把农民作为商品生产者组织起来，而完全不必深入到农业生产过程本身去，那么依我看来，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一观点，只有在完成第一步（即从流通方面把农民组织起来）之后，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78页。——编者注

我们才能着手去使农业的各种生产过程社会化。这样从时间上把这两项任务明确划分开来是不对的。不管是合作社还是其生命力已经过实践的考验和证明的那些农业生产集体组织形式，现在都应当得到国家的支持。只是必须做到：在这方面不要强迫命令，不要自以为是，要让农民自己根据实践和经验认清哪种经营方式有好处，同时作为一个总前提，当然，必须使社会化的经营形式采取比目前农村的农业生产形式更为高级和更加集约的农业生产形式。

几家用木犁耕作土地的农户集体组织起来，这绝不是社会主义建设。靠木犁我们是建不成社会主义农业的。

有一次同一位来自农村并极其兴奋地讲述农民集体组织（使用木犁）的同志谈话时我说过，如果在这个村里出现的是一台拖拉机而不是使用木犁的农民组织，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会被认为是更大的成就，因为能够组织起社会主义农业的前提之一是农业的集约化和农业技术获得目前未有过的发展。可惜苏维埃国家还没有足以保证农业获得这样发展的经费。

在机器生产的情况下过渡到公共耕作土地也合算一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机器——例如拖拉机——现在也能在农村引起一场彻底的革命。

一台拖拉机目前使农业生产过程革命化的程度远远超过一千名到农村抽象宣传集体农业形式优越性的宣传员。有一个合作社工作人员曾经对我说起拖拉机进入农村后所起的思想影响。下面就是一个购买了拖拉机的机器组合相继遇到的一连串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维持田界一块块地单独耕地，还是所有土地一起一下子耕完。后一种办法比较有利。耕地以后，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是把耕过的地分开，还是大家一起播种，一起分成。庄稼长熟以后，又出现一个问题，是分未收割的庄稼，还是大家一起收割后

再分。大家一起把庄稼收下来以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分这些割倒的庄稼，还是一起脱粒。接着，一起脱粒之后又出现一个问题，把粮食分给各户，还是把粮食通过合作社卖掉后分钱。这就是农民在农业中使用拖拉机后所产生的思想活动过程，它说明了农业生产过程社会化所可能经历的道路。

需要全力帮助那些现在往往只是建立单个农民无力办到的购买最起码的耕犁基础上的集体联合组织。但是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这还不是社会主义建设，这最多不过是一个萌芽，它以后才能发展成建立在高度技术基础上的真正的集体化形式。

合作社的种类

消费合作社

现在让我一般地扼要谈谈各种合作社的状况。关于消费合作社，首先应该指出：它采用自愿入社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消费合作社入股社员的人数增加了（目前约有八百万人），它的营业额大大增长了。消费合作社在销售工业品方面所起的作用，从它所占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这个数字就可看出。消费合作社在调节市场价格方面的作用是不容争议的。如果没有合作社，我们在实行货币改革时期就未必能够这样成功地开展我们稳定物价的运动；如果没有消费合作社的帮助，调节国内市场的工作就要复杂得多。

农业信用合作社的发展

关于农业信用合作社的工作必须指出，为详细研究这一问题而设立的专门委员会曾经通过下述决议：在下面农村里设立统一

的农业信用合作社，既为入社的居民的信贷需要服务，又为他们的供应和中介的需要服务。在农村不应当有任何专门的信用组织和单独的进行农业的中介、供应工作的专门组织。但在农村建立统一的农业信用合作社的同时，应当规定一系列补充措施，以保证它的工作能够合理而公正。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建立的农业信用合作社组织要保证能把存款，把农民经济中积累起来的资金吸引到合作社来。为了达到这种结果，必须使来自农民存款的信贷基金也和国家用于开展农业信贷业务的拨款一样，不得用于任何其他业务。这种合作社应当靠专门资本或专门贷款来执行其供销中介职能，决不可挪用用于信贷工作的资金。

上述这些保证必须做到，以便使农民完全相信，信贷资金万无一失。在信贷业务方面这是唯一与中央农业银行系统有联系的合作社，在所有其他工作方面它属于农业合作社的总系统。除此而外，必须做到使农业合作社不做买卖，不经售消费品。应当做到而且要保证做到把消费合作社同农业合作社的职能完全划分开来。应当制定一个农业信用合作社的统一章程，作为代替现有农业信用组织和一般农业组织的基层合作组织的基础。

现在的农业合作社的状况具有以下特点。农业合作社的收支额大大增加了。中央和地方联合在所属的农业合作社以及基层合作社（乌克兰不计算在内）的收支总额如下：1923年1月1日为五千七百万，1924年1月1日为二亿五千五百万，1924年10月1日为四亿七千万。由此可见，农业合作社的收支总额由1923年1月1日的五千七百万增加到1924年10月1日的四亿七千万，如果把乌克兰计算在内，则整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收支总额为五亿六千万。农业合作社的数目也大大增加了。我们目前在农村约有四万个农业合作社。但是，每一个合作社摊到的资金仍然非常不足：战前每个合作社的资金是六万卢布，现在每个

合作社的资金总共只有一万五千卢布。我们在合作化农户的数目方面也不如过去。现在合作化的农户是三百万，而战前合作化的农户则是一千二百万。可见，在使居民群众合作化方面，消费合作社超过了战前水平，而农业合作社则大大落后于战前水平。

最近几年来，农业合作社无论在收支额方面还是在社员人数方面都有所发展。但是，如果拿绝对数字来说，那么它仍然是非常微小的。就个别商品来说，农业合作社在农产品国内流转方面所起的作用反映在下面的数字上：粮食占百分之二十三，亚麻占百分之二十，油类要大得多，占百分之四十。这些数字本身是很大的，但是它们仍与合作社在我们整个经济体系中所应起的作用是不相称的。农业合作社和其他各种合作社不能够，也不善于使自己的工作同它们所拥有的资金相适应，这是它们的缺点之一。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地区的合作社的危机，有时甚至是很严重的危机。

这就是合作社组织不善于使自己的工作同它们拥有的资金相称的很好证明。根据农业合作总社的资料，截至本年1月1日，整个合作社网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点五的合作社是办得好的，百分之三十七的合作社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和办得差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五的合作社是过得去的。

这就是我们的合作社、尤其是农业合作社的现状。因此，在应当作出的实际指示中，必须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巩固现有的合作社网上，放在改善合作社网的工作上。预算中必须拨出新的资金。因此，国家预算要在下半年拨出一千二百万卢布以应合作社的需要。

更加注意手工业合作社

现在谈一下关于手工业合作社及其作用的问题。在各种合作

社中，手工业合作社是最受人轻视的。这种合作社得到的帮助最少。我们的经济机关过去和现在都常常把手工业合作社看作自己的竞争者，认为不应当给以帮助，而应当进行斗争。

有时，我们某些工业机关对待手工业合作社的办法简直带有盘剥性质。谢烈达同志向我提出的调查材料使我感到吃惊。例如，他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调节地方五金工业的国营组织干出了下述事情：它从手工业者手里收购了一批刀子，每把价格三卢布五十戈比，而它自己生产出来的刀子每把价格六卢布五十戈比和七卢布。它把手工业者生产的刀子和自己生产的刀子混在一起，按照平均价格出售。直到现在为止，国营工业部门不考虑手工业提出的向它供应原料和半成品的要求。不但不给它贷款，甚至连供应废金属方面也不予帮助。这样的事实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对待农村手工业合作社的态度很不象话，这对手工业者的合作化包藏着极大的危险，而手工业合作社在吸收农民中的剩余劳动力方面却起着极大的作用。

农民中的这种剩余劳力将会涌入城市；扩大产业后备军的队伍，另一方面也将产生农村的贫困现象。今后如不能迅速发展工业以适应市场容量的增长，我们就将不得不靠从国外进口商品的办法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尽可能依靠手工业来满足这种需求要更合适得多。此外，有许多手工业部门可以满足我们的工业根本还不可能保证满足的那些经济需要。因此，如何根除农村的贫困的问题，在哪里给没有马匹的农民安置工作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发展小手工业来解决。所以，不久以前颁布了一个减轻手工业者捐税负担的专门法律。必须彻底改变工业部门和我们的信用机关、财政机关同手工业合作社的关系。

必须终止以行政手段干预合作社工作

我只再谈一个与我们的合作社建设有关的问题。把合作社的工作做到能保证居民群众信任合作社的地步，这是通过合作社建设不但使小农生产服从我们的监督、领导和调节，而且还使它长入苏维埃经济总体系的前提之一。只有我们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农民合作化的态度，只有我们更多地信任农民，才能取得农民对合作社的这种信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使合作社活跃起来。党对农民的这种信任应当表现在保证合作社的选举自由上，表现在严格遵守合作社的章程上，表现在清除我们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以行政手段干预合作社工作的方法上。

应当坚决抛弃以行政手段干预合作社工作的方法，然而必须大大加强在农民群众中进行的社会工作，以便使合作社的管理机关掌握在贫农和中农的手里，使合作社能以自己的工作来为基本农民群众的需要服务。

自由选举合作社管理机关，选举机关对选民完全负责和向选民报告自己的工作，最严格地遵守章程，用开展和加强社会工作的办法来代替行政命令和压制手段，这就是根除合作社建设中的缺点和取得农民群众的信任的基本方法。

同志们，请允许我在结束这个报告时回过头来谈一谈我在报告开头部分所企图阐明的那种见解。在农村的经济生活中，我们正在经历着通过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而表现出来的那种变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国有工业、运输业、银行等等的发展壮大，都足以使我们不必惧怕新经济政策在农村的推行。新经济政策在农村的推行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管理方法的废除，都是同在农村中确立那种已在城市实行的法制极密切地联系

在一起的。如果不造成这种实行法制的局面，就根本不能设想会顺利地建设合作社和实现合作社所面临的宏伟任务，首先是取得农民信任的任务。

由此可见，农民的合作化是同实际实现党对农村提出的其他任务，即同活跃苏维埃的运动，同争取在农村建立廉洁的行政机关等等分不开的。

从我们政策的这些总任务的观点来看，农村合作社的作用有许多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合作社的作用同工会的作用有相似之处。正象工会是工人群众学习社会主义建设和苏维埃建设的学校、是党联系千百万非党工人的环节一样，农村合作社应当是锻炼最活跃的非党农民上层分子以使他们最积极地参加苏维埃国家建设的一个熔炉。

在资本主义关系以比从前大得多的来势开始在农村发展起来的这个时期，必须对合作社倍加关心，使它成为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的真正基础。（经久不息的掌声）

译自《真理报》1925年4月30日。

关于合作社的报告的结论

(1925年4月28日在俄共(布)第十四次
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我在这里加以说明的中央委员会的观点和决议，根本用不着拉林同志来解释和补充。首先因为，没有他帮忙，我们也能做这件事。其次因为，拉林同志是借口保卫决议而在攻击它。因此请允许我首先反驳拉林同志。拉林的解释归结起来就是要用在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没收或征用农业资产阶级的一切积累的诺言，用立即在农村发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建议来“改进”决议。拉林同志以为，靠这样解释决议，就能真正使新经济政策在农村中顺利推行。我认为，如果需要找一位演说家来发表一通言论，说明如何需要使农村情况恶化，那么，未必能挑出比拉林同志更合适的人了。(有人喊：“对啊！”)如果力求尽快发展农业生产力，促使目前的农村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同时又发出十年以后对农业资产阶级的财产进行征用的诺言，那么，不仅拉林同志，而且任何人都不会在农村搞积累了。做这样的补充和解释，意味着实际上取消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部政策。布哈林同志发言维护这个提案，反对拉林同志的解释，是做得完全正确的。

拉林同志的发言也许适合于十月革命以前好久的情况。他显然认为，工人阶级专政的存在没有给农村各阶层之间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带来任何变化，苏维埃政权下的农村是完全沿用斯托雷平时期的手段和方法向前发展的。我认为，拉林同志在1925年

重述他在革命前时期的革命小组里说过的话，是完全不适当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改变了雇农、贫农和中农的地位，改变了他们捍卫自身利益的方法。拉林同志没有看出这个根本差别。用拉林的这种办法不能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用这种办法我们是不能摆脱农村经济生活的停滞状态的。目前农村形势的整个特点，恰恰在于对待成长中的农业资产阶级的实际态度跟发展农村经济是互相矛盾的。每个人都感觉到这种矛盾，有人便往往打算用一种对富农的“特殊”解释来回避这种矛盾。在这方面，戈洛晓金同志在这里的发言是值得注意的，他说，他认为富农是一种需要压制的人，虽然整个问题在于不能用行政手段来加以压制。我在自己的报告中曾经指出，现在必须用比较自由的态度对待农村，同时我也强调我们能够并且必须使农村的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包括农村上层的经济发展过程沿着我们苏维埃的轨道前进。列宁同志在运用私有经济原则来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方面走得更远。他在《论粮食税》这本小册子里是这样写的：“谁能在这方面（即在活跃工农业的流转方面——阿·李·）取得最大的成绩，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甚至没有经过合作社，没有把这种资本主义直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那他给全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益处，也比那些只是‘关怀’共产主义纯洁性，只是对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写规章、条文、训令，但在实践上却不能推动流转的人，要多得多。”^①

这最后一句话就是专门为戈洛晓金同志和那希望预见十至十五年以后的一切情况的拉林同志而写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利用私人资本的态度比我们决议中所说的还要随意些。列宁同志接着写道：“这可能被认为是奇谈：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28—529页。——编者注

的帮手吗？但这丝毫也不是奇谈，而是经济上完全无可争辩的事实。既然这个小农国家，摆脱了战争和封锁，在运输业方面遭到了重大破坏，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运输业和大工业的无产阶级领导，那么，根据这些前提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地方流转在目前具有头等意义，第二、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①我认为，用上面的引文可以解决跟拉林同志的争执了。

在提请你们注意的决议中，许多细节，例如放宽土地租佃、期限、条件以及在农业中雇用劳动力等的细节都未加规定。所有这类问题有待于进一步仔细探讨，这里只是通过一般性的指示。但是，在所有其余的方面，在关于农村中实行切实有效的经济政策、根除战时共产主义方法以及取消富农和富裕农民两者的定义等方面，我觉得拉林同志对我的提案的解释是对的。我们在城市中建立一些条件，让私人资本合法活动，向他们课税，但在任何场合下，从任何方面来说，私人资本都不是非法的，我们对待农村资产阶级（不管它人数有多少）也必须牢牢掌握和实行同样的策略。如果戈洛晓金同志建议规定，到某个时候要压制富农……（戈洛晓金从座间喊道：“这不是我说的，是农村共产党员说的。”）是啊，是您教他们要用尽办法在一切场合压制富农，要给积累规定限度的那些农村共产党员。正因为如此，我才反对戈洛晓金同志的建议，我才说，首先，无论如何要“压制”、要逼迫是不对的，其次，我们的决议的精神是不用行政方法阻碍积累。这是要对每个人解释清楚的！城市里对私人资本采取的那套方法要推行到农村去，在那里要建立法制。在控制和调整资产阶级发展过程以及利用这一过程方面，我们现在拥有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要比弗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29页。——编者注

拉基米尔·伊里奇当初提到利用资本主义时好几十倍——那时运输业瘫痪，没有银行，工业生产直线下降。如果在巩固和发展合作社方面采取果断的措施，那么，日益恢复的农村终将进入全苏经济建设的总体系，从而我们也就能利用资产阶级新生阶层所积存的资金了。

在这里的全部讨论中，特别使我惊讶的事情是，在参加代表会议的人里面竟没有一位同志就手工业合作社问题谈上一句话。对我们合作社建设的这一方面如此不关心是十分危险的。因此，为了再次促使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让我宣读一些有关莫斯科省手工业者情况的数字。在叶哥里也夫斯克县过去有三万八千名手工业者，现在只有一千名，在莫斯科县过去有三万二千名手工业者，现在只有六百九十名，在博哥罗次克县过去有五万一千名手工业者，现在只有六百九十名，这就是说现在相当于过去数量的百分之二、百分之二和百分之四。^①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农村严重地贫困化了、空前地穷苦了，农村失业大军形成了。在一些地区里，手工业是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主要收入剩下百分之二，这就是贫困，这就是在商品荒条件下的流氓无产阶级，本来在商品荒条件下把手工业者利用和组织起来，对我们是会有利的。迄今对这问题还不够注意，这次代表会议上讨论合作社问题的情况便是例证。

讨论中错误地解释了我对商业的意见。象这里的一位同志那样来解释我们的商业政策是不行的。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决定价格的不仅是我们，而且还有供求关系。为了能够真正调整价格，国家必须掌握大量货源。就这个意义来说，粮食情况是不佳的。我们今后的政策应该是力求稳定价格。我们必须逐年前进达到这一

① 这里的百分比计算可能有误。——编者注

点。调整价格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农民经济的自发性和我们国家的贫困。如果我们手里有大量粮食，我们就能对价格进行应有的调整。

现在就合作社建设方面的实际建议略谈几句。我在合作社委员会中的任务是收集各地经验，按照党的总政策颁布切实可行的指示。很可能，并非全部有用的建议都被我们注意到了。但是，我一定要反对在会上通过某些关于各类合作社分配国家贷款的具体而精确的决议。有一次为了分配贷款好象是召开了一届各省、各共和国和各民族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似的，会议开了好几天。会议开完几天以后，我见到了加米涅夫同志。加米涅夫同志被这项工作弄得精疲力竭，但是还不能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资金。

我们对少数民族合作社的政策是否需要作某种修改呢？在这里发言的一位同志甚至用上了“殖民政策”这个名词。我认为，在我们党内应该禁用这个名词。如果要用它来打比方，那也只是用在下述意义上，比如，英国的殖民政策在于靠损害殖民地的利益来发展宗主国，而我们是靠损害“宗主国”的利益来发展“殖民地”。（喊声：“对啊。”掌声）在一段时期内，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要和那些在历史上长期受欺压的边疆民族打交道。苏联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应该帮助它们；但在这方面当然是有限度的。现在却出现这样的局面：农业中心地区的地方预算情况比边区还差。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讲坛上谈“殖民”政策，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不仅歪曲了我们的纲领，而且也歪曲了我们日常的实践。

决议草案中有一段话规定，不准明显的富农参加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这段话引起了很大争论。这里又开始抽象地议论起富农，按拉林的方式加紧向富农斗争了。决议里，在富农这个名词

前面故意加上“明显的”三字，为的是缩小人数，并且规定由合作社来执行这一指示。合作社章程中，现在也有这样的限制。例如，小业主不能参加消费合作社，手工业品采购商不能参加手工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还要考虑到一些特殊的活动方式，以便根据这些活动方式来决定哪一些人不得参加管理委员会，哪一些人则根本不得参加农业合作社。假定有农民自己在搞借贷活动，能否让他参加信用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呢？我看，不行。法律上完全不必作此规定，可直接交给合作社去处理。

某些同志建议重新实行综合化，建立综合合作社。由于农民不大熟悉外语，他们把这种合作社叫做阴谋合作社^①，尽管这个名称是凑巧取的，但却道破了综合的本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明确划分各种合作社的不同职能。各种合作社样样都卖，它们对于消费合作社是一种补充。不论是信贷方面还是在为农民主需要服务方面，我们对农民都没有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农民放在农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里的钱都白搭了，因为合作社商品积压，遭到破产。经验和实践充分证明，必须严格划分主要类型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之间的业务范围。有人说什么，私商只呆在一个地方，而我们则需要出去跑，——这是无关紧要的事。农民会不只一次，而是二十次地跑出去，以便取得尽可能多的利润。经常混淆各类合作社的职能的作法导致，而且也不可能不导致破产。

有位同志问，农业信贷方面的新合作社应该取什么名称？我们在报告里说过，农民在农业合作社方面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基层合作社。这里，你们从卡明斯基同志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关于农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问题的讨论是在怎样的气氛下进行的。有

① 外来语интеграл（综合化、整体化）和俄语интрига（阴谋）一词发音相近。
——编者注

些人认为，叫“农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农民就会来投资。另一些人主张，叫“农业一信用合作社”可以更有把握地吸收投资。我认为，采用哪一种名称并不重要。如果用改换名称这样的廉价手段就能够吸引人们向合作社投资，那就不值得去争论这件事了。

必须指出，讨论农业合作社时，大家在关于承认农业合作社制度的弱点，关于必须根据决议中提出的新章程和指示来改革农业合作社制度的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我要提醒代表会议不可对这方面的突然成功抱太大希望。现在就来保证没有一个合作社组织会受富农控制，那将是错误的。能够保证任何合作社都不会破产吗？当然不能。合作社的建设当然会遭遇一连串的局部失败和偏差。

最后我要谈一个显然是由工会工作人员提出的小问题。如你们所知，决议中有一段的内容是，防止把一些为了就业自己组成某一小工厂的劳动组合而暂时离开生产部门的工人从工会里开除出去。我认为，工会开除这些工人是错误的。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失业者承租国有工厂，利用一些贷款使工厂开工……就为了这点把他们开除出工会。为什么？我认为，那些能够利用工厂、使工厂开工的工人丝毫不比苏维埃职员或全俄农林工会的许多会员，离开工人阶级的其余部分更远些。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工人。失业者组织起来使工厂开工，我并不认为这是件坏事。我认为，为此用开除出工会的办法进行惩罚，就跟工会把手工业者当作非劳动人员一样是错误的。我们有些工会运动工作者不懂得，全部费用是来自手工业收入的手工业者丝毫不比那些进城搞临时工作并由工会组织起来的农民离开工人阶级更远些。

必须通过决议的上述条款，以免使失业者不敢组织自己的劳动组合。

最后让我建议代表会议选出专门委员会，另行研究在讨论我的报告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在即将进行的表决中，代表会议必须作出原则性的决定，批准中央委员会在合作社问题上的总方针。

译自《真理报》1925年5月3日。

农业合作社的作用和意义^{*}(摘录)

(1925年6月4日在农民协会
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农业合作社问题受到特别注意

李可夫同志在他的发言的开头部分指出农业合作社落后于我国经济恢复和消费合作社发展的一般速度，说明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和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他说，这些决议第一规定了一般合作社建设方面的新指标，第二规定了农业合作社得到充分和坚决的保证：在工作方面将获得它所需要的援助并给它创造顺利发展的环境。但是，必须牢牢地记住，主要负责实现这些决议的人是农业合作社工作者自己。

农业合作社问题现在受到特别注意，这是因为苏联的整个国民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看来将会大大改善全体农民的状况。我们可以期待在最近几年里就把农业提到比旧日沙皇时代更高的阶段。

农民经济的发展

李可夫同志接着谈到经济的现状。他指出，去年的特点是没

* 本篇是报纸发表的摘要。——编者注

有买主，然而今年的特点是没有商品，买主却有的是。这个买主就是农村、农民。出席这次大会的农民当然都知道，并不是所有农民的生活都很好。全体农民当中有百分之四十没有马匹。我们知道，农民并非总是因为有了多余的钱才去购买犁和耙的。他们常常是吃不饱也要买。农民正在竭尽全力摆脱贫困状态，首先要改善自己的经济，所以他们购买的主要不是个人所需要的东西，而是土地、牲畜和农民经济所需要的东西。这就不能不使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有所增长。一句话，农民经济已开始恢复。我们的播种面积即将达到战前水平。农民大规模地改善农业，由三圃轮作制过渡到多圃轮作制、改善畜牧业、引进集约作物——所有这些都在农村开展起来。这就是说，农民的觉悟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有了提高，他们在采用更完善的耕作方法。在最近几年里，这将会使农业恢复工作产生十分良好的结果。

农村资产阶级滋长的危险

政府正在尽一切力量对付这一发展过程。李可夫同志为了证实这一点，谈到近来为促使农业最迅速发展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农业税、租佃土地和雇用劳动力的条件、土地规划拨款的增加、道路建设、农业信贷、各乡预算的增加、对歉收省份的支援、七千七百万卢布防旱基金的设立以及家庭手工业等等。

李可夫同志说，国家为了改善农业所采取的全部措施，最近就会为农民经济能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恢复起来而创造非常好的条件。但是我认为，在恢复农民经济的条件下，会产生许多农民都能了解其本质的某些现象。由于农民经济恢复工作是在商品货币流通条件下，在百分之四十的农户(农户总数是二千二百万)没有马匹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一些农户恢复得快些，另一些

农户恢复得慢些，还有一些农户则根本恢复不了。在租佃土地、雇用工人有更大自由的条件下，在自由的商品流转和积累的情况下，当然会发生这样的危险：由于农业的恢复，一亿农民可能分化出一小部分新兴地主即新兴农民资产阶级。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我们不能熟视无睹。

必须使贫农富裕起来

为了使这种危险不致成为现实的危险，不致成为真正的危险，全体农民必须在农业合作社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要采取某些行政措施来防止这个阶层的出现，那是有害的，因为这样的斗争方法必然会阻滞二千二百万农户经济的恢复。现在恰恰是需要采取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为恢复农民经济创造条件，同时必须在经济上同农村资产阶级的作用可能增长的现象进行斗争。

这些办法包含在我国总的经济政策中，这就是减轻贫农和中农应缴纳的捐税，给予（通过国家机关、通过合作社）贫农和中农以支援、贷款等等。我们现在的任务并不是要使富裕农民成为贫农，而是要使贫农成为富裕农民。必须反对那种把复兴的农民当作“富农”对待的错误态度。

如果中农或者甚至是贫农由于自己的劳动、本领、知识而富裕起来，并没有奴役、剥削、欺骗别的农民，那么，他就不是富农，而是真正的苏维埃农民，或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不自觉的布尔什维克”。（笑声）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就是要消灭贫困。用自己的劳动来消灭贫困的农民就是农业方面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必须斩钉截铁地承认这一点。（掌声）危险的是奴役别人、强迫别人为自己劳动的农民即新兴的农村资产阶级。富裕农民利用粮价的波动而发财致富。秋天他们以低价买进贫农的粮食，到春

天却以高价售出，因而赚到很多钱。我国的全部政策都必须有助于同这种恶劣现象作斗争，即同一部分农民奴役另一部分农民的现象作斗争，因为我国政策的目的在于消灭农村的贫困现象。合作社和合作社建设应为解决这些任务而服务。合作社应当成为农民赖以恢复和改善自己的经济、积累由于恢复自己的经济而储蓄的资金的农民组织。

农业合作社应该支援贫农和中农

只有在合作社工作得比富农好而费用比富农少时，我们才会取得这样的成果。

我曾见过这样一些情况：合作社援助农民的条件看来还不如本村富农的条件有利。而富农也正是借口帮助贫农来进行盘剥，当农民没有马匹和农具，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富农便借给他所需要的东西，以便从农民身上简直剥下一层皮来。为了消灭富农在这方面的活动，合作社必须帮助贫农和中农，当然条件应该比富农的优惠。

合作社在援助贫农和中农的同时，应该把全体农民的资金吸收进来。我不希望出席这个大会的代表们留下误解，认为国家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整个农业信贷体系。

现有农户二千二百万，每户哪怕是一百卢布，用一百乘二千二百万，就是二十多亿卢布这样一笔可观的款子。我们没有这么多钱，也无处去筹集这么多钱。我们必须在组织农业合作社时，把农民所有可能积蓄起来的钱（虽然现在还很少，但将来一定会增加）都吸收到合作社来。如果不解决吸收农民资金的问题，我们不仅不能建立起农业信用合作社，而且也不能按照农民自身的需要来利用农业的积累。必须使富裕农民也把自己的积蓄存入农

业合作社。

怎样把农民的资金吸收到合作社来

为了便于合作社吸收农民的资金，我们专门做出了决定：第一，确保存款机密；第二，必须保证在办理与农业信贷没有关系的任何业务时，不使这些存款有被用掉或损失的危险。

沙皇时代农业合作社的大部分资金是由农民为数不多的、有时是微不足道的存款凑集起来的。国家现在所提供的资金似乎并不比沙皇时代少，可是农民几乎根本不在合作社存款。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会继续增加对农业信贷和农业合作社的拨款，但是全体农民应该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单靠国家资金我们根本办不起农业信贷。农业合作社工作者应该在利用已经拿到的并且在最近一个预算年度还要增加的拨款的同时，千方百计地吸收居民本身的资金。

由于农业信贷具有特殊意义，政府和党的机关对于组织农业信贷工作问题，曾专门进行了讨论，并且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农业银行和农业合作社在下面即在村里设立一个基层合作社，以执行信贷职能和中介职能。

我们觉得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通过这样统一组织，在下面给全体农民群众应该在其周围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社的整体打下一个十分巩固的基础。如果在农村单独成立信用合作社和单独成立农业合作社，那将是危险的。（掌声）

在农村，农业合作社应该是一般的组织。这样就容易使农民组织起来，容易使合作社本身发展起来，容易使各种农业恢复工作互相配合起来。

除此之外，还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使拨给农业信贷用的资金不

仅绝不能象农村以前那样用于贩卖扑粉，甚至绝不能用来贩卖花布。拨给农业信贷款的资金应该跟统一的基层合作社的其他资金划分开来，绝不应挪用于这个合作社的任何其他业务方面。无论是为了把农民的资金吸收到农业合作社来，还是为了通过发展农业信贷保证使农民获得基本的援助，我们都必须做到这一点。

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问题

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问题，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的经济问题之一，看来也是主要的政治问题之一。（掌声）如果没有农业合作社，如果不去发展把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社，那么今后苏维埃经济和苏维埃国家的存在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样我们就有二千二百万农户与国有化的、按照计划原则组织起来的整个工业体系相反，是没有组织的，分散的，既然我们的全部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在恢复经济的总计划、组织社会主义的计划的基础上同贫困做斗争，那么我们就必须拥有这样的农民组织：第一，它能报告政府，农民在哪里受到“压抑”；第二，它能使农业的恢复工作同所有其他部门的恢复工作结合起来。如果不发展运输业，如果没有冷藏设备和粮库，如果不安排调拨农产品的工业，那么农民就不能真正恢复自己的经济。但是为了把农业同我国经济中有组织的部分即大工业结合起来，必须按照经济方针、为了经济目标而把农民组织起来，也就是说，要成立农民的合作社组织。

合作社可以由农民自己建立

我们必须做到的主要事情，就是让农民信任合作社，把合作

社看做是自己的机关，感到自己有权利选举自己愿意选的人参加合作社工作，并且要求他向自己报告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做到的第一件事是保证合作社的选举制度和合作社机关对农民负责的制度。（掌声）我们必须做到的第二件事就是让男女农民群众经常检查自己的合作社机关的工作。

只有在选拔大批农民参加合作化工作的条件下，只有靠农民自己才能建立起合作社。由官员包办，我们什么也做不好，会把一切都搞糟。

我们不要害怕农民登上如此巨大规模的建设合作社的舞台会犯些错误。用不着害怕这些错误。只是必须使农民监督和了解自己的合作社，以便随时都能改正这些错误。如果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犯了什么错误，就应该让农民知道，并且共同努力来寻找建设和发展合作社的好方法。我甚至要说，如果我们要开展起千百万农民参加的建设合作社的群众运动，那我们就不害怕任何错误，我们就要千百次地改正错误。要贯彻政府和党关于合作社的决议，基础就在于取得农民的信任，尽量吸收农民参加合作社，提拔农民自己的合作社组织者。农业合作社是在亿万居民中间工作的，在广大居民当中必然有很多有才干、有本领的人。只是我们还不善于发现他们。能够搞好合作社事业，热爱这项事业，了解这项事业，满怀热情，能学会认真工作的人，无疑是有的，只是必须消除他们的胆怯心理，挑选有本领的人参加合作社工作并且给予他们指导。

我们的错误

在这里，我应该谈一谈我们中央机关所犯的一些错误。如果说中央的、省的和其他各级的农业合作社机关有什么错误，特别

是严重错误的话，那就是它们和地方联系很少，对地方指导很差。（掌声）加强合作社同上层领导中的农民群众和基层合作社的联系、发布指示、进行训练、开展宣传等等，现在应该起重要的作用。不做这些工作，我们就不能把合作社组织起来；不做这些工作，就不会有真正农民群众的合作化。

当有人对我说，某个基层合作社垮台了，我对中央机关回答说：“显然，你们没有很好地指导它们。你们为了避免它们垮台做了些什么工作呢？”（掌声）

在这里，问题不仅在于资金，而且在于人们应该学习如何工作、如何建设和如何进行组织工作。为了吸收大批农民参加合作社，在农民中造就一大批我们苏维埃的先进的合作社建设者，就必须加强对合作社工作者的指导、训练和思想工作。

李可夫同志在提到最近由于销售即将收获的新粮而面临的任务时说，今年大概是个好收成。所有迹象都表明，有着良好的丰收前景。在合作化的目前状况下，政府和所有的苏维埃机关在销售新粮方面会遇到一些困难。销售新粮的任务主要是使粮价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不让它象前些年那样惨跌（当时曾跌至十五戈比），也不让它暴涨。

粮价低对于国家（更不用说农民了）是完全不需要的，是完全没有好处的。不妥善地组织农民，不使合作社充分适应新粮销售情况（例如，不开展抵押业务，即不让农民把粮食抵押给合作社，就是说不能抵押粮食以取得贷款），那我们今年就会在为农民争取公平的粮价方面遇到极大困难。我们现在准备采取下列一些办法：第一，筹集收购粮食的基金；第二，保证在新粮出售前，为运货下乡做好货物储备；第三，改变征税期限，避免这些捐税给农民造成压力，使得农民向市场急忙抛售粮食来缴纳税款。我们将通过这些办法来防止粮价下降到对农民不公平的程度。但是，

我们没有足够的合作社网，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收购粮食的官员机构来做这项工作。此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实质上现在应成为所有农产品向城市输送的主要机构、而以后应成为唯一机构的合作社这种农民组织目前还没有。（掌声）

我们现正采取一切办法来预防粮价可能象去年那样下跌的现象，但是在没有合作社的情况下，谁也保证不了能够百分之百地做到这一点。不仅农民，而且政府都有一个弱点，这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合作社这个销售新粮工作的主要杠杆。

我们将在更高的技术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

李可夫同志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说：农村的发展现在稍稍落后于城市的发展，但是大概最近几年农村就会赶上城市。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建设工厂需要很多资金和时间，而给予农民比较少量的援助就能当年立即取得成效。同时，为了真正恢复农业，必须给它提供农具、农业机器。我们在最近几年里必须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怎样更好地利用我们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东西（旧的铁路、工厂等等），而是我们共和国的劳动联盟将怎样建设新的东西。（掌声）这就是目前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转变关头的基本特点。我国全体居民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国内战争和饥荒，曾经陷入破坏的深渊，在过去几年里曾以极大的努力来逐渐摆脱这种困境。今年年初，我们已经摆脱了困境（在一些经济部门成绩多些，在另一些经济部门成绩少些），我们已经面临这样的时刻：工人和农民在利用旧的遗产之后应该在更高的技术基础上建设新的工农经济。我们在进行建设工作时，必须保持农业与工业的完全协调。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必须使工业与农业互相服务，互相满足彼此的需要。进行这项工作，就是要为没有贫富之分的社

社会主义社会奠定经济基础。（掌声）现在我们只是开始着手做这项工作。为了真正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必须使全体劳动人民发挥巨大的积极性，并具有高度的学识和文化。因此，当我们讨论合作社问题的同时，也要讨论活跃苏维埃、吸引农民群众参加苏维埃国家建设和保证下层人民具有学识和文化的问题。同相信巫婆而不相信医生的人一起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不仅要使农民和工人发挥现有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而且要使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提高许多倍，以调动劳动人民的一切力量来参加我国的建设事业。

李可夫同志最后说：

“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我们才能建成合作社和社会主义社会，而合作社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译自《真理报》1925年6月7日。

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

(1925年12月5日在莫斯科省第十四次党
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很自然，对于这一次代表会议同对于即将举行的第十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一样，大家十分关心的是我们的国内政策和中央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活动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同各种倾向（利益、经济形式、阶级）的斗争。在第十三次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间的这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需要考虑的是党在经济建设领域和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政策的成果，总结一下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并在所有其他国家疯狂的武装反抗或抵制的情况下保住了政权）如何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据此制定出我们今后的政策。就我所知，各地在代表大会之前举行的代表会议所进行的全部争论都集中地反映在这些问题上。

关于苏联经济的性质

为了说明以上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十分明确地弄清工人阶级和党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当中所必须考虑到的那些社会-经济条件。这里我不打算去提及那些阐明苏联经济的最好的（从科学的观点看）术语问题。无论如何绝不能把现今的社会-经济制度称之为新经济政策，因为按照我们的理解，新经济政策指的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体系，其任务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组织

的基础。完全可以理解，如果说一个社会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那么，这种依赖关系绝不意味着它们是等同的。在新经济政策的帮助下，随着我们面临的任务的实现，我国的社会结构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现今的社会-经济成分的状况，那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五光十色的各式各样的经济形式。我国的经济象一堆经济形式的堆积物，稀奇古怪，其中既有宗法式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残余，又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在文化和生活领域里也同样存在这种五花八门的情况，既有偶像崇拜和血腥报复的残余，又有新的社会主义生活萌芽和工人阶级中社会主义意识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列宁同志在《论粮食税》这本小册里在分析我国经济结构时所列举的五种成分。我国经济就是由这样一些成分组成的（根据上面的分析）：“（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①

从以上多种多样的经济形式来看，如果不依据所有复杂的经济形式而只依据上述列宁同志谈到的个别形式来断定我国的经济，应该说那是完全不够的。

商品流转和货币流通有时影响某些人去很好地认识我国经济的主导性因素即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实质。

到我们这里来考察苏联国内状况的一个德国代表团回到德国以后发表了一篇工作报告，其中把我们的国营工业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我们中的一些同志在讲话和文章里也往往持有这样的观点。我认为这里不是用词不当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一个具有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5页。——编者注

重大原则政治意义的问题。在实际中，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企业是指什么，什么样的企业才可以（而且应该）称做资本主义企业呢？“资本主义企业”的概念里应包括这样一些必不可少的特点：存在着资本家阶级即生产资料的私有者，这个阶级能依靠这种私有制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攫为己有。生产资料私有者（即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行为也就叫做剥削。如果不存在这种情况，即不存在占有和随意支配生产工具并攫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那就既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也不存在国家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和一般政治经济学的最起码的常识。把我们的国营工业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工业，这不仅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它在政治上是一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意识形态表现，在这些人看来，在我们这里，似乎是一个新的有产的剥削者阶级取代了旧的、被十月革命铲除了的资本家的地位。在我们的国营工业里是没有资本家阶级的（请原谅，我不能不在莫斯科组织的代表会议上谈论这些最起码的常识），一切生产资料都完全归工人国家所有。因此，把我国工业解释成“国家资本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一种骇人听闻的歪曲。我国的工业很贫穷，工人的生活也很贫穷，工资低，我们的工人收入比福特工厂的工人收入少。这完全是事实，而我们的不幸也正在于此。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福特是工厂的所有者，他攫取剩余价值，即剥削工人，而这些工人并不是美国的主人，尽管他们比苏联的工人富。在我国的工业中，我们有“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每一个人都必须绝对清楚地把握住这一点，以便抵制某些人的惊慌失措情绪，坚定不移地用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

某些人在解释新经济政策上也反映出这种惊慌失措的情绪，这些人把新经济政策解释成为“不断退却论”。弗拉基米尔·伊里

奇把“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解释成为一种国内战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被迫采取的军事-消费经济制度，并指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即从对资本主义的正面冲锋转入包围行动，从“直接和彻底摧毁旧社会的……革命办法”转入完全另一种办法，即“改良主义式的方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活跃的程度能够使它们受到国家的调节”。①

这里我不准备具体分析新经济政策同战时共产主义相比是不是退却和为什么要“认真和长期”实行的问题。这里我只想强调指出这样一种错误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新（现在已经不新了）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地后撤。这种观点的产生是由于不了解新经济政策的意义，不了解我们已经在依靠和通过新经济政策展开进攻，并且用竞争的办法和在市场流通的基础上逐渐排挤我国经济活动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为了说明一些人对新经济政策的糊涂观点，我要在这里援引一小段萨法罗夫在《列宁格勒真理报》（见今年该报第 268 号）上发表的文章里的话：“我们的运动是在前进，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要知道，这是一种从退却到进攻的逐渐转变，从新经济政策引起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和决定性的这一点上来看，这是在准备新的进攻……”这就是说，我们大家现在所做的事情不是在向社会主义方向运动，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而仅仅是在新的革命的意义上准备新的进攻。另外一些同志也有这样的考虑，他们把我们的国营工业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把新经济政策视为某种“不便于”暴露的讨厌的疾病。为了证明我国国营工业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概念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575 页。——编者注

的正确性，我要援引列宁同志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所说过的一段话。列宁同志写道：“毫无疑问，在我国目前具体经济情况下，当我们把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但必须是建立在公有土地上的，必须是处在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监督下的）同彻底社会主义式的企业（无论生产资料或企业占用的土地以及整个企业都属于国家）联合起来的时候，这里也就产生了第三种企业的问题，即合作企业的问题……这种企业以前是没有起过独立作用的。”^①他接着对合作制作了分析（用列宁的话来说，在我国条件下合作制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国的国有化工业使用了彻底社会主义式的企业这一术语，以示这种企业同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区别。在他的分析里，各种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指的不是国营企业，而是租让制和租赁制企业。不言而喻，这是绝对正确的。对于我们说来，重要的不仅在于说明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实质，而且在于评价各种经济形式的比重和相互间的作用，因为它们的斗争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程度。所以，国家计委在关于我国各种经济成分拥有的资金的“控制数字”上所作的首次试探性的统计，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些统计在准确性上可能不十分可靠，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些统计中所表明的各种经济形式间的对比情况是正确的。根据这些统计，国家拥有的资金不少于一百一十七亿卢布，即占百分之六十二；合作社拥有五亿卢布；私人的、主要是农民的经济拥有七十五亿卢布。由此可见，在资金方面，优势是在工人阶级一方。这些数字表明，在我国这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而且现在已经有了物质前提的保证。这种社会主义建设是在自由商品流转、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和使私人利益同国家利益结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5—686页。——编者注

合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是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时，不仅不应当把农民从我们身旁推开，而且应当在这一建设中率领他们前进。因此说，新经济政策是使生产力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方法，并且是以私人的（小资产阶级的，半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同无产阶级国家的共同社会主义利益相结合（通过市场）的一定的尺度，以使这种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一定尺度为基础的。在上面援引的那篇《论合作制》的文章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新经济政策的这一思想是这样阐述的：“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难题。”^①

在不久前为迎接第十四次党的代表大会而公布的党中央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提纲里，列举了一些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的主要数字。这些数字无可辩驳地证明，工人阶级在自己的党的领导之下，依据新经济政策，能够而且实际已经在沿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能够而且实际上已经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这些数字雄辩地说明了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加，工业产值的提高和我们的财政制度对整个经济生活日益扩大的影响；最后，这些数字还反映了合作制的发展和巩固。我相信这些数字大家都是知道的，这里我只准备从这一长串数字中指出两个在我看来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情况来说是最重要和最能说明问题的数字。这是两个说明工业产值和工人阶级人数的数字。1920—21 年度，我国国营工业的总产值徘徊在战前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水平上，而去年，即在 1924—25 年度，则已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估计为二十九亿九千八百三十万战前卢布。今年，根据国家计委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682 页。——编者注

的控制数字，国营工业的产值将达到四十五亿一千一百七十万战前卢布（约为战前产值的百分之九十）。

工人阶级增加的情况（单位：千人）

1923—24年度	1516.7
1924—25年度	1846.9

今年，随着国营工业的发展，在业工人大约将增加五十万人。这个数字不包括运输业和农业工人，指的仅仅是注册工业的在业工人。

这两个数字不仅说明了国内经济生活的高涨和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说明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它们说明，我们不仅在发展，而且是在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这里我必须就我们现实生活中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即关于失业问题说两句话，应工人们的要求，我在工人会议上的每一次讲话中都不能不谈这个问题。

工业的发展

现在，失业人数有一百多万。1924年年中，我们苏联的失业人数达到一百六十多万，我们现在同那时相比，失业问题已经有了某种缓和。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是最尖锐的一个问题。

应该注意到，在最近一年中，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农村失业者的流入，劳动市场的多余劳动力大约将增加六十万人。我们的大工业、运输业和建筑业全年所能吸收的新工人有一百万人。

这样一来，可以预期，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失业人口将不是一百万，而是六十至七十万。但是这个前景并不乐观，它使党和政府不得不设法救济这些失业者。我在这里不可能详细说明我们在失业问题上所采取的全部措施。我仅指出一点，即由于经济的普

遍高涨，今年我们计划开展更广泛的救济工作（发救济金，组织社会工程和劳动集体等等），这样预计得到救济的失业者大约会有六十万人。同去年相比，对失业者的救济将大大增加。

我不能由此断定我们今年在消灭失业现象的斗争中将取得完全的成功。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规定给予每一个失业者的救济金平均只有每一个在业工人工资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这就是说，离最起码的生活水平还差很远。

除了进行直接的救济工作以外，还拟定了消除农村劳动力过剩现象的斗争措施，因为这种过剩是造成当前失业现象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劳动力过剩最严重的地方有坦波夫省、沃罗涅什省和中部黑土地区一些其他省份，还有位于这些省份区域的若干个县。正是出生在这些省的农村的人组成了失业者的主要队伍。这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战前就已开始的长时间危机，尖锐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引起的农业的严重衰退造成的。

消除失业现象的重大措施之一就是在农业本身建立必要的条件，使农业本身能大量使用农村的剩余居民的劳动。

所以党和政府在采取加快农村生产力发展速度的一般政策的同时，还特别采取了帮助上述省份的农民的专门措施。除了给农业的一般拨款而外，今年为了贯彻这些措施又拨出了二千五百万卢布（在预算和信贷方面）。

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我还必须指出现在失业现象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失业者的绝大多数都是非熟练工人。因此我们便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存在着失业大军，另一方面，熟练劳动力又不够用，我国工业越来越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因此，党中央和政府在消除失业现象的斗争计划中提出了对失业者的培训问题，即把没有工作的粗工训练成为熟练工人的问题，以便用这种

办法来排除我国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之一。经我们考虑，今年用这种办法将把数千名失业者培养成熟练工人。

我认为，大家从我上面讲到的有关失业情况里已经有所了解，在我们的生产中不光是有成绩和收获，不光是有光明的一面，不，在我们的道路上也有尚未解决的和需要解决的复杂任务。

在这些任务中，首先要指出的是进一步发展工业的任务，而现在发展工业已经不能再靠从革命以前的制度下接收下来的工厂、设备、铁路等等这些旧的物质技术基础了，而是要靠建立新的固定资本。当大家都把现在所经历的发展时期看成一个转机的时候，更要记住这个问题。现在的转机恰恰表现在我们的工厂和设备在任务上几乎已经完全饱和，一句话，无产阶级通过十月革命接收下来的全部固定资本几乎全部利用起来，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工业，那就不能不建设新的厂房，安装新的机器。

在运输业里，情况同样如此，现在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更新铁路设备，扩大通道网和增加机车车辆。

如果说从前由于工厂停顿和锅炉熄火，总之，由于固定资本得不到充分利用，而把工业拆散很容易，不需要很长时间，不必用很多物质消耗，那么现在扩大工业的问题便关系到增设新厂房、新矿山和新的机器设备等等问题了，而要解决这个问题，自然就需要花费比过去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资金。在最近几年中，我国工业以百分之四十、五十、六十的比例逐年增加，有一些部门增加的比例还更高。我认为毫无疑问，现在既然扩大工业问题是同建立新的固定资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今后的工业发展速度将大大放慢，未必能超过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可能还会比这更低）。

在建立新的固定资本的基础上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关键是什么呢？

全部关键在于国内提供的积累速度问题。我要十分强调指出这一点，而且希望每一个党员和每一个工人都能十分明确地把握住这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指出这样一种情况，即在最近几十年的世界经济理论中，没有说到有哪一个国家能在不争取外援、不取得外来贷款的情况下独立发展本国的重工业。大家知道，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拿不到这样的贷款，而且从长远来看，至少是在近期，我们一定不能指望会拿到这样的贷款。因此，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应放在加快国内的积累速度问题上。

诚然，我们有一些优越的条件，而且相当大，这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的，这些优越条件是我们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特性决定的。第一个优越条件在于，我们这里没有地主和贵族，在我国，资产阶级在数量上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少，比早先的俄国也少，因此，也就不存在有关这些阶级的非生产性开支问题。社会的积累过去有很大一部分被寄生阶级白白挥霍掉，而现在则几乎完全成为国家的财产，并被用来投入经济建设事业。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优越条件。

我们的第二个优越条件在于，尽管我们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未能取得特别显著的成就，但是，在经济生活的发展中，无政府主义的竞争和个别一些经济部门不考虑其他部门（有时是一些很重要的部门）而盲目发展的情况所起的作用比任何资产阶级国家都要少些。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根据国家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更加有目的地使用即或不是每一个卢布（我们的计划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至少也是每一百万和每一千万卢布的国家资金。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那么快地摆脱严重的破坏状态，并在一些决定性的国民经济部门中几乎达到战前的水平，应该说原因就在于有了这些优越条件。我认为，这些优越条件在解决下面我要讲的任务上也将发挥自己的作用。

我这里有一份我们的财政经济机关关于基本建设投资的材料。根据这份材料，计划用到基本建设方面的费用为二十二亿五千万卢布，其中工业方面的投资为十亿左右，农业方面的投资（建设粮仓、冷库、腌肉厂等等）为三亿六千七百万卢布，住宅、公路、市政公用设施、人民委员部的建设为三亿九千七百万卢布，余下的用于其他方面的需要。这份材料没有专门指出住宅建设的支出，但仿佛记得是准备拿出二亿四千万至二亿五千万卢布。

总之，新的基本建设投资总共为二十二亿五千万卢布。这对 我们尚不习惯的听觉来说，几乎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了。

如果把这个数字同去年的基本建设所花的那一两亿卢布比较一下，那么这二十二亿五千万卢布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了。

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数字比去年大而忘乎所以，不要过分地乐观，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有了这笔费用就可以那怕是在相对的很大的程度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那些任务。为了让大家具体了解一下这些数字同我国国民经济所需要的基本建设费用相比具有多大的意义，我可以用住宅建设方面的基本建设费用的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如上所述，在今年一年中，我们的资源至多能使我们拿出二亿五千万卢布用来达到这一目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在居住条件方面，对一个人来说还稍微过得去的起码卫生的住房标准，平均每人应为十六平方俄尺。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在许多城市，实际每人的住房面积只有七至八平方俄尺。据统计，即使所有城市每个人的合乎卫生标准的住房面积不要达到十六平方俄尺，而只要求达到十二平方俄尺，那就需要为此拿出二十亿五千五百万卢布，也就是说，比我们今年在努力动员国家全部资源的条件下所用来投入住宅建设的资金几乎要多出十倍。我认为这个对比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同时我还认为，在新建设的其他领域里，需要的数量同我们实际可能予以满足的数量之间，也同

样存在着十分惊人的差距。不管是党中央还是政府，都十分了解住宅问题的全部意义。在我国条件下，住宅问题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经济意义即使从下面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比如，假使把机器和车床都集中在几个工厂里，分班昼夜不停地工作，那就要有利得多。但是我们不可能办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住宅供更大数量的工人居住。

提高文化的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当工人阶级在自觉性、积极性和组织性上比其他居民阶层进步得更快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巩固。现在正是各阶级和居民阶层的积极性迅速提高的时刻，所以这一点是特别必要的。我再重说一遍，在这种条件下，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言而喻，我们苏联目前所处的极端恶劣的居住条件是横在提高工人文化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大家都知道我们往往有好几个工人家庭同住一间房子的情况；我们有一些地区的工人甚至住在窑洞里。在莫斯科的许多群众集会上人们都向我提出了应采取果断措施同酗酒现象作斗争的问题，不管是喝私制白酒还是喝伏特加酒，应一律加以限制。我认为，而且继续认为，要在工人阶级中消灭酗酒现象，一个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前提是提供哪怕是稍微过得去的居住条件。这些条件要能保证工人阶级有可能得到休息，能读书看报，能一般地过上人的生活。在我们这里，工人们所处的居住条件往往会使根本不会喝酒的人也喝起酒来。（笑声）尽管住宅问题有这样巨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但是我们却不可能拿出比二亿五千万卢布更多的钱来用于住宅建设，这就比稍微解决一下住宅问题的起码需要减少了十分之九。

我不打算去分析其他部门基本建设拨款的数量同实际需要之

间的情况。我只想指出一点，即使在这些部门里，拨款的数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些部门最迫切的需要。

上面列举的基本建设的拨款数字只是一些预定的和估计的数字，在我看来，随着对经济情况查明得越来越具体，这些数字还可能会减少。

我认为，在解决发展工业和确定基本建设费用的时候，态度应该比以前更慎重。新建设带有自发的性质；地方机关和个别工业部门在实行新的建设和发展工业上往往存在着与总的计划和现有的资源脱节的现象。当谈到基本建设费用时，应该注意的是，新的企业、铁路、运河、水电站等等建设往往抽调了流通领域里的资金，在工程结束之前就不能使商品量得到增加，因而使商品危机更加尖锐，并加重了国家整个资源的负担。

例如，第聂伯河水利工程、伏尔加河—顿河通航运河工程等等这样一些任务的实行就是属于这种情况，至于在重工业方面的巨大开支，那就更不在话下。从发展国民经济的角度看，在这些领域里和朝这个方向来进行建设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个别时候也不能不考虑根据当前的，比方说 1926 年或 1927 年的经济状况是否有能力这样做，我们是否现在就能把大批资金从流通领域抽出来用于需要等若干年后才能受益的那些工程。

到现在为止，我只谈了工业即我国经济中彻底的社会主义成分的问题。下面我还要就我国工业的另一部分即纯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问题谈几句。我指的是租让制企业和租赁制企业。在第十三次到第十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之间这段时间里，我们把几个非常大的企业租让给了外国资本家，例如象戈尔德菲尔德斯亚麻厂、恰图拉锰矿、古鲁巴农场、莫洛戈列斯林场就是属于这类租让制企业。

中央把企业租让出去是否做错了呢？我认为，由于我们面前

有那么多的我在上面向大家讲过的那些困难，中央的这一政策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实行了租让制，我们便有可能把用在戈尔德菲尔德斯亚麻厂和恰图拉锰矿等等企业的费用投到许多其他企业中去。现在，外国人在所有租让制企业投放的资本有三千八百万卢布。而我国工业所拥有的资金数量则达数十亿。所以，在租让政策方面，步子还可以迈得更大些。如今，租让合同已由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前夕的五十个增加到了八十八个。在租让制企业工作的工人（包括季节工）共有三万五千人。至于说租赁制，这方面的工作同样发展不大，哪怕从工人的人数上也可以看出来，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材料，1924—25年度为六万人（这里还包括租赁给合作社的企业的工人）。我认为，通过这些小小的数字足以正确无误地看出我国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巨大优势。

但是商品荒和零售价格提高的情况当然会造成小私有制企业的发展。而且我不怀疑，如果市场形势不改变，这种情况一定会充分暴露出来。

根据代表会议的议程，捷尔任斯基同志将作“关于工业”的报告。所以这里我不准备更多地谈论工业问题，我现在要谈谈我们在农民政策方面的一些任务。

说到农村，不能不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农村是最难办的一个领域。

绝不能把关于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及其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同工业孤立起来。工人阶级的国家工业是而且必定是我国经济结构中（包括在整个文化建设中）的真正的主导因素。如果把农村同城市分隔开、把农业建设问题同工业分隔开，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我国国营经济建立物质技术基础力量的可能性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合 作 化

关于拖拉机化，现在已经谈得很多了。但是，农业改造及其机械化的问题当然不能仅仅归结为拖拉机化，把它当成改进落后农业的唯一方法。除此之外，还应该摸索在土地耕作和农业组织方面实现技术革命的其他途径。拖拉机、农业电气化和经营土地的大企业的组织潜力都必须同把农民经济纳入正在产生的社会主义关系的轨道的主要方法——通过使农民大规模合作化——结合起来。这就是弗·伊里奇在他生前的那篇著作中给我们指出的农村合作化道路。当然，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必须总结党执行列宁同志这项遗嘱的工作。我现在只举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合作化农户的一些增长数字：1924年1月1日合作化农户有一百四十七万户，1925年1月1日有二百六十五万户；同年7月1日，已达到三百九十万户。如果我们把1924年1月1日的合作化农户作为一百，那么至1925年1月1日增长为百分之一百八十；至7月1日则增长为百分之二百六十五点三。这就是农村合作化过程大规模开展的标志。但是，农业合作社在质量方面是否同它本身的任务相适应呢？我认为，我们的合作社事业在质量方面比数量方面差得很多。合作化农户总数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增加了一倍多。而合作社本身的工作却未必获得了同样的改进。第一，从合作社组织中的大量盗窃事件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第二，从合作社迄今仍然没有表现出我们为组织贫农和中农所需要的那种农民积极性，也可说明这一点。第三，从合作社无力包罗城乡商品流转，也可证明这一点。按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合作社有哪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呢？根据我们苏联各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结构极其不同的特点，应该通过解决哪些任务和用什么方法来使

居民合作化呢？假定说，合作社在农业本身还没有进行革命（就是说，在土地耕作方面个体的、小私有者的农民经营仍然原封未动）的时候，就能够把农民经济的供销合作领域完全包括进来。这是否就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农业组织呢？不完全是。但是，既然农村的全部买卖已经停止由各个生产者经营，并且实现了合作化，那么这就已经不再是独立的小资产阶级经济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经济将从商品流转方面纳入我国计划经济的整个体系。我们将有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类型。个人私有因素在生产领域（土地耕作等等）还会保留下来，可是小资产阶级经济从个体商品流转方面而来的最危险特性将会消除。当然，彻底的社会主义合作社组织只有当合作化不仅使流通领域社会化，而且能在将来使农业生产过程本身社会化的时候，才会产生。我们的农村是否将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经历这两个过程呢？我认为不能在时间上把这两个过程严格分开。看来，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某种平行的情况，因为现在农村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本身社会化的萌芽（诚然，还非常幼弱，不太稳定）。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系列机器、种籽协作社以及诸如此类的联合组织，它们正在为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实现社会化一点一点奠定基础。

关于富农和富农的危险性

合作社的建设问题，本是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专门讨论的一个议题，现在与富农、富农危险性和农民分化这些问题相比，怕要退居次要地位了。对农民分化的估量，对农村中各种社会力量及其斗争的估计，对国家和党由于农村新资产阶级的发展而“蜕化变质”的危险的估计，——所有这些问题现在都在各种代表会议上进行讨论。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在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讨论

过，并且通过了一项关于两种倾向的决议。这两种倾向本身（谁的倾向，向什么方向发展，怎样表现）现在研究得非常仔细，几乎用不着重复一再讲过的东西。我到想谈谈另一个情况，即谈谈对富农惊慌失措的情绪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在商品自由流转和农业普遍高涨的基础上，富裕农民和富农将有所发展。（不管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还是在通过了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的时期都一样）我们大家过去和现在都十分清楚，从敌视共产主义的阶级力量增长的意义上来说，这种情况无疑是很危险的，但是，无论在1921年春天，还是在1925年春天，我们都非常了解，富农的这种危险作用必须用完全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方法来加以克服。我们有依靠贫农委员会剥夺农村富农的丰富经验。毫无疑问，这些手段向来是由党掌握的。如果这种危险现在已经严重到威胁工人阶级专政生存的地步，那么，只要把恢复贫农委员会的政策的问题提上日程，依靠半民半军的组织就能消灭富农阶层。富农是否已经发展到人们应对他们惊慌失措的地步呢？我看，过去没有根据这样提出问题，现在更没有。显然，象博古舍夫斯基（此人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名垂史册，然而他却有机会现在成为“历史”人物）一类的同志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们硬说“富农是个可怕的东西”。十分清楚，富农绝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在出租土地和雇用劳力合法的情况下，富农将发展起来，而同他们进行斗争则应该用另外一种方法即经济的方法。我们同富农的斗争应该是依靠中农和贫农的经济组织，由国家对他们进行直接帮助，并通过他们在苏维埃中的政治组织来保证他们在农村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在经济领域，我们拥有同富农进行斗争的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手段，拥有用贷款帮助贫农和中农的信贷政策制度。（因为富农力图占据信贷“帮助”领域的巩固阵地，当然，是按照奴役性的条件“帮助”贫苦

农民。我们应该在苏维埃和合作社等等机构里把贫农和中农组织起来，用向这些阶层提供各种优待的办法来对付正在发展起来的富农。

不久前在一次会议上，我不由地想起了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前夕农村的情况。当时农村的实际做法使每个村必须有“本村的富农”。当时曾经有过这样的现象，在一些早已没有富农的穷小村庄里，为了使全体农民同地方当局“打交道”非常方便，村会规定“大家轮流当富农”。（笑声）“当富农”，这就是要承担很多义务：迎送宣传鼓动员和“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为他们解决住房，喂马，等等。（笑声）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以前，农村在这方面充满着“战时共产主义”的领导方法的残余。“战时共产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的残余推迟了农村的经济恢复和城乡商品流转的发展。党的任务就是要消除农村“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通过苏维埃和合作社的渠道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贫农和中农组织在党的周围和苏维埃中。由于富农可以使农民基本群众即中农跟着自己走，它在政治上对我们是危险的，因为中农是“我们农业的中心人物”，在农村占多数，掌握着大量农业生产力。只要我们通过贫农把中农同产业工人、苏维埃政权和党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彻底地战胜富农。

农村的阶级分化

联系到上述情况，有必要来谈谈目前农村阶级分化的一些因素。

在研究农村的阶级分化时，首先必须特别审慎地（尤其是在政治结论方面）运用现有的统计材料，因为我们的农民-农业统计工作方法还远远不能对农村的一切生活现象做出全面的和精确的统计。此外（而这是远为重要的），在分析农民的阶级分化时，并

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考虑到现时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跟革命前的区别（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没有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土地私有制等等）。

在研究下面所引的材料时，我要求大家注意各种附带说明。中央统计局为了进行抽样调查而抽选出来的几个省，在1922、1923、1924和1925年期间按照播种面积对农户所进行的分类表明，由于农村的普遍经济高涨，没有播种面积的农户的百分比在下降，而中等播种面积的农户的百分比在上升。按照耕畜和乳牛的数目对农户进行的分类也说明了类似情况。

下面就是我从中央统计局得到的各类农户情况变化的材料：

年 份	被调查农户数	无播种面积者	播种1俄亩以下者	播种1—2俄亩者	播种2—4俄亩者	播种4—6俄亩者
1922	228989	4.1	20	30.5	30.6	9.9
1923	233318	3.3	17.8	27.6	31.7	12.3
1924	237407	3.1	14.3	25.8	34.6	13.9
1925	263480	1.8	12.3	24	36.9	15.7
年 份	播种6—10俄亩者	播种10—16俄亩者	播种16—25俄亩者	播种25俄亩以上者	总 计	
1922	4.3	0.5	0.1	—	100	
1923	6.2	0.9	0.1	0.1	100	
1924	7	1	0.2	0.1	100	
1925	8	1.2	0.1	—	100	

这个统计表说明没有播种面积的农户在逐年减少，中等播种面积的农户在不断上升，而有大块播种面积的农户则虽然上升得略微少一些，但仍然有了相当大的增长。对这个问题作了独立研究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各农户耕畜的变化也表明了类似的情况。

年 份	农户数（按百分数计算）					
	无耕畜	有一头耕畜	有二头耕畜	有三头耕畜	有四头以上耕畜	总 计
1922	34.1	59.9	5.5	0.4	0.1	100
1923	34	59.8	5.7	0.4	0.1	100
1924	33	60.1	6.3	0.5	0.1	100
1925	31.9	60.7	6.7	0.6	0.1	100

在指出与农业恢复过程相联系的这个没有播种面积和没有马匹的农户的百分比下降趋势时必须说明，断言这个百分比今后肯定还会日益下降，那当然是不对的。可能，由于现在还很难预见的各种条件的改变，这种趋势也会发生变化。无论如何，这里的任务是要采取一整套帮助中农和贫农的经济措施（首先是通过合作社）来影响农村的分化过程，使之避免富农阶层的急剧增长。

同时，不能不谈一谈按照农村各阶层间商品粮的分布来对农户进行分类的尝试。

我指的是戈连多同志所公布的并曾在讨论农村阶级分化问题时提到的那个统计表。这个统计表后来还经过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专门审核和检查。检查中央统计局编制的谷物饲料平衡表（这是确定我国农村阶级分化程度的主要依据）的工作，现在已经结束了。根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结论，谷物饲料平衡表无论就其编制方法来说，还是就其基础材料来说，都不能作为据以判断农民富裕情况、农业商品率以及主要农民阶层的经济关系的有力依据。

古比雪夫同志将在这里作一个专门的报告，大概将详细阐明中央监察委员会经过检查中央统计局关于谷物饲料平衡表的理论所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因此，请允许我只引用几个能够说明这

个问题的数字。

大家知道，根据戈连多同志的统计表，富裕农户占商品粮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富农本身占百分之三十，贫穷农户则根本没有商品粮。按照工农检查院的新材料，贫穷农户出售的商品粮，占商品粮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中农占百分之四十七，富裕农户占百分之二十八，而且富裕农户的数目恰好与戈连多同志所采用的那个数字相符，即在农民中占百分之十一。

中央统计局（和戈连多同志）的这个错误的统计表，很可能是对富农感到惊慌失措的原因之一。这种惊慌失措将使中农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被置之脑后，并引起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政治危险。这个错误的统计表无疑是造成政治偏差的统计上的依据。而这种政治上的偏差，是同忽视富农危险性和掩盖正在出现的农民阶级分化一样危险的。

因为这种偏差将使我们忘掉我们的农村政策的根本任务——必须用“使真正的居民群众真正实行合作化”的办法，同中农结成最巩固的联盟。

戈连多的这个统计表的政治意义，正象看过的人所感觉到的，就在于使中农根本不再成其为农业的中心人物。

在讨论与阶级分化、收成、粮食收购有关的农民问题的各种会议上，有许多发言都一再暴露出这种偏差。

我们的 错 误

我应该在这里向莫斯科省代表会议非常坦率地承认，由于我们在计算收获量方面的错误，以致我们前进的速度不能不比秋季制定的计划有所放慢。

由于今后我们也必须根据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联系的一

些关节点来制定我们的计划，所以党必须十分认真地分析我们去年所犯的那些错误。

妨害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国民经济机关有哪些部门工作得不好？妨害国民经济机关有计划地顺利进行工作的主要障碍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因素：第一，城市、工业、工人阶级对农产品的需求跟农民的农产品供应之间不相适应。第二，工业品的需求和供应之间的失调极度加剧。第三，国内粮食市场的混乱，使关系到是否能满足对进口商品的需要的出口计划遭到了破坏。第四，在为数较少的基本建设资金和对按我们的标准说来是大笔的基本建设费用的大大增长了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相适应的情况。这四个因素给目前的整个政治经济形势造成了紧张局势。造成这种紧张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农产品销售和粮食收购运动方面。在这里，我们犯了不少错误：第一，夸大计算了商品粮的数额；第二，在粮食收购的时间上要求过急，而对今年农业税对粮食市场情况的影响的减弱缺乏应有的估计；第三，由于过于慷慨地给粮食收购人员提供资金而使我们的货币发行能力紧张起来；第四，对于我们粮食收购人员之间的不正当的竞争没有进行十分坚决的斗争，以致促进了粮价的猛涨。

由于这种种错误，使我们在发展工业方面和对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方面也犯了一些错误。由于粮食收购计划、对外贸易计划和在国外采购工业原料和设备的计划都夸大了，所以我们扩大工业的计划和基本建设投资的数额也夸大了。根据夸大的收购数拨付的收购资金，使提高了的粮食需求和有节制的供应之间出现了上面所说的那种失调。粮价上涨和流通中的货币太多，就说明了这种情况。几个星期以前，我感到货币已经多到了使我们的卢布有贬值危险的程度。居民手上的货币多于市场上的商品。

总之，由于我们的错误，使得我们必须修改进出口计划，修

改工业生产计划，并且有造成通货膨胀的危险。现在我们正在通过为粮食收购，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建立的十分严格的财政信贷制度来克服通货膨胀的危险。简单地说，由于我们根据初步的估计来制定其余的一切计划，我们是多少有些冒进了。目前，我们的任务是要稍稍收缩一下，重新调整我们的力量，以便比较缓慢地，但是却完全不致有任何波动地向前发展。然而也无须夸大危险和神经过敏，因为今年收购的粮食几乎超过了往年一倍，对外贸易额也大大超过了去年。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可以预期今年取得良好的成绩。我们有些经济部门完成计划的期限将予延长；某些工业部门的发展同原来的计划相比将受到一些控制；信贷将缩减一些，进口计划也将削减。任务就在于，通过调整力量来保障我们的经济能顺利地和没有危机地向前发展。这是目前完全可以实现的任务。

为此，政治局通过了专门的决定，在经政治局批准和公布的加米涅夫同志的决议草案中就引用了这个决定。我现在向大家宣读的只是这个决定的几段摘录：“鉴于已为粮食收购工作实际证明了的对谷物饲料收购计划的明显夸大（这扩大了收购人员对谷物饲料的需要，并由于收购人员之间没有建立统一的战线而造成粮价的猛涨）；鉴于有关商品余粮的计划的明显夸大，兹承认必须修改粮食收购计划，使之全面削减，同时在实施这一计划时保证上级规定的价格的真正实现……”，“……承认在编制粮食收购计划时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接下去是几点结论，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下述结论：“鉴于财政和进口能力的削减，必须首先在新的建设和基本建设投资方面修改工业发展计划。在修改计划时，应力求尽量少削减这样一些工业部门的发展计划，这些部门的生产一旦发展了，那么即使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计划的实现推迟一个时期，也会立即使商品不足

现象有所缓和……”。在修改对外贸易计划时，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保证今年的贸易顺差。去年在对外贸易方面出现了逆差，这就是说，我们的进口多于出口，为买外国货花掉了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外汇基金。我们需要顺差，是由于下述几点原因。第一，我们需要有用来备荒的储备，因为几乎每隔三四年就必定有一次由于天灾而造成的歉收。第二，国家必须掌握丰富的储备以应付来自外国资本主义包围的种种料想不到的复杂情况，如突然地急剧削减信贷。所以，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这些问题的决定的目的在于，要整个国民经济不要跑得太快，而是要慢一点走，避免在前进中有任何一点跌交的风险。我们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使我们比过去有了大得不可比拟的回旋余地，并且有了比过去大得多的能力来保证今后经济的不断增长。问题只是在于削减由于秋季估计上的错误而造成的过分庞大的计划，虽然有些计划已经着手执行了。

关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国内贸易 人民委员部的合并

如果我还没有把关于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这两个人民委员部合并的决定的意义向大家讲明白，那么我对我国经济情况的说明就还是不全面的。必须指出，作为这个决定的基础的，既有组织性质的考虑，也有关于对外贸易在我国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和意义的一些原则上的考虑。

对外贸易的作用将随着农业的发展而越来越大，这一点应该说是确定不移的。目前出现的一些妨碍城乡商品流转的反常现象，是同工农业发展的比例失调联系在一起的。十分明显，今后即使不对农业进行极其大量的投资，它也会比工业更多更快地把产品投入市场。这就决定了要由对外贸易来发挥的作用。城乡经

济结合的问题，现在已经不能撇开对外贸易来孤立地看了。对外贸易已经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参加进来了。目前存在于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可以把对外贸易当作一个阀门，利用这个阀门就可以把城乡之间正常流转组织起来。但是，最近时期以来，在我们的国内贸易机关的工作和对外贸易机关的工作之间出现的脱节现象证明，如果它们的工作不能更好地协调起来，那就不可能卓有成效地来发展对外贸易业务。

有过这样的情况，在国内市场上按三十卢布收购的黄油，在国外市场上只卖二十八个卢布。我们必须使国内的价格政策比过去更能同出口的利益一致起来。把国内贸易机关和国外贸易机关完全分开，是造成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脱节的组织上的前提。在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之后，这个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作出这个决定的目的在于，通过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合并，给调整国内和国外贸易奠定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必须相信，这既可以成为对我国国内市场自发势力施加更有效影响的基础，同样地也可以成为实现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最好形式的基础。我们关心市场问题，是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市场是最容易滋生资本主义因素的培养基础，因此，市场斗争问题乃是我国经济体系中社会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因素之间的斗争的最重大问题。大家知道，在这个斗争舞台上，我们在夺取阵地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前不久私商还掌握零售的百分之八十五，而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才不过百分之十五。现在，这个对比大致如下：国家和合作社已经占百分之五十，其余还属私商。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能够使零售商业在出售时不在批发价格上漫无节制地胡乱加价。如果故意不谈这一主要问题，那么成绩还是相当大的。使零售商业做到价格低廉，这不仅是主持经济计划和经济调节工作的机关的最重要任务，而且也是全党的一项最重要任务。

整个来说，我们的经济状况就是这样。我们的经济状况，虽然有些局部的失败，但还是可以说是工人阶级在市场贸易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的进攻。诚然，我们前进的速度比预想的稍微慢一些。今年我们在估计新收获的农产品的出售量方面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丝毫也没有使我们停止进攻，只是迫使我们把完成计划的期限向后推延了。

社会主义建设和知识分子

过去的一年，就实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国内和平”这一点而言，我觉得是很出色的一年。

在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绝对无意断言我国已经不存在阶级斗争了。“国内和平”这个说法是针对国内战争而言的。所谓国内和平，是指除了孟什维克企图在格鲁吉亚发动暴乱以外，在我们苏联根本没有任何居民集团制造任何麻烦。所以，就“国内和平”来说，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这个时期，情况是非常好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的威信提高了，我们党的威信提高了，即使不是所有的人都热爱它，那也是所有的人都已经十分尊重它的力量了。这一点现在已是有目共睹，甚至流亡国外的白俄也对用暴力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不存任何希望了。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和威信的提高，特别有力地促进了大批知识分子对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态度的转变。这种情况不仅在教师代表大会上，而且也在庆祝科学院成立周年纪念等等会上反映出来。我们今后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越大，知识分子就会越来越多地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或者，至少转到同苏维埃政权真诚合作方面来。象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者等等这样一些劳动阶层，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居民集团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将随着

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日益消失。

知识分子对我们的态度的这种转变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成就，因为整个经济建设和整个新文化建设都直接要求大量使用知识分子的劳动，如果不吸收专家（工程师、医生、教师）参加工作，就根本不能顺利解决今后时期的任务。必须承认，那种排斥非党专家的态度，在有些地方迄今依然存在，只不过有时用我们的国家有发生所谓资产阶级蜕化的危险作借口来进行掩饰罢了。这种危险，无疑是存在的，因为在我们社会机体里还存在着一些至今同情资产阶级而不同情我们的人数众多的阶层。这个居民集团实质上是对我们苏联的资产阶级包围的一种延续。虽然红军和对外贸易垄断制把我们同西欧资产阶级隔开了，但是西欧资产阶级仍然有富农集团和私人资本作为自己的直接的代理人。就这方面来说，危险是存在的，而且由于私人资本活动能量的提高和农村中富农阶层活动能量的增大，危险还可能增长。但是同时，如果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即因为存在着这种危险而根本不去考虑在经济建设、建立新工厂和国家电气化等方面使用专家、甚至是有着大资产阶级思想的专家的必要性，那也是极其错误的。为了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和保障经济建设，中央委员会已经采取了专门的措施来改善初级国民学校和高等院校的状况。今年的预算大大增加了对文化需要的拨款。

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

同志们，这就是党中央在过去一年所执行的政策的一些主要因素。本次代表会议和即将召开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都将审议和评价这个政策。最后，我还想谈谈党的成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问题。关于领导工作，我们必须强调的主要一点，就是它比国内

战争时期变得复杂和困难得多了。党的领导方法的这种复杂性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苏联全体人民的积极性、觉悟程度、文化和教育都空前地提高了。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各个方面的工作任务本身都毫无例外地变得远为困难了。生活本身的五光十色和复杂纷繁，给我们提出一些新的任务，同时也相应地产生了对新的、非常过细的领导方法的需要。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克服这些困难。第一，如果仍力图让中央在过去那种程度上和用过去那种方法来保持对全国党的、政治的、经济的生活的领导，那是不正确的。第二，领导方法本身应与过去不同，因为我们现在正处在积极性高涨的时期，而这种积极性本身就是一种极其有力的政治因素。所以，在关于工会的决议草案里有两条重要的规定：第一是多接近些群众和少搞些命令主义，第二是党应当尽量少干预工会的具体工作。因此，党关于活跃苏维埃和合作社的工作，以及关于在苏维埃和合作社实行自由选举的决议，都是非常及时的。

我们的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一年来，党员已从六十四万七千名增加到了一百万名。党内工人的数目也增加了，但是目前这个时期，当全国工人的数目正在极大地增长时，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党也不应落后于这种增长。

如果认为工人数量的增长根本不必通过组织在党内的工人数量的增长反映出来，那将是错误的。假如在工人总数增长的情况下，入党工人数量依然不变，那就意味着党对整个工人阶级的影响减弱了。当然，提出在一两年内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吸收入党这样的任务，那也将是很大的错误。这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十分迅速的增长，主要是靠从农村出来的人，他们在习惯上、观点上和觉悟程度上都还跟整个农民群众没有多大差别。因此，完全有必要使工人阶级的这些新的阶层通过工会这所共产主



义学校的工作，初步接受无产阶级的锻炼，养成无产阶级的习惯和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我总是觉得，在尽可能短的期间内把约占我国工人总数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人吸收到党里来，将是符合党的利益的。

我还认为，现在就提出关于采取某些补充措施来更顺利地迅速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的问题，是非常及时的。我已经给大家举出了一些能够说明我国各个经济领域的恢复过程的数字。但是在我们苏联领土上所拥有的“主要的资本”、社会主义改造的唯一的牢固的社会基础，就是工人阶级、它的觉悟，以及它的文化水平和积极性的提高。

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要比在发展工业、发展整个经济和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小得多。

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积极性和组织性提高得越快，工人阶级的专政和工人阶级对各个阶级、各个居民阶层的影响也就会越牢固。党应该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使工人阶级比过去在更大的程度上实际成为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领导者。只要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还带着官僚主义的毛病，就足以说明我们对于这方面的状况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满意的。但是，只有在工人阶级中有越来越广泛的阶层被吸引到国家管理和国家工作上来的时候，整个国家管理系统才可能得到改善，官僚主义和官吏的作用才会减少。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积极性、组织性和人数提高得越快，这一工作也就会进行得越顺利、越迅速。现在，文化建设问题、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以及通过工人阶级对农民和其他居民阶层的领导问题在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整个政策中应该放在比过去更为重要的地位。（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真理报》1925年12月9日。

在莫斯科省第十四次党代表 会议上的闭幕词

(1925年12月)

同志们，这次就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所展开的辩论同我的报告原来打算涉及的范围并不完全一致。我认为，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由于我们党的莫斯科组织和莫斯科代表会议的成员，从《列宁格勒真理报》上以及从他们和列宁格勒来的同志们的交谈中，了解到了在列宁格勒召开的省代表会议和各区代表会议对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和党的各项任务的讨论情况。我本人在报告中有意回避了列宁格勒的同志发表的某些我所不同意的言论，因为我本想，必要的话，最好是当面同这些列宁格勒的同志谈。但是，我的想法错了。我觉得，有些人在今天的发言已经露出了某种苗头，表明了在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辩论将会如何进行和在什么范围内进行的问题。

首先，我想回答一些字条和发言向我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我一共接到一百多张字条，但我能够回答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

有一张字条说：“您曾指出，欧洲是北美合众国的一个殖民地，就象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其他殖民地一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托洛茨基同志说美国正在卡欧洲的脖子，也就说对了。”

在关于美国的作用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的看法是对的，但我所捍卫的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美国有这种作用，在我们的政策中，我们丝毫不能低估和忽视欧洲各国之间的各种矛盾。

例如，波兰和德国之间的利害矛盾，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利害矛盾，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利害矛盾，等等，等等。欧洲各国之间的这些矛盾是那样大，以致在颇大程度上也决定了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共产国际的策略以及各国共产党的政策。

“法国在全世界面前摆出了一幅不可能恢复本国币值的样子，这是它出自本国的利益而故作姿态还是它真的不可能恢复本国币值呢？如果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那就请您说明原因。”

我担心，答复这个问题可能被说成是干涉法国的内政。因此，请允许我不来回答这张字条。

其次，若干字条提出了有关中国的问题：“冯玉祥是什么人，他对张作霖的态度如何，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中国的第一个不幸是，许多年来，它已经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了。中国早已不存在什么巩固的全国性政府。中国的各个地区都掌握在不同的军阀手里。这些军阀在其军队驻扎的地区称王称霸，反对中国联合成为只有一个政府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因为在统一的国家里，他们将只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一个小螺丝钉。

中国的第二个主要不幸是，它没有一个坚定的、比较强大的、全国性的人民政党，没有足够强大的、富有某些革命传统的工人运动。共产党暂时只在广东地区——中国很大的一省——能起较大作用。广东的政权属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政党——国民党。

这一切无疑是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一大障碍。

国民党也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在所有未参加国民党的中国活动家中，国民军司令冯玉祥是最彻底地捍卫中国民族解放利益的。在中国的实际政治生活中，下述事实具有极大的意义：指挥军队和控制各省的每一个军阀，都接受某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援助，而且都从给予他们“援助”的那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

益出发来推行自己的国内政策。冯玉祥显然与许多军阀不同，他并不依附任何外国政府或者资本家集团。

除冯玉祥以外，中国最著名的活动家是张作霖。近来，他在中国人民眼里已经成了反动势力的化身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张作霖占据着跟我国和日本接壤的地区——满洲，力图借挑起苏联同日本的对抗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这一企图如果得逞，对我们苏联以及对我国的和平政策是异常危险的，因为我们在东方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保持同日本的和平关系。现在，张作霖的统治似乎已经削弱了。

中国现时的解放运动是一种最为有力的尝试，其目的就是要取得过去几十年中在中国曾经存在过的彻底的民族自由和独立。它和从前那些运动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诞生了真正全国性的、人民的政党，出现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正在开展异常强大的罢工运动，这种罢工运动已经成为中国解放运动中的重大政治因素。现在，中国的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也成为巨大的革命力量。中国工人在非常出色地开始创造自己的革命史，在其革命的阶级斗争中表现了不屈不挠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可见，中国目前正处于如火如荼地开始组织巨大民族解放力量和革命力量的时期。至于这种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运动何时能够达到建立稳固的人民革命政权，这一点现在还很难说。

“请您回答，如果说敌人企图在外交上包围我们，而这种包围由于洛迦诺协定而变得更严密了，那么我们对和平还有哪些展望，我们将如何对付这种包围。”

我在自己的报告中曾力求逐一说明这些展望。在我的报告所列举的展望中，我没有充分强调大家知道的事情，即没有充分强调为统一的工人阵线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没有充分强调英俄工会委员会在这一斗争中以及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的作用。我在自己

的报告中还说，尽管洛迦诺协定也是反对我们的，但我们根本不象某些人那样相信条约能够消除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实质性的利害矛盾，相信条约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和现代资产阶级就其本性来说不能解决的问题。

下面一张字条说：“我国预定访问德国的工人代表团的情况现在怎么样？有些企业的人选已经确定下来了。”

对这个问题我只能回答说，就一切材料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不想在自己那儿见到真正的俄国工人。他们宁愿把俄国孟什维克描绘成苏联工人阶级的代表。能从德国政府方面为我国工厂工人代表团取得入境签证的那些组织，即第二国际的那些组织，是不会邀请我国工人到那里去的。

希望在德国会见苏联工人阶级代表的德国工人的那些基层组织，迄今还不能迫使它们的领袖或者迫使对政府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活动家们邀请俄国工人代表团到德国去。

下一个问题：“请您谈谈，中央委员会对于大批代表团来苏联访问有什么看法。这不是要苏联付出一大笔开支吗？——因为这些来访是要耗费大量金钱的。”

在代表团的来访上，苏联政府和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花费一文钱。前来我国访问的所有工人代表团所需的费用都是根据工人大会的决定，通过各该国家内的特别捐款和工厂分摊的办法筹集起来的。

我认为，我们应当竭力欢迎西欧工人的这种主动精神。这些代表团多半是由工厂劳动者、党外人士以及第二国际组织的成员组成的。他们来访苏联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因为在他们的帮助下，能够消除资产阶级政党以及孟什维克和阿姆斯特丹的活动家们对我们和我们的工作所散布的谎言。国外反对我们的不仅仅是考茨基一人。

借助于这些代表团，各国工人可以广泛交流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经验，并在争取建立统一的工人阵线的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掌声）

其次，有人向我提出了几个关于我国对内政策的问题：“中农把自己的经济发展到什么样的高度才不致成为苏维埃政府眼中的富农，中农经济的上升有没有什么限度？”

我们区别富农和中农并不根据“上升”。对于中农经济的上升，从来没有任何限制。富农是指剥削其他农民为生的农民阶层。对于剥削，我们一直是有限制的。因此，必须在研究农村生活的基础上检查这些限制的效果，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保护那些遭受剥削的农民。在这里，剥削既指雇工和租佃方式的剥削，也指放债、倒卖、贩运等等方面的剥削。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农民剥削另一个农民的情况，那也就不会有富农。

“我们连续三年在粮食价格上都犯有错误。1923年价格低；1924年价格高；1925年价格仍然高。有什么降低价格的办法吗？也许，国家没有粮食储备，就很难执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的粮食政策？”

我认为，国家需要有粮食储备这种想法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执行粮食政策方面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能够影响粮价高低的粮食储备。我国某些地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些大的省城粮食常常脱销，因此这些城市的粮价暴涨。这样，这些省份的农村里的粮价也随着提高了。这种事情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收购的粮食刚够满足国内消费和出口的需要，国家手里没有任何余粮。

“我们对成年工人训练与不训练有什么不同？这会不会影响到新一代青少年呢？因为我们有许多青少年都没有任何专门技能。”

这张字条显然是共青团的什么人写的。为了使他们放心，我应当告诉他们说，我们决不会撇开青少年不管。必须通过学徒工厂艺徒学校等等帮助青年成为熟练工人。不过，当前这还不够，还要对一部分成年工人加强培训。在我们对待青年的态度上，我们恐怕不会犯在谷物饲料平衡表的问题上犯过的那一类错误。（掌声）

“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如何，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达到战前水平？西欧的发展速度比我们快还是慢？”

这张字条提出了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在恢复经济方面，我们已经开始同西欧竞争。如果资本主义比我们更迅速、更成功地发展和恢复起来，这将表明资产阶级社会在竞争过程中战胜了我们。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使我国的经济和工业的恢复保持住比西欧快得多的速度。我在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中曾向你们分析了欧洲资本主义的状况。我觉得从这种分析可以看出，西欧资本不大可能在其发展速度上超过我们。

“您在这里说过，工人的工资应当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但是现在为什么给专家确定了高得出奇的工资呢？对工人来说，这是有点难以理解的。”

高得出奇的工资我没有听说过。最近通过的党中央委员会的指令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是要调整专家的工资。工人知道，专家的劳动报酬至今都是用各种专家工资、津贴和花红等办法来支付的。我们决定加以调整，采用一种专门的专家工资等级制。采用这种工资等级制不要增加开支，就能建立一种正确而明确得多的工资制度。在一定时期内，为了保证专家为我国工业和正在恢复的经济效劳，稍微多花一些钱是完全可以的。

建设新的工厂，改造经济和更新装备，在我国工业中引进美国的新技术，这种事业不吸收精通业务的人来参加是不行的。我

认为，从西欧或美国聘请经验多资历长的优秀正直的工程师，付给的钱也许很多，但使之很好地完成我们还不会做的工作，这对我们是较为有利的。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我们大家往往和廉价的专家一起进行廉价的工作，这给我们的工业、工人阶级和苏维埃国家带来的好处远比聘请和利用富有经验和学识的、尽管是资产阶级的专家所带来的好处要少得多。更新我国工业的装备和建设新的工厂的成就，取决于我们能否完全彻底地利用人类智慧在工业技术和组织方面的全部成果。因此，对我们来说，专家的劳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我们缺乏这种专家的情况下，我们也许还不得不靠从西方聘请薪金很高、但是富有经验和精通业务的资产阶级专家。世界上一个预算达四十亿卢布的大国的主人——工人阶级，当然不会拒绝为这个或那个工厂雇佣富有学识与经验的工程师和专家这样一种优秀的，往往是资产阶级的家庭教师，以便向他们学习。

有几张字条提出了通货膨胀危险的问题。这种危险已经露出了苗头，但是已经采取了防止这种危险的措施。这些措施是：紧缩信贷，减少银行货币发行量，争取降低物价，增加商品供应，改进商业组织，打击投机倒把。这些措施的部分实施造成了某些机构和工厂企业的暂时困难，因为它们的信贷有些减少。

同志们，这就是我对一部分提问字条的回答。

关于对我的报告的讨论，我应当首先指出，我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的发言。（掌声）

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是非常一致的。例如，对合作社的评价，对我国工业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回答，不论在我的报告，或是在布哈林同志的发言中，说法几乎都是相同的。

因此，我认为加米涅夫同志力图把我和布哈林同志分开，只反对他一个人，这不是很高明的办法。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问

题，即关于国营工业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的问题，加米涅夫同志什么也没有说。我们的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还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工业，他向你们谈过自己的见解吗？（喊声：“没有。”）

加米涅夫同志不回答中央委员会决议草案中直接提出的和解决了的问题，却在背后捣乱，重提1921年布哈林同志和列宁同志的意见分歧。不回答现在提交给党解决的问题，而想用重提和引述许多年以前某些同志和列宁同志发生过的意见分歧来把问题搅乱，这是不行的。要知道，这样的意见分歧也不光是同布哈林同志一个人有过。（掌声）

要有一般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就得有两个阶级：资本家和工人。

国营工业在谁手里呢？在资本家手里吗？不是。如果我们的工业是在资本家手里，那我们就不是执政党了，而在我们国内也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专政了。加米涅夫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重提列宁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和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是并不怎样重视那些分歧的。

然而，加米涅夫同志所没有回答的关于国有化工业的本质这个问题，却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提交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草案，政治局已经一致通过。在关于青年的决议草案中已经说明，我们的国营工业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现在，加米涅夫同志不知为什么没有勇气承认他投票赞成过的东西。加米涅夫同志在其发言的其余部分谈到了收成、合作社、农民的阶级分化，也谈到了我们对贫农的政策，并且说什么布哈林同志和我批评了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我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我在自己的报告中，还是布哈林同志在他的发言中，都没有提到加米涅夫同志，也丝毫没有指责他；不论是我还

是布哈林同志，都没有说过加米涅夫同志一句话。因此，加米涅夫同志认为这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对待富农和中农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的一切谈论都针对着他，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既然他认为这是针对他的，他就应当公开说明，根据何在。

请允许我再扼要地谈谈加米涅夫同志对布哈林同志号召农民“发财吧”这种说法令人遗憾地多次进行的(固然是隐晦的)指责。乌格拉诺夫同志已经向你们引用了加米涅夫同志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其中用了与布哈林同志的用语相近的说法。我现在从加米涅夫同志的《关于苏联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总结》这本小册子中给你们引一段原话。在这段引文中他说：“首先我们应当采取建设新的日益富裕的农村的方针，因为我们的工业必须不断发展，而日益富裕的农村将是销售工业品不可缺少的商业基地。这种日益富裕的农村是实行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巩固国家地位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些任务，必须使居民富起来”。

你们看，在这段引文中，每隔三两个字就用一次“日益富裕”、“富起来”等等字眼。但谁也没有为此专门指责加米涅夫同志，谁也没有要他悔过。

布哈林同志却不走运；他在报上承认了自己在这个口号上所犯的错误，然后在一次会议上发表了相应的声明，随后又在另一次会议上发表了声明，不知道此事何时才有尽头。不久以前他向我许诺说：“我把自己的这个‘发财吧’专门印在一张大告白上，说我已经完全彻底放弃了这个口号；为了少费口舌，我不论到哪儿去开会，都把这张告白悬挂在身旁。”（掌声）

谈过这些意见之后，请允许我转到另一个问题吧。我觉得，由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应当彻底弄清楚——这就是富农、富农的危险以及与此有关的谷物饲料平衡表的问题。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关于富农危险问题的

提法。在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中有这么一段话：

“由于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而开始的农村阶级分化，在最近的将来就要表现为：一方面是从富裕农民阶层中成长起来的新的农民资产阶级在一定时间内将进一步扩大与加强，另一方面是农村贫农分子将日益无产阶级化。”

在我看来，从这段引文无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之后，现在还有人跳出来，装出一副明察秋毫的神气向党叫嚷：“你们看不见富农的危险，——你们瞧，富农正在发展”。对于这些人可以说，美洲并不是他们发现的。（掌声）

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看得十分清楚：“在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增长”可以加强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但是同时也将带来私人资本的发展，特别是农村中富农上层的增长。

所以，现在整个问题不在于弄清一般趋势：富农是否正在增长（代表会议已经谈过这一点，并且说明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整个问题在于：这种增长有多快，阶级分化过程的速度如何；由于富农的这种增长，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对比以及阶级力量的对比，是否正在发生变化并且往什么方向变化。

富农问题的主要之点就在这里。

有人硬说确切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多大意义，而重要的只是弄清趋势，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弄清富农正在增长的趋势当然重要，但是弄清这种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也很重要。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这种增长必然会提出政权变化的问题，这在理论上是可想而知的。富农增长的危险归根到底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当然，仅仅在城市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相应发展与巩固的条件下才有这种可能）。有人说，是百分之六十一还是百分之三

十的余粮掌握在富农手里，这对共产党来说都是一样的。这种人忽略了这样一点：富农阶层数量上的增长，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也会引起这种复辟的危险。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马上就想到，假如这些数字是准确的，那么需不需要尽快采取某些措施来改正我们的农村政策。我们有多少富农，农村新资产阶级正以怎样的速度和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增长，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有一个富农总比有一千个富农好些，而有一千个富农总比有一百万个富农好些。（赞同的喊声）因此，说某些数字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意义，不起任何作用，这是不正确的。

既然中农和富农的问题最近也联系中央统计局关于各阶层农民之间商品粮分布的数字讨论过了，所以我应当再谈谈这些数字，谈谈报刊和一些发言对这些数字的说明。我在报告中提到的中央统计局的统计表确定了下述“事实”：占百分之三十七的拥有两俄亩播种面积的农民，今年将缺粮，将在其他地方购买。占百分之十四的另一批农民，拥有全部商品余粮的百分之六十一。最后，占百分之四十九的中间一批农民，拥有可以投入市场的全部粮食的百分之三十九。

这里援引的五个基本数字可以说明，不论就人数来说，或者就其拥有的商品粮数量（百分之三十九）来说，中农已经不象我们认为的那样是农村的中心人物了。这些数字不能不引起党的极大注意，不能不使党大为不安。

中央统计局的余粮分布统计表同时也是农民阶级分化表，根据该表的统计，全部余粮的百分之六十一掌握在百分之十四的农民手里。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富农掌权的危险敲敲警钟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现在不能说，问题不在于准确的统计和计算，而在于这样一个总的问题：富农是否正在增长。关于这个总的问题

题，如果不考虑鲍古舍夫斯基荒谬而愚蠢的发言，是从来没有人争论过的。但是，富农阶层的增长在一定阶段上会从量变转化为质变，从而可能引起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这是我们应当认识清楚的。此外，在援引的农民阶级分化的数字中（报纸似乎“掩饰”了这些数字），中农的作用根本不符合列宁对中农的作用的理解。他认为中农是“我们农业的中心人物”。但照这个统计表看来，中农不起决定作用。戈连多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些数字，《真理报》针对这篇文章，于9月27日刊载了斯捷茨基的文章，这是做得很对的。斯捷茨基同志既研究了统计表本身，又研究了从统计表得出的结论，并且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个统计表提出了我们的中农是不是中心人物的问题。

在自由商品流转的情况下，在以千百万农户的生产活动为基础的农业中，是没有条件保证中农永远占据主要地位的。农民的阶级分化是中农阶层的分解造成的，而中农阶层的作用又取决于农村中阶级分化的程度。

阶级分化可能使中农不再成为基本农民群众。因此，斯捷茨基同志认为这个统计表和戈连多同志的论断具有原则性的重要意义，这是完全正确的。斯捷茨基同志在文章中做出下述结论：

“假如……只把拥有六——八俄亩播种面积的农户划入中农阶层，再加上拥有八——十俄亩播种面积的一部分农户（这部分住在乌克兰南部草原、伏尔加河下游和东南地带粗放农业地区的农户也算是中农），那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商品余粮掌握在中农阶层手里。”^①（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百分之六十五的余粮在中农手里——这已不是百分之三十九了。无论我本人也好，还是同我谈过这个问题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① 见《真理报》1925年9月27日第221（3152）号。

们也好，都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斯捷茨基同志的论断和《真理报》的观点是正确的。根据人民委员会关于检查中央统计局这方面工作的特别指示，有关谷物饲料平衡表的问题，以及有关农村各社会阶层之间粮食分布的问题，都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里讨论过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还没有在政治局里研究。因此，我只是宣布一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结论，而这些结论仍完全由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中央监察委员会得出的初步结论，从下面这个统计表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统计表引用的数字说明了在出售的全部粮食中，各阶层农民所占的百分比：

		占出售的全部粮食
贫苦农民	出售	23.7%
中农	出售	47.8%
富裕农民	出售	46.7%
富农	出售	11.8%
		100%①

大家可以看出这个统计表和中央统计局原先的统计表的巨大差别。以前，富农的出售额占百分之三十，现在是将近百分之十二。按原先的统计表看来，贫农的出售额等于零，按新的统计表看来，贫农的出售额占百分之二十多。应当指出的是，第一个统计表在最初制订时是力求计算所谓粮食纯出售量，即只计算农民卖出的粮食超过买进的数量，而第二个统计表则是说明了全部粮食的出售情况。所以，中央统计局的统计表在讲到贫农时只讲了他们买进粮食。实际上，他们在秋冬两季是出卖粮食，而在春夏两季则买进粮食。为了确定粮食收购的方针，为了弄清粮食收购

① 原文如此。——编者注

机关和合作社应当同哪些农民阶层打交道的问题，第二个统计表在编制上也是比较符合实际要求的。在中央统计局原先的统计还没有经过中央统计局本身和工农检查院核定以前，根据这个中央统计局的其他材料也能证实这些原来算出的数字是不完全和不精确的。这些材料说明了各阶层农民所买进的工业品的数量。结果发现，农村中的上层分子——富农和富裕农民大约拥有百分之六十一的余粮，总共买进了百分之二十的城市商品，其他阶层（没有余粮的贫农和拥有余粮百分之三十九的中农）却买进了百分之八十的城市商品。然而，为了买进，就得卖出；所以，中农和贫农为了买进从城市送到农村的全部商品的百分之八十，就得卖出这个数目的农产品，或者从别的地方设法挣到这些钱。当然，富农可能是有很多粮食的。不过，正如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材料指出的，在农民卖出的全部粮食中，百分之二十三点七以上是贫农卖出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七是中农卖出的。不能认为贫农和中农卖出的这全部粮食没有通过合作社和我们的收购机关。当然，贫农在秋冬两季卖出粮食，春夏两季则买进粮食。但是应当注意的是，第一，贫农买进的是比较便宜的东西，其次，他们在秋季卖出粮食，往往在春季买进土豆。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合作社应当采取一切办法帮助贫农，同时防止富农可能会在“帮助”的幌子下奴役贫农。这也应当是我们的农业信贷所要解决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这里顺便提一下，有人曾借口说，最初的粮食收购计划是由政治局批准的。我可以证实这一点。我们在政治局听过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粮食收购计划的报告；我们是批准了这个报告还是仅仅给这个报告备了案，我就记不清楚了。我们批准了原来是错误的东西，党应当不应当批评我们呢？应当批评。对于批准错误的计划，政治局承担不承担责任呢？承担责任。我不拒绝承担这个

责任，我想，政治局委员中也没有任何人会拒绝。如果谁想要这种声明，那我可以发表这样一个声明。

现在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批准这个计划的时候低估了富农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是富农手里集中了大批粮食，他们把这批粮食囤积起来，倚仗自己不缺钱花，观望等待，以便利用粮价上涨进行投机。当然，富农有很多粮食，但是，把我们粮食收购工作的失败仅仅甚至主要归因于富农，这种看法对不对呢？我认为不对，因为握有粮食的不光是富农，还有其他的农民。在整个粮食收购运动时期都表现出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善于收集中农和贫农能够卖出的全部粮食，粮食收购的状况就会完全不同。对于粮食收购工作，我是决不拒绝承担责任的；粮食收购方面的失败，我绝不想光让富农负责。我并不认为应当把本身的一些错误和失策也推到富农身上去。这方面的失败原因，我在自己的报告中已经谈过了。我要在这里指出的只是，在原先的计划中，我们考虑到了农民消费的增长。无论在沙皇时代，还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农民经常吃不饱，现在，由于税收降低和丰收，农民当然就会首次增加自己的消费。此外，在丰收的条件下，农民力求自己储备一些粮食，以防自己的经济遭到各种意外（歉收等等）。有些事情本来在秋天就可以估计到的。至少可以估计到下面这种变化的全部意义：现在，农民作为自由的卖主，第一次同我们处于对立的地位，无论税收机关或者行政当局都不能压制他们，在这些条件下，农民有可能增加自己的消费并多少储备一些粮食。

这里强调关于贫农的决议是由我们大家一致通过的，这完全正确。但是把日益增长的富农危险当做一个月前通过这项决议的唯一原因，这就完全不正确了。既然各地的很多同志都在这里出席会议，我得要求他们务必不要向任何一个贫农如此解释我们关于贫农的决议。如果贫农以为我们帮助他们只是由于农村里有富

农，他们就未必会以应有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了。

有人认为贫农问题在我们这里出现有点突然，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上，无论十月革命以前或者以后，贫农问题都是最迫切的、从而也是研究得最多的问题之一。

在贫农委员会成立以前或以后，我们的党从来没有忽视而且不可能忽视把贫农组织起来对于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在我的报告中向你们谈到的那个时期，即从上一次党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委员会曾不止一次讨论了贫农问题。今年春天，中央委员会四月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直接谈到：“我们的任务是尽力帮助全体农民群众进一步发展农业，并且特别关心农村中人数还很多的贫农阶层的需要。同时，苏维埃政权必须支持和加强国家对于恢复贫农经济的帮助，尤其是在内战时期以及由于最近几年的歉收受害特别大的地区。”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指出：目前时期，无产阶级对农村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之一……应当是“在严格遵守革命法制的条件下，实行各种立法的和税收的措施（地方上也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护农业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利益”。

同一次代表会议《关于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党和各种贫农、中农组织（互助委员会等）的工作方针，应当是保障力量单薄的居民阶层和中农阶层的利益”……

其次：“农业信用合作社尤其必须以组织劳动组合、农业协作社、集体农庄、农业公社等集体的农业劳动组织形式和生产组织形式去帮助半破产的无产的农民群众，帮助他们站立起来”……

为了不让任何人把自己对富农的反感以及对贫农的同情跟其他党员对立起来，我从自己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得到大会完全

赞同的报告中抽出几句来念一念。当时我直截了当地说^①：“特别困难而又非做到不可的主要一点是，在让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同时，我们能比以前更多地面向贫农和中农。在对农村实行这一政治路线的时候，不能低估由于农民可能把我们的政策解释为面向新的农民资产阶级而造成的危险。因此，消灭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为开展恢复农业的工作创造实际条件和扩大雇工与租地的可能时，要使贫农和中农比以前更多地从我们这里感到他们自己的权力，而且从我们身上得到比以前多得多的真正物质帮助。”接着我还说：“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贫农往往是说得多，帮得少。现在，我们应当开始切实地帮助他们了。”在去年8月以来的许多个月内，中央委员会的农村工作委员会每周都讨论贫农问题和帮助贫农的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农村工作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即关于贫农的决议中所阐述的那些建议，就是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提出来的。这些建议具体地分析和考虑了农村工作的经验，组织贫农的方法，对待贫农的态度，以及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全会以前所能确定下来的帮助贫农的最有效的方式。

现在，我们有些同志习惯于反倾向的斗争。我担心的是，在这种反倾向的斗争中，也可能搞得过火。当然，某些倾向对党有一定程度的严重危险，可能破坏党的政策，有害于党的行动一致，显然违背列宁主义，是应当坚决果断地同它作斗争的。然而有些同志，在每次无论讨论什么问题的时候，都非要找出“倾向”不可。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曾一再作出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请你们给我解释一下，如果党员不能彼此辩论，不能讨论问题，那还有什么党内民主可言？要知道，人们无论讨论什么问题的时候，总

^① 见我的小册子《农村，新经济政策与合作社》，莫斯科1925年国家出版社第2版第18和20页。

会说出一些完全不同的想法的。否则也就用不着讨论了。我们在反倾向的斗争中，有过火的危险，我认为从列宁格勒组织的一位大名鼎鼎的工作人员萨尔基斯同志的发言里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在列宁格勒省代表会议上说：“大家知道，我这个人象有些同志那样，是喜欢读点儿书、写点儿东西的，我尽力收集各种各样的倾向和摇摆现象，得出下列各点：（1）在我们的政策和实践方面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列宁受到批评；（2）富农问题；（3）民粹主义思想和旧日的真正农民公社的复活；（4）在国际革命停滞不前和西欧资本主义趋于稳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问题；（5）‘全民政府’及其对全体居民的态度，不论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索尔茨同志）；（6）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对于从工人中吸收新布尔什维克的态度问题；生产会议问题；工农通讯员运动问题，等等，等等。此外，我应当把拉林的倾向重复两遍。”^①在这段引文中，除了“等等，等等”之外，列举了九种倾向。在这些“等等等”背后，秘而不宣的有多少呢？大概，萨尔基斯自己也无法计算，或者没有计算出来。我认为这样滥用“倾向”一词是一种危险的胡闹。遗憾的是，这么干的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列宁格勒组织的一位领导者，他想用这种办法使党保持对列宁主义的百分之百的忠诚。我担心，如果让萨尔基斯这样一些同志随心所欲地干下去，那么许多党员不仅将不说什么或者不写什么，而且连独立思考也会害怕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要解决党内民主问题，就一定要容许党员讨论他们不明白的问题，而且我们对这种讨论的态度应当是：不能因为每一个有时是无关紧要的意见分歧而给同志扣上“倾向分子”的帽子，也不得

① 见俄共（布）列宁格勒省组织公报第2（22）号第2页。

使他遭受迫害。（掌声）

十月革命后的新的一代正在党内成长。老一代是在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民粹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进行斗争和论战的条件下培养出来的。新一代没有经历过这种锻炼。应当让他们能够发表意见、争论和讨论。当然，在这些意见中也会有许多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应当靠论据、宣传和写文章来加以纠正，并且证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如无特殊需要，不必把人一棍子打死，不要揪住不放，因为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错误都会得到纠正和证明，在讨论过程中就能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不应忽视的是，党的面前正在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是要找出正确答案的。

我们党是十分强大、巩固和团结的，并不害怕一些小问题上的细微分歧会影响它的一致和坚定。（掌声）

然而，如果拿萨尔基斯同志的尺度去衡量我们的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村工作的同志，则大多数农村组织都应当解散。在农村中，我们大概不仅可以找到我所列举的那些“萨尔基斯倾向”及其“等等，等等”，而且能够发现不可胜数的各种错误、误解以及大量战时共产主义残余。在这些农村基层组织中，往往缺乏基本知识和文化。由于我们农村党组织的薄弱，我们对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大概只贯彻了一半还不到。我们还没能在农村中培养出这样的党的干部和苏维埃工作干部，他们在积极性增长的条件下能够在农村中真正贯彻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全会的决议。对于这些基层支部，问题是要培养和教育，提高它们的觉悟，而不是寻找它们的倾向。

当我听到某些报告人谈到土地租佃问题以及向富农让步的问题时，我想起了萨法罗夫同志，他拼命指责一位同志的“倾向”，说这位同志对可以根据列宁三十年前写的一本书来评断现时农村

中发生的一切表示怀疑。因此我担心的是，有人可能会从十月革命以前土地租佃起过何种作用的观点来认识现在放宽土地租佃的决议。由于把某些因素和社会力量在革命前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完全照搬到十月革命以后来，我们正在犯太多的错误，所以这个问题就值得谈谈了。战前的租佃关系是怎么一回事呢？战前，租佃是土地集中在土地占有者手里的结果。地主和其他土地占有者把土地租给农民，从而奴役农民。现在的租佃关系如何呢？土地私有制废除了。现在没有地主阶级和土地占有阶级了。现在出租土地的通常都是力量单薄、没有耕畜的农民，或者是抛弃耕作到城里做零工的农民。承租土地的是有钱的农民。当然，在与革命前的租佃关系相反的这种新式租佃关系中，决不排除奴役关系以及承租农民加强奴役出租农民的可能性。但是毕竟应当着重指出，正如你们所见到的，现在的租佃关系同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租佃关系不同了。拿现在的农村和十月革命以前的农村相比的时候，不能忽视人类历史上这么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即土地私有制和整个土地占有阶级被消灭了。

雇用劳动力也是这种情形，虽然程度要差得多。雇用劳动力的发展是农村中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最赤裸裸的表现。但是，现在我们对劳动的保护，战前是根本不曾有过的。对城市工人阶级来说，农村中的雇农就是它的亲兄弟。我们应当通过工会、通过党把雇农组织起来，而且正在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们将使雇农成为我们的农村政策的支柱。

容许放宽雇用劳动力并不是想向富农让步，而是由于无法帮助贫农马上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的经济。贫苦农民由于无法从国家和合作社得到必要的帮助，而宁愿受雇。城市里未必能够找到一个工人会认为失业工人的处境比在业工人（即使是替私营企业主干活）的处境还好。农村中的情形也是这样。

最后，对富农和中农的看法，我想再补充一点意见。同富农作斗争，我们党是有极丰富的经验的。许多年来，我们通过贫农委员会和其他方式一直在同富农进行真正卓有成效的实际斗争。因此，在党内和在农村现在都已形成了一定的传统。我们在方法上经常过火，滥用行政权力，把一些人错划成富农，而且犯了其他许多错误。不过，尽管如此，无论农村中还是全体居民中，都树立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形成了一种传统，认为不能让富农得势，不能容许富农把持苏维埃和合作社等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已成为党和人民的传统。如何对待中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没有争取中农的经验，在这方面没有形成传统和习惯，在解决这个最重要的任务方面还没有取得必要的成绩。

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在争取中农方面，为了把中农吸引到我们方面来，我们必须取得比过去大得多的成绩。

我们正确地拟定了对待中农的总路线，正确地确立了我们农民政策的关键——工人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的联盟。

不过，特别困难而又非常重要的事情，主要而又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在行动上，在日常工作中，在贯彻实际措施方面，通过雇农和贫农建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牢固结合——经济的和政治的结合。

我认为，现在农民问题的主要之点就在这里。中农跟谁走——跟富农走，跟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走，还是跟我们走，这取决于我们在实际行动上同中农建立正确关系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整个问题就在这里。日常的事实使我们确信，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即富农正在拼命争夺中农，而且无疑还会进一步加强这种争夺。如果我们能把中农完全争取过来，使他们离开富农，吸收他们参加合作社，把他们团结在苏维埃周围，使他们和贫农一起在苏维埃里，在机器协作社里，在土壤改良协作社里，在改

善土地耕作农业小组里，在许多社会组织（“扫盲”组织等等）里，同心协力地搞好共同的工作，富农的危险就会大大减少。

我重说一遍，对中农只能通过实际工作加以争取。由于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不足，农村生活环境复杂，我们的工业依然不够发达，所以困难是极大的。

党应当比过去更多地集中力量来克服这些困难。（暴风雨般的掌声转为欢呼）

译自《真理报》1925年12月13日。

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第九次会议上的讲话

(1925年12月22日)

同志们，有人企图把我的意见同这次代表大会上爆发的党内斗争的起因联系起来。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根据我的报告通过了决议，这个决议成为党内多数人同新反对派“纷争的起源”。很多发言者已经指出，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反对派今后行动的进程对我们党的前途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代表大会之前，由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索柯里尼柯夫、拉舍维奇和克鲁普斯卡娅等同志组成的集团第一次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党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派别。而我感到不幸的是在代表大会之前很久就同这个集团讨论过一系列问题，那时的情况同在这次代表大会展开争论的情况几乎相同。通过一年多的经验，我坚信索柯里尼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舍维奇和克鲁普斯卡娅等同志在观点上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任何原则上的一致性。(喊声：“对！”)在一年半多的时间里，他们只是在改变党的领导体制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更确切地说，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权能、影响，对他们来说太少了。他们一致的意见是必须改变领导体制以利于加强他们的影响。但是他们在政治路线上的一致性过去不存在，现在不存在，而在我看来也不可能存在。(喊声：“对！”)

反对派首领们的发言在整个代表大会面前显得极端的混乱。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出于同情“贫苦人和被压迫者”的观

点，支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笑声)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从右边”支持他们，他出于这样的观点，认为我们有很多危险，因为危险多，社会主义建设很困难，还应再退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发财吧”的口号导致了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的设想，而这个设想的发起人则是……索柯里尼柯夫。

可见，这个集团是由这样一些同志组成的，他们对政治局的这一或那一决议不满，一致希望改变党的领导体制，而在很多场合却又都站在根本不同的、敌对的、势不两立的立场上。

现在整个争论，在其原则方面，都集中在农民问题和那些来自农村的威胁着我们的危险上。在加米涅夫同志发言时，我想起了列宁同志在内战结束时的一次讲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曾经指出过这样一种危险，就是说战争结束以后，获得土地和熟悉土地的农民可能会提出“自决”。农民对彻底收回地主土地的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从这时起，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问题就在于农民对十月革命、对工人阶级的态度，在于劳动农民基本群众的切身利益将在苏维埃国家里得到多大的满足。那时党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并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确立了国家的，亦即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结合的必要性。

现在我们正经历着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不能只满足于农民对十月革命、对城市抱着消极同情或中立的态度，在这个时期里，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

全部问题在于必须同农民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怎样做到这一点？这是当前完全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和这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里曾试图找出一条明确的途径。现时的形势和新经济政策初期的区别在于，我们应当认真地摸索出一套从经济上来影响农村的办法、阶级杠杆和手段来帮助我们有效地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

义。中农问题恰恰在这一方面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十分清楚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至于说必须支持雇农和贫农，这自然是正确的，现在也仍然如此，因为农民中的这两个阶层也应该是我们争取中农斗争的支柱。

现在有人很喜欢重复强调必须同新经济政策的消极面进行斗争的问题。这是正确的，只要还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只要还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把社会改造过来，始终都应该是如此。

在整个过渡（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时期，比方说在二十至四十年的时间里，每年光是反复讲“必须同新经济政策的消极面进行斗争”就能解决问题吗？载入我国发展史的每一新的年度，我国经济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上的每一转变，都会提出一些新的任务。现在特别尖锐的和不同于以往时期的新任务是什么呢？

这个任务就在于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结成工人阶级同中农的巩固联盟，通过合作制、农业工业化等等同他们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现在来自富农的主要危险表现在哪里呢？绝不能说，我们在1925年还有来自发达的富农阶层方面的资产阶级复辟的直接危险。这种危险还不存在，尽管从理论上说这一点是可能的。现在实际的危险不在这里，而在于富农阶层企图把中农拉向自己一方，而且情况常常也正是这样，所以也就存在着同富农争夺中农的斗争。中农是现在农民人口中的基本群众，是农村的决定性力量。把中农阶层从富农的影响下解脱出来，我们就可以战胜富农本身的危险。当然，农村的分化今后还会发生，这样一来，中农群众就将逐渐消失。是否能有一种“自然法则”会使中农成为一切时代的“中心人物”呢？绝对没有！中农现时的角色，是农村在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的结果。在争取中农的斗争中，我们还有

着党现在尚未解决的任务，暂且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但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任务，我们一定要孤立富农，并逐渐吸引中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斯大林同志是完全正确的，他说，现在应当把主要火力指向那些对这一点还不懂得的人，而这样的人还是相当多的。

顺便说说，我接到一封鲍古舍夫斯基的来信，近来我们在用一切火力向他进攻。他问我该怎么办，现在谁也不同他谈话，人们不愿意刊载他的关于犯错误的说明，一些最亲近的朋友也不肯伸出帮助之手，他似乎变成了党内“麻疯病患者”。然而那些不懂得同中农联盟的全部重要性和迫切性的形形色色的人是以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为首的，他们在列宁格勒拥有自己单独的机关报。我们应当考虑这个因素。要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不是鲍古舍夫斯基，因为鲍古舍夫斯基既没有自己的机关报，也没有自己单独的组织。争夺中农来跟富农进行斗争，把农村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经济的轨道是非常困难的任务。在解决这些任务的时候，我们定会犯不少错误，部分原因在于党还缺少受过相当训练的和人数众多的干部。要想把这项工作抓出点起色并付诸实施，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同时要克服一些巨大的障碍，其中包括克服党内的阻力，这种阻力得到党内某些拥有自己的机关报和自己的组织中心的首领们的支持。因此我认为，在代表大会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所通过的决议里，应当充分地考虑到在解决我们政策的最主要问题中所存在的这个特殊障碍。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里对有的人提出指责，说这些人不认为中农是资产者，而实际上中农确实是资产者。那小农是无产者吗？同样是小资产者。大部分贫农又是什么呢？是小资产者。当然，中农也好，贫农也好，都是小资产者。但是他们同富农、同农业资产阶级是有区别的，因为他们能够和我们（如果我们不把事情

做得太蠢）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而真正的资产者从来不会和我们在一起进行建设。抹煞小资产者的（无论中农的，还是贫农的）这一面，把他们和所有其他资产阶级等同起来，会使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走错方向。为了战胜富农，为了通过合作制来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我们必须让中农跟着我们走，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话（看来反对派也承认这一点），那就绝不能用一些所谓私商、企业主、富农、中农、贫农统统都是资产阶级的“高深”思想把自己和人们搞糊涂。

这种概括方法不是把农民（贫农和中农）所固有的特征区分开，它只会把农民的这个阶层同所有资产阶级混为一谈，这样就很难理解党在农村的策略，只会破坏争取中农的政策。

我绝不想说季诺维也夫同志不懂得这一点。想必他是懂得的。但是，只要没有其他论据证明副报告是正确的，那么，他所提出来的论据除了造成危险的混乱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加米涅夫同志发言立足于指责党内部分人对“新经济政策的危险性估计不足”。我认真地听了他的发言。依我看，他太不自量了。他引用了中央关于两种倾向的决定，断定这两种倾向具有同等价值。他证明了什么呢？他是证明两种倾向同样危险吗？相反，他企图向代表大会证明，对中农估计不足的倾向同对新经济政策的危险性估计不足的倾向相反，它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危险。如果从他的发言中作出实际的结论，那就是对待这两种倾向不应平均使用火力，应把全部火力集中到一种倾向，即集中到鲍古舍夫斯基同志的倾向，而没有必要指出第二种倾向，因此应当把这一点从所有的决议中删去。

除此之外，加米涅夫同志还采取一个颠倒事实的做法，说他反驳斯大林同志，但对倾向问题的说明并非出自于他，而是出于中央的决议。

斯大林同志曾担心在这个讲坛上将会出现一些专会吹毛求疵的辩护士，因此，他在自己的报告里不止一次地重复说，两种倾向都能够破坏党的全部政策。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报告里一再声明说，两种倾向都会给党带来极大的危险，但当前我们最困难的任务是建立同中农的牢固联盟。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至今还没有把中农争取过来。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更多的经验；胆怯、无能和缺乏自信心的现象在基层组织当中是很严重的。例如很多基层干部常常不会和不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个任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政治思想正反映基层干部的无能和在理解党在农村所面临的新任务上表现出的无知。加米涅夫同志无论如何过去和现在都绝不可能否认这样的事实，即争取中农的斗争仍然是一场新的斗争，党对这一斗争是不熟悉，我们在这方面暂时还没有可靠的和行之有效的办法，基层组织对争取中农的这场斗争现在也还缺乏足够的力量和信心。

现在有一些言论是在助长这种胆怯、张惶失措、无能为力和党在农村所面临的困难，因此这一点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由于缺乏论据，季诺维也夫同志又杜撰出另一种倾向，我相信，他指不出中央委员中有任何一个人有这种倾向。他断言存在着一种把新经济政策称为社会主义的思潮。我认为，这种倾向只存在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臆想之中。

那么，季诺维也夫同志自己是如何给新经济政策下定义的呢？下面就是《列宁主义》一书的这位作者所下的定义（第314和315页）：

“……必须牢牢记住，工农联盟本身在今后（即在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要比现在将更加需要，而新经济政策（即工农联盟的这种形式）则是暂时的现象。工农联盟，这是严肃的、长期的、永久的，直至阶级完全消灭为止。新

经济政策，这是严肃的和长期的，但不是永久的”……

从这里不难看出，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如何“严肃地”对待新经济政策的。比方说，在德国或者在英国革命胜利以后，按照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意见，新经济政策在苏联将不再需要，尽管既未实现社会主义，也没有发生可以迫使党废除新经济政策而回到某种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看来，在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之间将还有一个过渡时期，因此不相信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可以在我们目前这样一个农民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某些同志也沾染有这种思想。

过渡时期所特有的经济制度是什么样的呢？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苏联的这种经济制度是某种长久的，固定的经济组织。依我看，错误的根源正在于把这种长久性、不变性强加给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经济制度的这种做法。在过渡时期，在这种经济制度的各种组成部分不断发展的同时，整个经济结构也在起变化，这一点是最基本的。过去当我们的工厂停工、或者当我们的很多工厂的生产水平只及战前的百分之四至五的时候，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现在是不同的，因为现在我们工人的数量增加了很多倍，我们正在实行生产集约化，逐渐使国家电气化。正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经济结构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变化。因此，当人们认为过渡时期是一种固定的经济制度时，那就犯了明显的错误，因为过渡的概念包含着运动，变化，从一种制度（资本主义）向另一种制度（社会主义）的过渡。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断言，不能把国营工业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工业。还存在着文盲，不文明，工人生活不好，还有贫困现象等等。十分正确。这些缺点我们还没有根除。但是，要知道社会主义建设正是要消灭这一切！

现在不同的是我们在我国的经济中已经找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动力，找到了同农村中劳动者而不是同富农进行阶级联系

的主要关键，取得了能使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得到保证的实际力量的对比优势。

我们同新反对派代表人物的争论就是党能否在经济落后的我国建成社会主义。他们曾证明说，没有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由于经济的技术落后，社会主义在苏联便不可能建成。我们回答说，只要我国有了正确的政策，尽管技术落后，我们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至于我们是否能保证社会主义免遭外来干涉和复辟活动的干扰，——这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周围环境。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等人的言论中也反映了这些争论。

四人政纲引起了一场很大的争执。只有了解上次同他们争论的同志才能够理解这一点。最近阶段的争论始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他在把耳朵贴在地上，听到了历史的脚步声之后写的。在这篇文章上面，除了标题《时代哲学》以外，还有小标题《迎接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无论是大标题，还是小标题，都提得非常响亮。任何人都明白，作者想要在这些标题下阐明向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纲。这个政纲得到了加米涅夫同志的支持和补充。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们委屈了他们。假如我们不委屈他们，假如他们是大多数，那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时代哲学》就会原封不动地成为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政纲。什么是这个政纲的基本论点？首先，它的根据是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吃饱了的俄国”。

季诺维也夫同志写道：“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暂时还没有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但是饥饿的俄国已变成了吃饱了的俄国……这已经不是预见，而是事实”……

有人指责我们过高评价了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很难想象有谁能比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时代哲学》里浮夸得更厉害。现在仍存在着上百万的失业者，大批的儿童无依无

靠，大量人不识字和缺乏文明，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有了一个“吃饱了的俄国”，这只能是对我们还未能战胜穷苦和贫困的嘲弄。

下面是季诺维也夫听到的“历史的脚步声”：

“……为什么在十月革命的伟大日子里无产阶级奋起行动，而且广大的人民群众也跟着他们？为什么这些群众跟着列宁赴汤蹈火？为什么在苏维埃政权最初的艰难岁月里，这些饥寒交迫的群众冒着敌人的炮火，高举着列宁的旗帜前进？为了平等的思想。

你们想知道，人民群众在我们的时代真正向往的是什么吗？”（着重号是我加的。——阿·李·）

这大约是六个月，或者不到六个月以后写的。

“……要用一个词来表达这种向往，可以说这个词就是‘平等’。这就是认识我们时代的哲学的真正关键。如果我们想成为‘人民意识’的真正表达者，我们就应当站在为平等而斗争的最前列。”

这就是摆在大家面前的1925年反对派政纲的要点。

我打算不用自己的话来驳斥“我们的时代”这个口号，我只想读一小段引文，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的：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争论字眼是没有必要的。

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我们就谈不上平等，就不能不加以防备，以免帮助了资产阶级。”他接着写道：

“把工农平等奉献给我们的是劳动农民利益的维护者，他们大半是社会革命党人。另外的人，象舍尔公民那样，虽然学过马克思主义，但是毕竟不懂得，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工农平等是不可能的；应该认为，许以这

种平等的人就是在发展高尔察克纲领，虽然他们并没有了解这一点。”（鼓掌。喊声：“这是从哪儿引的？”）

列宁格勒的同志们喜欢核实引文，而且做得很认真。我可以告诉他们，我读的这段引文，摘自《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二一二页《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一文。^①

我也有摘自卡尔·马克思论平等问题的引文。在我们研究季诺维也夫的《时代哲学》的那个“时代”里，我们不得不重新翻阅老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某些著作。这些引文自然完全充分地证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正确的。

在季诺维也夫的《时代哲学》里，除了为我们的时代提出“平等”的口号以外，还曾指出党、特别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蜕化的危险。这个政纲后来又加上一些关于工人个人利润分成和关于鲍古舍夫斯基问题等等。经过辩论，现在这里还留下些什么呢？

加米涅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里说：“党内有没有脱离列宁路线的情况呢？没有，我也相信没有。整个中央是否有从列宁路线滑到布哈林路线的情况呢？没有。”问题究竟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在布哈林周围组成了一个红色教授集团。因此产生了副报告，因此出现了党内的纷争，党的统一也因此受到了威胁。在同反对派的辩论中，我们不但在这些问题上，而且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多次面临公开辩论的威胁。他们多次恐吓我们说：“我们将向全党控告。”为什么他们多次想向党控告呢？除了关于要让他们中的一个人当中央委员会书记的问题以外，在各个不同阶段的争论中毫无共同性的东西。现在他们还要求红色教授们脱离布哈林同志。

在代表大会前夕，当我们同季诺维也夫同志讨论关于怎样才能避免党内和国内纷争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我们说，根据

^① 这是指《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的卷次、页码，引文中的黑体字是李可夫加的。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8—839、841页。——编者注

他的意见，我们可以坐在一起共同来起草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他们接受斯大林同志的一切提纲，并无异议。但是，他又说，我们不能做的只有一点，那就不能允许列宁格勒的组织的领导发生变动，不能允许对它现在的领导人进行任何触动。他们最关心的是要使列宁格勒继续成为独立的、拥有自己的机关刊物等等的竞争中心。

可见，主要分歧点是党内应当有一个中心还是两个中心的问题。我们认为，党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喊声：“对！”）必须保持统一。无论什么样的多数，它只有在没有竞争中心的情况下，才能领导党。（喊声：“对！”）对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意见，对于他提出的关于列宁格勒组织的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因而他也不同意决议草案，而且又在代表大会的讲坛上作了副报告。（喊声：“可耻，可耻！”）我援引的同反对派的这些谈话是为了证明，反对派是毫无原则的，不仅反对派首领们（索柯里尼柯夫和季诺维也夫，拉舍维奇和克鲁普斯卡娅）的观点各不相同和自相矛盾；他们的无原则性还表现在他们在辩论中不断变换自己的政纲和改变自己的观点。

在我们同反对派辩论中，即或是在一个短时间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反对派提出了一个政纲，一个要求，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以向党控告相威胁。过了一段时间，为了玩弄新的花样，他们又撤回了这个政纲，于是就再次提出了辩论的恐吓。他们这样折腾了几次，最后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讲坛上提出了副报告，对布哈林同志的红色教授们提出控诉，并要求得到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位。

反对派的这种演变，我们同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同加米涅夫同志的长时间的谈话证明，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臆造的，这些问题现在都同我们不能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与富农倾向进行斗争有关。

在这里无论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还是加米涅夫同志，都没有丝毫的诚意，就象在同新经济政策的缺点进行斗争的问题所表现的那样。如果他们在克服或减少新经济政策的缺点方面提出了什么实际合理的建议，那不要通过任何辩论和任何副报告我们就会接受。无论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里，还是在这四个人同我们的个人交谈中，除了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建议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以外，他们在这方面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说什么在中央委员会里有人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富农的危险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富农倾向的影响，必须指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现在这里正在举行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让反对派来指出，究竟是谁不懂得新经济政策的危险性、不懂得农村资产阶级发展的危险性，哪怕有一名代表是这样。我敢断言，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不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没有，而且在党的省委会里大概也没有。反对派的每一个成员对于这一点也是完全清楚的，尽管现在他们在制造各种不存在的分歧。

在这里，我想就扎鲁茨基同志的问题说几句。他是第一个向中央委员会发难的。我不很明白，当扎鲁茨基同志在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发言时，他想证明什么。他大概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当人们对扎鲁茨基第一次提出指责的时候，我是不相信的，后来证明这种指责是对的。只是在当着很多证人的面宣读了关于扎鲁茨基同志指控中央委员搞热月政变的文件的时候，我才开始相信这种指责。

在第一次宣读这个文件时，扎鲁茨基说，宣读文件使他免除了再说话的必要性，因为文件里已经说了他想说的一切。他的这个声明引起了愤怒。第二天，他声称，这一切他确实说过，但只是为了迷惑莫洛托夫同志，因为他认为同他谈话的那个同志是莫洛托夫同志暗中派去的。对于这个声明，不但我，而且很多同志

都回答说，他同一个党员谈话，而这个党员则可以把对扎鲁茨基同志的奇怪怀疑广加散布。他不但能够同莫洛托夫同志讲，而且能够同其他党员和在党的支部里讲。于是扎鲁茨基同志又提出了他的第三种解释：他什么也没有说过。当我亲眼看到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出现了扎鲁茨基的三种回答，我对列宁格勒人说：“现在我对扎鲁茨基不相信了。”扎鲁茨基在作三种解释时列宁格勒的同志都在场，他们自己声明说，他们会撤他的职。现在扎鲁茨基被选进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柯马罗夫被撤销了，洛博夫被撤销了，而扎鲁茨基则当选了。

托姆斯基：这是个很精彩的镜头。

巴卡也夫：不是把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了吗？

李可夫：在这里，列宁格勒代表团中有人问我，我们是把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了吗？要知道，当时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已经临近，再说他也在行。（掌声）

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负责书记扎鲁茨基同志的问题表现了某些地方显露出来的极端的张惶失措情绪。而当真相大白之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同志又在这里出来说：“你们指责的是谁？”对不起，难道所谓中央委员会在搞热月政变的这种指控不是已经证明存在着极端的惊慌吗？有人问我，我们把他开除了中央委员会没有呢？我应当说，为这类事我们不只是应当把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问题。象指控中央委员会搞热月政变这样的事，作为党员这可不是能够拿来开玩笑的事。（喊声：“对，对！”掌声）

扎鲁茨基的问题正是惊慌失措情绪的最鲜明的标志之一。我向大家这样说丝毫不夸张。我重复一遍，我对这件事没有任何成见，并且长时间地，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怀疑过它的真实性，然而很遗憾，在扎鲁茨基同志本人当着很多证人的面“表白了自己”以后，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意见。于是马上有人到我们这里来

说：“你们在谴责谁？”既然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书记带有这样的倾向，请原谅我这样说，那么，在他的一伙人中想必还有别的什么人。

布哈林同志成为主要的被告人，他的日子最难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有人企图使他成为“该打的孩子”。关于布哈林同志，我在这里只想说一句：当然，他犯了错误，现在大家人人都这样说。但是，你们列宁格勒的同志犯了更大的错误，因为在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口号是错误的（布哈林同志本人承认了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并且本人公开地放弃了这个口号）之后，你们还在把这个口号在所有农民和非农民组织当中，通过报刊、印刷品，口头宣传和各种其他途径到处散布。如果你们承认这个口号是危险的，那么我问你们，极力设法让任何一个农村的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这个口号是否对你们有利？可是你们却这样做了。尽管你们也知道在布哈林同志本人的声明里和在中央委员会的决定里都已承认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可是你们还是这样做了。竭力让我们苏联的每一个公民都知道布哈林同志的错误言论，你们这样做给我们的阶级斗争、我们的党、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什么好处呢？（掌声。喊声：“为了使任何人不敢重复它。”）为了使党内任何人不敢重复这个口号，要知道，他们把这个口号向所有的非党人士通报了！（笑声）但是，你们忘记了或者故意不去发现某些其他的东西。我想专门向列宁格勒人讲一讲关于布哈林同志的问题，在我们党内第一个发现存在两种倾向及其危险性的恰恰是布哈林同志。并且在谁还没有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提出了它们的存在。他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和他更早的一次讲话里就断定了它们的存在。布哈林同志的这个说法早于任何其他人，而且被我们列入了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布哈林同志是这样说的：

“我们力求增加我国的国民收入总额，加速我们的经济周

转；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帮助中农、贫农和雇农。谁不懂得我们积极对待农村积累的这种含意，而认为这种政策只是‘开放富农’，谁就犯了富农倾向的毛病。

当然，我们现在不应当因此就要掩盖、抹杀和害怕资本主义关系的某种发展。我们不需要用单纯的行政压制去克服它们，而需要利用这种情况给贫农和中农以经济帮助。谁不明白这个问题，谁就有富农倾向。

在我们的报刊上，现在还透露出另外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有如下述：

有些同志在正确估计农村某些现象的时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能用行政压力去克制富农，而要看到这样的前景：由于分化，我国将产生资本家和雇农；阶级关系将愈来愈尖锐化，事态不可避免地发展到我们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①

这是布哈林同志在 1925 年 4 月 17 日说过的。党在十月全会上谈到了两种倾向，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而第一次十分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的则是布哈林同志。

还必须详细谈谈问题的另一面，就是与惊慌有关的一面。反对派是在什么时候特别强调困难和对新经济政策的危险估计不足的问题的？特别强调是在经济困难最初的表现显露出来以后，尽管困难是轻微的和不足道的，但毕竟是困难，我们现在正在克服这些困难。我认真地听取了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发言。他们俩人声称，现在经济困难的原因在于富农。我们少收了二亿普特的粮食，——据说这是富农的罪过。再比方说，货币的稳定性受到了威胁，——是富农的罪过。计划订得不正确，——又是

^① 《布哈林文选》1981 年人民出版社版上册第 370 页。——编者注

富农的罪过。当我听到了这一切时，我想起了张伯伦。在印度发生了困难，——拿共产国际的奸细问罪；在埃及发生了困难，——是布尔什维克的奸细的罪过；在夏威夷群岛发生了混乱，——又是布尔什维克。（掌声。喧哗声。喊声）

我同你们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定义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但不能把不成功的或者不妥当的计划硬说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征。（笑声）这一点我是不同意的。加米涅夫推说他在某地休假，然而他正是犯了我们大家所犯的错误。那又怎么样，好极了，正是他犯了这个错误。但是任何人都不否认，我们也不否认，加米涅夫同志是第一流的富农问题专家。然而，为什么当他休假回来之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又去执行这些据说没有他参与而制定的带有富农倾向的计划呢？这位富农问题专家顽固地执行了政治局错误地批准通过的计划。政治局作出关于取消它的粮食收购和出口的秋季决定的决议所依据的，并不是加米涅夫同志的倡议，而是政治局的其他成员——斯大林同志和我的倡议。

我们取得了十月革命后几年来最好的收成。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的错误推给别人（我不推卸自己的责任）？是由于富农对我们很好地利用今年起了什么妨碍作用吗？这样的理由只是极端惊慌的结果。富农本来能够向我们提供但是却没有向我们提供粮食。这是事实，但是中农也没有向我们提供粮食，贫农也没有提供。对整个谷物饲料的平衡都缺乏考虑。而加米涅夫同志被谷物饲料的平衡搞乱了。现在每一个党员都知道这些错误。不能只用富农的原因来解释我们经济计划的失误。

与其说罪过在富农，还不如说我们计划过了头，没有及时发出危险信号，没有改变本来应当而且能够比我们实际所做的更早些改变的那些东西。

我还想谈谈对我们提出的零星的指责。例如，我们对鲍古舍

夫斯基的处分是否够了呢？我不知道，也许应该更严厉一些。但是我问你们：究竟谁应当受到处分？要知道，《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编辑是布哈林和加米涅夫同志。（喊声：“还有斯列普柯夫同志。”）对，还有斯列普柯夫。但是要知道，加米涅夫同志是编辑。那为什么只指责布哈林同志一个人呢？（喊声：“布哈林同志这段时间不在。”）看，这里有的同志甚至还说布哈林同志不在。加米涅夫同志说，他不允许因为他没干过的事而受到非难。那为什么布哈林同志就应该受到各种可想象的和不可想象的非难呢？（笑声）这一切要由两个人负完全责任。也许这里犯了错误，也许这件事情应该在一周前或一周后写出来，也许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但要知道这并不证明现在使党受到分裂威胁的斗争是正确的，这不能证明那个副报告是正确的，不能证明反对派是正确的，也不能证明你们不仅在党内展开的而且可能席卷全国的那种胡闹行为是正确的。（喧闹的掌声。喊声：“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审查过这篇文章，他是怎么看的？”）

同志们，我的发言是从我们党进入了她的生命的最紧要的关头开始的。拉舍维奇同志在他的发言中除了玩弄词藻以外，还要求保障少数派的讨论自由。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引证了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为了使大家了解她引证了什么，我读一下这本小册子的开头几行：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

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

(《列宁全集》第14卷第2册第299页)^①

这就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参加共产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时所回忆的东西。

我想把反对派的代表们所说的一切同他们向代表大会建议做的事情比较一下。加米涅夫同志在声明中直截了当地说：“于是，我问自己（这意味着自己同自己谈心）（笑声）：党内有没有脱离列宁路线的情况呢？没有，我也相信没有。整个中央委员会是否有从列宁路线滑到布哈林路线的情况呢？没有。”这就是加米涅夫同志的一个声明。另一个声明则说斯大林不能团结他们。

他们在用蜕化的理论作为进攻的炮弹，并对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作了回忆，结果断定，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党，都没有向任何地方滑动。如果把现在党的状况同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时期的情况相比，那么，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很清楚，在现在的形势下掀起党的公开辩论，按照拉舍维奇同志的要求对问题进行这样的讨论，在党内是行不通的。关于对农民的不同阶层的态度问题，农民的这些阶层将会以极大的热情进行讨论。我们当中的辩论，中央委员会之间和代表大会的个别集团之间的斗争，意味着我们苏联全体居民的非党群众之间在国内的政治斗争。（喊声：“对！”）在加米涅夫同志自己同自己谈话时承认了无论是党，还是中央委员会都没有任何滑动的情况以后，有些人竟走上讲台提出这样一些不但能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引起纷争，而且能够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性的要求，——我问你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74页。——编者注

们，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想多少吓唬我们一下；因为他们知道，党的共同利益要求把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加米涅夫和我们大家套在同一架马车上，所以他们提出了对党带有屈辱性的条件。（掌声）我希望反对派象全体党员一样，都能认识到，党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要求，党从来对任何人，无论是对斯大林、季诺维也夫，还是对其他的什么人，都不会屈服，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掌声。喊声：“对！”冲着列宁格勒代表团的喊声：“可耻！”）

现在党的状况同在斯德哥尔摩时期的状况有着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党拥有在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有着丰富的创造性经验的大批干部。现在党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在需要的时候，不管缺了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党照样能够继续前进和进行自己的事业。（掌声）

我在结束发言的时候想向代表大会宣读和建议采纳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时所考虑的、而不是他现在所考虑的主张。我现在宣读他在《党内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小册子里讲过的一段话。在第二十三页上他这样写道：

“我们能够允许派别和小集团的自由吗？不能。我在我的提纲中说过：执政党内的派别自由，——这意味着有建立并行的萌芽政府的自由。”

第二段引文引自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派别问题，我说过的所有麻烦事，不正说明我们需要比迄今为止强一千倍的坚固性吗？我所描写的所有麻烦事，难道不正是在大声疾呼，我们需要比迄今为止更为牢固的铁一般的团结和我们不能允许自己走得过头，以至于允许派别自由和甚至小集团的自由吗？‘民主’，‘书记的官僚主义’。你

们记得反对派的这种叫喊吗？列宁的号召就是回答。反对派是不是又搞错了呢？是搞错了！”（第80页。着重号全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加的。）

最后，我还想宣读一段从列宁格勒各党组织委员会会议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所通过的决议中摘录出的引文：

“……以列宁格勒组织这个最老的布尔什维克的党组织（各党组织的委员会。——阿·李·）的名义宣布，今后仍将进行反对小派别活动的斗争……”

我觉得这个声明表达了全体列宁格勒工人群众的意见；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代表大会应该向列宁格勒组织提出的仍应是这个声明里所说的东西。（掌声）

同志们，国外报刊的最新报导证实，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已在国外广泛流传开来，并且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软弱和共产党大大衰败的迹象。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国外的通讯中了解到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要比我们党近几年来所发生的所有分歧，所有辩论要危险一千倍。我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对反对派中的同志产生季诺维也夫同志就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而说过的那种印象。他那时说：“代表大会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如同在中央委员会周围，在党的主要核心周围，筑起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方阵。这是一堵布尔什维克城墙。谁如果愿意，尽可以用脑袋往这堵墙上撞。”（掌声）季诺维也夫最后说：“遭殃的是他的脑袋，而不是墙。”

我希望列宁格勒的同志在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好好重温一下他们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所说过的那些话。（掌声）

我在任何场合和在任何程度上都不想而且也不能否认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和将来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在任何情况下，我

都不想否认新经济政策有着很多消极的和危险的特点。但是我希望每一个党员都要清醒地认识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一种危险性，一旦在我们党内发生尖锐的派别斗争，它就会造成巨大的困难。我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使未来的中央委员会，不管它的成员如何，不要再出现与它对立的任何其他中心，任何别的，拥有自己的机关报、自己的刊物、自己的联络系统的组织。两个中央，“封建主义”，“国际联盟”，在我们党内都应当予以消灭。（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转为热烈地欢呼。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

译自《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8号公报）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5年俄文版第20—37页。

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三次地政机关会议上的讲话

(1926年2月28日)

同志们！你们的会议恰好是在我们报刊提出了一系列经济问题的时候召开的，这些问题综合了城乡关系的最主要的各点。

我已经听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如问政府和党是否正在改变自己的农村政策。我应当毫不含糊地声明，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和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最充分不过地反映出来的政府和党的政策，仍然完全有效。只有仔细观察城乡经济联系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只有对这些变化进行必要的研究，以便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善于使全部政策去适应已经发生变化的形势，这项政策才能得到正确贯彻。

自然，就是现在我们大概也必须重新审查一下最近几年来所做的一些事情，必须巩固苏维埃国家的基础——工农联盟。我认为现在的城乡关系与两三年前的城乡关系的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在不断发展的工农业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厂和农民土地之间的更加密切的联系。这种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几乎完全中断了的同市场关系发展的联系以及同农民经济商品率提高的联系，现在已经恢复起来，并且越来越巩固了。

但是，不仅城乡两极之间的经济联系得到了恢复和巩固，而且我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也得到了恢复和扩大。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关系进一步的顺利发展首先取决于农民经济商品率

的提高。我国农民经济已经达到的非自然经济化（即商品率的提高）的程度，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已经足够了，因此，我认为目前的主要口号应当是为提高农业的商品率而加紧斗争。无论是巩固城乡的联系，还是清除现在我们报刊上正在讨论的国民经济个别部门发展上的比例失调的现象，都取决于这一点。

给城乡之间的关系带来新的东西的第二个特点是：摆脱了地主土地占有制而被推到不断发展的市场面前的农民经济，正在越来越坚决地根除落后的经营方式，并学会以关切的和重视的态度对待在提高土地肥力和改善农业生产方式方面的科学成就。如果说在四、五年以前，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对于农民经济中能否迅速采用优良的耕作方法（由于落后、不文明和农民对一切新事物存在自发的不信任心理），还可以抱着某种怀疑的态度，那么，现实生活已经证明，农民在这方面已经有了重大进步。如果说农民在两三年内就学会了在自己的经济中使用拖拉机这一种最复杂的农业机器，如果说在同农业中的保守作风和落后现象作斗争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就，那么，我认为农民已在文明经营经济方面很好地通过了第一次考试。城乡联系的加强以及农民所表现出来的改善自己经济的能力、对科学实验和农艺学的主张的关切，这两种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决定着农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显然，农民经济的发展本身、它的技术的改进和它的商品率的提高，都取决于它所必需的工业品的供应情况。大家知道，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困难。农民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缺货现象（它的表现是农村零售商业价格的上涨），成了农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由于在修理、重新装备和兴建新工厂方面必须支付大量的基本费用，所以我们的国营工业向农村市场供应它所需要的商品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工业不够发达和必须把大量资金投入工业建设，造成了目前的经济紧张局面。如果说农

业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就能很快发展的话，那么，工业只有在投入极其大量的新资金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发展。

今年这一年是在预兆丰收的情况下开始的，而且大有希望顺利完成粮食收购和粮食出口的计划。我们指望用这些粮食换回我们所需要的相当大量商品，其中包括以前已在国外采购的装备农民经济的那些物品和个人消费品。

最近几个月证明，我们对粮食出口额的增加所作的估计过高了。因此，不得不压缩出口计划，从而也不得不削减我们的进口计划。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从 1925 年秋天起已经出现的经济发展的整个规模。已经形成的局面迫使我们为了不致出现对外贸易的入超而不得不减少进口额。这一点又迫使我们大刀阔斧地削减进口计划。由于这种削减，今年我们可能有少量拖拉机将会缺少联挂式农具，脱粒机和捆禾机将缺少足够数量的绳索。这当然将使我们的工作遇到困难。但是，要指望毫无痛苦地克服经济方面的困难，那是办不到的。这些困难既打击了工业（因为一部分工业将由于缺乏进口原料和半成品而感到困难），也打击了农业。

在对目前的经济困难所作的各种解释中，有时暴露出想把产生困难的原因归咎于我们牺牲城市和工业的利益而过份地“面向农村”和农业的那种企图。而从这里可能得出必须大大改变我们的农村政策的这种十分错误而又非常有害的结论。我认为，对于解决我们面临的任务所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十分错误的。对于我们农业和工业之间所存在的比例失调现象，恐怕不会有人提出异议。毫无疑义，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确存在比例失调现象。但它是一种长期的现象，并不能说明我们今年所遇到的与前几年不同的那些特殊困难的原因。这种比例失调现象应当彻底消除，但决不能靠使农业退化的办法来加以消除。农业的向前发展是国家真正工业化的前提之一。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两者都应当发展，并

且工业的发展要做到一年比一年更好地、更多地为千百万农民的利益服务。有一些认为我们现在经济困难的唯一原因是比例失调的人，主张必须对农村的税收政策来一个彻底改变。维诺格拉多夫有一天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政治无知的鲜明样板！），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文章里建议把现行的农业税差不多增加一倍（达四亿卢布）。我认为这种建议是完全错误的。为了确定明年的税收数额，我们首先必须考虑播种面积的扩大情况，其次必须考虑对过去逃税的那些农业部门予以课税，过去由于逃税的缘故，单一农业税的全部负担都落到谷类作物上了。

应当把这些新增加的农业课税对象考虑进去，以便对农民经济课税的工作做得较为公平合理一些。把这些因素（即不断扩大的播种面积和农业生产的其他项目）都考虑进去，就可以增加国家预算中来自农业方面的税收额。同时必须指出，实行这项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让地方机关承担正确清查新的课税对象的主要责任。

我们迄今在农业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找出弱点和错误，以便集中全部积极因素去克服它们。农业的主要弱点在哪里呢？就是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界的自发力量。我认为，出席会议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十分有把握地说，明年是不是个丰收年。我们在这方面至今还象以前那样依靠猜测。我们毫无把握避免再次发生象 1921 年那样歉收的危险。如果农业由于天灾而大幅度减产的话，那么，我们苏联现在的整个经济地位将会受到比以前更加严重得多的打击，其中，工业也会受到打击。克服农业的自发性应当是一项主要任务。因此，在我们面前突出地摆着两个特殊的问题：（一）同干旱地区的旱灾作斗争；（二）进行恢复中央黑土区的工作。

由于可能发生通货膨胀的危险，我们现在不得不削减预算的

支出部分。但是，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以便使这种削减既不致影响对抗旱斗争的拨款，也不致影响对恢复中央黑土区的拨款。

在农村中自发性还以另一种方式暴露出来：由于农村组织性不强，在农民当中正在发生分化，农村内部个别经济集团之间也在发生冲突。直到现在还不能认为，我们无论在组织贫农和中农阶层方面或在组织合作社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我们的农业是通过组织得还很差的市场而同工业和城市建立起联系的。要通过合作化使农民经济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全面地提出合作化问题不过是一、二年以前的事。因此，对于要把千百万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希望它很快就会取得成绩，那还为时过早。合作社在最近一个时期大大发展起来了，但它还不是把农村居民的全部积极性集中起来的地方。我们在活跃合作社组织的选举方面和使选举出来的机关对参加合作社的居民负责方面，还未能取得真正的成绩，还未能象我们所需要的那样使农民群众关心合作社的生活。农民还在很大程度上把合作社看作是官办事业，而不看作是自己办的事业。这就是目前合作社的主要弱点。对合作社的这种看法，也就是农民不愿向合作社踊跃存款的部分原因。合作社的这种状况是非常危险的，因而必须竭尽全力使合作社成为农民的真正的合作社，成为发挥农民的积极性的组织，成为吸收小额储蓄的中心。

同志们，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地的农艺工作人员，所以，我想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向农艺师们表示敬意。只有当科学渗透到我国经济的所有毛孔时，我们才能组织起新的农村，战胜愚昧和落后。因此，在农业领域传播科学成就的农艺师和兽医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人员。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后能否实现全人类的梦想——组织一个没有贫穷和愚昧的人类社会？在我国条件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聚居地传播科学知识和经营农业的新方

法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的农艺学和兽医学应当大众化，应当唤起农村居民的积极性，应当建立在农民的主动精神的基础之上。

科学和农民，农艺师、兽医和农村能否找到共同语言，这将决定今后我国农业恢复的命运。大家应当注意这一点。（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真理报》1926年3月3日。

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总结

（1926年7月26日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同志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全会在星期五结束了。所有决议都在报刊上发表了，这是按预先的规定发表的，但是会议的速记记录和全会的其他材料还没有整理出来，所以我在自己的报告里还不能利用这些材料，加上这次会议离全会只间隔两天的时间，要详细地研究全会期间积累的大量材料，显然是完全不够的。但是这次全会通过的决议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应当引起党的高度注意，因此，我不认为我同意作这个报告是错误的。

依我看，在这次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最主要的是关于拉舍维奇同志等人的事件的决议和关于苏维埃改选的总结的决议。因此，我报告的主要部分就讲这两个决议。

拉舍维奇等人的事件

正如你们所知，就拉舍维奇、别连基等人的事件通过的决议

* 我把我在党的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的速记记录作了部分删节，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我认为这些东西在报纸上发表是不适宜的。同时，我把我在结束语中阐述过的某些意见加进了报告。

规定，取消拉舍维奇的党的候补中央委员资格，并警告说，如果他继续进行派别斗争，那他就是自己置身于党的队伍之外。决议还规定将季诺维也夫同志开除出政治局，但保留他的中央委员的资格。

我想，如果没有说错的话，在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上，破坏党的纪律问题还从来没有象在最近这次全会上出现的那么尖锐。对象季诺维也夫这样著名的党员作出象最近这次全会所通过的这样的决定，这在从前是不曾有过的。我个人记得类似的情况只有一次，这件事关系到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因为只有少数党员知道这件事，我现在就来讲一讲这件事。

这件事发生在 1921 年，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在世。施略普尼柯夫当时是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在一个党支部的会议上，他对政府的某些决定提出了批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一份文件上知道了这件事，这份文件至今还保留着。这份文件上说（我援引这份文件时在修辞上稍微作了一点改动，但意思是准确的）：

“……前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在支部作了一个报告——不是报告——不能称为报告，而是对政府的决定提出批评。他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出租企业的决议作为批评的依据。他首先从决议中关于‘要承认，经济搞得乱七八糟。’这一点谈起。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对此哈哈大笑地说：‘这是什么意思？管理了四年，无人作主，这怎么可能？’他批评的第二点，是针对决议中说‘尽管劳动生产率已达到最低限度，但仍然要为工人供应工作服和粮食。’这一点遭到了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更严重的批评。他说工人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而劳动生产率在一些工厂甚至超过了战前。

批评的第三点是关于盗窃问题。施略普尼柯夫同志说，

工人们是无罪的，有罪的是经济机关，是它们把工人引上了偷盗的道路。在批评结束时他声称，整个这个决议散发出反工人的情绪，工人应该警惕。”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到这份报告后，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以便讨论他——列宁——关于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破坏党的纪律而应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他提出建议的理由是党中央不能允许任何一位中央委员破坏中央的政策。中央委员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争论和辩论。但是，他们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不管是同意还是不同意，都应该无条件地，一心一意地贯彻执行，并在非党群众和党员中维护这些决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同中央委员会的总政策是一致的。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来，根据中央委员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对该决议的批评，完全有理由提出把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的问题。根据列宁同志的建议，当时中央全会通过了这样的决定：

“听取了关于施略普尼柯夫破坏党的纪律的情况说明，兹决定：

(1)认为中央委员会进行组织干预是必要的。明天，即8月9日上午十一时召开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定预定的、由所有住在莫斯科的俄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参加的委员会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把施略普尼柯夫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处于少数，大多数人不同意把施略普尼柯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只决定解除他的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决定中写道：

“(1)鉴于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作为中央委员，多次破坏党的纪律，会议确认，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今后继续在中央委

员会以外发表谈话、声明和批评来反对中央的政策，抵制真正反映了党代表大会意见的中央决定，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关系到施略普尼柯夫能不能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问题。因此，会议坚决要求施略普尼柯夫彻底改变他在这方面的一切政治行为，使之符合他在其中工作的中央的路线。假如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今后仍不改变他的行为，中央委员会将委托召开同样的会议再一次讨论他的问题。

除三票弃权外，一致通过。

(2)该决定只立即通知各省委，只在《俄共中央通报》上发表。

(3)解除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为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错误而要求把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但是这一错误同拉舍维奇、别连基等人的事件相比要逊色得多。须知，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是公开合法地在党内，在合法的共产党的会议上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决定提出批评。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党的纪律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他那些即便是对党的纪律稍有削弱的行为，向来要求都是很严厉的，即使这种破坏纪律的行为同现在拉舍维奇、别连基等人的分裂活动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那也得要求把施略普尼柯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仔细地讨论了拉舍维奇、别连基等同志的事件。

这个事件的实质在于有些党员严重破坏了党章，在组织派别方面采取了实际步骤。他们抱着这样的目的举行了非法会议，定出暗号，安排秘密寓所等等。

别连基同志主持的一次秘密的非法会议是在莫斯科市郊召开

的。这次会议的报告人是候补中央委员拉舍维奇同志。除此之外，中央监察委员会还查明了这样一些事实，例如，别连基去到敖得萨，在那里成立了从事派别活动的三人小组，同这个三人小组一起拟定了专用联络密码。别连基拟定密码自然不是为了他个人使用，而是为了背着党同某个派别中心进行非法的秘密通讯。业已查明，反对派分子多次被派到很多地方去分送政治局的秘密文件。不久前，几乎所有莫斯科的支部都收到了从列宁格勒尼古拉也夫车站发来的同一个反对派分子的信，其目的是要让这些支部起来反对党的中央委员会。业已查明，党的秘密文件由一些非党的女打字员打印复制了多份，成为非党分子的财产。业已查明，反对派分子同非党分子就他们在反对派同党中央大多数委员斗争时采取何种立场问题进行过多次交谈。

正如你们所知，别连基同志是共产国际一位负责工作人员；共产国际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古拉尔斯基和魏奥维奇，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曾企图同外国共产党的一些个别人和集团建立联系。

当然，别连基及其同伙只能按照那些在政治上领导反对派的同志的愿望和指示从事非法活动。因为派别分子的大量活动联系是通向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所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认为，在审查拉舍维奇等人的事件时，只谴责次要人物，而对季诺维也夫同志对待派别组织的实际活动的态度问题避而不谈，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坚决同所有这些派别的、非法的、分裂的行为划清界限，那么他的问题在监察委员会里，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会上本来是不会提出来的。但是，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出席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会议，尽管一再邀请，他却声称，他正忙于编写苏维埃改选提纲，他在这次全会上对所有这

些分裂行径都没有表示反对。

党的决议和反对派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在讨论党内分裂活动事件时并没有涉及到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其他一些同志与党内大多数人的政治分歧。托洛茨基同志在党内的意见分歧要比季诺维也夫同志严重；而梅德维捷夫的意见分歧又要比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严重。但是有一些同志虽然在某些政治问题上同党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然而并没有建立派别，没有分裂党，并且执行了党的决定，所以也就不存在对他们采取任何组织处理的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同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分歧早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之前就开始了。党不止一次地指出过托洛茨基同志的政治立场。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1924年1月）决议中说：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分析了‘反对派’代表人物发动的全部性质，得出一个结论：在我们面前的现在这个反对派不仅企图修正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公然背离列宁主义，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丝毫不容怀疑，这个反对派客观地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和政策的进攻。对党内民主原则的解释已经开始超出党的范围，其用意就是要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扩大新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

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共产党在国内享有唯一的合法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最不坚定的共产党员有时会受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全党应当看到这种危险，并密切注意保护党的无产阶级路线。

我们全党必须进行经常而坚毅的斗争去反对这种小资产

阶级倾向。”^①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完全证实了这一论点，代表大会特别强调地指出，反对派的思想实质是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反映。在这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中说：

“……在新的资产阶级阶层（农村中的富农、城市中的耐普曼）的政治积极性提高的同时，我们党内也受到了小资产阶级情绪的侵蚀。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已经指出，去年年底出现的党内反对派是一种‘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党内的、主要是非无产阶级地区和支部的最不坚定的分子部分地受到了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这种动摇，无论就其同列宁主义敌对的思想内容来说，或者就其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可能造成的影响来说，都是对党极端危险的。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党，它不仅应当坚决回击党内这种动摇行为，而且应当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设法预防这种动摇将来再度发生。”^②

其次，关于党同托洛茨基的意见分歧的问题，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已作过结论，这次大会是在季诺维也夫同志主持和直接参加下进行的。关于1923年的反对派的问题，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

“……代表大会确认，俄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得到其他共产党内（波兰党、法国党、德国党，等等）某些集团和个人的支持，这些集团和个人同俄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派一样，都是这些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都受到了共产国际第

① 参看《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2分册第367—368页。——编者注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2分册第416页。——编者注

五次代表大会的严厉谴责。

代表大会听取了关于苏联和俄国共产党的情况的专题报告，并在各支部研究了有关本问题的材料之后，作出决定如下：

(1)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名义，批准俄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和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两项决议认为反对派的纲领是带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纲领，反对派的行动是危害党的统一，因而也危害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行动；

(2)把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和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纳入本决议，并作为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予以公布。”

现在季诺维也夫同志同托洛茨基同志走到一起去了。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下进行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对所谓“工人反对派”曾作出了如下决定：

“……‘工人反对派’以及同他们类似的分子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是小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的动摇的表现，是削弱共产党的坚定的领导路线，在实际上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

……俄共代表大会坚决反对上述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思想表现，并认为：

- (1)必须同这种思想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 (2)宣传这种思想是同俄国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①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同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分歧只是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2分册第69页。——编者注

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时才形成的。你们大家都非常了解这些分歧是在哪些方面进行的，了解每一个争论的问题在代表大会上争论时的详情，也了解新反对派的观点受到了这次代表大会的谴责。代表大会对他们的错误作了如下的表述：

“……但同时，代表大会同样坚决地斥责下述的企图（也同样斥责了低估富农危险性的第一种倾向。——阿·李·）：抹杀共产党在农村中的政策的基本问题，即抹杀争取中农这一农业的中心人物的问题和作为推动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基本组织形式的合作社问题。

……在目前情况下，第二种倾向包含着这样的危险：恢复剥夺富农的政策，破坏目前党在农村中的路线，即破坏已经保证获得了重大政治成就的路线，破坏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结合，从而破坏我们的全部建设工作。”^①

我援引这些引文，是为了使我们记起党及其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同偏离党的、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策的行为进行斗争的基本的原则因素。党的这些决议从来也没有撤销，即使在今天也还保持着它的全部效力。党同现在的反对派的原则性分歧已基本上表现出来，并由党的这些决议作了说明。但是，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这些分歧本身并不会导致党的组织上的结论。

对季诺维也夫、拉舍维奇等同志采取组织措施，直接原因并不是这些原则性的分歧。

对某些在个别政治问题上同党有分歧的同志采取这样的组织措施是有害的、不必要的和极其危险的。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3分册第81页。——编者注

党内民主和党的统一

人们在政治观点上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是很自然的，这是合乎规律的。如果为此而受到迫害，那党内民主就是一句空话。只有在意见分歧的基础上形成了小集团和派别、破坏了党章、造成了分裂的威胁时，才必须采取组织处理的措施。

我再说一遍，党同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分歧要比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分歧大得多。除此之外，他比其他人更早地提出了为党所拒绝的纲领。党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在一起的时间要比同托洛茨基同志在一起的时间长得多。但是，托洛茨基同志没有采取那种分裂的步骤，尽管党同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分歧更大一些，所以对他没有采取最近全会对季诺维也夫同志所采取的那种措施。

我觉得，从党的利益的观点出发，这样提出问题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只有工人阶级专政的巩固性受到威胁时才是最大的危险，这当然也就是党的分裂。我向你们列举施略普尼柯夫事件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列宁同志对待事情为什么会显得那样大惊小怪，为什么态度要那样坚决，尽管这个事件同拉舍维奇、别连基等人的事件相比是那样的微不足道。

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同拉舍维奇、别连基、米哈伊洛夫等人划清界限，这一点连同所有这些同志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会面前所表现的行为，使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感到异常吃惊。这些同志背着党进行自己的秘密活动，把同他们一起搞分裂活动的人隐藏起来，在党的最高机关面前象是党的局外人，象是别的党的党员。这些同志的行为向整个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证明，某些同志在他们的分裂活动方

面，在他们企图组织党内的派别方面，已经走得相当远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把自己的党的活动的某些东西向党隐瞒起来，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现在秘密活动已经达到了如此地步：有些党员甚至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隐瞒自己的党的行为。为了说明那些现在正领导反对派的同志不久前是如何对待党内类似生活现象的，我要宣读几段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1924年1月1日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代表会议说：

“……有时有人说，党的所有灾难都来自第十次代表大会。怎么能是这样呢？要知道，正是第十次代表大会承认了党内辩论和讨论的自由。但也正是第十次代表大会接受了列宁同志关于禁止派别和小集团活动的建议。恰恰这一点是某些人不喜欢的。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政策是列宁同志的政策。所以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里的问题是对布尔什维克政策原理的攻击，是对列宁主义原理的攻击，是对第十次代表大会作的基本总结的攻击。因此必须最严格地区别在情况允许范围内辩论和讨论的自由，派别和小集团的自由。

这完全是情况不同的两回事。

无产阶级专政就在于它是一个完整的磐石般的整体。分裂了的专政——这是干涸了的水，这已经不是专政，而是专政的灭亡。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坚决主张把讨论的自由同小集团和派别的自由区别开来的原因。”

这段引文中提到的决议是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手写下了这个决议，并建议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批准通过；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这个决议被证明是正确的。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之间的时期内，根据第

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这个决议被看作是党的秘密文件，只是按照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它才被公开发表。决议中具体是这样写的。

“……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高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在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当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在这种党内最高领导者的全体会议上，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那么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实行。”^①

我再引一段季诺维也夫同志1924年12月11日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他在会上对派别集团还表示了更加强烈的反对。

“……因此，我们请你们，莫斯科的组织，给我们一个准确和明了的回答。如果你们以为派别集团合法化的时间已经到来，那就直截了当说出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个时间没有到来，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它根本就不会到来。（热烈的掌声）它不可能到来是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出版自由和非无产阶级阶层的一般政治权利问题等等。谁若不懂这一点，谁就是根本不了解整个情况。这还关系到我们对农民的整个态度问题。我们不能允许党的分裂，如果我们允许这种分裂，那我们就是允许国家的分裂。党内稍有不稳都会很快反映到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2分册第65—66页。——编者注

整个国家机关中来。难道现在你们没有看到实际情况吗？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哪一个人人民委员部内人们不在到处叫嚷说，在我们党内发生了某种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如何结束，还很难说。无论是专家，还是其他一些工作人员，都在谈论这件事。党内的分裂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整个国家机关的迅速分裂。所以说小集团问题是决定党生死存亡的问题……”

这就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924年底和1925年初所说过的话。他在另一地方又说：

“……对派别活动，应当趁它在萌芽状态就立即予以打击，因为有时稍一迟疑，就会象我们在某些其他国家看到的那样，它就会发展起来。那时结果只能是分裂……”

我引用最后这一段话是为了说明，我们对季诺维也夫已经打击得有些晚了，（笑声）所有的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也意识到这一点。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全会上，很多人发言都指责中央委员会太软弱，对反对派的斗争太不坚决有力。一些人建议对拉舍维奇、别连基和所有其他人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我认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处理得完全正确，它为了保证心平气和地消除分歧，尽了一切可能，让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中央委员会也很正确，让反对派的代表人进入了政治局。

之所以必须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使反对派能在具体工作中同党协调一致，使反对派有可能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里合法地捍卫自己的观点。

代表大会已经过去六个半月了。在这段时间里，党、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为了能在共同工作的基础上保证党的统一、行动的统一和逐渐消除分歧，作了一切努力。然而，反对派不但没有从自己方面朝这个方向作出必要的努力，反而不断地

攻击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总是企图加剧分歧，扩大分歧，在没有分歧的地方寻找分歧，制造了一种难于有系统地、有计划地领导党和国家工作的局面。党似乎处在防守的地位。为了统一，为了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党应该从防守转为进攻的时候已经到了。拉舍维奇、别连基等其他同志的分裂活动突出地表明，现在党的统一受到威胁超过了从前任何时候。这一点尤其危险的是因为我们已失去了列宁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党经受了很多危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在工会争论时期，还有同工人反对派有关的问题等等。列宁同志依靠党的大多数，给予反对派以有力的打击，致使反对派很快就失去了任何政治意义。

列宁同志去世以后，党内生活最主要的问题是通过团结党的干部，提高每一个党员的责任心和对党的纪律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全体一百万党员来代替列宁同志的特殊作用——保证党的完整性、坚韧性、最坚决地为捍卫党的统一而斗争；要把党培养成象列宁同志那样，能够坚决有力地回击来自任何方面的分裂党的企图。正如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第十三次和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及最近一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所证明的那样，现在党的骨干已经团结起来，能使任何一名在自己的活动上威胁着党的统一的党员遵守党规。

党通过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所采取的那些组织处理措施对于那些在自己的工作中破坏党的统一的人是一个最严重的警告，不管这些人在党内有多高的地位。我们的党——联共（布）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是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包围和国内各派阶级力量的斗争——实现这个专政的党。要知道，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仍然是个少数。联共党只有在党的队伍的牢不可破的、钢铁般的团结统一的条件下，才能够完成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如

如果说在举行罢工时，任何破坏工人即无产阶级纪律的人都是工贼，那么，每一个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党的纪律的人就要比工贼还坏。如果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期，党内没有力量、没有勇气、没有决心及时地刹住每一个领袖人物的分裂步伐，不管他是季诺维也夫，还是李可夫，或者是托洛茨基等等，那么，这将意味着联共（布）党还没有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

一些同志会这样提出问题：假如党的多数人和反对派的领袖们通过相互让步和妥协而达成协议，这对于党不是更好些吗？

这样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它的出发点在于把党理解成各种思潮、派别、集团的联盟，各派的领袖可以达成政治上的妥协和协议。它把党和派别看做是两个权利平等的缔约双方，把党的中央委员会当成一个联合机构，如同一个由各种不同的，具有独立政纲的派别和集团的代表所组成的党派联合内阁。这种观点的前提就是否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本身，也就是说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或实际存在的。党内多数人的决定是决定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意志的唯一正确的、唯一无产阶级的和唯一民主的方法。任何其他的观点，保卫派别和小集团的自由，都是知识分子自由派对待党的观点，都是否定列宁党的建党基本原则，否定整个历史，否定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组织传统。

我们的党不仅是执政的党，而且是在一个大国里唯一合法的党。通过党的个别党员和通过在党内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不能不反映出党外进行的斗争，不能不反映出部分非无产阶级的人的阶级利益，党内的派别自由斗争实质上就是变相的国内政党斗争。党内的派别斗争无非是在国内朝着组织各种党派和走向资产阶级议会主义迈出的第一步。归根到底，党内各种不同的意见代表着各种不同的利益，力图形成拥有自己的纪律、在党的中央机关拥有自己的代表的派别，从而把党的中央机关变成一种联合机构。

因此，用“派别和小集团的自由”的口号来庇护新反对派的做法是一种要把所有反对派分子都统一在新反对派周围的诱饵。

拉舍维奇等人的事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伙同志在组织派别方面采取了最坚决的步骤。

现在有人在大肆宣扬说党内的多数人也组织了派别，说多数人的派别对于党的统一是最危险的和最有害的。部分党员和整个党之间在政治观点和政纲上的差别，成了为维护派别和小集团的自由进行政治辩护的根据。其实党的多数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不同于全党的政治观点和政纲，因为这个多数人决定着党的政纲和政治活动。因此，关于我们党的多数派组织了最危险的和最有害的专门派别的全部论据是毫无政治意义的。这当然不排除全党路线的拥护者在个别一些问题上一起商量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党内斗争时期。这种情况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的时候就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例如，在同托洛茨基关于工会运动的争论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但发表了由十一名党员签署的政纲，而且不止一次地召集拥护自己观点的人们开会，以便同反对派进行斗争。

关于拉舍维奇等人事件的决议在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中央委员会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这个事件走得太远了，必须使全体党员象一个人一样，一致起来保卫党的统一。在党的统一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必须把所有的党员群众都动员起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批评了一些很有声望的党员违反党章和党纪的行为。全体党员群众应当以这种压倒多数的力量支持联席全会，使任何人再也别想破坏党的统一。（掌声）

同志们，我预料会有很多字条来问我，撤销季诺维也夫同志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对于共产国际会有什么影响。共产国际的主席是由共产国际的国际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因此，联共（布）党政治局对共产国际的主席既不能委任也不能撤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外国共产党的许多著名党员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会议。他们当中有：雷梅尔、艾尔科里^①、什麦拉里、墨菲、诺伊曼等同志。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全会上的发言中代表本国党声明，完全支持我们党内的多数人，并认为在苏联国内外帮助我们的党同反对派进行斗争是他们革命良心的义务。（掌声）

在讲完党内状况问题之前，我要答复一个问题，有人在递给我的一张字条上这样问道：“你们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这符合民主吗？在群众会上讨论过吗？”首先，政治局不是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党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只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从自己委员中选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民主不仅表现在党员可以自由地选举党的机关，而且表现在可以自由地改选和撤换这些机关的成员。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以压倒的多数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有人说：“这不民主。”难道让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政治局里反对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代表全党意志的中央委员会的意志和希望就是民主吗？（笑声）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设起来的，而不是按照“天生的”领袖们的理论建设起来的。

关于苏维埃的改选

我现在谈谈另一个重大问题，即苏维埃的改选问题，这个问题在全会上非常详细地讨论过。最近一次苏维埃改选，是在各阶层人民积极性提高、党在农村改用新工作方法的情况下进行的，

① 即陶里亚蒂。——编者注

这次改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对于我们领导这场极其艰难和重要的政治运动的党，是一次考验。在这场考验中，全会完全检查出党所采取的路线的正确性，看看这条路线是否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是否能加强贫农和中农的结合等等，等等。

讨论得最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苏维埃改选是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影响和使苏维埃制度滑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还是相反，它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不想列举改选结果的数字，因为这些数字在报刊上已经发表了，每个人都能很容易地了解到。整个看来，在这次改选中工人阶级的积极性要比其他阶层居民的积极性高：工人参加选举的人数在其本身所占的百分比要比其他阶层的居民高。但是，如果把各社会集团各不同阶层的积极性增长的速度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某些阶层居民的积极性增长的速度比工人阶级还快。这一点应该说是肯定的。

多年以来，苏维埃改选是第一次在广泛和公开的选举运动的条件下，在完全的国内和平和全国居民的积极性提高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农村，根据各方面的反映和材料，中农群众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农村的贫农至今在其组织性和积极性方面都落后于其他阶层的农民群众。但是，如果把农村贫农在最近的改选中所表现出的组织性和积极性同前几年的情况比较一下，那就必须肯定，他们的主动性第一次在农民中间赢得了重要地位。必须使党在今后继续比现在更加坚决和有力地在农村的贫农中进行工作。

在对党领导改选运动的工作进行总结的时候，必须指出，在很多地区，党的组织犯了一些根本性的错误；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支部无所作为，既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也没有发表自己的政纲。一句话，酷似当年工人运动中的“尾巴主义者”。在改选方面有些指令破坏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企图破坏宪法的

情况，这些指示扩大了非无产阶级阶层的居民的选举权。根据党中央书记处的倡议，重新修改了这些指令。

不能否认，对苏维埃改选运动中出现的失策和消极现象，现在估计得重一些总比估计不足要好一些，这样以后纠正起来就会更容易一些。但是，如果从这些个别消极现象中得出结论说这次选举运动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削弱了党的作用、意义和影响，那就是十分错误的。必须看到在这次改选中所得到的最主要的东西，即从在居民中的工作方法、在农村扩大党的影响的方法、工人阶级和农民相互关系的形式上看，工人阶级的专政提交到了一个崭新的、过去从未达到过的阶段，要知道农村里不久前还盛行着委派制，行政专断和命令。

一位似乎是来自北高加索的报告人说得对，他说，从前在许多乡，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而这些人常常在农民中并没有足够的威信。现在我们有一些苏维埃政权的基层机关受到居民的充分信任，它们的成员是些农民，即常常都是些非党群众，但是其中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全都是完全真诚拥护苏维埃制度和同情党的人。

尽管在最近的改选中有许多失策和过错，但在争取使农民基本群众——中农——脱离农村富农阶层的工作上，我们还是第一次取得了重大的成绩。由于有了农民积极分子和贫农组织，党就有可能在公开的政治运动中借助于新的方式、政治竞赛的方式同富农阶层进行斗争。在此之前，同富农阶级进行斗争多半是靠强迫命令、行政手段和直接没收富农财产的办法。党现在进行的这类运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联席全会做得完全正确，它一方面强调了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和过失，另一方面也指出，整个改选的结果证明我们党在领导国家的政治生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次改选使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巩固、

工农联盟得到了加强。

在工人和党员的会议上，我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苏联劳动群众日益提高的积极性是我国经济高涨和实际实现社会主义的最重大的政治因素。最近的选举运动又一次地证明了各阶层人民积极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积极性的提高略慢于其他阶层。当然，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即过去除了工人以外，其他阶层的积极性都是微不足道的。无论对农民还是对城市妇女这样的阶层都可以这样说。从积极性的百分比很低这一点上说（例如，参加以前几次选举的人数只占百分之十到二十），他们很容易就能够把自己的积极性提高一倍。工人阶级除了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来参加经济机关和工会机关工作以外，在不影响它在苏维埃中的优势的情况下，为了提高自己的积极性，还应当不遗余力地参加选举运动。然而，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提高受到阻碍的情况应当引起党对活跃工人民主的问题以高度的注意。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不能落后于其他阶层的主动性的发展，而应超过其他阶层的主动性的发展，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阶级才能将自己对其他阶层的领导坚持到底。

在培养这种主动精神和活跃工人民主方面，我们在日常实际工作中是否一切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呢？

我认为没有。至今还有这样的情况，某些行政机关或党的机关的同志对待人们对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常常是公正的批评抱着不友好的和敌对的态度。我不认为我们这里的情况全部是这样。但是如果一千件事情里面出现一件这样的情况那也是完全不正常的。压制批评和害怕批评的人，根本不懂党的政策，对于这些人来说，党内民主和发扬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动性，完全是一句空话。这些人不懂得我们所面临的任务的全部复杂性和艰巨性，不懂得如果没有居民本身积极地参加，这些任

务是不可能实现的。

除了这两个最主要的问题（拉舍维奇事件和苏维埃改选）以外，中央全会还讨论了三个问题：住宅问题，粮食收购运动和英国罢工。我觉得，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没有拿出应有的精力和时间来讨论住宅建设和粮食收购运动。这是由于党内的斗争即反对派同多数人的斗争干扰了我们积极的创造性工作。在关于苏维埃改选问题、英国罢工和拉舍维奇事件的问题上开过多次会，在所有的反对派和整个全会的热烈参加下进行了极为紧张的辩论。住宅建设问题和粮食收购问题讨论得不够明确，并且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假如所有的党的组织都卷入同反对派的分歧的广泛辩论，那我们的正常工作、我们这个大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是可想而知的。如果党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领导国家和经济建设的复杂工作，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未必能取得根据国家生活的客观条件所能取得的成就。

粮食收购运动和住宅问题

粮食收购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今年又一次获得了丰收。我国经济的恢复过程，工业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地利用今年的丰收，能否利用得比去年更好些，我们能否按照切实可行的价格收购足够数量的粮食，并把这些粮食提供给国家，建立国家的粮食储备和向国外输出多余的粮食。在下一年中，我们在发展我国整个经济和实行国家工业化能够迈出多大的步伐也将取决于这一点。应当说，要胜利地解决这些任务一定会遇到一系列的严重困难。根据还不十分准确的预计材料，今年的收获量将比去年提高百分之十。商品粮食的

数量即农民能够出售的粮食，大约为十亿普特。

在丰收的基础上，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必将得到发展。今年城市、工厂、工人阶级对同农村的这种商品的交换在思想上要比去年更有所准备，或者说这场丰收将意味着农业即农民经济的作用将比工业的作用更加提高。经济机关向我提供的和捷尔任斯基和克维林同志在中央全会上引用的材料说，我们的工业在新的丰收兑现的情况下将能够向农民提供比去年更多的商品。在本经济年度的后半年，工业比去年多提供二亿五千万至三亿卢布的日用消费品。工业的这种增长能否充分地满足农民的需要，特别是在这样的丰收年？我觉得未必能满足，并且在来年也未必能克服得了商品荒现象。但是在农民的需要提高的年度里，假如我们能在不从国外进口成品的情况下使商品荒的现象稍有缓和，那也将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去年我们竭力通过从国外进口成品来缓和商品荒，在去年秋季的三个月里进口和出售了价值约七千五百万卢布的外国商品——布匹，皮鞋等等。今年我们是依靠在扩大我国工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来实现丰收和城乡的商品流转。

粮食的价格是粮食收购运动中最主要的问题。至今农民的收入还是按每一普特粮食的价格来计算的。这种计算方法未必是正确的。在国外，农民经济的收入额是按单位面积的收入来计算的。

如果农户从同样的面积上能收获更多的粮食，那么在价格降低的情况下，农户的总收入不但不会降低，而且还会增加。去年的粮食价格很高，结果只好决定降低切尔文的购买力，同时也造成了其他商品价格的提高，使粮食的出口得不偿失。今年经过丰收一定要定出合适的粮食价格，这种价格既要使农民不吃亏，又要保证余粮出口有利可图。这对苏联的整个经济，尤其对它的货币制度将会产生良好的影响。我觉得今年小麦的平均价格应定在一卢布左右，有时也可略高一些，以便能使四种主要粮食（黑麦、

小麦、燕麦、大麦) 的平均价格维持在八十五至九十戈比左右。在实行这种粮食价格政策的同时，应当相应地提高我国切尔文的购买力和降低工业品的零售价格。劳动国防委员会、商业人民委员部和各地方机关已在这一方面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在最近一个半月至二个月的时间里，降低工业品零售价格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工业品的零售价格开始渐渐下降。

至于住宅问题，首先我应当说明，中央全会取消了对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的讨论，这就是关于按照工资附加额来建立住宅基金的可能性问题。中央全会委托政治局吸收工会和经济机关的代表参与解决这个问题，根据得到的准确材料并考虑各种意见加以解决。

现在发展工业、国家工业化和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都遇到了住宅建设问题。住宅问题就其尖锐程度来说现在未必次于工资问题，而在不久的将来它可能要变得更加尖锐。在某些地区、住宅问题现在已经比工资问题更加尖锐了。因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认为对工人住宅建设作出专门的决议是必要的。

这项决议的最重要之点是建立专门的基金，这样就可以保证更全面和更有计划地解决工人的住房困难。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的经济部门中，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到了这种地步：我们不但没有把固定资本耗费掉，而且还使它有了增加。现在只有国家的住宅基金还在继续减少。要保证城市居民和城市工厂住宅区居民得到最低限度的住房面积，需要拨出的款额是很大的，可能超过十亿卢布。最近两年来我们在住宅建设上共花费了大约三亿五千万卢布，可是这并没有能制止住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住宅面积的减少。建立专门的数量充足的住宅建设基金是解决住房困难的重大步骤。同住宅问题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房租额的问题。至今房租也

抵销不了房屋的折旧；房租太低，以致无法进行必要的修缮，结果住宅越来越破旧，住宅面积日益减少。因此，实行一种提高房租的政策来把住宅保持在原有水平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的工资水平还不允许这样做。不久前，我们小心谨慎地在房租方面初步作了一点小小的必要的调整。今后，随着工人实际工资的提高，还必须对房租适当地加以提高，使房租能最终达到房屋折旧要求的水平。

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党的统一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用了很多时间讨论英国罢工。共产国际执委会有关英国罢工的决议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开幕前很久就已发表了。这一决议预先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曾经进行过非常详尽和仔细的讨论。在这次全会上本来只打算听取情况报告，但是这个报告把政治局和政治局委员会中长时间进行过的辩论又重新挑起来了。

我不想提及与英国罢工和英俄委员会问题有关的所有意见分歧，何况不是所有反对派成员都同意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据我所知，拉柯夫斯基和拉狄克同志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是赞成党的观点的。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发言的所有外国党的代表都表示拥护联共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

同志们！由于已经形成的党内状况，各种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在党的中央机关，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开始占用很多时间。最近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开了一个半星期。在政治局我们经常对议事日程上的所有问题都无法讨论。这是因为常常一个小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就会引起一连串的分歧，最后发展成普遍性的辩论。

这样就减慢了党的中央机关的工作速度，我觉得，假如在现有的意见分歧的基础上再一次掀起社会性的大辩论，那对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这样就会大大减缓全党和整个苏维埃机关的工作速度，且不说这种辩论未必会只停留在党的范围之内。很可能辩论会超出党的范围。

同志们！我们已经消除了今年前半个经济年度曾经笼罩着全国的那种经济危机的危险性，我认为这一事实是当前国内形势中最基本的一点。成功地稳住了切尔文的币值，基本上实现了发展工业的预定计划。但是必须坚决地指出，今后还要克服很多巨大的困难。我国经济的恢复，国家工业化资金的积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状况的改善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地得到实现，这就是：要保持党的统一，全体党员要象一个人一样，一心一意地去贯彻执行党在政治方面和经济组织方面的指示。

必须集中全党的力量来发展国家的工业化事业，扩大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保证加强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积极性，吸收工人阶级参加国家机关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成功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为此就必须有党的统一。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这个重要时刻，即在我们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必须拿出党的全部力量，不惜一切地保卫党的完全统一，绝不允许分裂，不允许辩论，要使全体党员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到解决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全世界革命的工人运动都是极为重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中来。（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译自《真理报》1926年8月1日。

在全苏工会第七次代表 大会上的讲话

(1926年12月6日)

同志们，苏联工会历届代表大会不仅在我国生活中，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最重大的事件。这些代表大会能有这样的作用，是由于我国迄今是世界上工人阶级牢固掌握政权的唯一国家。

本届代表大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是由下列特殊条件决定的：一方面是目前苏联的经济和政治日益发展，另一方面是世界工人运动不断扩大。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关键和当前形势的特点是，正当我国工人阶级在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的时候，所有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却正在遭受世界资产阶级的残酷进攻。前面一位发言人已经指出，资产阶级进行打击的手段，不仅是用资本主义合理化来减少工人工资、延长工作日和恶化劳动条件，而且采取各种措施来限制“工会运动合法化”。英国的矿工罢工是反对资本的各种进攻的最有力表现。这次罢工揭露了资产阶级向工人运动发动普遍进攻的计划。英国矿工罢工的经验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暴露了工人运动中使资本家增加力量的那些弱点，英国矿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改良主义首领的背叛和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松散。在这种形势下，苏维埃工会和苏联整个工人阶级的作用具有特殊的意義。苏联工人阶级应当树立（正如它支援英国矿工所表现的那样）并且正在树立革命团结和支援的真正榜样（它支援英国矿工就是这种表现），革命工人组织也应当对工人运动其他战

斗队提供支援。同时，苏联工会在争取工人运动达到国际团结的事业中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它反击资本主义的进攻，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正在举行进攻的、力图把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部重担转嫁到工人阶级肩上的资产阶级。

目前，全世界的改良主义背叛行为同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之间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苏联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开展的工作为中心而进行的。我们已经在认真解决成为苏联当前发展时期主要内容的国家工业化这个最复杂的任务。苏联工人阶级在奠定国内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其他各国国际工人运动的命运。国际资产阶级和西欧与美洲的改良主义者惯于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每一个失败说成是十月革命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失败。但是，相反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每一项成就不仅是苏联工人阶级的成就，而且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成就。

因此，认为我们党，我国的工会和整个工人阶级是在闭关自守的民族范围内进行活动，这是极端错误的。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人阶级组织方面的每一项成就和每一次挫折，都会在全世界引起反响。

苏联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九年期间向全体无产阶级树立了为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生存权利而英勇斗争的光辉榜样，树立了迅速治愈被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创伤的光辉榜样。这些经验成了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财产。但还很不够。现在，我们应该通过实践切实推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步经验，因为这些经验暂时还是已经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创造性工作的唯一典范和准则。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已经能够组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保持政权并取得管理国家和组织经济的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通过工人阶级同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联盟加强

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困难不见得比我们以前所经历的困难少。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设在生产组织领域能实现人类智慧全部成就的新经济。仅仅在我们从过去接过来的和现在已经充分利用的那些工厂和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已经不能再向前发展了。我们需要新的工厂，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尽快获得更高的技术。这对当前来说是我们建设的基础的基础。

前几年的成就创造了积累资金的前提，使我们能够着手新的建设任务。今年，我们投入工业和电气化基本建设的资金达十多亿卢布，并着手建设第聂伯电站和谢米列奇耶铁路等大工程。这条铁路长达一千多俄里，把我国产棉区中亚细亚同产粮区西伯利亚联贯起来。

要顺利解决这种任务，不仅要求千百亿卢布的巨额投资，而且要求苏维埃经济迅速掌握由于我国落后迄今尚未采用的那些技术成就和工作方法，否则，巨额投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着手实现的任务实际上比我们迄今已经实现的任务要宏伟得多，因为我国工业化的纲领实际上是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实现这个纲领将意味着实现十月革命的全部纲领。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在当前发展阶段上首先是在更高的技术水平上改造和组织我国的经济。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次代表大会上曾把电气化计划称为党的和苏维埃建设的第二个纲领。这个纲领实际上只有现在，即当我们能对提高和改进我国经济的技术基础的事业投入巨额资金时，才开始实现。

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上，工人阶级现在碰到什么障碍呢？

第一，我国技术落后，使我们依赖西欧。我们自己不会制造机器。我们不会设计机器。有时甚至在国外定购机器也不在行。

这是主要障碍之一。第二个障碍是我们的文化落后。不能把工业化理解为只是从国外运进机器安装在我国工厂里的极简单的过程。我国用这种零碎地输入工业化的办法是不会成功的。认为这样机械地引进机器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任务，那是错误的。输入外国机器只能帮助我们部分地解决当前的任务，但无论如何不能解决建立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我国自己的技术这一问题。工业化本身不仅意味着改变各个工厂的技术，而且要改造和重建整个经济。实现工业化将意味着改变阶级对比关系，增大我国工人阶级的比重。

工业化意味着工人阶级用另一种方法对待农民、小手工业者等中间阶级。只有在全国的一般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和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逐日提高的情况下，工业化才能实现。

你们从国内战争史知道，国内战争是通过在工厂中组织军队骨干的方法进行的。你们知道，在最艰苦的 1919 年和 1920 年是如何同饥饿进行斗争的——这一斗争是依靠组织工人征粮队进行的。我们现在着手实现的这些任务，比我们在过去阶段所解决的任务更加困难得多和复杂得多。我们正在着手实现要改变我国整个面貌的各项任务，这些任务应当达到，而且定会达到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

如果，一些比较个别的任务，例如征粮斗争，只是由于工人阶级发挥了最大的积极性并满腔热情地进行了斗争才能解决，那么，国家工业化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则只有当工人阶级在我国发展的这个新阶段上更积极地参加我国的建设才能顺利解决。

苏联工会这个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的中心任务是除了保护工人阶级的日常利益（工资、劳动保护、社会保险）以外，还要保证工人阶级最广大阶层都积极自觉地过问我国建设的一切问题。

苏联工会的使命在于把工人阶级团结在新阶段的宏伟任务的周围。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改进和生产合理化都是不顾工人阶级的意愿，违反它的利益，那么，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问题则只有在工人阶级最积极最直接的参与下才能解决，而目前的一切具体问题，如精简管理体制、节约制度、生产合理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工业品成本、降低工业品价格等问题，也只有在工人阶级最广大群众最积极的参与下才能解决。同时必须牢记，这些问题不仅是我们经济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党和国家全部政策的基本问题。

在工人集会和生产会议上对我国的建设问题，如工厂、住宅等的建设问题讨论得越积极，我们在实际解决这些任务时就会越少犯错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不仅是通过上层组织管理经济和国家，而且整个建设和管理都是在工人阶级最广大群众的直接参加下进行的。

同志们，代表大会工作日程上的各种问题现在涉及到工会组织、国际工人运动和国家管理等等活动的各个方面。我们全部活动的各项内容都是当代重大问题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组成部分。

如果仅仅从一个角落孤立地观察我国的经济工作，有时觉得在这个“角落”所集中的只是一些狭窄的“经济”任务，而实际上这一切问题都是工人阶级目前正在为其实现而奋斗的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组成部分。你们知道，不论是在我们党内，还是在国外的许多组织里，都有一些人怀疑我们能否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这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信任是同我们道路上经常遇到的那些困难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得不在一个文化落后、工人阶级未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实现世界上前未有过的任务。这些困难使某些人（诚然，为数不多）对胜利完成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

发生动摇、摇摆和怀疑。不久以前关于这个问题所进行的争论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工会怀疑过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胜利并在九年期间取得最大成就的工人阶级，不能够或不可能继续前进，不可能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尽管条件异常困难。越是直接接近群众，越是接近直接参加过国内战争现在在工厂劳动的居民阶层，就越坚信自己的力量，越少摇摆和动摇。

这次代表大会正是在进行所谓恢复时期的总结和认清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各种困难而产生的动摇后果的时候召开的。最后，我深信这次代表大会将代表世界上最革命国家的最革命阶级用坚毅果敢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公开宣告：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而且一定会建成。（暴风雨般的掌声，转为热烈欢呼）

译自《真理报》1926年12月7日。

在全苏工程技术人员第三次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27年4月6日)

同志们，我谨代表政府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这次代表大会表示祝贺。

十月革命这一整个世界史上十分罕见的事件，快要满十周年了。十年来的经验和实践证明，十月革命是符合历史要求的，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国家制度是非常巩固的。

在过去的年代里，这个制度在确保国家进行整体建设方面经受了十分严峻的考验。你们的大会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召开的：国家经历了一段从几乎全盘瓦解恢复到战前经济水平的漫长道路，并在着手实现一些十分重大的经济任务，这些任务标志着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一场全面的革命。大家都知道，政府通过了一些诸如建设第聂伯水电站、谢米列奇耶铁路、大型冶金以及机器制造厂等等的决议。在农业上使用拖拉机，在中央黑土地带和干旱地区进行农业改造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年。国家电气化是政府所实施的计划中的一个最主要部分。整个计划的任务是要改造国家的经济，使它走上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轨道。

这次大会是加入工会的技术人员的一次大会，它是苏维埃制度巩固的明证之一。工会组织完全是作为工人阶级的斗争工具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从未有过技术人员以平等成员的身份参加体力劳动者的工会组织的事例。相反，在革命

前的俄国，通常技术员、农艺师以及工程师是同体力劳动者相对立的，这种情况现在除了我国以外，世界各国还是照旧如此。十月革命提出的最重要、最复杂的任务之一是在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中实现劳动和科学相结合，因为只有在这种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工人阶级、共产党和我们的政府所提出的那些伟大的任务。工人阶级的工会现在也团结了技术知识分子，在这次大会上就有从事工业、运输业、农业和林业工作的技术人员的权威性代表，这种情况充分表明十月革命的思想已如何深入我国社会生活。工会组织和工人阶级关系最密切，它成了一种团结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组织形式。

但是，我认为现在还不能夸大在这种结合方面取得的成就。党和政府都意识到，还没有做到应该和能够做到的一切，以便使工人和技术人员成为一家人。许多复杂情况，比如所谓“敌视非党专家倾向”，直到目前还可以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中看到。经常有人问：这是谁的过失？我看，问题首先在于客观条件。造成这类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落后和不文明。如果认为近几年内就能完全消除这种不文明状态，那将是最大的错误。另一方面，也不能讳言，技术知识分子的个别代表人物还没有彻底改变革命前某些技术知识分子对体力劳动者所持的态度。但是，毫无疑问，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关系不正常的事例是越来越少了。这样的事例是个别的。必须共同努力使它们完全消失。我要着重指出，工会就是向这类现象进行斗争的组织，而且应该十分坚定地、有成效地进行这种斗争。

我已经说过，国家面临着异常重要的任务。只有十月革命后在我国建立起来的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才能确保这些任务的完成。

现在，经过将近十年为新社会而斗争的实践以后，未必还需

要特意证明，如果没有工人阶级专政，就既不能保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又不能保证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有计划地执行国家工业化计划。哪怕只是短期地容许提出一项不是工人阶级的，而是任何另一个阶级的纲领作为国家政策的基础，人们就会看到，这样一来，实现社会主义思想将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为制止社会阶级分化、为国家工业化进行斗争也将完全成为空想，而这项斗争却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它促使我国的生产力迅速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并能提高全体居民的物质福利水平。

劳动与科学相结合一旦真正实现，就能沿着上述道路迅速而顺利地前进。每个人都应该明白，为了努力发展我国经济，现在十分需要在最短时期内保证在一切经济部门，在工业、交通、农业方面采用一些费用最小、收效最大的经营方法，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显然需要在我们的建设中运用世界科学思想的一切成就。

科技人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是无可争议的，在实施政府通过的计划时，科技问题的作用在增长，科技人员的作用也将随之有更大增长。

实施这一计划时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呢？最主要的障碍当然是我国技术和文化的落后。因此，应该特别注意提高国内的工程技术知识水平的任务。由于我国的技术水平低和技术知识不普及，政府不得不在许多场合下向西欧和美国的学者、技术人员寻求必要的帮助。例如，在第聂伯水电站建设方面，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国技术人员的第聂伯水电站工程设计工作曾经获得国外权威人士的高度好评。在许多工业部门订立技术顾问援助协定，直接吸收外国技术人员参加工作，这一切将来也要实行。但是，与此同时，应该更加努力，保证最大限度地发展我们苏联的技术员、工程师、农艺师和学者的技术、技术知识和好的经验。

我们打算进行大量工作来改造我们这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

的国家的经济。但是，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技术界对那些我们必须提出和解决（不管好坏吧）的技术、经济问题还不是很积极和主动的。我们在经济改造、基本建设、干旱地区的抗旱斗争、中央黑土地区的重建等方面所做的一切，当然都要有技术人员参加。所有这些意义重大的问题不仅牵涉到千百万居民的利益，决定着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且从科技观点看来这些问题也具有极大的意义，但是，技术员、工程师、农艺师并没有充分地讨论这些问题。我认为，讨论如何使我国电气化以及改善我们的能源经济这样一个问题，就能使成千上万的青年技术人员受益。这类讨论不仅吸引青年技术人员参加整体建设，而且也能揭露我们建设工作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存在的许多缺点。

我们不向任何人隐瞒过去一个时期内，比如说，在基本建设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但糟糕的是，正是基本建设，比如造纸工业方面，没有得到技术员、工程师、专家以及学者的广泛评论。如果专家、学者、工程师以及农艺师能够就政府目前实行的经济改造中各项专门技术问题进行争论，那是一件有利无弊的事情。广开言路、吸引各行各业的专家参加讨论，这和必须吸引最广泛的工人群众参加讨论这类问题一样，是完全必要的。

我听到过一些工程师表示不满，说是要他们在生产会议上向工人说明怎样、在什么地方改进工作，改进些什么，而农艺师则要下乡向农民解释应该怎样战胜干旱，改进土壤肥力等等。我认为，在苏维埃条件下，没有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和直接参与，就不能顺利解决经济问题，这种情况是十分明显的。革命前，建设某一个工厂，甚至一条铁路，可能被看成是个别人或一部分私有者的事情。在我们的情况下，这是一项全国性的、广泛的社会任务。

技术员、农艺师和工程师不能使自己和工人群众对立起来。

在当前情况下，工程师和技术员必须是和工人们平等的一员。某些人总爱将“同志关系”和“纪律”说成是两种相互排斥的概念。这是不对的。在我们党内，相互间的同志关系和铁的纪律两者最大限度地结合在一起，只要看到这样的范例，就能相信上述对立情况是站不住脚的。

许多同志向我指出，目前某些科技界人士似乎对两个方面有所不满。第一是物质状况，第二是技术人员权利的保证。我认为，这类埋怨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并不期望能在这里讨论这一问题，而只是着重指出以下情况：

首先是，从事生产工作的技术人员的物质状况近两三年来毕竟是大大改善了，无论如何要比从事文教卫生工作的科技人员的物质状况好得多。至于说到各类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物质保证，那就应该考虑到，熟练劳动（特别是受过教育的、能在实践中运用最复杂的科技成就的那种高度熟练的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报酬差别在目前情况下是完全难免的。不这样做，在现代条件下就难以进行建设。但是，也必须看到，各部分居民中间的物质状况差别过大，不仅包含着某种政治性危险，而且还关系到国内工程技术人员本身的利益，因为对于我们一切人来说，技术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如在这时扩大这些居民阶层的物质福利差别，这种结合就很难实现。我绝不是以此来说明，目前我们这里已经不存在物质保障很差的知识分子、技术员和工程师。没有疑问，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

至于有人抱怨经济、生产部门技术人员的权利没有妥善解决，我应该承认这类抱怨是非常正当的。在我看来，只需对这些申诉意见略作修正。不能在谈权利时不谈义务和责任。必须把权利和义务两者联系起来。这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在作了这种修正

以后，我同意承认，就这一问题进行的指责大部分是完全正当的。党和各高级苏维埃机关早在 1925 年末就对这一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定，但是直到目前这些决定大部分没有实现。这方面的过失必须尽快弥补。

同志们，我在一次会上收到一张字条，说现在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对党和苏维埃的关系仿佛比过去差了。我说，这是不对的。（掌声）其所以不对，是因为政府和党在吸收技术人员参加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作了许多（绝非无效的）努力。我们国家在各个经济部门都提出了重大的、从科学技术方面看来令人鼓舞的任务，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科技界人士不参加积极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者的行列（他们的参加是诚心诚意的），是难以想象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就着重指出了我国和任何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差别，即十月革命消除了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法律这一切障碍，它们阻挠在经济中有计划地运用科学，并且使私有者为了取得私利将科学变为他们手中的工具。

这次会议召开的时刻不同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表上述讲话的时期，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多的办法，能在工厂、铁路和农业上运用科技成果。如果当每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应该燃起创造之火的时期，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在工作中表现不出巨大的劳动能力和毅力，在解决国家面临的整个技术任务和困难问题时表现不出积极性，不向工人阶级苏维埃和党努力靠拢，那就成了一桩很难以置信的事情。（掌声）

译自《真理报》1927年4月9日。

在苏联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27年4月19日)

同志们！现在如果不提过去整个一个时期在政府工作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一些基本的经济问题，就不可能对苏联的国内情况和对内政策作出哪怕是概略的介绍。当国内战争结束和我国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进行和平的经济建设的初期阶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0年底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过：

“这是最幸福的时代的开始，到那个时代政治将愈来愈少，人们谈论政治会比较少，而且不会那样长篇大论，讲话更多的将是工程师和农艺师。”接着又说：“我们无疑学会了政治，这方面我们不会受人迷惑，这方面我们有基础。而经济方面的情况却不太好。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更多地发动工程师和农艺师，向他们学习，检查他们的工作，不要把代表大会变成空谈的机关，而要变成检查实际成就的机关，变成我们能够真正学习经济建设的机关。”^①

在目前，当我们已经完成“恢复”时期的任务，并且许多经济部门已经超过所谓战前水平，从而已接近于解决彻底改造国民经济的更复杂和更艰巨的任务时，这一点就显得特别正确了。

加里宁同志关于农业的报告和古比雪夫同志关于工业的报告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97页。——编者注

已列入这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和前几次代表大会不同，这次是把两个报告的提纲事先发表出来，以便使大家对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些问题能够预先作好讨论的准备。

我所引用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彻底解决了现时代的一切特殊的政治问题。这些话只是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多地从经济建设方面去解决我国的政治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声明（如果撇开内政的困难不说），在目前比他说这些话的那个时期更加正确，因为工人阶级的政权更加巩固了，国内的整个苏维埃制度没有受到任何威胁，而经济建设则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在伟大十月革命后的这一时期内，十月革命成果的主要支柱工农联盟已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以及后来克服经济破坏的巨大工作中得到了巩固、发展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在十月依靠工农联盟取得了胜利，也正是依靠这个联盟，国内战争得以胜利结束；这个联盟也是同经济崩溃——这个由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严重后果进行胜利斗争的基础。现在，工农联盟的坚强有力，两个阶级的行动一致和由此而来的政治上的一致，一定能够保证我们沿着以世界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为基础来改造整个经济的道路胜利前进。在我国的情况下，即在运输、信用系统和几乎全部工业都集中在国家手中的情况下，在土地国有化和没有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的情况下，这种改造就是社会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是一个需要多年时间的长期过程。但是，在这条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提高我国的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都会改善人民群众的福利，特别是改善最贫苦阶层的福利。

一 工业化政策

这次代表大会应当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什么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呢？工业化的道路。只有它（工业化）才能千百倍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才能增加群众的福利，才有可能为这些群众的利益来利用我国的取之不尽的资源。关于工业化方针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只作了笼统的描绘，而在目前，这个方针不仅被制定得更具体更详尽，而且已经被付诸实行了，这是上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后两年来在政府政策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

因此，实际执行这个方针不能不成为政府工作的注意中心。我认为这次代表大会首先应当从这个观点来评价总结报告所涉及的时期的政府工作。

未必需要专门证明，特别是在举行了十月革命的我国未必需要专门证明：正是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这样一条原理。工业化不是十月革命“臆造”出来的，而是由历史提出来的。对历史所作的分析使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能够完全无可辩驳地证明：以大工厂工业和工业无产阶级为特征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由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条件下，工业化就好比是由松明过渡到电灯，由木犁过渡到拖拉机，由愚昧过渡到文明。但是在苏维埃国家，并不是不管这种发展的社会阶级形式反其道去发展一般的生产力，而是要建立新的经济组织，即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

由于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前进的结果，城乡之间归根到底将会形成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呢？其必然结果应当是，完全消除过去很多世纪以来历史遗留下来的城市和乡村状况的差别。早在许多年

以前恩格斯就已经指出过，电气应当成为而且必将成为消除城市和乡村在经济上和文化生活上的差别的工具。

其最终形式意味着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业化，将导致阶级的完全消灭，同时也将导致城乡生活方式差别的完全消灭。因此可以说，工业化方针是消除城乡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差别的方针。

为了说明我国经济在最近两年里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请允许我引用以下数字^①：

年 度	国民经济总产值 (以百万战前卢布单位计算)	工业产值 对总产值的百分比	农业产值 对总产值的百分比	生产资料 的生产对 工业生产的 百分比	在有独立收入的居 民总数中工业、商 业和运输业的在业 人口所占的百分比
1923—24年	12 272	27.8	72.2	51.7	9.3
1924—25年	14 619	34.8	65.2	52.6	9.7
1925—26年	18 306	38.2	61.8	54.4	11.0
1926—27年	20 166	41.0	59.0	56.1	11.5

这些数字指出，在国民经济生产增长的总背景下(1)工业品所占的比重；(2)生产资料的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3)工业人口的百分比都有了增长。

为了更充分地说明苏联国民经济结构本身发生的这些变化，我再引用一下关于工农业发展的速度和水平的材料(和1913年相比^②)：

① 根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资料。

② 应当附带说明：在1913年，关于生产规模还没有精确的和最后确定的材料，因此，要确定最后几年与1913年相比的某些产值水平，由于原始基数不同而可能会有差异。但这些计算的差异并不很大，所以不会使发展的总趋势有什么重大的变化。

对 1913 年产值的百分比

年 度	(按战前价格计算)		每年的增长速度	
	农 业	工 业	农 业	工 业
1923—24年	72.3	44.1	6.5	32.8
1924—25年	77.9	65.6	7.6	48.9
1925—26年	92.3	90.3	18.6	37.7
1926—27年	97.2	106.6	5.3	18.1①

当然，应该看到，在国内战争年代，工业产值的下降水平大大低于农业产值的下降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明最近几年工业增长达到如此快的速度的原因。最近几年工业超过了农业生产增长率，现在和农业相比它处于较高的水平（和 1913 年相比）。

我所宣读的这些材料是我国沿着工业化道路发展这一事实的数字表现。自然，也不能过高估计这一事实的意义，因为我们还处于应当使我国从农业工业国彻底变为工业农业国的长期发展的开始阶段。即使现在还有人把“农业工业国和工业农业国”的这种对比看作仿佛是旨在反对发展农业利益的政策的表现。这样解释我们的规划是不正确的。

出席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有占大陆六分之一居民的劳动人民的代表。其中有些人在这个大会上是代表边远的“不开化”地区的，这些地区几乎还完全没有接触到文化和文明。要知道这些最“不开化的”农民区还在用木犁耕地，不给马钉掌，在那里自然经济成分占着统治地位。这些地区怎么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摆脱这种落后状态呢？这些地区的农民迟早会设立打铁作坊给马钉掌，会设立某种作坊或求助于其他一些地区，以较完善的工具来代替木

① 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计算，1926—27年的工业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二十。

犁。农民会修建一些桥梁或者方便的交通道路，以便运出农产品。我们全国的经济也很落后。政府关于在罗斯托夫建立农业机器制造厂、在斯大林格勒建立拖拉机工厂以及修建联接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的谢米列奇耶铁路等等的决定，实质上就是要为全国建立这种打铁作坊或其它作坊。这些工程对于发展全国经济来说是必要的，就象不开化地区需要建立打铁作坊一样。

当然，也可以设想另一条道路，这是西欧和美国资产阶级力求达到的道路——即我国同资本主义包围势力之间进行“分工”的道路，按照这种“分工”，苏联仍应是一个农业国，要向国外输出粮食和原料并从国外购置工业品。任何人从殖民地国家的例子都知道，这条发展道路不仅在理论上是可以设想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是，这条发展道路会自发地导致殖民地同自己的宗主国的斗争，而且在许多地方已经引起起义。这一方面是把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置于外国资本奴役下的道路，另一方面是使我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永远落后的道路。这条道路意味着不仅完全放弃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放弃我国在经济方面的真正的、持久的进步。在我国那些虽然很有学识，但是表现了当时曾被称为民粹派的那种思想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人们当中，有时还可以看到对苏联经济发展前景持这种观点的人。无论如何，这条道路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工业的发展不够充分给苏联的整个经济打上了落后的烙印。必须斩钉截铁地承认这一点。我国每一俄亩农田的产量比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农业产量少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并且我们工厂的设备也不好，因而不能保证给我国提供必要数量的价廉物美的商品。——我们只有走工业化的道路才能使经济进一步高涨，而这种高涨应当并且也只有在工农业同时高涨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两者（工业和农业）是完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现

在，大家都已十分清楚地看到，农业发展的可能性和速度取决于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速度。如果说农业是给工业供应原料和给城市居民供应粮食的源泉，是出口的支柱，而通过出口又成为进口的支柱，是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和劳动力的后备所，那么，工业化的实现反过来又保证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的集约化，因为工业化实现以后就可以供应农民廉价的农业机器和其他工业品，就可以扩大对农产品的需求而使整个商品流转活跃起来。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城乡对劳动的需求，从而导致缓和并最终完全消除失业和农业人口过剩的现象。

我们已经真正走上了国家工业化这条道路，并且我们走这条道路已经是第二年了。应当承认，实行工业化的头几年对全国来说是十分困难的。

主要的困难是由下列情况产生的：从预先付出工业化所需要的费用到获得直接的良好成果，时间相距很长，因而在普遍短缺资金的情况下，就不能不使我国整个经济出现一定的紧张现象。例如，我们正着手进行第聂伯河工程，兴修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谢米列奇耶）铁路和伏尔加—顿河通航运河。我们对所有这些工程总共要支出几亿卢布（至少是三亿五千万至四亿卢布）。在即将执行的五年计划中，这些支出在获得直接成果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个“负数”，因为在上述建设工程完成（这已超出五年远景规划范围）之前，国家从这些工程方面实际上得不到任何收益。在所有这些企业竣工并投产以前，国家当然就得负起相当沉重的担子。今年，政府已决定兴建许多大型工程（大型冶金工厂和机器制造厂等）。

二 既定的工业化速度是否可行

我们既定的工业化速度即新建设的速度是否可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着重指出这样一种情况，即如果没有基本投资，国家就不可能继续生存下去。当然，目前工业品的涨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组织得不够好、杂项开支太大等等造成的。但是，物价昂贵的主要的和长远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工业设备破旧和落后。从帝国主义大战时起，一直到近两三年以前，工业设备的更新和检修根本就没有进行过，或者说没有大规模地进行过（且不说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的工业设备遭到的直接破坏）。

我们整个工业的技术状况极端落后。我们这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我们在国外订购了早已完全过时的机器，这些机器是陈旧、笨重和赔本的。所有这一切非常尖锐地提出了一个任务，这就是要尽快地弥补过去的疏忽，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搞好工业更新。这个任务不解决，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工业，不可能在同物价昂贵的斗争中取得多大成就。

在过去的时间里，住宅也被破坏得很厉害。至今我们也扭转不了城市居民住宅面积下降的趋势。现在住宅问题一年比一年尖锐。这个问题不仅决定着城市居民的福利和生活，而且也决定着工业的发展。现在住宅已处在“最低限”，可能成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障碍。

运输业，其中包括铁路，在这方面的情况也很不景气。铁路运输的发展非常迅猛，某些铁路线大大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为了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在基本建设上花大量开支。如果说现在给予运输业和住宅建设的基本投资还少于工业方面的投资，那么在今后我们就必须防止工业同住宅和运输业之间在基本建设

投资上出现巨大差距。否则，如果运输业和住宅建筑业得不到充分的发展，那就会对整个经济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在上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我仅仅是一般地谈到了当时刚刚出现的转折，即由我国经济的恢复时期到新建设的转折，谈到了与此有关的新的经济和政治任务。在第三次代表大会过后的时期里，新的建设事业开始广泛展开，基本建设的费用一年比一年增加。

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投资增加的一般情况可见下表：

苏联国民经济的基本投资^①

(单位：百万切尔文卢布)

	1924—25年度	1925—26年度	1926—27年度(计划草案)
工业	385	780.1	917.8 ^②
电力建设	39 ^③	109	153
运输业	104.1	223	278.7
农业	272.3	349.8	509.4
铁路建设 ^④	203.3	309	373.8
其他建设 ^⑤	137.3	247.8	312.2
	1141	2018.7	2544.9

这些数字说明，国家在投资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和落在整个经济和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我们能否实现和能否维持住数字表中所拟定的速度呢？

① 根据国家计委的材料。

② 三千万卢布的后备不计在内。

③ 只是预算拨款。

④ 此外，还有工业铁路线的建设：1924—25年度为四千五百万卢布；1925—26年度为九千四百万卢布；1926—27年度为九千七百八十万卢布。这些投资都算在工业里。

⑤ 这些基本投资项目包括：民用通讯、市政公用事业、地方铁路建设、大型粮仓和冷库、医院、学校和各级人民委员部的办公楼。

衡量能或不能的标准是什么呢？这种标准就是要视以下两种情况而定：第一，这么多的基本投资量会不会打破经济体系的平衡；第二，在消耗这些资金的同时，广大群众的状况是否能得到改善。从这个观点出发，研究一下去年（1925—26 年度）基本建设的经验是特别有意义的。大家知道，去年的经济建设头半年是在危机现象加深的情况下进行的。造成这些不利现象的条件就是年初过分硬性加大了基本建设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前些年的积累所允许的限度，与此同时，群众的个人消费量大大提高了。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政府压缩了基本建设过于庞大的规模，使它同国家的实际资源相一致，纠正了信贷货币政策（减少货币流通，限制信贷），推行了节约制度，等等。为了防止切尔文的购买力降低，我们不得不把多余的货币抽出流通领域。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政府才得以重新恢复了遭到破坏的经济平衡，并如同我在上述数字表中指出的那样，保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相当大量的基本投资。因此，在纠正了 1925 年秋出现的众所周知的“失算”和压缩过份庞大的计划以后，我们就保住了既定的建设速度和规模，并进入了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

今年我们将实行大规模的基本投资计划。从完成计划的可能性来说，从过去半年的情况中可以看出一些什么样的征兆呢？当然，现在要总结这第二年的基本建设情况还为时过早。但是根据过去半年的经验，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预计，今年我们一定会防止以往年代的困难。总的形势说明，由于再一次获得丰收，今年的经济发展情况一定会比去年更顺利。我们的粮食采购计划完成得相当令人满意。货币金融市场的情况不再使人担忧，我们不必再为完成既定的计划而增发货币了（就象去年那样）。例如，流通中的货币量在 4 月 1 日和在 10 月 1 日大致一样多（1926 年 10 月 1 日为十三亿四千三百一十万卢布，4 月 1 日为十三亿四千

六百五十万卢布)；现在不仅不存在卢布激烈波动的任何征兆，而且有材料证明，我们的币值趋于巩固，切尔文的购买力在提高。过去的一年是逆差的一年，为了支付国外的债务，我们不得不减少我们的储备。今年政府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保证顺差和外汇积累。到开代表大会时（确切些说是在上半年）我们已经积累了大约六千万卢布。对外贸易的垄断在争取使我们在对外贸易中取得顺差和对加强我们的货币地位的斗争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如果政府不掌握这个调节外贸关系的工具，情况就会比实际表现的情况要困难得多。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宣布，对外贸易的垄断制是苏联整个经济政策的原则性基础之一。国外常常有人谣传说我们对垄断制的态度在改变或一定要改变。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断然地重申，对外贸易垄断制是政府整个经济政策的主要基础之一，绝不能允许对它有任何削弱。对外贸易垄断制不仅保证了对整个外贸关系实行计划领导的可能性，而且也保证了苏联劳动人民的利益。有了垄断制，国家就有可能按照完全为劳动者的需要服务的原则来组织和发展外贸事业。农民比任何其他阶级都更关心发展外贸。如果能为我们的外贸系统提供大量的象粮仓、冷库、烤干机等等这样一些必要的物质技术装备（遗憾的是我们这方面的情况还非常差），那就会使大量的过去找不到市场的农产品找到出路。这样就会大大改善农民的状况。比方说，只要建设一些罐头厂，就可以使蔬菜和水果这一类产品找到很大的销路，而现在这些产品却往往全部烂掉了。我们的弱点在于我们没有把商品流转的物质技术放在应有的高度，包括外贸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报纸常常报道说，出口的鸡蛋运到时已经坏掉，黄油发了霉，许多地区的水果和蔬菜运不出去。今年政府第一次拿出了相当大的一笔资金用于冷库、烘干机、粮仓和罐头厂等等项目的建设。随着我国外贸机构和国内采购机构的完善，农民将在发展自己的经济

中得到可靠的保证。

我现在还要回到基本投资的能力问题上来。尤其是现在，在国家的经济领域里，即使不存在表面明显的普遍失调，那人们也会埋怨说计划订得太紧，只有投入相当大的财力和人力才能完成。无须在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隐瞒，这个计划当然是很紧的。但是，如果不作出巨大的努力，要想使我们的国家摆脱极端落后的状态而使自己成为有文化的、富足的和工业化的国家，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实行这样的计划时，紧张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想在我国的经济上不致停滞不前，那就不可能不把计划订得紧一些。问题只是在于，第一，要使计划的不可避免的紧张程度不要过量，否则就会在国民经济中出现病态的征兆；第二，在基本投资增加的同时，工人和农民群众的福利也应有所提高。这是否可能呢？每年既要拿出两三千万卢布作为国民经济的固定资本，同时又要保证提高广大群众的福利，这是否可能呢？如果我们在经济上停滞不前，这种可能性也可能被除外。但是既然经济在不断发展和国民收入在一年比一年增加，所以资本支出的增加就会、而且一定会伴随着广大群众物质状况的改善。必须着眼于这样一点，即苏联的直接任务就是要为工人和农民建立一种尽可能与沙皇时代大不相同的生活条件。遗憾的是，我们至今还不得不把工人的工资拿来同战前比较，把农民现在的状况拿来同他们在沙皇时期的生活状况比较。必须尽快地结束这种比较方法，把沙皇俄国时期的生活水平远远地抛到后面。但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的这种提高必须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投资的扩大同时并进。当然，也可以把我们今年用于第聂伯水利工程和谢米列奇耶铁路的钱花掉，分给农村的贫农或城里的失业者，也可以把原先打算投入工业的以亿数计的卢布用于救济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但结果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只会使我们试图用这类最简单的办法予以解决的那些需

要在以后的年代里更加扩大。如果我们把这些钱吃光用光，我们在以后的年代就更不可能战胜贫困和饥饿。因此，我认为政府最近两年来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对于其基建项目，开支增加就可能造成劳动群众的状况恶化，这种情况是必须加以避免的。这是极大的错误，不仅是政治上的错误，而且是经济上的错误。但是，另一方面，在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方面也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和速度，不能削弱群众物质保障的基础本身即国家的经济发展，而现在，基本投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条件。我们应当保证实行工业化的工作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既定的目的，但是必须遵循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加强苏维埃国家两个主要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第二，保持整个经济体系的积极平衡。

这里不妨回忆一下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发展工业方面有关这个问题的指示：“鉴于苏联日益提高的需求和农业发展的需要，以及农业的集约化和收获量的增加，不仅需要保持国营工业既定的发展速度，而且需要加快这个速度，但是这里必须有一个条件，即必须使工业的发展按照原有的计划进行，并同国家的、首先是农业的财政力量和需要，同有效改进产品的质量相适应。”

我们有没有什么现成的锦囊妙计使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进一步发展经济和合理分配各经济部门的几十亿资金的任务，并保证在各个环节都不出现脱节和危机现象呢？这样现成的锦囊妙计是没有的。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是第一次在解决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我们只能从实践本身去寻求所需要的解决办法，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逐日检查自己的工作。但是现在如果没有一个周密的长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就不可能进行经济工作。谢米列奇耶铁路或第聂伯水利工程将建设五年。如果着手伏尔加河—顿河通航运河工程，那所需的时间也不会少。许多其他工程也都需要

很长的期限。国家计委最近初步拟定了一个五年计划，准备很快就交给政府审议。这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中国家给予国民经济的基本投资数字大约为一百五十亿到二百亿卢布。

这笔钱用到什么地方和如何用的问题，即往农业投多少，往工业投多少，往运输业投多少，这是现在经济建设中主要的和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三 工业化和工人阶级同农民的经济结合

在提出国家工业化的口号以后，某些人持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这个口号的矛头是针对农业的。为了证明这种看法毫无根据，我举出最近三个年度，即从 1923—24 至 1926—27 年度对农业的拨款。实际上，仅仅从国家预算经费和地方经费中拨出的款项^① 1923—24 年度是一亿一千四百五十万卢布，1924—25 年度是二亿三千九百九十万卢布，1925—26 年度是三亿零九百七十万卢布，1926—27 年度是三亿三千五百八十万卢布。由此可见，在四个年度之内，我们已从地方预算和国家预算的经费中为农业的需要支出了十多亿卢布。此外，用于农业的还有农业信用系统的资金，今年达二亿零三百万卢布。由此可见，今年用于农业的经费（包括其他比较小额的拨款）总共约为五亿五千万卢布。我想了解一下 1913 年的这类拨款是多少。给我送来的调查材料说，我们现在的拨款额超过了 1913 年的一倍。

上述统计不包括通过棉业总管理委员会、糖业托拉斯等组织对农业投入的资金，而它们对农业投入的经营费用也有几千万卢布。

^① 根据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预算、地方预算、外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的非常用途和灌溉一项的农业拨款。

当然，上述费用还不是充足的。这些费用远远不能满足我国落后农业的那些巨大需要。我们应当十分坚决地承认：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援，我国农业自身是不能以需要的速度来发展的。农业现在特别迫切地感到需要国家的这种支援，因为农业的“恢复”时期也行将结束。由于以前归私人占有而现在归农民所有的土地已全部开垦，粗放的耕作方法已经到头，农民（特别是人口稠密地区的农民）已不可能在落后的技术基础上继续发展农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的“恢复”过程行将结束。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是同它的组织和耕作方法的根本改变联系着的。人们谈到工业时，认为应当更新装备，兴建新的工厂等等。这样的“更新的装备”，在农业方面也是需要的。因此，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根本道路是使农业集约化，这种集约化现在一年比一年更感到必要了。

我国农业的弱点又是什么呢？农村的主要不幸是所谓过剩人口，即在农业本身找不到工作的那些劳动力。这种人口过剩现象是我国农业特别落后的结果。农业特别落后的表现是产量非常低，比外国使用文明的耕作方法的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少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我国每俄亩收获五十至六十普特的黑麦就算是好收成了，然而在外国，收获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普特远不是什么稀罕的现象。这是我国农业的历史落后性。根据研究了百余年来产量变化的统计学家B·米哈伊洛夫斯基所作的统计，这个时期每年平均单位面积产量的增长率只有千分之五。如果今后的单位面积产量每年只增加千分之五，那我们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也必须提高每俄亩的单位面积产量。

在畜牧业和原料作物方面现在有某些不顺利的征兆。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消除在畜牧业和原料作物方面已出现的发展缓慢现象。我觉得我们所采取的那些措施（提高某些原料的收购价格，实行征收单一农业税的优待办法，向相应地区运送粮食，

等等)，在最近一年之内是可以缓和紧张状态的。但是，如果认为原料困难的实质只在于去年对原料价格采取了不正确的政策，那就错了。毫无疑问，在这方面犯了相当大的错误。但是我们所以在原料生产方面遇到困难的根本原因还不仅仅在这里。请看，在比利时，每俄亩的亚麻产量是七十二普特，可是在我国，只有十六至十八普特！在种植亚麻的地区，几乎所有可以种植的面积都已经栽种上了。为了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在这些地区开垦新的土地，然而又没有新的土地可开垦。所以，在这样的农业水平和这些播种面积的情况下，在收成只有十六至十八普特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获得巨大成果的。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体系本身。必须保证从三圃轮作制过渡到多圃轮作制，采用改良的种籽，施加优质肥料，等等。如果不能赶上比利时人的产量的话，也要尽快地保证使每俄亩的收获量哪怕达到比利时的一半。依靠用粗放耕作法扩大播种面积来迅速发展农业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行不通了。所以解决原料生产的问题，第一，要靠农业的改造，第二，要靠在按自然条件来说最适于发展某些作物的地方建立新的原料产区。

我不愿意人们这样地理解我的主张：所有二千五百万农户统统必须实行农业集约化方法并且采用同样的方式。在象苏联这样的大国里，虽然对于绝大多数农户推行集约化政策是正确的，但仍然有一些蕴藏着有利于发展粗放耕作的巨大潜力的地区。在我国那些渺无人烟的地区有大量原封未动的土地，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起来。但是，即使集约化方法和农业向新的更高阶段过渡的方法本身，也都应当根据每一个别地区的特点来分别加以采用。各地的气候、土壤、日常生活和交通等等条件差别如此之大，以致在农业方面比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更有必要根据地区的特 点来分别采用耕作方法和提高产量的方法。如果不充分考虑每一地区的这

些多种多样的特点，如果不根据实验预先作好充分的检查就机械地实行这种或那种措施，那么我们就会把许多事情搞糟。就拿使用拖拉机的问题来说，这大概也是正确的，因为使用拖拉机，对我们苏联各个地区和各个省未必都是同样有利和同样必要的。

就是现在，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也还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从积累所谓“无形的”粮食储备这一事实就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曾要求中央统计局哪怕是粗略地调查一下，农民由于最近两个丰收年的结果能够积累多少实物粮食。中央统计局送来了一份材料，说它查明，截至1927年7月1日止，这种实物积累可能达到的数量大约是七亿普特。

这已经稍稍超过统计学家们所指出的战前时期储备量。

这些储备表明农民的福利显然正在增长。这些储备在遇到自然灾害、歉收和干旱时就会成为农业的后备粮。由于农业可以防备这些灾荒，也就使整个经济和全国都会有备无患。

这种实物形式的积累的消极面是什么呢？那就是实物形式的积累按其本性来说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在积累了适当数量的储备以后，个别的一些农户就打算暂时中止发展这种经济了。而最主要的消极面则是使七亿普特粮食这一项巨大财富存而不用。

我已向你们报告了我们是多么紧张地为发展工农业而筹措资金的。我国有些经济部门，在对它们投入新资金以后，过一两年就能收回这笔资金，并且可以带来很大的增加额。但是在这里，作为这些实物储备的大量资金却从全国的周转中抽了出来，这当然就会使经济发展的总速度在颇大程度上缓慢下来。要知道，积累了这种实物储备的那些农户本来可以用它来购买优良机器、肥料和牲畜，从而改善自己的经济。这样做对于这些农户，对于整个国家都会大有好处。

这种实物形式的积累（1）是靠这种形式防备自然灾害的农民

经济的自发性和不稳定性所产生的结果；（2）是城乡交流不够发展和城乡联系不够的结果。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价格上的不恰当的比值是妨碍发展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联系的最主要原因。价格上的这种不协调现象对于我国整个经济，对于农业状况，特别是对于农民状况所产生的极其不良的影响，已经谈论得很多了。在古比雪夫同志的报告中你们将会听到这方面的情况。所有苏维埃机关正在以最大的毅力来进行的降低工业品价格的工作，无论对于普遍改善全体人民群众的状况，特别是改善农民的状况来说，还是对于在这一基础上保证城乡之间的必要的经济结合以及最迅速地发展农业来说，都是一个完全必要的先决条件。

人们根据经济发展的新条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农村的社会政策是否仍和以前一样，还是要对它作某些变更。有些同志认为，我们一方面鼓励以先进方式发展农业，在农业中广泛应用机器以及向更完善的耕作方法过渡，另一方面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中仍然想依靠贫农和中农群众，这是矛盾的。我要斩钉截铁地强调指出，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矛盾。政府过去和将来在农村中都要依靠中农和贫农群众。我们的旨在限制富农的剥削欲望及其增长的政策，仍一如既往，毫不动摇。只有使全体中农和贫农群众都来参加农业集约化过程，提高质量的过程，农业才能在更高的技术基础上顺利地发展起来。按贫农的社会地位来说，他们是工人最亲密的近邻。我们全部政策的目标是帮助贫农取得经济上的自立并摆脱贫困。但是，我们所以要依靠贫农和支持贫农决不是为了使贫穷的农民在农村中永世长存下去。在我国，农村中的贫农将逐年减少。

要知道，农业的状况正是取决于中农和贫农群众，而且也只能取决于他们。这一点之所以正确不仅是因为他们占人口的最大多数，而且也因为整个农业（占百分之三至四的少数富农户除

外)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在苏联,除了通过中农和贫农来发展农业的道路以外,别的道路是没有的。但是,数量如此之多的农户即使取得比较小的发展,也能在绝对数字上达到巨大的增长额。因此,我们为了发展农业、从质量上提高农业并使它集约化等等这一整套措施,只有在把基本农民群众吸引到这个过程来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一政策同必须鼓励农业采用一切先进的经营方式,丝毫不矛盾。除了改变农业体系本身和使基本农民群众改用更完善的经营方式以外,我们用别的办法是不能使农业高涨的。

不剥削他人劳动、不奴役别的农民的那些农户,由于改善了自己的经营方式,因而每俄亩收获的亚麻比如说不是十五普特而是四十普特,那他就是先进的苏维埃中农了。他们先于别的农民做到了全体农民必须做到的事,因此,应当尽一切办法支持他们,并且要让别的农民向他们学习。

只有全体农民都采用先进的经营方式,我们才能消除农民的贫困状态。组织农民同贫困和改善他们的经济而斗争的主要方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合作社。我们现在正力图在农村采用改进的机器、改良的种籽和肥料。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要花钱的,并不是任何农民都能买得起的,不用说贫农,有时也许连中农都买不起。如果中农和贫农不组织起来参加合作社,富农分子和富人就会这样来改组他们的经济,他们会添置拖拉机并成为最后会发展成地主的那个阶层。现在,当农民应该过渡到新的经济体系的时候,应该在农业中采用往往是个体农民所力不胜任的那些机器和耕作方法的时候,就特别有必要使农民合作化。所以,我们现在必须特别坚决地推行使亿万居民群众合作化的方针,这是政府在过去一个时期不仅在农村而且也在城市实行的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谈到合作社时,决不能忽视我国经济现实中的一个极为重要

的事实：在决定性的部位把私人资本的商业成功地排挤出去。以前，私商掌握了几乎全部零售商业和大约一半的批发商业，即实际上他们是市场的主人，而在过去的两年，由于加强了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机构的活动而排挤了大批私商。1924年私商在批发额中占总批发额的百分之二十二，今年已经占百分之十左右；在零售额中，私商从百分之六十降到百分之四十，而百分之六十则掌握在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手中。在粮食贸易方面，私商也受到了排挤。去年，私商经由铁路运往消费地区的粮食占百分之二十，而在今年，这个百分比已降到百分之五，有几个月甚至降到百分之二。

* * *

同志们！请允许我在这里结束我关于政府在过去一个时期里所执行的经济政策的一些最重要问题以及这个政策今后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路线的报告。我开始报告时，引用了列宁同志关于农艺师、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对我国经济工作的作用的一些话。现在，当我们着手实行工业化的时候，关于技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了。我们已着手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改造工业、运输业、农业和国家的整个经济。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在这一事业中取得决定性的成就：第一，要找到十分熟悉这方面的成就并善于在实践中应用这些成就的干部；第二，这些干部要能象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所要求的那样来真诚地、干劲十足地、忠心耿耿地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工作。正如我们以前竭力指出的那样，这些任务所遇到的困难正是在于必须在苏联的整个国民经济中运用最新技术。因此，任何一个人都必须明白技术知识分子问题的全部重要性。关于知识分子的一般作用问题，我就更不用提了，因为不普遍提高文化就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如果没有向群众传播文化的人，就不可能提高文化。关于知识分子为我国

各种工作服务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我们竭力吸收我国所有的知识分子参加工作，扩建了一些高等院校并保证工农成份的学员入学，但是现在对于专家的需求的增长要比这些新干部的成长速度快得多。在许多场合下，我们往往采用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西欧和美国的经验，吸收西欧的技术人员为我们工作。

今后应当加强技术人员的责任心，应当增加他们参加经济建设的人数。与此相应的是，应当更明确地规定他们在我国经济机关的义务和权利。鉴于我所叙述的发展苏联经济的一些新的特殊任务，应当加强知识分子、专家和技术人员在我们调度机关中的作用。但同时必须特别强调指出，这样加强专家的作用决不应当导致恢复知识分子在过去受教育时所灌输给他们的那种等级利益观念。国家信任专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同时也要求他们在无条件地承认由十月革命所创建的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权这一基础上忠诚地和真诚地工作。

同志们！我还要谈一点政府特别是工农检查院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及我们大家曾经无数次地谈到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我们的任务是建立廉价的、合理的和接近广大群众的管理国家的机关。应当说，几年来的经验使人相信，这项工作有着巨大困难，要比起初设想的困难得多。只是最近几年在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方面才出现取得某些成就的迹象。其所以取得这些成就，是由于我们通过苏维埃和其他许多组织让群众更积极更直接地参加我们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工作的结果。

工农检查院现已开始进行很大规模的、非常必要的工作，去同“文牍主义的因循习气”作斗争，因为“文牍主义的因循习气”堵塞了我们国家机关的渠道，地方、省和中央国家机关的渠道都被堵

塞了。我决不想说，莫斯科的情况比其他一些省和地区的情况好一些。工农检查院不久以前曾屡次向我表明并最终证实：在许多场合下，莫斯科的情况并没有好一些。我现在所以要提到工农检查院进行的这项困难的工作，主要是为了引起全苏联的舆论注意这个问题。必须创造条件以保证工农检查院的这项工作能够得到一切苏维埃机关和全体工农群众充分的全力的支持。工农检查院进行这项工作时应当依靠广大群众并利用他们的日益增长的积极性。

在全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主要是从农村的状况和消除战时共产主义遗留下来的残余这一观点来讨论改善国家机关的问题的。那时，这个问题是非常尖锐的，因为这种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已经成为发展农民和工人阶级积极性的障碍。必须根据苏维埃和合作社的整个体制建立起这样一种组织，在这种组织中，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可以得到充分的表现，并通过这种组织使他们的积极性在农村和全国的文化和经济建设中发挥出来。为此，提出了一项活跃苏维埃和保障革命法制的任务。到这次代表大会之前，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后，工人和农民参加苏维埃选举，参加苏维埃本身的工作以及合作社工作的人数都大大增加了。工人阶级以及农民中的中农和贫农阶层的政治积极性尤为高涨。现在，大约五十万农民和工人已被吸收参加我国司法机关的工作。在财政政策上采取的最新措施是把财政基础划归地方苏维埃，现在，这些苏维埃的预算达十七亿卢布。

在这方面获得的成就是否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足够了呢？我觉得必须承认，在召开上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令人特别突出地感觉到的那种缺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除了。要知道，那时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参加选举的人数降到了百分之二十至三

十，战时共产主义的成分、强迫命令的成分还在广为流行，地方苏维埃没有为进行其工作所需要的财政基础，而在合作社中也未能保证使居民表现出为它的工作所极其必需的那种积极性。最近两年进行的活跃苏维埃的运动，其目的就是要克服这些缺点，应当承认，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这些成就是否已经足够了呢？我觉得我们连全部工作的一半还没有完成。

* * *

我已经向大家介绍了最近几年中国家和经济建设的规模、政府进一步恢复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以及这个计划在执行过程中的巨大困难。最近两年来我们所做的工作仅仅是个开头，仅仅是在以后的年代里所要完成的任务的最初步的阶段。

同志们，我们为自己提出了非常困难的任务。两年来我们比较顺利地胜任了这些任务。我国政府将不会犯那些可以而应该避免的错误，这里唯一的和主要的保证就是政府的行动计划、它的一切步骤、一切经济措施都将通过整个苏维埃体系自上而下的讨论。苏维埃体系是劳动者的一种包罗万象的组织形式的体系，它定将成为一种实验室，所有优秀的工农代表都将在这里涌现，并在这里积极参加我们苏联的全部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我们只有依靠所有群众，依靠数百万工农群众，才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任务，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真理报》1927年4月23日。

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 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1927年5月)

李可夫同志指出，提交给人民委员会的关于手工业问题的决议有重大缺点。主要缺点是错误判断了手工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决议仅仅从商品荒方面阐述手工业的意义。目前，商品荒现象已经大大消除。人们从决议里得出的结论是，手工业的规模现在已经应该迅速缩减，而在商品荒现象消除以后，手工业应该完全消失，把它的地位让给大型工厂工业。李可夫同志指出，这样提问题对当前和最近时期来说都是错误和有害的。

李可夫同志认为，人们正是经常低估了手工业的规模。不应忘记，在大工业遭到极大破坏的年代里，一个人口一亿三千万的国家在经济上是怎么维持的。这是由于发展了自然经济和手工业，手工业的作用在这个时期里大大增加了。

目前约有三百万人从事手工业。在缩减手工业生产时，必须向这些人提供其他某项工作。

到目前为止，在许多情况下，手工业并未跟大工业竞争。

有许多商品是大工业根本不生产而完全由手工业制造的，例如许多木制品、蒲席生产等等。大工业毫无必要为生产这些商品建厂，为此花费资金。

* 本篇是报纸报导。——编者注

我们在手工业方面的整个工作的最大缺陷之一是，我们在组织手工业者合作化方面不够努力。李可夫同志认为手工业合作社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它的工作范围只涉及金属、纺织等手工业，这些手工业加工的原料是由经济管理机关专营的。对于原料不依靠经济管理机关而自行采集的那些手工业部门，合作社完全无法进行组织工作。可以列入这些部门的有蒲席、树皮鞋、车辕、木匙等制造业。在这类经常是最健全的手工业部门里，无论是在产品销售市场的组织或是财务管理方面，私人资本都几乎是十足的主宰者。

目前时期经济情况的最重要特点是我们的经济缺乏资金。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宜投资去扩大那些由手工业搞得很好的行业。可以更有利地把这些钱投入那些代表经济命脉的行业以及生产最感缺乏的商品，而不是用来同手工业者搞竞争。

人民委员会应该在其决议中十分肯定地说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手工业方面的政策经常是错误的。大工业没有充分注意妥善安排对手工业的半成品供应，——某些经济工作人员喜欢把这看成是一种经济调节方法。按李可夫同志的意见，这不是调节，而是滥用工业的垄断地位。

决议的重大缺点是，它太一般化，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手工业没有区别对待。在失业问题不尖锐的地区，手工业发展问题当然应该有别于人手过剩的地区。手工业的性质本身就决定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对它采取最多样化的办法。决议应该根据某一手工业、某一地区的特点使这些办法具体化。

私人资本贪婪的经营方式最容易因手工业缺乏组织性而渗入其中。必须规定一整套办法来防止私人资本剥削手工业者的现象。决议里很少反映这一因素。决议的原则性错误是，它把收购商和一些自己干活并雇有一两名工人的手工业者等同起来。当然，雇

有一两名工人的手工业者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雏形，但是不能把这种“资本家”和那些用最贪婪的方式剥削手工业者的收购商混淆在一起。

李可夫同志接着指出，决议里谈到，私人资本参加手工业的比率是百分之十四，但它还是没有说明，这种私人资本是真正的资本家即那些为贪图暴利而钻入手工业的收购商的资本，还是也包括那些自己干活并雇有一两名工人的手工业者的资本。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积累方式和不同的阶级内容。

李可夫同志指出，关于手工业问题的决议既已引起了不同意见，最好是在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和地方代表们共同逐条加以讨论。

译自《真理报》1927年5月8日。

斗争和建设的十年

(1927年10月15日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
庆祝会议上的报告)

一、十月的历史意义

同志们！十月——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它所创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范围。十月在人类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在庆祝十月十周年的时候，进行了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的政府报告不能只限于谈论本年度那些在十月革命的历史发展上没有什么重大和独立意义的个别问题。

十月——革命斗争的顶峰

十月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胜利，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多年英勇斗争目的的实现。在国际方面，十月是现时代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发展的顶峰。工人阶级在六分之一的地球上夺得了政权。十月是全世界工人阶级为争取创造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和实现这一纲领的革命方法而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思想斗争的第一次胜利总结。它是象巴黎公社——无产阶级国家的第一个萌芽这样一些世界性革命爆发的直接继承者。

十月革命是争取解放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的斗争中的一个最伟

大的世界性事件。我作为联盟政府的报告人所要谈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斗争第一个十年的成果，所以我不可能全面地阐述十月对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的意义。但是我在自己的报告里毕竟不能避而不谈我国胜利斗争的国际意义问题，我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是因为十月革命是世界工人阶级的胜利斗争中的第一个环节。（掌声）

我是在列宁格勒这个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发起者的城市作这个报告的。国外有时有人抱怨说，苏维埃政府的成员就会作革命报告。我要非常明确地声明，我是以革命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第一个工人国家的最高革命立法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讲话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十月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这些矛盾的最明显表现就是 1914—1918 年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时代是广大民众的阶级冲突空前加剧的时代。十月革命发生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的地带，它必不可免地要推动革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国家存在的十年对国际革命运动的意义还在于十月、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十年的经验是第一个和最伟大的经验，它已经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所吸收并运用。这一经验为后来的争取政权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工人阶级队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我们为什么能胜利

十月的独特性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在欧洲的落后国家之一——沙皇俄国开始和取得胜利的。在帝国主义时代——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俄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出现了一系列的特殊矛盾，这就在帝国主义的战争时期导致了工人阶级的胜利。这种独特性的主要表现是，一方面存在着相对发达的大工业，资

本和工人阶级都相当集中；另一方面农奴制的残余的压迫、大多数农民缺少土地以及封建的国家管理方法却束缚着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俄国资产阶级慑于革命的发展，同地主贵族阶级结成一伙，没有能力解决早已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任务。这些决定着群众在战争期间一整段英勇斗争的客观矛盾激化到了顶点。使人民群众受尽苦难的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和面临的普遍的经济危机，促成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并在俄国工人阶级面前提出了不仅要完成业已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

决定工人阶级在十月获胜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伴随着巨大的农民革命；先进的、最彻底革命的阶级即工人阶级争取人类最高理想的斗争伴随着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农奴制和专制制度残余的斗争。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土地才能转到农民手中，无产阶级只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国际环境也为沙皇俄国工人阶级的胜利提供了便利，因为帝国主义战争把欧洲各国人民搞得疲惫不堪，并在欧洲各国造成了一种非常紧张的革命形势。

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彻底革命精神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保证了革命运动的持续不断发展，并使这一运动有了必要的领导。最后，十月革命胜利发展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布尔什维克党是由列宁同志领导的。正是这些条件促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承担者——成为在十月取得胜利的阶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十月胜利的组织者

我曾说过，十月革命的顺利发展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因为领导着十月起义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由列宁同志统率的。在谈到十月胜利的时候，不能不强调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全部十月事

件里所起的巨大作用。从战争一开始，他就预见到了历史事件的进程，并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上作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全部雄才大略、全部组织才能都用在组织十月的事业上。在争取准备十月起义的斗争中，他不容许有丝毫思想上的妥协，不在任何障碍面前却步。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合发动决定了这个大国的数百万工农群众参加的十月变革的完全胜利。

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对比

同志们！我到现在为止还一点都未提到二月革命，我之所以只字未提，是因为二月革命不外是走向十月的准备。在二月和十月之间，即从推翻沙皇制度到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需要用来使工农群众作好夺取政权的准备，瓦解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在这期间，工人阶级和农民亲眼看到了他们昨天还在很大程度上追随着的那些政党的背叛，使自己从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人民社会党和立宪民主党等等的影响下解脱出来。在二月和十月之间的这八个月时间需要用来使各种决定性的力量转移到革命方面来。十月在自己方面已经掌握了全部工人阶级、绝大部分农民和全体士兵。反对十月的是立宪民主党人、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军队的指挥官。大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掌握的报刊、国家机关的残余势力和教会，纷纷组成统一战线来反对十月。但是革命不可避免地一定会胜利，而且已经取得了胜利，因为群众都站在革命一边。二月革命以后，自由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党立即起来坚决反对满足人民的最迫切的需要。它们反对立即无代价地把土地交给农民，反对签订和约和断绝同帝国主义者的联系，

主张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反对缩短工作日和实行工人监督等等，它们成为主要的反革命力量。二月革命后只过了几个月，力量的对比就很快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群众积累了革命的经验，经受了反对资产阶级和临时政府政策的直接斗争的革命锻炼。群众学会了区分革命的朋友和革命的敌人。

在二月和十月之间的这段时间里，通过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对妥协的积极斗争，真正的、起领导作用的革命司令部——布尔什维克党得到了巩固，整个苏维埃制度得到发展和加强，它动员起日益广泛的群众，同时使自己具有政权机关的作用。在二月和十月之间的时期，即在两个政权（苏维埃和临时政府）并存时期，事件整个进程导致了苏维埃制度的加强，从而在极大程度上为工人阶级的胜利提供了便利。

第一批革命法律

和平、土地、八小时工作日和工人监督是人民群众最关心和迫切的要求。当时只有把全部国家政权转交给苏维埃才能保证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十月革命以后已经度过十年了。现在，这一次斗争的个别情节甚至在一些当事者的记忆中也已开始淡薄了。十月变革后苏维埃政府立即颁发的一些政策决定就是对十月和对这个时期那些最紧急的任务的最好说明。

现将和平法令（1917年10月26日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摘录如下：

“10月24—25日的革命所建立的、依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工农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开始谈判。”……“本政府认为，各富强国家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毫无例外对一切民族都公正的

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①

十月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要非常坚决地割断同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者的任何联系，用革命的手段结束最反动的战争。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能把我们这个巨大的国家拖出帝国主义阵营。所有其他政党在这一时期都主张苏联同帝国主义继续进行战争。

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实现了世界上最彻底的土地革命。土地法令（1917年10月26日午夜二时，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宣布：“1.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不付任何赎金。（2）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农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②这一法律消灭了地主和贵族的长期压迫。

十月革命破坏了旧的国家体制，在劳动群众真正民主和各民族自由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国家组织形式。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讨论）决定：

“1.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

2.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③

宣言的第二部分确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和最终目的：“……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完全消除社会的阶级划分，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④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54、355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363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404页。——编者注

④ 同上，第404页。——编者注

以上我提到的文件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类已经转入了十月变革的时刻。

就在十月变革来临的时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党的代表还在斯莫尔尼宫并在这里的礼堂里举行会议。在十月革命那天唐恩还宣称：“……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政权将很快因广大群众的不满而被推翻。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长不了，胜利者将被击溃，而无产者也将遭到失败。”十月革命后，过了两个月多一点，召集了社会革命党人占多数的立宪会议。今天，当初出席过会议的一些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还常常把他们在立宪会议开会时的座位指给人们看。在这次会上，已故的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曾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建议立宪会议承认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苏维埃制度、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和工人监督。在这第一次会上就已暴露出，立宪会议代表的是革命的昨天，它拒绝承认劳动群众这些成果，因而遭到解散。

两种策略：革命和妥协

尽管唐恩和各资产阶级政党作了各种各样的预言，但是苏维埃政权已经存在十年了。然而在西欧无产阶级的队伍中至今还在争论，究竟是谁正确，是布尔什维克及其革命的策略即起义、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策略正确，还是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的活动家们及其改良主义的策略正确？在十月后的十年中，我们的策略即列宁党的策略，以及麦克唐纳分子、阿姆斯特丹和第二国际的策略都经受了考验。在一系列国家里，多次出现的形势表明，如果没有社会党变节分子的背叛，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本来是有可能取得国家政权而成为统治阶级的。经过了十年的伟大历史实验，究竟是谁的策略正确，已经有了明证。麦克唐纳分子、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在世界各国用自己的策略加强资产阶

级专政。经过十年的事态发展，在我国以外的所有地方都出现了资本对工人阶级的进攻。所有资产阶级国家都在加紧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只有在工人阶级运用武装起义的这个国家里，由于有了革命的策略，工人阶级才执掌了政权，只有在这个唯一的国家里才在进行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和进行真正的名符其实的争取和平的斗争。（掌声）

工人阶级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夺取政权和建设新社会的问题，是十月革命的十年历史所涉及到的最重大的原则问题之一。十月变革和苏联存在的十年，向每一个工人非常清楚地、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不仅是可以推翻的，而且在现代条件下，即在资本主义覆灭的条件下，必须进行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掌声）

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劳动者的真正民主

十月革命和十月以后的时期的全部经验证明，实现工人阶级专政可以保证全体劳动者一直到最受压迫的所有居民阶级在参加管理国家、立法和新社会建设方面享受最大限度的民主。苏维埃制度同资产阶级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在整个苏联境内，广大人民群众，数以百万计的工农代表时时刻刻都在参加全部国家工作。我现在手头还没有准确的材料来说明有多少工人和农民在参加各省、市、县和乡苏维埃这些直接的国家管理机关的工作。看来他们的人数不会少于一百万。我们苏联的劳动者在通过苏维埃系统、工会系统、合作社、各工厂的生产会议、妇女组织以及许多其他组织参加苏维埃国家的各项工作。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任何一个最民主的共和国也做不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掩盖物。所谓的百万富翁同穷人、工厂主同他们的雇佣工人、银行家同雇农的平等，这简直是一种嘲弄。当全部出版机

构、全部政权机关、全部生活领域的全部舆论工具都掌握在一小撮资本家手中的时候，资产阶级民主在事实上是对全体劳动者的一种最巧妙、最有害和最恶毒的欺骗形式。手无寸铁的、被压迫的、物质和文化上受到压制的、从来都没有管理国家经验的工人阶级、农民以及被压迫民族以巨大的“民主”力量奋起反对那些有教养、有武装、有文化、善于利用国家来反对人民的人，并且在直接的斗争中战胜了他们。（掌声）十月变革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的民主表现。

苏维埃制度将只存在到当整个苏维埃国家体制，从它的上层环节到它的最基层环节，从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到乡村苏维埃成员，紧密团结成一个持有统一目的的和代表统一意志的有机的整体时为止。苏维埃国家不掌握，也不会掌握任何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而在无论哪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里，这些工具都是统治阶级用来压迫和剥削劳动群众的。

试问，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如果没有工人和基本农民群众的全力支持，苏维埃政权能够存在下去吗？只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就完全可以看出，把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同民主（当然不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民主，而是劳动者的民主）对立起来，是非常荒唐的。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家和组织新社会，是我们胜利最主要的原因。为了保证劳动者的真正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将坚决彻底地镇压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反抗企图。

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

十月革命建立的国家所依据的原则和追求的目的不同于世界上一切其他国家。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大不一样。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和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不管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也不管我们的敌人乐意不乐意，但是无

产阶级专政国家产生本身在客观上是一个最伟大的革命因素。

起初，十月并不那么使国际资产阶级感到不安。资本主义世界认为，十月革命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和历史的“误会”。就是有那么一个叫列宁的人，一个新的普加乔夫或者斯切潘·拉辛，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组织“暴乱”，本来以为这次“暴乱”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扑灭，但是后来发现，这不是一次小规模的“暴乱”，而是开始了一场大的国际性的“暴乱”，于是资产阶级便采取武装干涉来镇压十月革命。现在已经很清楚，这次“暴乱”所产生的这个国家不仅未能象资产阶级所预言的那样，只要用几天或几个月的时间就能推翻，而且它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一年比一年巩固壮大，并作为一种异体钻进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这样，资本主义世界对十月和十月所建立的这个共和国联盟的态度就变得更为“严肃”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不会喜欢苏维埃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因为这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威力，证明了工人阶级在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组织新社会的才能。

十月以前，俄国是世界反动派的支柱。人们因此曾称它为“国际宪兵”。现在，苏联已成为全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面旗帜。十月以前，沙皇俄国自己奴役并帮助别的帝国主义国家执行奴役各国民众的政策。俄国曾经是一根敲打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头颅的大棒。现在，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为东方各民族一颗革命的明星。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把苏联视为社会主义的故乡，被压迫民族把苏联视为解放运动的故乡。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苏联的领土上消灭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并在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就在这里，正因为如此，苏联就得到了全世界一切劳动者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持。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每一次失利也是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失利。另一方面，国际工人运动的失利也是我们的失利，因为失

利，比方说英国或法国工人运动的失利、中国革命运动的失利，立刻就会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反映到世界资本对待苏联的态度中来。资本主义世界在各个时期对我们的态度不仅取决于这一个或那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而且主要地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布局。十月革命的胜利从一开始就是工人阶级的国际性胜利，而苏联的存在不仅是一个民族的阶级力量对比的结果，而且也是国际的阶级力量对比的结果。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绝不能象资产阶级政党所希望的那样，认为十月革命的意义带有民族局限性。这些政党对我们说：“你们在你们自己那里可以为所欲为，只是不要影响所有别的国家和世界工人运动。”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声明，我们保证苏联政府及其所有代表和工作人员绝不干涉别国内政。但是绝对想不出什么办法能使任何资产阶级国家防止本国工人阶级接受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思想影响。

二、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

同志们，十月变革后过去的十年是异常困难的十年。总的来说，这种困难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在一个落后国家胜利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革命仅仅发生在一个国家，而所有其他国家则仍然保持着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我们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时，不能不几乎完全依靠国内的资源。

有人会问，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解决十月的最终任务——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是没有希望的呢？在过去的几年里，苏联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成分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方面取得的成就很好地证明了列宁的论点，即就内部条件来说，我国胜利实现社会

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克服不了的障碍，只有外来的武装干涉才能阻碍这一事业。

苏联的对外政策

在过去的十年里，苏联的国际地位大大改变，并且经历了几个阶段。在十月后的第一个时期，德国帝国主义者占领了乌克兰的部分地区，迫使苏维埃共和国接受了布列斯特这个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称作“可耻的”和约的屈辱性条件。这样就给了我们将近一年的喘息时机。此后又出现了一个很长的同协约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冲突的时期，在这些国家的帮助下，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弗兰格尔的军队建立起来了。在这次短兵相接的斗争中，我国的工人和农民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迫使他们撤出了我们苏联的领土。

国内战争结束了，开始了更长的喘息时机。在此期间我国的代表在热那亚和海牙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举行了会谈。这时我们尽力用暂时让步的办法来延长喘息时机，尽可能保证我们国家在敌人包围中和平生存的条件。在热那亚和海牙，我国的建议遭到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的否决。

现在我们已经度过好几年和平关系的时间。如今我们已经同一系列国家建立了正常和友好关系，我们同某些国家就清除分歧和调整债务问题举行了会谈。我相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一定会同意政府的意见，即：由于国内局势的巩固和苏联国际作用的加强，现在已没有必要再去坚持我们原先在热那亚和海牙所提出的那些条件了。（掌声）当时我们比现在，比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日子里要软弱几十倍。当时由于我们很软弱，我们曾同意支付出很大一笔钱。现在我们仍然同意赎免，但是其代价比起我们最初同资本主义世界的代表在热那亚和海牙谈判时的代价已经大大

减少了。（掌声）

这也在同样的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同法国和一系列其他国家谈判的态度。在这些谈判中，我们的出发点是，发展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的正常经济关系不仅对我们是必要的，而且对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是必要的。

近几年来我们的对外贸易额不断增加。1921—1922年，苏联的外贸额为三亿三千万（战前）卢布，1926年已经超过了十亿（战前）卢布。这就是说，五年来外贸额增加了二倍多。尽管如此，对外贸易关系的发展还仍然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今后几年一定会有长足的发展。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是保证和平的主要因素之一。

争取和平的斗争

我国整个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延长和平喘息的期限。

大家知道，最近时期这种和平喘息受到了某种严重的打击。经过几年的苏联和平建设时间，又出现了战争威胁。英苏关系的破裂和一系列其他迹象表明，有人在试图组织敌对集团，试图对苏联准备新的进攻。

在最近几年我们还会象过去的十年一样，将用和平的政策即妥协的政策来反对这一政策，但是也绝不在十月革命取得的成果上作原则性的让步。我们没有越过这个原则界限，而且永远也不会越过。（掌声）我们今天仍将竭尽全力，努力采取一切措施、一切办法来争取和平和反对任何战争。（掌声）

过去十年来国民经济的发展

同志们，我们度过的十年，在广大劳动群众所表现出的英勇

献身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上，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有时连我们自己也没有发觉和考虑到我们的斗争对社会—政治和文化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巨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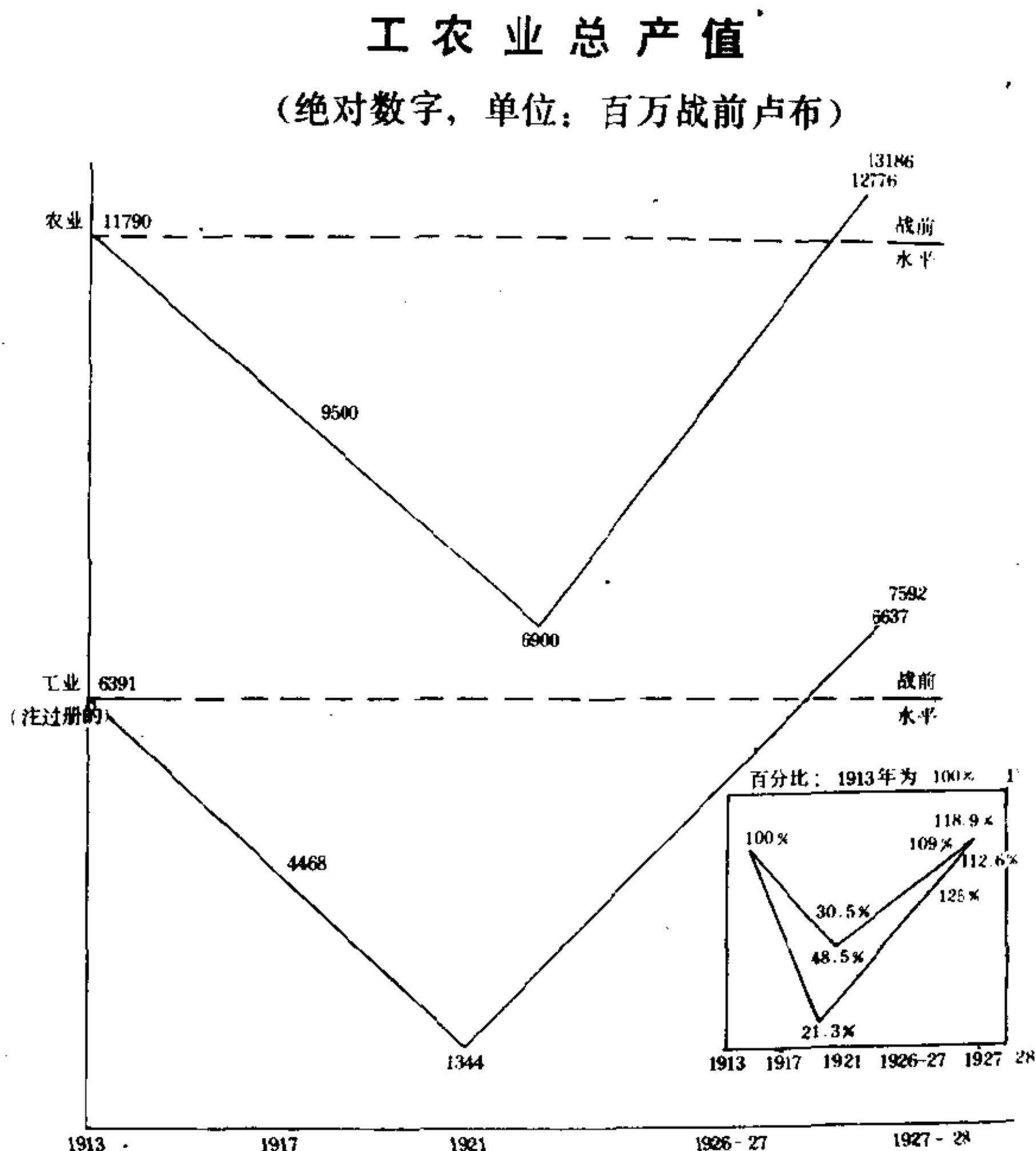
苏联千百万劳动群众承受了国内战争、外来干涉、破坏、饥饿和严寒的各种困难，度过了从根本上破坏全部旧的社会关系、破坏旧的国家机器和世世代代所形成的习惯与传统的时期，接着又投入紧张的和平工作来恢复国民经济并按社会主义方式来改造它。从情绪高昂的街垒战和武装战胜敌人到大规模的创造性工作，——这就是劳动群众在十月革命的十年来所经过的路程。

我们从哪里着手进行建设

现在，在各条战线已经过十年斗争的今天，在对过去年代的建设作出总结的时候，人们往往忘记了工人阶级是从哪里开始进行自己改造国民经济的创造性工作的，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着手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据国家计委工作人员的统计（我用的是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同志最近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的材料），六年的战争（1914—1920年）的耗费等于国内全体居民七年劳动的总产值。折合成黄金，国民经济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损失了约四百亿卢布；仅国内战争和封锁造成的损失达五百亿卢布以上。当然，这个计算是非常笼统的，只具有近似的性质，但是这些材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所造成巨大破坏。在过去几年里，工人阶级基本治愈了这些严重创伤，并着手新的建设。

国民经济的下降和上升

我国经济的下降和后来的发展与取得成就的具体情况有如下表。



(1) 此图原件字迹不清。数字可能不准确。——编者注

图表内上面的线说明了农业产值曲线下降和上升的情况。1913年农业的总产值为一百一十七亿九千万卢布，而1921年下降到六十九亿卢布，也就是说略高于战前水平的一半。今年的农业总产值超过了战前水平，达到一百二十七亿七千六百万卢布。根据最近的统计，今年如果不发生歉收，农业产值可能达到一百三十一亿八千六百万卢布，即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九。

图表内下面的线说明了注册(大)工业曲线下降和上升的情况。1913年工业的总产值为六十三亿九千一百万卢布，而到恢复时期初期即在1921年，则下降到十三亿四千四百万卢布，也就是说稍高于战前水平的五分之一。从1921年起，开始急剧上升，到十周年时，我们已经超过了战前水平(超过六十六亿三千七百万卢布)，而本年度预计将超过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十五。过去十年

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的经济发展情况大致如此。急剧的、灾难性的下降和异乎寻常的飞速上升，是整个过去阶段一个突出的特点。

农 业

从以上材料可见，农业遭受的损失比工业要少些，因为在总产值上，下降的水平从未低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五十，而同时工业产值却几乎下降到只及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二十。1914年的种植面积为一亿零九百万俄亩，1922年为七千五百万俄亩，而1927年已接近于战前的种植面积。农业下降和发展的程度还可以用下面的材料来说明。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农业（据统计机关统计）失去了百分之三十的男劳力，耕畜和农具遭到严重破坏，畜牧业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农业的商品量减少了将近百分之七十五。到了1927年，情况大大改观。我们几乎已经达到了战前的种植面积，畜牧业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一。虽然种植面积较战前有所减少，但是总产值仍有增加，这种情况表明，量变过程伴随着农业中的质变过程，尽管幅度暂时还不很大。技术作物和精耕作物的比重已经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农业中的这一过程是与农业中实行的多圃轮作、机械化和其他改进措施相关联的。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基本投资数量也在增加。1926—27年度，来自各个不同渠道（预算，农业贷款）的这种投资达到了四亿一千八百万卢布，而下一年度预算中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将达到五亿二千万卢布。

工 业

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对工业的打击特别大。在国内战争时期，工业负担的“革命费用”即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斗争的费用比国民经济所有其他部门都要重。1921—22年度的工业总产值下降

到极点，只及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二十八。在业工人的人数较1913年减少了一百九十一万八千人，总共只剩下一百二十九万四千人，即减少了一半多。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忘记原料和燃料短缺、交通破坏、大部分工厂停工的情景。

但是，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开始有了回升，而且速度不亚于下降的速度。古比雪夫同志将向大家作有关工业的专题报告，详细介绍工业十年发展的成果。我只想指出两个数字，这两个数字充分说明，由于工人阶级的热情和努力，在工业中进行了巨大的工作。1921年的工业产值只等于战前的五分之一，而1927年比战前水平超过了百分之九。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五年之内。任何一个国家也不曾有过如此突飞猛进的恢复时期。如果考虑到我国的经济恢复工作比其他国家晚开始四年，这一成绩就尤其显著。

十月以后，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我们接收下来的运输业已破乱不堪。国内战争又给了运输业一次新的巨大打击。在破坏得最严重的时期，运输量缩减到了战前的五分之一。现在，铁路运输量已达到了战前水平，在许多地区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

在国内战争时期，工资只及饥饿或半饥饿的水平，这一点所有的工人都很清楚；现在工资已经高于战前水平。1921和1922年，从预算指数看，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只有八点八四卢布；如今已超过了二十八卢布（战前为二十五卢布）。在我国国民收入中工人阶级所占比例1924—25年度为百分之二十四点一，1926—27年度达到百分之二十九点四。

无产阶级国家的政策是否正确？

无产阶级国家的政策，共产党在过去时期的政策是否正确，上面这些成果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绝不是想说我们就不曾

犯过许多局部的、有时甚至是比较大的错误。毫无疑问，这类错误是有过的。但总而言之，正象十年的工作成就所说明的那样，这些年来的政策基本上是完全正确的。

过去的十年，通常被分为两个最主要的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是与当时的情况相适应的，那时不能不把全部力量和全部资源都投入直接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直接保卫苏维埃无产阶级国家的事业。我们苏联的全部利益和全部政策都服从于这一基本任务的解决。工人和农民从全世界资产阶级的进攻下捍卫了苏维埃国家本身的生存。在战斗中他们相信，随着新的国家和经济制度的确立，只要直接的组织工作时期一到来，所有革命费用都会加倍得到补偿。我认为，继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之后而来的新的经济政策时期证明工人和农民群众的这些想法是正确的。我上面向大家介绍的发展情况表明，革命的费用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情况下是完全和彻底地）已经得到了补偿。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正确意义在于它使我们赢得了对阶级敌人的必要胜利，否则就没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现了工人和农民的战斗联盟。在新的经济政策时期，确立了工人和农民建设新社会的经济联盟。

谁将获得胜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这一时期通常叫做恢复时期，但是有些人却按照战后时期一切交战国使用这个名词时的涵义来使用这个名词。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苏联的恢复时期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担负着不同的任务。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原有的范围内得到恢复的。我们的恢复时期却是一个创造性的时期：在新的原则基础上，即在消灭工厂、铁路、土地等

等的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关系和组织经济的时期。

我们的工业是作为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恢复起来的，商品流转是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占据的市场越来越大的条件下获得发展的；农民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工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其他经济命脉对它的影响日益增长的条件下趋于繁荣的。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恢复时期，同时就是在国民经济中竭力加强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的时期，在经济制度中限制资本主义成分的时期。

毫无疑问，直到我们组成社会主义社会为止，我们国内将始终存在着阶级，存在着争夺经济影响和政治影响的阶级斗争，而且阶级之间的对比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

因此，在作总结的时候，在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增长进行比较的时候，必须从阶级对比的观点评定这些部门的情况，必须注意到社会主义成分及与其对立的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为了从阶级观点说明总结，我援引几个基本数字：比如，1924—25年度的贸易额，公营部分占百分之七十二点六，而在1927—28年度却增到了百分之八十四点五；私营部分的份额总共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量雇佣劳动集中在公营部分。同时按年比较可以看出，这种百分比正在逐步增长。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国民经济公有化的成绩。

而且，这些数字可以回答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谁将获得胜利的问题。有些同志认为，似乎两三年前回答这个问题对我们更有利些。据这些同志看来，当时全部优势都在社会主义成分方面。现在的情况似乎糟得多了。我认为，从有关我国经济发展的现有材料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1921—22年度，工人阶级的人数为一百多万；大多数工厂都是停工的，它们的产量几乎降到了战前的五分之一；私商在商业方面占统治地位；农

村中几乎没有合作社或者其他任何公有经济的萌芽。只要拿现在开足马力的工业、在业工人的数量、合作社网的发展、工人阶级和农民现有的关系以及迄今的全部建设成果同四、五年前的状况相比，就可看出，有些人的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悲观地估计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和至今取得的成绩。过去的十年证明，取得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能够保证极为迅速的经济高涨，能够引导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发展，同时排除生产中和商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十分明显，这一巨大的工作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来进行的：一方面家底子只有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彻底破坏了的落后国家的经济，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得到资本主义国家起码的支持，而且遭到它们的反对。

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建设

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过，在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特别是在沙皇俄国，重工业是靠外国资本才获得发展的。的确，到1915年，西欧向俄国工业的投资已达到数十亿卢布。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指的那个时期，我们大家都多少低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大家都低估了无产阶级克服困难的能力，而这些困难是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无法克服的。我向你们谈到的那些成绩，都是仅仅依靠我们国家自己的力量取得的，因为不论热那亚或者海牙都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除了使整个经济合理化的庞大工作之外，在重工业部门，在矿物燃料采掘部门，我们都还没有取得冶金业方面的必要成绩。俄国的燃料平衡表经常有赤字，靠国外进口燃料来填补。燃料危机是整个经济发展中的经常现象。我们在煤、石油、泥炭采掘工业中取得的成绩和大型电站的建设，为我们苏联的动力设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生铁和钢材的产量现在只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三。

但是，冶金工业部门目前正在行庞大的工作，最近几年也一定会改善这方面的状况。

在第二个十年的前夕

现在，在新的十年里，我们将不得不解决规模和意义都更大的任务。我不想详谈国家工业化的根本任务。这个问题已经阐述得很充分，而且大家都知道了。人民的生活状况，整个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都极为有力地显示了“恢复时期”的成就。在数量不断增加、质量迅速改进的新的技术基础上，每一年的迈进都将使我们取得日益增多的、有时是料想不到的成果。

今后十年规划的主要之点，是全面改造和重新装备整个经济——工业和农业。今后近十年的经济建设将和至今所作的一切有所不同，将彻底改变生产技术和劳动组织。工人阶级和农民迄今都靠落后的旧沙皇俄国遗留下来的东西同贫困和饥饿进行斗争。今后，工人阶级和农民每年都将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利用一切技术成就，人类智慧的一切成就。

因此，一切文化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如不大大提高苏联全体居民的文化，我们是无法解决整个经济合理化和经济改造的任务的。在今后的时期中，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技术和知识的意义，必然都要大大地增长。

今后的经济发展时期和我们至今经历过的时期不同，计划领导机关的意义和作用将不断增长。我们的计划机关目前正在编制的五年计划是这方面的一个转折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经济的五年计划，就是五年期间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在我国条件下，经济发展计划化的困难是同农业发展上的颇大自发性（丰年和荒年）有关联的。在工业和运输业的计划化方面，计划领导机关只能利用从资产阶级的、封建的沙皇俄国接收下来的那些工厂企业

和铁路网。对确定某些经济部门几年中间在新建设方面的发展的庞大工作，工业和运输业的改造，私人资本从商品流转中的排除，合作社在农村中的作用的加强，都在大大提高计划机关进行领导的能力，而且目前向计划领导机关提出了比以前多得多的要求。在五年计划中对整个经济进行全面规划的第一次尝试具有极大的意义，所以应当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或者苏维埃代表大会审查。

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

同志们，从我所讲的话里决不能得出结论说，一切困难和缺点都已克服了，往后的发展可以一帆风顺了。

在我们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也必然会有很大的困难。其中一个主要的困难在于，我们的国家是在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根本不同的原则基础上建设生活的唯一的国家。苏联的劳动者没有外援，不得不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资金建设新的社会。我们至今还没有根除许多不健康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在我们建设工作中每走一步都继续感觉得到。至于失业、无依无靠的人、文盲、房荒、城乡物质和文化水平上继续存在着差别等等现象，就更不用说了。虽然我们管理国家的工作现在显然比以前好些，但是我们至今仍然时常犯错误和出毛病。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也是这样。我们在劳动组织和生产组织方面还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部门中，就其技术状况而言，我们的国家至今还比资产阶级国家落后。我们花费大量资金开始了大规模的新建设，但还没有学会精打细算地和迅速地进行建设。拿我们同西欧和美国的建设费用和建设期限相比就可看出，我们花费的资金和时间多得多。我们决不能闭眼不看或者试图缩小我们工作中的所有这些困难和缺点。必须毫不掩盖和粉饰它们，必须充分揭露它们，研究和寻找尽快克服的办法。

对于其中主要的缺点和困难——失业、房荒等等，在编制五

年经济计划时应当加以充分的考虑，并且应当特别仔细地订出完全克服或减少这些缺点和困难的措施。

在谈到经济发展今后的远景时，我们决不应当耽于幻想，以为今后的一切建设将会一帆风顺，以为无需很大努力就能克服我们工作中的极大障碍，而不论这些障碍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造成的。比如，我们不应当无视 1924—25 年度我国遭到的那种歉收在最近几年中重新出现的可能性。在经济建设的各个阶段上，都应当估计到这种可能性，并且预先采取措施，以便最有准备地对付可能的歉收。

此外，不应忽视资本主义世界加强反苏活动所引起的困难以及可能对我国发动的武装进攻。我们在采取一切措施同其他国家保持和平关系的同时，应当相应地作好防止进攻的准备。

为了克服所有这些困难，无论如何必须加快我们经济建设的速度，并且象以前一样坚持为和平而斗争，毫不放松地关注苏维埃国家防御能力的增长。

十月革命的两重任务

同志们，十月革命面临的是两重性的任务：破坏和建设的任务。十月革命面向两个方面：一是面向过去，一是面向未来。十月革命初期，提到首要地位的自然是破坏的纲领，即消灭战争和君主制残余、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废除等级和特权、消灭民族压迫的纲领。十月革命的最终目的，即它的建设纲领，是建设新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首先必须彻底消灭的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从旧沙皇俄国接收下来的一些丑恶的东西。如果现在有人问我，在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前夕，根除奴隶制的一切残余、愚昧、无知等等的工作是否全部完成了，我将回答说：没有。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点。

我甚至可以援引下面这件事情来作例子。你们大家都知道，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我们就用法令规定了我们苏联各民族的完全平等。然而，我们是否实际实现了苏联领土上居住的各民族在经济发展、文化、人民福利等等方面的平等呢？尽管革命时期已经继续了十年，但是这种平等至今还没有实现，这一点是未必有人会反驳的。我们当然没有法律上无权的民族，但是我们苏联各民族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差别至今还没有根除，而不根除这种差别，就不可能有各民族的完全的、实际的平等。

其次，我们通过立法程序实行了妇女的完全平等，这种平等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都没有的。然而，如果你们打算根据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事实，检查一下现在的妇女在日常生活上是否已是完全平等的人，那么你们无疑会得出结论说，实际上，妇女在很大程度上至今还是受压迫的。在莫斯科目前举行的工农妇女代表大会上，有些人的发言提出了很多证明，妇女在日常生活中还没有达到实际的平等。

我们取消了官吏的一切特权，建立了新的国家管理制度——苏维埃制度。但在我们的国家机器方面，旧官吏的某些墨守陈规现象和传统习惯至今还有无表现呢？我认为，我们虽然在这方面采取了最坚决的行动，但至今还没有最终解决十月革命后第二天提出的任务。目前，在许多国家管理机关中，旧习惯的残余和旧病复发的现象还很严重。

宗教的影响和其他许多事实的影响也是如此，这些事实证明，十月革命关于清算过去的东西、克服旧的残余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

十月革命承袭了世世代代形成的传统习惯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仅仅消灭了大多数居民愚昧无知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期中，在许多情况下，历史遗留下来的落后的东西

还会有所表现。在最终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残余之前，还要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进行大量工作。

十月革命面向的第二个方面是未来，是建设新的社会。我们必须同时实现以上两重任务，因此，我向你们谈到的那些困难，曾要求工人阶级和农民作出极大的努力，而在今后的年代里，也无疑将要求工农至少象国内战争时期那样紧张地工作。

“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

工人阶级和农民在同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尼奇的斗争中所表现的热情，在争取苏维埃政权的生存本身的斗争中所表现的热情，目前必须直接转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在最近几年中，经济和文化战线的一些重要部门仅仅搭起了架子。为了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1917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革命所已经做到的，是俄国按其政治制度来说，在几个月内就赶上先进国家了。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①

解决这一任务应当是我们今后十年中的工作内容。

在我们执行上述任务（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完成民族的任务，而且是在完成国际的任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状况，使得苏联无产阶级肩负了充当社会主义建设开路先锋的历史任务。然而，“谁战胜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在国际范围内解决的。现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暂时以我国领土为限的社会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54页。——编者注

建设的成就。我们进一步的建设意味着以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间竞赛的加剧。因此，我们的成功或失败在颇大程度上将决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斗争的发展和结果。

我们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农民是直接担负社会主义实际建设的人。然而我们片刻也不应忘记，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应当记住在为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而斗争的艰难时刻他们所给予我们的帮助。

三、关于宣言

同志们！十月变革十周年这个日子在历史上不仅是我们苏联的节日，而且也是国际工人运动的节日，所以，政府提议由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国全体劳动者、农民、无产阶级以及全世界的被压迫人民发表专门的宣言。宣言包含的思想有很多我在报告里已经谈过了。因此，在宣言的内容上，我想只简单地谈一谈政府在十月变革十周年之际建议实行的一些实际措施。

第一个十年的总结——七小时工作日

宣言在工作方面提出的一个最主要的措施就是逐步实行七小时工作日。在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的同时缩短工作日这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从工人国家的观点看，并不需要进行专门的论证。这是我们纲领的基本点之一。确定何时过渡到缩短的工作日，这要看工业的成就为这一过渡提供了多少实际可能，会在多大的程度上保证国家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政府认为，实行工厂生产的合理化和机械化，建设一系列新工厂，既定的并已在实行的全部工业的改造和改建工作，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在

今后时期过渡到七小时工作日所必须的。缩短工作日必将是工业合理化和改建过程的第二个方面。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意味着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增加资本家的利润，那么我国工业生产的合理化则意味着同时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和物质状况。只要原料充足，确定七小时工作日就可以增加工人的班次。这样就可以把更多的骨干工人吸收到生产中来，并减少失业现象。

宣言里提出的措施十分果断，政府建议用一年的时间实际研究出实现这些措施的办法问题，并在不迟于一年的限期内付诸实施。

工人阶级在十月，即在十年以前，在旧的、落后的，被破坏的工业的条件下确立了八小时工作日，而在十月以前，工人阶级不得不在十至十三小时工作日的条件下劳动。工人阶级能够在缩短的工作日的基础上取得我报告中所提到的那些成就。工业的彻底改造加上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决定着今后过渡到七小时工作日的不可避免性。

政府建议在住宅建设事业的拨款追加五千万卢布。由于存在着众所周知的住房困难，所以这里必须说明，为什么只建议追加五千万卢布，而不是更多。这是因为政府拿出的这笔钱从本经济年度的预算条件来看，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可能。住宅建设的主要资金多少不是看预算，而是要看工业建设计划或专门的基金。本年住宅建设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资金达到五亿卢布。预算为住宅建设追加了五千万卢布的拨款，当然，这笔钱数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把这些钱都集中用到住宅严重不足的工人地区，就会发挥极大的效益。

宣言对农民意味着什么

为了改善农民的状况，政府建议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以下措

施：

(1)除了把农村所有贫苦农户的税收已经减免了百分之二十五以外，把农户的单一农业税再减少百分之十；

(2)对困难农户在欠缴的税款方面给予优待；

(3)从预算中拨出一千万卢布用于土地平整；

(4)提请下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对年老的贫苦农民阶层由国家提供保证的法案。

所有这些措施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帮助那些力量薄弱的农民阶层和保证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前些时候把全体农户的单一农业税减免了百分之二十五；今后打算把农户的税收再减免百分之十，这种优待不仅针对所有贫农户，而且也针对那部分力量较弱的中农户，因为这部分农户没有这种帮助就不能迅速地加强自己的经济。

在平整土地方面，除了前些时候的拨款以外，还将再拨给一千万卢布，这样就可以保证通过国家来帮助平整贫农和很大一部分中农的土地。国家之所以建议拨出这笔钱来，是因为平整土地是现在改造全部农业的前提，土地不平整就不可能改善农业生产，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推动农业走上社会主义轨道。

政府提交下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对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局部实行保险制度的建议是一种崭新的做法。政府建议开始时只限于对那些年龄在六十至七十岁的家中劳动力弱的农民实行国家保险的办法。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要尽可能把这方面需要的准确钱数弄清楚，这样政府就可以向代表大会报告，根据预算的情况可以拿出多少钱来用于这一需要。

追加学校建设方面的拨款同住宅建设的拨款一样，是不需要作什么说明的。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非常迅猛，以致政府和地方苏维埃来不及满足学校网发展中的那些甚至最迫切和最突出的需

要。除了原来的学校建设资金以外，又决定追加一千五百万卢布拨款，这样现在便在很大的程度上缓和了这种急需。

关于残废军人的救济问题，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曾经作过多次研究。上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有很多代表都提到这个问题。政府打算把残废军人的救济基金至少增加一倍。这样将会使全国丧失了大部分劳动能力的那部分残废者得到极大的帮助。

大赦

苏维埃国家的力量的加强，工农组织性的提高，以及整个苏维埃制度的巩固，使我们有可能来限制采取最高的社会保护措施，只把这种措施用来对付那些国事犯、军事犯和持械抢劫犯。鉴于以上考虑，政府建议对所有犯人都实行减刑，但是，对一些政党中的图谋推翻苏维埃制度的首要分子、贪污盗窃分子的处置则不在此例。在我们看来，所以要规定这一例外情况，是因为对工农苏维埃国家的公开露骨的敌人绝不能宽容，因为国家是在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捍卫本身的生存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的。同样，政府认为对那些恶毒的贪污盗窃犯也不能实行大赦，因为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类罪行是特别有害和危险的。（李可夫同志宣读宣言，读完之后，会场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认为我代表政府提出的这些具体措施与十月的成果具有同样大的意义，它们是使工农在十月革命中取得的主要阵地得到保持和加强的最好的证明，并将有助于苏维埃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及其国际意义的加强。（经久不息的掌声。全体代表起立唱《国际歌》）

译自《真理报》1927年10月19日。

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28年3月9日)

同志们！我的报告的题目叫做《苏联经济状况》。由于我们苏联很大，它的经济异常复杂，因此这个题目可以从各方面去谈，什么都谈一点。但我认为最好详细谈谈目前经济状况中的两三个主要问题，而撇开所有其他问题，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谈，而你们也没有足够的兴趣来听。这三个主要问题是：第一，粮食收购；第二，商品荒和工业发展的前景；第三，一个较为局部但在目前十分迫切的问题，即同不久以前揭发的顿巴斯一批工程师的阴谋有关的经济反革命问题，这一阴谋暴露了我们整个工作中的一些重大缺点，使我们的经济遭到了重大损失。

粮食收购和市场状况

由于本年第一季度粮食收购过程中出现了某些困难，这些困难不仅有造成粮食出口中断的危险，而且有引起国内粮食供应危机的危险，因此粮食收购问题就特别尖锐和急迫了。满足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对粮食的需要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起码要求，作为国家经济生活正常发展的基本条件是无论如何应当予以保证的。粮食收购量，特别是在丰收年，不仅应当保证国内的需要，而且应当保证出口的发展，并通过出口来抵补国家对进口货物（原料、机器、设备等等）的需要。在目前这个粮食收购季节开始的时候，

我们出口了二千六百万普特粮食，但是由于收购情况不佳，不得不停止粮食出口。其次，我们发现无法供应那些生产包括亚麻在内的工业技术作物的农民地区以必需数量的粮食。最后，由于居民们担心可能发生战事而对粮食的需求量比平日有所提高，我们面前出现了城市粮食供应困难的问题。

在新粮上市的最初几个月，粮食收购的进展是正常的，但是，从9月底开始，粮食收购就已急剧下降，而且大大落后于去年。上年度的头半年，即从7月到12月止，计划收购机关收购了四亿二千八百万普特粮食；今年同期总共只收购了二亿九千九百万普特，而且收购速度不断地逐月下降，例如，12月份我们收购的粮食几乎比10月份少了一半。在今年这整个半年里，收购的粮食不到全年计划的一半，而去年同期却收购了全年计划的大约百分之六十五。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在今年第一季度快结束的时候，由于粮食收购遭受的挫折，国家的经济生活开始受到重大威胁。

粮食收购的困难有哪些经济原因呢？主要是商品荒日益严重，这种情况极大地妨碍我们粮食流转的发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准确地弄清商品荒的绝对数量是异常困难的，因为用来确定商品供求数量的计算方法是不可靠的，至少是十分相对的。根据一些经济统计人员的计算，1925—1926年度第四季度和1926—1927年度第一季度的商品缺额约为二亿卢布。这就是说，居民的商品需求量比商品供应量多二亿卢布。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和本年第一季度的商品短缺额大约为五亿卢布，即比去年同期多一倍半。

从去年7月到12月底，农民由于卖出自己的产品得到了大约十七亿多卢布，而在本年同期则超过十九亿卢布，即多百分之十

一。农民由于进城作零工，在建筑工地和林场等处干活，他们的收入比去年增加了大约一亿卢布。

然而，同去年相比，向农民征收的税额却并未增加，因此，增加的收入就归农民支配了。如果从这些收入中扣去税款、保险金以及购买非工业品的钱，那么农村对工业品的购买力总额就将增加大约三亿卢布，即超过百分之十一。

城市情况又如何呢？在这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过程（由于提高工资和降低物价），即增长了大约百分之十。

同城乡需求这种猛烈增长相对应的是什么呢？去年第四季度同第一季度相比，工业生产降低了百分之十一（由于原料缺乏和其他许多原因）。本年第一季度的产量也低于我们的所有估计。就物质方面而言，工业生产增长了，但是，因为这时价格降低了百分之十，所以，用价格（按零售价格）表示的工业品总产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只增加了百分之零点四。

我不来详谈本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不足的原因，我只想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些是同工业无关的（如包括羊毛在内的某些国外原料进口延误），有些是同工业有关的。属于后一类原因的有原料分配不当和棉纺工业改产新品种和新规格的高级产品，这种改变造成棉纺工业生产上的停滞以及毛纺工业组织工作上的缺点等等。

粮食销售的市场条件就是这样。在城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急剧增长的情况下，轻工业产量稳定不变必然大大加剧商品荒，削弱城乡商品流转中一些最薄弱的环节。最薄弱的一环就是粮食收购，它比去年下降了，而其他一切作物的收购量却都超过了去年。例如，从收购运动开始到1月底止，收购量超过去年的有：大麻纤维超过百分之七十，小张皮超过百分之二十八，大张皮超过百

分之十五，油子超过百分之五十八点五。在最初几个月里，亚麻收购的进展十分顺利，然而，当亚麻产区的粮食供应恶化的时候（12月间），亚麻收购量也就降低了。随后，亚麻收购量重新开始上升，但是目前我们的亚麻收购状况还不稳定。其他许多产品（油、蛋等等）的收购量也增多了。今年第一季度收购了牛油三十九万八千普特，而去年是三十八万五千普特；蛋一千四百四十六车皮，而去年是八百五十五车皮。整个说来，除粮食外，所有农产品的收购都高于去年的水平。因此，如果说我们的城市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某些食品（特别是油和蛋）脱销的情况，那是由于城市居民消费的急剧增长和我们商业机构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根据贸易人民委员部的调查，今年第一季度莫斯科油的销售量提高到三十二万三千普特，而去年是二十五万六千普特；列宁格勒提高到十七万八千普特，而去年是十四万普特；蛋的销售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城市中这些产品的供应经常中断，也多少是因为我们——坦率地说——对城市消费的增长有点估计不足。在工人和职员的开支朝着提高饮食质量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要准确地估计消费的增长是极其困难的。在我们这里，从主要吃黑面包改为吃白面包，从吃植物油改吃牛油，变化是很快的，以致在估计需要多少数量才能满足迅速增长的需求时就可能出错。今年的错误是往后的年份必须加以考虑的。工人饮食的改善是我们苏联生活中一个重大的积极因素，因此，我们的收购机关、整个合作社网和商业网的计划，当然应该把保证满足工人阶级逐年增长的消费作为首要任务。

不应当忘记，目前我们不能完全不输出诸如蛋类这样的产品。由于停止粮食出口，我们不得不减少出口总量。停止粮食出口意味着出口计划中形成了一个应该想方设法加以填补的“漏洞”。如果我们完全不出口农产品，这就会迫使我们减少譬如棉花的进口，

从而相应地削减纺织业的生产。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出现城乡之间商品流转的普遍危机，只是粮食收购出现了一时的障碍，而出卖粮食所得的收入未必超过农民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为什么工业品的不足会十分明显地影响粮食收购呢？我认为原因之一在于不同农产品的比价。

今年第一季度的物价指数实际上是：黑麦——100.5，小麦——110.7，各种谷物——109.4，而技术作物的指数却是140.1，蛋类——217.7，肉类——172.6，大张皮——161.6，小张皮——210。

只要为农民设身处地想一想就能明白，农民为了得到钱，为什么首先出卖的不是粮食，而是那些进款较多的农产品。如果农民需要缴纳农业税，而指数他从黑麦可以得到100.5，从小张皮可以得到210，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在他看来，在一个卖主和任何一个聪明的当家人看来，出售小张皮当然比出售黑麦有利一些。因此，凡是农民有选择余地的地方，他总是出卖对他最有利的东西。我们既然无法向农民提供数量充足的商品，而税额仍象去年那样偏低，那么农民就没有多大的兴趣出售自己的全部余粮，而主要是出售他能得钱较多的东西了。

但是，为了得到纸币而出卖粮食，愿意这样做的人是不多的。我们的货币无疑一年比一年值钱。然而，对于上次战争中一卢布变成五个戈比的经验教训，农民仍然是记忆犹新的。因此，我们关于战争和战争危险谈论得越厉害，愿意仅仅为了得到纸币而出卖粮食的人也就越少。

如果说谷物在其他农产品中是竞争能力最小的话，那么，就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比价来说，农产品的市场营销条件现在毕竟比去年有了改善。剪刀差，即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差，同战前相

比（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计算），去年为百分之七十，今年为百分之五十四。这是工业品价格下降（主要工业品的价格降低了百分之十）和农产品价格略有提高的结果。

关于粮食价格

从上述剪刀差的情况我接触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终究不能为了刺激提供粮食而提高粮食价格？过去，我们曾经不止一次采取提高价格的办法来消除粮食收购方面的某些停滞现象。也许提高价格确实是最好的办法？我简略地谈到过的各种农产品的现行价格制度是立足于下面这一点的：我们鼓励最费力、最有助于我国落后的农村在经济上稳步上升的技术作物的发展。不仅从农业本身的发展来说，而且从建立广阔的国内工业原料基地来说，这种做法都是重要的。为了让农民生产工业用的这类农业原料有利可图，应当付给他们多于生产粮食的报酬。把粮食和其他作物的价格拉平，就会导致缩减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而这种现象我们这里已经有过。因此，提高粮食价格就必须提高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从而必然要提高工资，同时还要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只要提高粮食价格，我们就不得不提高其他许多商品的价格，从而降低卢布的购买力，使得苏联最贫苦的居民阶层的生活状况恶化，因为粮食和其他产品在这些居民的生活费中占最大比重。为了缩小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主要办法是降低工业品的价格。然而，当我们还没做到这一点的时候，这种价格上的差距无论在粮食收购上，还是在我们同整个农村的相互关系上，都是最薄弱的环节。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困难也就集中在粮食问题上了。

当然，以往实际形成的各种农产品之间的比价，并不是不可

改变的。对这些比价，今年已经作了许多变更，今后还要变更。有许多种农作物，最初在农业中培植的时候，是需要予以最大限度鼓励的，当它们在农业中十分稳定地种植起来以后，就不需要这些特殊的鼓励办法了。不过，在改变这些比价时，我们的出发点不应当是普遍提高粮食价格，而应当是降低工业品和若干种农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正如我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已经说过的，对于粮食作物的发展及其播种面积的扩大，不仅应当给予比以前更多的注意，而且应当给予更多的物质帮助。粮食收购的困难是由我们收购机关的许多错误造成的。例如，出口需要的若干种次要商品定价过高，就属于这类错误。在许多地区，一张什么水田鼠皮的价格达三十戈比，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区，两三张水田鼠皮的价格就等于一普特粮食。这类大错误当然是不可原谅的。我们的收购机关还有其他的错误，比如，收购季节中价格涨落不定，特别是在据以确定价格的交售粮的标准即质量有所改变的时候。

关于富农和一月措施

粮食收购方面出现的客观困难，使得农村中最富裕的富农分子能够利用这些困难来投机，来拼命抬高价格，这就更加恶化了粮食收购工作。一般说来，即使农村中一个富农也没有，粮食收购的困难在理论上也是可以设想的。如果不把商品送到农村，不规定对出售粮食有利的价格比例，让收购机关更加愚蠢地办事，那么即使一个富农也没有，粮食收购也会出现困难。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商品经济，无论是简单商品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它的性质都是如此：它只有在销售自己多余产品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看到，农村中最富裕的分子即富

农利用这些困难来抬高价格，并且围绕这个问题把农村中拥有剩余商品粮的一切阶层都鼓动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情况：富农分子收购粮食，拒绝出售存粮，拼命哄抬粮价。因此，在解决粮食危机的斗争中，我们首先必须打击的对象是实际上破坏粮食收购的组织者和要求抬高价格的急先锋。

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些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收购方法，农民们由于这些方法而从农村中写了很多信来。

除了提高粮价之外（要提高粮价就得重新修改一切产品的价格），还可以设想一个办法——从国外进口粮食。但我认为，这两种办法远不如我们开展的加强粮食收购的运动。毫无疑问，这种运动具有“突击”的一切典型特点。假使有人问我，如果通过正常的方法，即不采取这种突击运动，而能消除粮食收购的危机，是否会好些，我将坦率地说，这会好一些。但是问题在于，为了解决粮食收购的危机，我们只剩下非常有限的时间了——在春天来临之前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了。必须承认，我们耽误了时间，忽视了粮食收购困难的苗头，没有预先采取一系列为粮食收购运动的顺利开展所必须采取的，并且应能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关于粮食收购以及供应国内谷物产品这一意义重大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的措施。我们之所以开展突击运动，因为这种运动在目前条件下是摆脱困难的唯一的和最适当的出路。在这一运动中，也象在其他任何突击运动中一样，我们必须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加紧采取一系列经济方面和非经济方面的综合办法。我们向农村投入了大量商品，从而减少了城市的商品供应；我们为了吸收游资，延缓了农民纳税的期限；我们实行了自动捐献法；我们同酿私酒的行为进行了比较坚决的斗争；我们动员了所有地方苏维埃组织、党组织和农村组织参加粮食收购工作；我们把中央和地方的大批工作人员派到农村，派到收购粮食的地方去。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

密切关注农村和粮食收购运动，整个粮食收购部门受到了检查，许多异己分子和坏分子被清除了。这一切总合起来也就决定了最近开展的粮食收购运动的内容，由于这一运动，粮食收购已经有了转机。

这一运动的积极成果之一是粮食危机问题已从日程上取消了。1月份，我们已经收购了七千五百万普特，而去年1月份是五千七百万普特；2月份收购了一亿一千五百万普特，而去年同期是五千三百万普特。3月份的粮食收购工作进展顺利，因此，在这三个月里，我们大概收购了本来打算收购的数目，即二亿五千万普特。这就基本上解决了消除国内粮食供应中断的危险这个问题。应当列为这一突击运动的积极成果的还有：由于根据这一运动的经验对我们一切粮食收购组织和合作社组织的工作以及农村中一切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所以农村中这些组织的工作目前都有了比过去明确得多的阶级路线。这一运动从实践上进一步贯彻推行了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指示：加强贫农的工作，巩固同中农群众的联盟，加紧向农村中的富农阶层展开进攻并限制他们的剥削倾向。这样一来，粮食收购运动的意义也就远远超出了消除今年粮食收购危机的范围。

新经济政策和商品流转的调节

这一运动除了优点以外还有没有缺点呢？当然有。例如，报上就屡次指出过这些缺点：企图改行直接商品交换，强制摊派农民公债，组织某种巡查队等等。总之，有些同志在一些场合抄袭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这一切都是消极因素应坚决予以消除。无论是取消新经济政策，还是恢复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我们之

中谁也没有说过，也没有考虑过。在农村中和城乡关系中恢复战时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此议论纷纷是毫无意义的。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项指示曾经联系粮食收购工作就这个问题说过下面这段话：

“有关我们似乎正在取消新经济政策、实行余粮收集制和剥夺富农等等的议论都是必须坚决与之斗争的反革命谰言。新经济政策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基础，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是这样的基础。新经济政策意味着一定条件下的商品流转和容许资本主义存在，这种条件就是国家保留着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调节贸易的权力和可能性。没有这一点，新经济政策就会是单纯恢复资本主义，而这一点是议论取消新经济政策的反革命饶舌鬼们不愿理解的。”

尽管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屡次发表声明，报上也就这个问题刊登文章，但是关于在农村中恢复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的议论不知什么缘故还在继续流传。几天以前，在莫斯科的一个区里，工人们曾告诉我说，直到现在从农村收到的一些来信里，农民们还在谈论自己对在农村恢复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的担忧。我认为，在多数情况下，这类担忧不是由于某些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的疏忽和胡作非为造成的，而是因为对粮食投机分子施加的某些压制以及把一些从事粮食投机活动的富农交付法庭审判，都被这些人说成是对农民阶级施加的普遍压制的缘故。富农想把事情说成被攻击的不是他们——富农投机分子，而是全体农民。富农散布这些谣言并企图向农民证明，对富农投机分子实行的政策正在威胁他们农民群众，他们的目的当然是企图得到农民群众的支持，以保护他们的富农投机者的利益。对农村富农阶层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贫农和中农）群众之间制造纠纷的险恶用心必须进行最无情的斗争。苏联政府和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依靠贫农和同中农

的联盟来实行对投机分子、剥削者和富农的政策。

下一年度是否能用下述办法来组织粮食收购，即国家规定人人都须遵守的固定粮价；在一个地区只指定一个机关收购粮食；农民须按照规定的价钱把粮食卖给这个机关，如果他们不把粮食卖给这个机关，就应交付法院审判。能否认为这个办法有什么地方在原则上违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呢？我认为，这种办法在理论上是完全可以设想的。然而，无论今年或者最近几年，这种办法都是行不通的和不能容许的。这种甚至不让农民在本地市场范围之内有机动可能的办法，意味着国家无论在粮食收购或粮食供应方面都实行完全的绝对的垄断。而在粮食供应方面，即使在目前，大量粮食也都是通过地方市场而不经过我们的粮食贸易机构。要准确地查明不通过国营组织和合作社组织的国内粮食流转量是不可能的。但是，毫无疑问，购买粮食的大部分农民、手工业地区、小城市和市镇，即使现在也经常由粮食生产者直接供应或者通过私商供应。我们无法准确地统计，农民直接向消费者，或者通过粮食集市和市场，卖出多少粮食和什么粮食，谁向他们买了这些粮食。国家对粮食贸易的完全垄断，会使国家除了供应城市外还承担供应所有农村消费地区和所有购买粮食的农民阶层的重担。目前，我们不能担负这样的重担，也未必需要这样做。我担心，这样对待农村不仅将搞得我们跟富农阶层决裂，而且也跟更广泛的农民阶层决裂。

私商在粮食收购方面的作用一直在下降，最近一年下降得尤其厉害。由于我们拥有越来越充足的力量和资金，今后还要降低私商的作用。合作社和国家收购的粮食必须不断增长，合作社和国营贸易网保证供应的粮食消费者的范围必须逐年扩大。为了粮食收购工作的顺利进行，必须消除各个粮食收购人员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给今年和前几年的粮食收购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必

须比以前更坚决地保证把粮价稳定在国家规定的一定水平上。不过，这一切我们过去是而且将来也要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进行。我们从来没有把新经济政策这一概念理解成商品流转的完全自由。既然资产阶级国家在某些情况下采取行政和司法措施来调节商品流转，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更应当和必须这样做。当然，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过去采取过而且将来也要采取行政措施，直至依法惩办。在城市里，对于外币投机者，纺织品投机分子以及其他商人，我们就是这么办的。这丝毫没有违背、也不会违背新经济政策和商品流转的原则。对待农村中作恶多端的富农分子，也必须采取这种办法。

新经济政策作为在商品流转的基础上对待农村的一整套办法，是要完全保留的，目前，地方工作人员的许多过火行为、滥用职权和愚蠢做法，助长了关于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流言蜚语的传播，是非常有害和危险的。必须同它们不断进行无情的斗争。应当让全体农民知道，城乡关系中的商品流转是要保留下去的，就象农村内部生活中的革命法制要保留下去一样。

商品率和扩大农民经济的办法

今年粮食收购的失败使我不得不谈一谈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即关于我国农民经济的商品率以及为加强整个国民经济周转而需要使之扩大的途径问题。农民经济的商品率，即农民卖到外边，卖到村外市场上的产品，就粮食来说，在战前的1913年起码占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在1924—1925年度占百分之十四点三；在1925—1926年度占百分之十四点一；在1926—1927年度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我们的农业就总产量来说已达到战前水平，但是农民经济的商品率现在却大大低于战前水平。商品率正

在逐年提高，但不能说这种提高是多少有点劲头的。技术作物和畜牧产品也是如此。畜牧业的商品率，1913年大约为百分之三十点九，而去年则为百分之二十五；技术作物的商品率过去是百分之七十三挂零，现在是百分之五十三。

这个数字材料需要略加说明。问题在于，同1913年相比，农村人口大大增长了（大约增加了四百余万），而农民人数增多了，消费也就更多了，这就减少了农民产品的商品量。其次，恢复农业的地理条件本身是各不相同的；在消费地区，农业恢复的程度大一些，在生产商品的地区，恢复的程度小一些。总而言之，这多少降低了我所援引的数字的意义，但并没有排除这样一个事实，即农业的商品率落后于农业总产量的增长。

我国农民经济的商品率为什么如此低呢？我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供应农村的工业品不足，价格较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民经济结构的性质本身，它仍然是小农经济和极小农经济。最近几年，农业的生产单位一直处于逐渐变小的过程，因为农户分家，所以生产单位变得越来越小。农民的生产单位越小，它的商品率就越低，农民自己一家一户消费的产品就越多，他们出售的产品就越少。

在确认农业生产商品率低的同时，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政策中按照“提高商品率吧”这个空洞的口号办事呢？当然不能，因为在个体生产的条件下，甚至在商品流转比较自由的情况下，商品率增长本身也包含着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长。毫无疑问，目前商品率最高的经济是富农经济。因此，并不是任何商品率的增长，也不是任何经济的扩大，都能纳入我们的规划并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应该支持的是那种能把农村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并能使农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的那种经济的扩大和商品率的提高。在我国条件下，简单商品生产者面前有两条道路：

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或农业集体化道路。当前的任务是引导农民经济沿着这第二条道路发展。我们如果不在扩大农业的基础上提高商品率，是无法使农业获得发展的，但我们必须在集体化的道路上使之扩大。

要使城乡之间的流转既正常又稳定，绝对可靠的最大保证是农业中社会主义集体生产形式的作用和意义的日益增长。随着这种增长，农业和工业之间各方面的困难就会越来越小，而且国家在粮食收购工作中将有大得多的回旋余地以及按照计划调节整个流转的可能性。

目前农业中社会化成分的比重有多大呢？如果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加在一起，1926—1927 年度它们在总产量中占百分之二点七，今年预计可以提高到百分之三点五。1926—1927 年度，它们在农业商品总额中占百分之八。可以预期，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在商品流转方面的比重今年大约将达百分之十。

当然，农业通过集体化而扩大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是不能用任何强制手段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特别坚决地采取各种办法来促进和加速农村向集体经济过渡的过程。应当指出的是，只要我们进行系统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在这方面取得卓有成效的结果。在农业生产中社会主义成分的发展方面，集体经济当然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去年，政府已经拨了大笔款子来支持和发展农村的集体经济，今年，这种拨款增加了一倍多，党和苏维埃应当特别集中精力解决农村中集体农庄运动的巩固和加强的任务。

在我谈过粮食收购和农村政策问题之后，我想再谈一点。我们上一次遇到经济困难是在 1925 年，我们克服了那次困难，我们那时摆脱了困难，是由于大大提高了粮价，修订了各种经济发展计划，削减了基本建设工程，等等。我们今年却没有用这种办法来

摆脱困难。我们解决了粮食收购危机，但并没有削减工业的基本建设工程，也没有提高粮价，也就是没有任何倒退的行动。我们仍然面临的重大危险，是播种面积可能扩大得不够。农村中处心积虑哄抬粮价的分子（富农），会力图减少播种面积。我们必须同中农和贫农群众一起，在农村中开展扩大春播地的斗争，这种斗争将能保证播种面积的增加。对于今年的春播运动，政府已经拨了大笔资金，并采取了其他许多办法，以扩大春播地和增加谷物生产。今年的春播运动比往年具有更明显的政治运动的性质（同富农作斗争）。我得到一些地区的消息说，富农已经拒绝承租他原先租种的土地，并且减少自己的播种面积。诚然，这些现象并没有普遍性，但在许多场合下，富农正在鼓动减少播种面积。因此，必须开展播种运动，以便依靠我们同贫农和中农阶层的联盟，凭借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关拥有的物资，在这场斗争中战胜富农。我们粮食收购突击运动的成功以及春播运动胜利的保证都取决于下列情况，即目前农村的状况较之两三年前有了颇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在于贫农组织加强了，我们同中农的联盟巩固了，农业本身发展了，我们的党组织、合作社组织以及在农村中工作的其他组织都取得了重要的经验，它们在农村生活中的意义和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作用增强了，这一切都大大超过了两三年前的状况。

工业发展的前景

我们工业方面的前景如何呢？我谈到商品荒尖锐化的时候曾经指出，今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的增长十分微小，假如这种状况持续整整一年，我们的商品荒就会大大加剧。因此，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前景问题，多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

减轻商品荒的严重程度。根据我们今年年初拟定的控制数字，列入计划的工业的生产增长额应当是百分之十七点六（去年是百分之十九）。现在我们能够确定，今年的生产将增长得较多一些——百分之二十多，即超过去年的增长额；其中大部分增长都在本经济年度的下半年。按绝对数字计算，全年的生产增长额约为二十亿卢布。而且，在这百分之二十多的增长中，消费品生产的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快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百分之二十）。工业的这种普遍增长不仅证明我们今年也能够保持很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且证明商品荒今后将会大大缓和。与此同时，基本建设的投资额大大增多了。去年的投资额是十亿九千万卢布，今年将超过十二亿卢布。而且，主要工业部门之间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仍然同去年大致相同；在全部基本建设投资中，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约占百分之七十，生产消费品的工业约占百分之三十。

这种分配是否正确呢？许多人认为这种分配并不完全正确。在轻工业部门工作的同志坚决要求增加轻工业的资金，而在重工业部门工作的同志则提出相反的论证。我认为，不仅在今年，而且在最近若干年内，多向重工业投资是十分必要的。轻工业用比重工业少得多的基本建设投资，就能大大增加自己的生产量。在棉纺织工业中，单靠改为三班倒的七小时工作制就能大大增加皮棉加工的能力。其他许多工业部门也可以这样做。

虽然轻工业在产量上超过了战前，但重工业还是落后于战前。要增加机器或生铁的产量，只有利用大量基本建设投资去开采金属工业的原料（矿石）才能做到，因为要挖掘矿井，这就需要做大量的预备工作，需要大量时间和大量费用。重工业，特别是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产量的提高，其依赖基本建设投资的程度要比轻工业大得多。因此，拨给重工业的费用也就应当比轻工业多得多。

今年，不仅工业产量和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在增长，而且交通运输、住宅建筑、冷藏设备等等的基本建设投资也在急剧增长。工人阶级的人数也将随之增长。实际工资将增长大约百分之十二，今年的工资总额起码将增加到一亿三千万卢布（仅就列入计划的工业而言）。

关于集体合同、修改生产定额和计件工资定额的问题我就不谈了，因为报刊上在讨论生产合理化、重新装备工业和降低成本问题时已经充分地阐述了这些问题。尤其是，托姆斯基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不久以前的发言也都阐述过这些问题。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可能性增加工资的整个政策是始终不变的。

关于我们技术上的落后

根据所有这些征候，我们可以说我国经济高涨了。我应当说，如果我们没有犯至今所犯的那些不能容忍的错误（特别是在基本建设方面的错误），这种高涨将会急剧得多，工人阶级的生活将会好得多。这些错误我不想再谈了，因为报上一直在谈，我也不止一次报告过了。所有这些缺点延缓了工业化的速度，减少了工业品价格降低的可能，妨碍了工资的提高、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以及城乡商品流转的增长。

正如我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上所说的，我们前进中最主要的困难在于：我们在改造落后的经济，在开展新的大规模建设，而且在用“落后的双手”把最复杂、最完善的技术方法移植到我国来。通过国家工业化，我们打算而且必须越过资本主义国家在漫长的年代所走过的技术进步的过渡阶段。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时不能不碰到的困难，我们的党是十分了解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困难，特别是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

渡时期的最初阶段，一方面是由于技术力量普遍缺乏，另一方面是由于吸引现有技术力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遇到许多阻碍，因为这些技术力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培养出来的，而且多半属于资产阶级。我们的党纲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发展生产力这一任务要求迅速地、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科学技术专家，尽管他们多半浸透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可见，工人阶级必须利用异己分子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基本任务，——问题的困难和复杂性就在这里。

党纲通过以来已经过去许多年了。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声明过，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已被战胜了，我们甚至同那些至今浸透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习惯的专家也建立了合作关系。

顿巴斯沙赫特区的反革命阴谋

然而，不久以前揭发的事件说明，在这方面并非一切都是很顺当的。我指的是顿巴斯沙赫特区一伙担负重要工作的专家和工程师已被揭发的阴谋。

让我们看看一些身为工程师的阴谋家的口供内容吧。这个集团的领导人当中的一个工程师供称，这个集团给自己规定了如下的任务：推翻苏维埃政权和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用尽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进行破坏。手段之一是：利用从良矿中开采劣等煤的办法来阻挠顿巴斯煤矿事业的恢复；不去开采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工业矿层；封闭有利的矿井，开采无利的矿井；破坏和不适当使用机器；从国外购买不需要的设备，——总之，不适当、不经济地耗费大量资金，借以使顿巴斯煤矿的财政陷于紧张状态，既造成煤炭缺乏的现象，又提高生产费用。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不让苏维埃政府利用顿巴斯地区的煤藏，而把它们留给过

去的矿主。

这个工程师是这样说明这伙身为专家的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思想的：“各人的政治信念各不相同，有保皇党人，有立宪民主党人，总之，这是一个大杂烩——一群乌合之众。他们需要的只有一点——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这些人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唆使工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工会、党组织，并且挑起罢工。已经查明多起某些工程师完全不能令人容忍地侮辱工人的事件。也出现过破坏通风设备而使空气几乎不能进入矿井的事故，以及违反一切安全规章进行操作的情况。如果我不是自己碰到有凭有据的真事，我会说这一切都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恶毒谎言！但这是事实！在许多年中，这帮人在主要的工人区之一的顿巴斯工作，那里有坚强的工会和党组织。然而尽管如此，还是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使得我们在无煤的地方挖掘矿井，订购不需要的设备，炸毁电动机，不断地同工人“捣乱”，对工人采取在苏联绝对不能容忍的、纯粹是侮辱的方式。已经查明，这一伙反革命分子是同以前的矿主有联系的，他们从以前的矿主那里取得进行破坏活动的经费。其中一些参加者本身就是煤矿企业的老板或股东。从案件材料还查明，他们同外国特务机关有联系。在谈论向我们苏联进攻的时候，他们提出自己全部工作的直接任务是从内部协助可能进犯无产阶级共和国联盟的敌人。在许多年中，在极为重要的地区，在极为重要的经济部门，一伙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居心险恶地蒙骗了我们大家。

从这一案件必须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我们大家——无论经济机关，工会组织、党组织或者其他机构——都没有发觉在我们身边酝酿成熟的危险。这是我们大家的耻辱，是苏维埃制度、共产党、工会、经济工作人员以及所有地方组织的耻辱。我们在紧张地致力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时候竟没有发觉，资产阶级利用十二

个坏蛋，几乎就在我们大家眼皮底下破坏我们的经济，同工人阶级进行斗争。我们各种机构工作中的缺点和毛病是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是确实存在的。这种情况是我们大家的耻辱。

第二，看来不是所有的反革命专家都放下了武器。我们这里遭到的是敌视工人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分子的一次规模很大的暗中袭击。当我得知这一案件的时候，我不由得想了想，其他地方是否还有类似的情况。为什么其他地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呢？我们大家应当更仔细地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人在蒙骗我们，工人阶级加强警觉性，党和所有一切组织提高警惕性，都是十分必要的。既然这十二个坏透了的保皇党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能够蒙骗我们多年，那就表明我们大家太疏忽大意了。有一种情况也可说明这一点，譬如，我们这儿经常发生火灾，而且烧掉的常常正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比方说，烧掉了索尔莫沃那样的工厂。报上经常可以看到接连不断的火灾消息。虽然并非到处都是，但在许多场合下，我们碰到的是明目张胆的纵火行为。当苏维埃共和国和社会主义的朋友和敌人都亲眼看见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开始取得重大成绩的时候，当苏联的经济超过战前水平的时候，当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指望我们无法完成经济建设任务的最后一点希望因此破灭的时候，和外国特务机关勾结的旧矿主便伙同那些妄图对我们实行武装干涉的人，对工人阶级和苏联的建设发动了突然袭击。跟这桩案件有牵连的，不只是那些名为苏维埃共和国公民、应当和将要按照革命法制受到无产阶级专政法庭严惩的人（喊声：“对！”热烈的掌声），而且还有外国籍的人。我并不认为同我们打交道的德国公司或英国公司本身都干过这种勾当，但是已经查明，某些外国公司的职员和代理人中有人直接参加了这一反革命阴谋。在这些外国专家中，有的已经逮捕并将交付法庭审判。（热烈的掌声）

专家、新的技术干部和经济工作人员

这一阴谋案件无疑引起了我们大家极端的愤怒。但是，如果因为揭发这一阴谋而使得排斥非党专家的态度有所发展，那就异常有害和危险了。当然，绝对不能把所有的专家混为一谈。在专家当中我们有许多真诚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我已经收到顿巴斯专家们的决心书，他们表示要无条件地、坚决地同这些案犯划清界限。毫无疑问，十年来有很大一批专家已同苏维埃制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成了恢复和发展我国经济的真诚的合作者。在密切注意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的同时，还必须利用这一事件促使专家当中的动摇分子最终自己觉悟过来。我们在专家中间至今还可以看到行会习气和帮会关门主义的残余。沙赫特区在技术方面发生的一些胡作非为的事情就是明证，跟这一案件没有牵连的专家是不可能没有发觉这些事情的。要知道，其他的矿场就在沙赫特矿场旁边。为什么这个巢穴不是由全体专家的力量揭露的，而是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机关和司法机关发现并取缔的呢？显然，带有旧的行会习气的分子还在这些工程师中占着上风。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必须承认，在象沙赫特区进行的这种斗争中保持中立就等于帮同犯罪。（掌声）

由于人们议论这一案件，有一位专家曾向我表示担心，怕沙赫特区事件的外传，党和苏维埃政权可能发出的提高警惕的号召，会使工程师的称号本身变成耻辱，并激起排斥专家的浪潮。我回答他说，第一，工人阶级已经大大地成长了，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专家，我们就无法取得任何重大的技术进步，他们也知道在同排斥专家的态度作斗争时，我们可以依靠工人阶级业已提高的觉悟；第二，这一案件必定会使一切正直的专家更加接近苏维埃

政权；第三，我们有权要求而且必须要求一切正直的专家共同对付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叛徒。我们将在技术进步本身，我国工业化的实践本身，看到在这方面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从这一案件还应得出一个结论，这一结论是同新的专家干部，可以说是我们的红色技术人员有关系的。我决不能指责他们说，他们出于行会的团结心或者其他什么考虑，隐瞒了对我们抱着敌对情绪的专家们的某些过失、错误或蓄意的犯罪行为。我相信，他们不仅会正直地、而且会全心全意地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们的不幸在于，我们新的专家干部很少，增加这样的干部需要颇多的时间。为了使富有经验和学识的新的专家干部更快地成长，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我们的第二个不幸在于，在经济管理方面，许多担任经济工作的共产党员机械地对待交给他们的工作，而且过于“肤浅地”理解管理制度和管理任务。在党代表大会上，我曾把这种态度叫做“传动法”，照这种办法，负责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作用仅仅归结为在各个“部门”通过传送装置给他送来的一切东西上面签字。（笑声）这种使各个部门把一切收文发文送到负责的经济工作人员面前由他签字或者盖章的传动法，首先使得负责的经济工作人员本身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其次造成对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专家的工作不是进行检查和监督，而似乎是在挑动他们去胡作非为。（喊声：“对！”）必须使经济工作人员实际上不仅熟悉整个经济，而且熟悉一切技术问题。只有单纯的愿望或者只是明确这种必要性，那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力量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单靠资本主义制度遗留下来的、往往浸透了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专家来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改造我们的整个经济。在技术方面，新的红色专家和经济工作人员的作用也一定会不断地逐年增长。由党指派担任经济工作的共产党员，往往以为

领导工业企业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别人向我报告和说明，我来决定就行了。也常有这样一些共产党员，他们认为主持糖果厂或者炼铁厂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不管在哪一种生产中，反正都有内行人向他们报告，而他们则作出决定就行了。（掌声）必须使一切参加经济建设和领导生产的人都认识到，他们必须熟悉本行生产中的基本技术问题。

我们过于频繁地把一些工作人员从一个工作部门调到另一个工作部门，从一个工业部门调到另一个工业部门，这无疑是错误的。这种状况也必须改变，要使经济工作人员相信他们以前由于多年坚持不断地工作而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知识不会白费。我在这里特别是指那些担任经济方面的实际工作，同时又在高等技术学校听课的经济工作人员。必须使经济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工作中不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如何替别人的工作做报告上，不要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用于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或者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或者托拉斯作一般的报告和研究这些报告，也不要把时间用来拿着这些报告沿着我们各个机构的官僚主义长梯到处跑。必须使所有的经济工作人员完全明白，党和政府把某项工作交给他们的时候，期待他们的不只是关于他们考察别人工作的报告，而是全面研究自己的生产，不仅是从商业和组织经济的观点，而且还要从生产技术的观点来研究。毫无疑问，研究专门技能和生产技术过程是需要专门的教育和长时间的坚持不懈地埋头苦干的。但是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多少事情都有赖于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看作是自己切身事业的新干部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所以必须集中最大的力量、意志、毅力、坚定性和注意力来解决这方面的任务。
(热烈的掌声)

译自《真理报》1928年3月11日。

在苏联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1928年4月16日)

同志们，由于两个原因，我请求主席团允许我就会议讨论1927—28年度的预算问题讲几句话。第一，因为在讨论预算时，提出了一些具有一般原则性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与预算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却非常密切地涉及到政府的经济政策。第二，因为对今年的预算的讨论是在稍微有些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我认为，这种特殊情况与粮食收购上的困难有关、与所谓沙赫特案件提出的全部问题有关，而且也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本次会议上许多发言者所讨论的全部经济建设问题有关。

粮食收购运动的情况

市场的失调和粮食收购中的困难使预算的编制工作在各个阶段上都受到了很大影响。现在，有关大量增加预算收入部分的提案已提交会议讨论。在人民委员会审查预算草案时，我们曾受到了粮食收购困难的影响，而且我们当时十分怀疑，我们能否保证实现那个收入数额本来不大的预算，例如，那个与消费税和农业原料加工收入有关的部分。我们当时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一些纳税的工业部门的原料供应已经困难到了极点，以致很难指望这些部门能很顺利地完成计划。不光是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而且我们

的整个经济活动，都受到了粮食收购困难的影响。

政府很快就要讨论我国亚麻工业的问题。目前我们很可能完不成亚麻收购计划。原因之一是，我们未能及时把足够的粮食、葵花子油、工业品送到亚麻产区去，所以这些地区的农民就只好采取“自力更生”的方式，把大量的亚麻子加工成油料，拿亚麻去换粮食，等等。

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具有非常尖锐的性质。我们的时间非常紧，从一月到解冻前，我们必须把全国在下一个收获季节到来之前所需要的粮食备齐，光从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粮食收购运动从今年一月起所带有的突击性质。我所以讲到这一点，是为了使人们丝毫不要怀疑，政府并不认为这种收购粮食的办法是正常的，而政府之所以采用这种办法，是因为实际上没有别的办法。问题就是这样摆着：要么是一成不变地沿用往常的收购办法，那时，国家就得冒发生经济总危机的风险；要么就是采取非常措施来保障国家的粮食供应，使国家避免发生危机。

我们采取了第二种办法。现在已经取得保障整个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成果。但是，粮食收购的这种办法，也跟任何突击运动一样，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指的是，在不同的地区都发生了对政府的指示部分地加以歪曲或搞得过火的情况。

另一方面，就在粮食收购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又掀起了认购和推销农民公债的运动。这种同政府发展农业的整个方针息息相关并旨在满足农业需要的措施，遭到了富农阶层的敌视。

对于拥有大量存粮的农村上层采取了追交余欠和捐税的严厉措施，对于农村中隐藏了大量粮食妄图哄抬市价的富农阶层则采取了依法惩处的措施。他们（富农阶层）企图把这些措施看成是政府的农民政策的全面改变。

现在大家都已清楚，在粮食收购方面所采取的这些非常措施，

都是为了对付农村中富农阶层的投机倒把。勿庸讳言，如果我们能及早发现粮食收购上的挫折，如果我们能对实际上已经发生的情况有更大的预见性，那么，我们当然也就用不着费多大力气就可以冲破收购运动中的困难。

所有这些因素不能不影响到预算的编制，并且使人担心能否顺利地完成这个预算。但是，我再说一遍，我们现在已经摆脱了编制预算时期的那种紧张状态。

沙赫特案件的几个主要结论

目前形势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沙赫特案件。这个案件是一批敌视我们的专家利用他们在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地位，在我们经济建设的要害地点——顿巴斯，采取破坏活动的方法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这个破坏事件的事实本身来讲，并没有什么特别和惊人的东西，因为我国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残余，他们时时都在企图反对苏维埃国家。在存在着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或那个方面，这种现象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不断发生。沙赫特案件的特点表明，这个地区苏维埃的实际工作和经济组织系统不够完善，以致未能及时杜绝这种破坏活动。那些反革命阴谋家从事他们的这桩“事业”已经有好多年了。可是，无论苏维埃机关，还是工会机关，以及党的机关，在整个这段时间里都没有发现这批罪犯。这就是沙赫特案件的最糟糕和最坏的一面。由此可见，必须尽力改进我们的整个工作。我们在斗争中处于最有利的条件，因为斗争是在我们的领土上发生的，是在工人的中心顿巴斯发生的，在全部政权都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情况下，一小撮阶级敌人竟能长期地进行反对我们的破坏活动。这无疑就是说，在我们的工作中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缺点。

今天在这里发言的那位尼古拉耶夫工厂的同志，我看就十分正确地强调了一种应当并且能够用来改进这项工作的方法。他是这样讲的：“请多听听我们非党工人的话吧。”我甚至还要说，不光要听非党工人的话，而且要听全体工人的话；不光要听工人的话，还要听农民的话。我们的苏维埃机关应该比现在更进一步成为调动最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动精神的地方。我们必须使各级苏维埃的工作同志深入地了解我们所有建设部门的情况，并且不客气地批评我们无疑大量存在着的一切缺点。不然的话，今后类似的“沙赫特事件”还会重演。不光是苏维埃，而且还有工会以及所有那些把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机关，都必须改进工作。我们再没有别的可以用来防止沙赫特事件重演的社会斗争手段了。

我并不认为沙赫特案件使我们非得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对待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态度不可。参与反革命勾当的只是极少数的专家。十月革命后的十年来，我们在对待专家工作上是有所进步而不是倒退的。同早先比起来，大多数专家现在无疑是更加靠近工人、农民和苏维埃政权了。我们本身的缺点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各类不同的专家对我们所抱的不同态度，没有充分利用专家中间已经出现的分化过程。在我看来，沙赫特案件的结论之一是：必须使苏维埃政权和我们的群众组织进一步同那些愿意为发展我国的生产力而跟苏维埃政权一道真心实意工作的专家搞好关系。同这部分人搞好了关系，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对整个经济改造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也便于我们对那些不完全可靠的专家进行考察。总而言之，我们就会比过去更容易区分敌友。

沙赫特案件再一次清楚地表明我们对一般专家的迫切需要，而且还提出了专家不足和我们的经济干部不够熟练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在我之前发言的一个同志说得很对：“要让负责工作

人员不是在名义上，而是真正地负起责任来。”但是，如果你们叫我去当一个什么工厂，比方说，生产涡轮机的工厂的负责人，那我对那些据以生产涡轮机的设计图的质量是不能负责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虽说我是一个负责人，可是对于生产涡轮机却一窍不通；而要懂这一行，就必须有专门知识。如果我要把全部责任都亲自承担起来，那抱敌对情绪的专家就会愚弄我，而我却觉察不出来。为了对经济改造和改进工农业真正承担起责任来，就需要有比我们现在多得多的大批优秀的和更靠近工人阶级、农民和热心于新社会建设任务的专家干部。不久以前，我曾在一次报告中引用了一份调查材料，其中提到：我们的专家对工人人数的百分比是略高于百分之二，而外国平均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我们的专家和科技人员的数量实在太少，对于解决我们给自己提出的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非常艰巨而重大的任务来说，是太不够用了。

为了彻底地改造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经济，为了在最短期间内重建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业，光是投入大量资金是不够的。为了合理地、最有成效地利用这些资金，就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和科技人员。我们在整个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缺点，并不仅仅在于我们（从预算和别的来源）拿不出多少钱来，而且在于我们还不会很好地利用这些钱，不善于在短期内就用这些资金取得我们国家所特别需要取得的成果。当然，主要的障碍在于我们技术和文化上的落后。在一、二年里是消除不了这种落后的，而为了克服这种落后状态，还必须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在发展我国高等院校和专门科学机关方面拨出大量的经费。如果我们解决了下述两项任务：一方面吸引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到苏维埃、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里来，保证在这些组织里能对我们的一切工作进行批评，并吸引群众参加领导工作；另一方面，发展技术专门知识并

使靠拢苏维埃政权的专家干部增多，那我们就可以保证“沙赫特事件”今后不再重演。

这就给经济工作人员特别尖锐地提出了一个任务：不光要善于研究工业组织问题和一般经济问题，而且还要善于研究生产技术问题。这就要求他们必须顽强地去求得专门学识和研究技术问题。

预算是整个经济计划的最重要的部分

现在，请允许我就预算的情况讲几点意见。会上已经有人指出了今年预算编制工作中的两个缺点。第一，预算的编制和批准的时间过迟。第二，编制预算时犯了有关共和国预算权的法律。这两点指责都是完全正确的。过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编制的只是国家行政预算，即是说，大体上和资产阶级国家所编制的那种预算一样，那我可以向大家担保，我们编制这种预算会比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都要早得多，也好得多。我们编制预算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它实际上是整个经济计划的最重要的部分。必须做到，在今后几年里将预算作为苏联整个经济计划的一个部分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报告。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预算编制得迟，是因为苏联整个经济计划编制得晚。在一月份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才收到生产财务计划草案。其所以如此，除了经济机关和计划机关工作上的缺点以外，还因为编制象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样一个共和国的生产财务计划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已经不能只限于编制所谓联盟工业的生产财务计划了，因为共和国工业、比较小的工业和地方工业的产值现在已经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既然讨论联盟工业的计划与讨论共和国工业和地方工业的计划分不开，所以对于那些与编制生产财务

计划有关的各种困难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今后，我们必须这样来编制经济计划，即把计划中的一些细目砍掉，以便保证能在较短时间内就把计划编制好。如果说预算编制过迟是个大缺陷，那么经济计划编制晚了就是更大的缺陷了，因为不管是一个工厂企业，还是一项建筑工程，都不能不由于什么地方没有制定出生产财务计划而因停工造成巨大损失，更不必说春秋的播种运动取决于农时，而不是取决于我们经济机关和计划机关工作的结果和期限了。及时地编制经济计划在我国整个生活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再说一遍，经济计划编制过迟，要比预算编制过迟更糟糕。在我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编制计划的方法简化，把计划中的许多不必要的细目砍掉。

预算的编制，违犯了各共和国印花税分摊方面的法律。在同预算委员会的几个同志谈话时，我问他们还主不主张恢复法律的效力。可是，我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支持者，并且我想，这次会议也未必能找到这样的支持者。照我看来，这就说明，违犯法律是由于形势所迫，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利益要求把根据正式法律我们就无从弄到的那些钱用于工业和运输业。既然如此，是否应该修改预算法呢？我认为，修改法律的问题未必非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本次会议期间解决不可。最好是再等一年。不过，我不相信在今后几年里，我们在预算法上能找到一种适当的表述方法，以致使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不必在某种情况下对预算法略加变动。为什么呢？因为我国现正处于我们的经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暴风雨时期。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税收以及收入在各种用途方面的分配也经常发生变化。在这个高度紧张的时刻，要制定出一项既考虑到现在正发生的一切变化，又能把这一切变化以明确无误的法律规范固定下来的法律，那是非常困难的。

我国预算乃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主要方法之一。这就

决定了它的基本内容。在这里，有一个人，好象就是拉林同志，他把预算的收入项目分为两个主要部分：非税收收入（据他说，这与从居民那里收回资金无关）和税收收入，并以此为根据企图批评我们的财政政策。这种分法完全是相对的，假若据此得出某些原则性的结论，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在我国的情况下，非税收收入和税收收入之间并不存在很大的原则区别。

什么是非税收收入呢？这就是列入预算的我们经济机关的利润部分。我们从一俄尺花布上获得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戈比的利润，跟通过间接税，即消费税从同样的东西上提取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戈比会有多大区别？我看这里并无区别。在资产阶级国家倒是存在着区别，因为在那里的税收归预算，而工业收入则归资本家。在我国，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角度来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是自己规定价格和税收。价格制度同样地也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非税收收入和税收收入之间的区别根本不象拉林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在直接税上可以非常彻底地和准确地贯彻我们的阶级政策，使穷人得以免税，而向富有的人课税。因此，在预算的税收部分贯彻阶级政策的可能性要比非税收部分大得多。同时，通过直接税要比通过间接税更容易作到这一点。

如果说我们预算结构上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直接累进税的因素到目前为止还只占预算的一小部分。要改进我们预算的收入部分，当然，就必须同提高直接税的比重联系起来。

这里提出来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我国货币的购买力和外国货币的购买力对比问题。我并不怕被别人指责我有“资产阶级倾向”，应该承认，我国货币和外国货币的购买力的对比，现在还不如1913年。完全没有必要把这种情况掩盖起来。确认这个事实，无论过去和现在都算不上什么“资产阶级倾向”。我们的整个经济都受到空前未有的破坏，其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资产阶级

国家。只是最近几年，我国货币同外国货币比价才开始趋于好转。布留哈诺夫同志曾经讲到这个情况，他提到由于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卢布的购买力在去年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五。

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因为这说明，我们的情况在开始好转，出售的东西开始便宜起来，开始在这方面追赶外国了。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赶上。我们在降低成本方面已经多少作出了一点成绩。就是在这方面也还没有象我们预计的那样完成政府提出的任务。在本年度和今后几年里，我们在降低成本和价格方面必须取得比最近两年还要大的成就。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私商的问题。同一个拉林同志在谈到私商时，好象说我们这里有人在纵容私商，并说如果有人问“在俄罗斯谁过得快乐和自由？”，那他就会说是“私商”。对不起，对于这一点谁也不会相信。

近两年来我们一直在加紧把私商从商品流转领域排挤出去。对私商课的税越来越重。要是大家看看近几天的报纸，你们就会看到，莫斯科苏维埃（乌格拉诺夫从坐位上说：目前尚未收足四百万）和乌格拉诺夫同志在讨论一个问题：用什么样的国家机关来取代那些沿街捧着托盘兜售小面包和火柴的婆娘。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地来取代那班“私商”。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并不是私商在增加——他们没有增加，而是虽然生产上升得很快，商品却还是不足。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这一方面，而不在于把那些捧着托盘的婆娘从大街上赶跑，并且用“合作社的”或“苏维埃婆娘”去取代她们。（笑声）

预算委员会的草案把对超额利润的课税从上年的一千一百万卢布增加到一千五百万卢布。如果把这件事提高为一个原则问题，那就错了。在地球的六分之一土地上，把对私商的超额利润的课税增加四百万卢布，也“出不了大乱子”。拉林同志也许会走上讲

坛来自命不凡地说：“毛病就在那儿，还是我们把它纠正过来的。”实际上那不过是压死了一个跳蚤而已。（笑声）预算上的缺点和错误并不限于那笔四百万卢布的款子。预算经过会议审议之后，将仍存在缺点和错误。但是若因此就把它们提高为原则问题，那就是不能容许的和有害的牵强附会。在对私商的课税上，还存在着很多缺点和错误。

凡是在我们能够查明私商收入的地方，常常我们能通过课税在转眼之间就让他们“完蛋”，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大笔的私商收入会完全逃脱课税。困难主要在于：我们不可能查明私商能够获取的并借以使自己得到发展的全部收入。这是否就是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无能呢？照我看来，一个机关如果得不到整个苏维埃制度的帮助，就胜任不了这样的工作。任何一个人民委员部都不能用官僚主义方法来搞好这个工作。在这里，必须共同努力使私人资本无从逃税，并且利用课税极其严格地控制私人积累的增加。这就是我们在贯彻执行对于私人资本的政策方面实际存在着的困难。所以，我绝不能承认诸如此类的指责是正确的，如说布留哈诺夫同志、弗鲁姆金同志、库兹涅佐夫同志，或者整个财政人民委员部都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即使事情果真如此，应该挨骂的也不光是他们这几个人，而应该是整个人民委员会。搬出这类无中生有的指责，硬说在最敏感和最重要的地方，在我们的财政政策领域都受着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近两年的情况恰恰说明，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私人资本的作用在日益削弱，私人资本处处都受到排挤。苏联政府已经颁布了很多法律来提高对资产阶级的课税，改善劳动人民和贫农的生活状况。对城乡劳动人民一视同仁。在这里，绝不能抱着偏见把这些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问题同卢布的购买力问题扯在一起。在我们

无产阶级共和国联盟里，即使有时发生卢布购买力下降的情况，政府也会采取一切办法来保障工人的利益、贫农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并将在这样的条件下设法提高各阶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掌声）

我们从来不曾使我们的阶级政策完全以货币流通领域的某一措施的成功与否为转移。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不管其货币的命运如何，总是靠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来使那些富裕的、有产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和私有者阶层增加收入的办法来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而我们则不同，不管现在和将来我们都是从保障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利益的角度来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的。这就是我国整个财政政策和已经提交给大家的预算的特点。（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真理报》1928年4月20日。

中央十一月全会的总结

(1928年11月30日在列宁格勒党组织
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中央全会已在前几天结束。全会所有决议都获得一致通过。

中央全会开了八天。很清楚，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要把中央全会曾经讨论过并作出决定的所有问题稍微详细地加以阐述是办不到的。

列入中央全会议程的有四个问题：关于1928—29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发展；关于七小时工作日的初步总结和继续推行；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和发展农业的措施的报告。

全会议程的前两个问题，即关于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和党的成分问题，是就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作定出总方针的一些问题中的最重要问题。

关于七小时工作日和北高加索农村工作的报告，具有最重大的实际意义。但是，这两个问题没有涉及到需要加以评论的一些原则性的因素。中央委员会听取北高加索委员会的报告，为在自己的全体会议上经常听取最大地区党组织的报告开创了先例。这种办法可以改进经验的交流，使我们有可能更加切实地着手研究地方的工作，在作出有关共同的问题的决议时，可以更充分地研究地方的工作，并根据地方的经验来检查这些决定。

刚刚闭幕的中央全会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关于控制数字和调整党的发展问题上，因为这两个问题涉及一系列原则性的因素。所以，我请你们特别注意我在报告中叙述这两个问题的部分。

工业化的道路

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由于现在必须解决这一问题的整个经济和政治情况非常复杂，同时也是由于这个问题的本身性质非常重要。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是全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这个计划将预先决定大量的物质财富从一种社会成分转到另一种社会成分，从一个经济部门转到另一个经济部门。因此，控制数字将预先决定阶级对比关系的变化，当然，在估计控制数字时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这些数字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工人阶级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加强。1928—29 年度的控制数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前整个经济工作的继续，而这些数字的实现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以后各年的形势。不能把控制数字同以前各年割裂开来看，也不能不估计到这些数字对最近几年内将有一定的意义。

我不准备详细谈论作为我们一切决定的前提的那些问题。中央全会所持的出发点是，国家的工业化和由此而来的工人阶级政治作用的加强，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方法。中央全会所持的出发点是，之所以要竭尽全力来加快工业化的速度，是由于我们经济的需要，也是由于国际关系的需要；只有在最短期间内我们能在组织生产、改进生产的技术生产基础方面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在我们联盟发展的现阶段，重工业的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对于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提高都有决定意义。所有这些原则不仅在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

和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早已固定下来，而且也在每个党员、以及大多数工人和一般劳动人民的思想中早已固定下来。

在说明我们已经在国家工业化道路上取得的成就时，我不打算列举一大串数字，而只想谈一谈其中最重要的数字。在这里，我首先应当举出两个数字，因为这两个数字说明了由于我们近几年来的工作而在国家经济中所取得的巨大进展。这些数字涉及到农业和工业的对比关系，农业是我国社会经济体系私人成份的主要中心，工业绝大部分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类型。很明显，关于这些对比关系如何发生和以什么样的速度发生有利于工业的变化的材料，关于我国经济中社会主义工业的比重是否增长和以什么样的速度增长的材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的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指标。

苏联 1925—26 年度工业的总产值约为一百二十五亿卢布，农业的总产值约为一百七十三亿七千万卢布，换句话说，工业创造出来的价值大大低于农业创造出来的价值。1928—29 年度，根据我们在中央全会上审查过的控制数字来看，工业总产值将增加到一百九十多亿卢布，而农业的总产值则将达一百八十六亿二千四百万卢布（这些数字都按 1926—27 年度不变价格计算）。由此可见，在最近几年（1925—26 年度、1928—29 年度），党和工人阶级的工作成果，表现在工农业的对比关系和工农业比重的对比关系方面都发生了有利于工业的急剧变化。当然，这种对比还没有证明，我国已经变成象德国和英国那样发达的工业国。在这两个国家中，这种对比关系有利于工业的程度比我国大得多（而在英国则大得无法比拟）。然而，无可争辩的是，从 1925—26 年度起，我们完成了标志着工业和工人阶级的状况极大巩固的工作。

过去和现在伴随着这一过程而来的，是生产资料生产的急剧

增长超过了轻工业的发展。1928—29 年度的控制数字预定重工业几乎增长百分之二十，生产日用品的轻工业增长百分之十五点六。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过去和现在都超过轻工业。这一事实的意义用不着加以说明，因为下面一种无可争辩的情况已使这种意义变得非常明确了，这就是：如果我们国内能够稳定地供应煤和石油、生铁、铁和机器等产品，如果我们能够广泛地发展化学工业并使全国电气化，国家工业化就能够顺利进行。

在重工业部门中，发展速度显得特别快的是：内燃机生产部门（比上一年度增长百分之四十点三）涡轮机制造业（增长百分之一百三十七点五），农业机器生产部门（增长将近百分之三十），化学工业（如过磷酸钙增长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硫酸增长百分之四十五）；发电量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四。这是我们党千方百计加快生产资料生产速度的决议正在顺利实现的最好证明。与战前相比，现在我们的内燃机生产达百分之四百多，1928—29 年度农业机器的生产将超过战前百分之二百八十。上一年度，各地区电力站的发电能力几乎已经超过了战前的两倍。自然，我们大家都非常明白，这些部门在旧俄都处在萌芽状态。因此，在这些很高的百分比背后是一些不能使我们满意的不大的绝对数字。然而，这些工业部门近年来的发展速度，无疑地说明了我们在重工业、特别是在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极大成就。同时，有许多生产部门是我们第一次初建的。

当我们分析这些成就并且讨论能否再稍稍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些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最宝贵的、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最革命的工业部门——金属加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现在正遇到原料即生铁不足的困难。在许多情况下，妨碍这些部门发展的，不是设备不足而是生铁不足。尽人皆知，原料即棉花、羊毛等等的不足，是束缚轻工业发展的桎梏。但是，人们不知为

什么直到最近仍很少注意这个事实：例如，要不是生铁不足，金属加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幅度还会更大一些。

轻工业原料问题的解决是同对千百万分散的个体生产者的态度问题分不开的。这些生产者的经济目前处于很低的发展水平；要知道，棉花、羊毛、亚麻和皮革，这一切都是农产品。

我们是在另一种社会经济条件下解决金属工厂的原料问题的。我们有的是矿石，因为整个矿业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由此可见，在我们这里不存在当我们和分散的千百万小个体经济打交道时所遇到的那些社会经济障碍。矿业的发展和生铁的生产直接取决于生产技术能力，当我们对这个问题给予一定的注意、善于安排工作和增加费用的时候，这些生产技术能力可以扩大到所需要的程度。现在应该比以前更加重视生铁问题。

由于生铁不足，我们现在还不能使机器制造业更加迅猛发展。我们通过机器影响农业，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机器是在集体化的原则上改造个体生产者经济的最重要杠杆。现在，我们在许多轻工业企业中实行七小时工作日的三班制，但是，由于国内金属制品和机器奇缺，迄今在金属加工工厂和机器制造工厂中不仅不能实行三班制，甚至经常不能实行两班制。

1928—29年度控制数字的一个很大弱点，就是在靠少年和乡下人来增加劳动力的情况下，工交战线上就业工人的数量增加得很少。如果不是生铁未能完成计划，我们本来靠金属加工工厂增加班次的办法，既可以在工业中增加就业工人大军的人数，又可以加速工业化，缓和商品荒现象。依靠增加班次的办法，例如，在列宁格勒的金属加工工厂和机器制造工厂中，就可以把这些工厂周围的闲散劳力都利用起来。当然，要这样做就不得不在某些方面进行改造，扩大住宅建筑，但是这样做比建设新的工厂更容易并更节约。用两班制、尤其是三班制来代替一班制，就会加快

资金本身的流转。但是，由于生铁不足，我们不能这样做。

当然，可以而且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把废金属和金属下脚料等等收集起来加以利用，但很明显，这不是解决金属问题的办法，必须采取措施扩大生产技术能力，以便增加金属原料的生产。因此，无论人民委员部、政治局还是中央全会，在审查生铁问题时所持的出发点是，拨出尽可能多的资金来发展矿业和高炉的生产。因此，着手兴建象西伯利亚的帖利别斯工厂和乌拉尔的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这类新的冶金工厂，加强现在开工的冶金企业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时，必须抛弃我们机关刊物上一度流行的那种偏见：仿佛从国外进口黑色金属生铁是“可耻的”，必须进口的只应当是现成的机器。如果我们可以自己能够制造优良的机器，那么在生铁不足时进口生铁对我们就更有利。

现在生铁问题是工业任务链条中的根本环节，采取各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生铁，还是生铁，这个口号应当是今年和最近几年中工业工作的中心口号。

本年度我们要大力推动的另一个工业部门就是化学工业。去年度我们对化学工业的投资是三千二百万卢布，本年度将投资一亿一千万卢布。资本主义俄国遗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化学工业的嫩弱幼苗。我们几乎是白手起家地建设化学工业。我们同过去的水平相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的化学工业水平相比，这种成绩太小了。

化学工业发展的问题，或者象我们这里目前习惯地叫做国家化学化，现在，当它正在经历着发展的最初阶段时，不仅应当引起专门经济机关，而且应当引起整个苏维埃舆论界、科学组织和全体工农的特别注意，就象当时国家电气化问题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一样。无论是从提高农业（采用矿物肥料）和增加轻工业资源

(例如人造纤维)来看，还是从巩固国防来看，化学工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谈到重工业和轻工业时，会听到这样一种意见，据说，仿佛化学工业或金属加工业的发展同克服商品荒现象的任务有矛盾。自然，投入生产资料生产中的千百万卢布对于日用品是不能立即产生效果的，它们只能在将来对日用品，即对它的数量、质量、价格便宜发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它们将根除商品荒现象，同时从根本上减少我们对于外国资本的依赖，而广大市场上也会对金属制品和化学工业品提出巨大的需求。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机器、化肥）将提出大量的需求。因此，无论是化学工业还是金属工业，除了在靠重新装备我国经济和使经济合理化来发展国家生产力这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外，就是作为克服商品荒现象的工具来说也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易于在对整个经济最有利并且在最需要的方面同商品荒现象作斗争。

我们将靠发展金属工业和化学工业来为实现农业技术革命（化肥、机器、建筑材料等等）创造条件。

除生铁以外，建筑材料的生产是我们当前建设必须克服的一个难关。某些建筑材料短缺到只能满足对其需要的四分之一左右。在扩大工厂、铁路以及住宅建设的时期，克服建筑材料不足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建筑材料短缺，建筑单位只要能弄到所需材料就不顾价格和质量，在这种情况下，使争取建筑成本低廉、建筑材料价格降低和质量提高十分困难。然而，能否顺利完成在改造时期起关键作用的基本建设的宏伟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筑工程组织的改进，取决于及时供应这些工程以质优价廉的建筑材料。我们建设成本之所以高，主要是由于建筑材料不足、价格过高以及质量低劣的缘故。

在本年度的控制数字中，规定把对建筑材料生产的拨款增加到一亿零五百万卢布。但是，要杜绝这种或类似的“危机”，光靠金钱是不够的，必须改进我们的经济和计划机关的工作。象砖之类材料不足的现象，最不能用客观条件或生产工具缺乏来解释，因为我们这里有的是原料，而且又不需要特别的设备和技术——在这方面更多地应当归咎于我们的笨拙。

至于轻工业的前景比重工业还不如。规定棉织品增长的幅度只有百分之七至八，毛织品增长百分之九，亚麻织品则缩减约百分之二。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我们大力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不得不减少轻工业基本建设的拨款所造成的。轻工业发展的这种相对缓慢的速度，也不是由于偏离了我们发展的总方针。如果我们能使轻工业具有更大得多的规模，我们一定非常乐意这样做。但问题是我们在乎此遇到原料（棉花、羊毛、皮革等等）不足的困难。如果不发展这几种原料的生产，也就是说，如果不使我们的农业大大提高；如果不彻底改善进出口的前景，也就是说，如果不增加我们的出口、因而也不增加进口，我们就不能立即向前迈出大步。即使从国家整个形势来说，特别是在我们同农业结合方面来说，都非常明显地看出必须最大限度地发展轻工业。

组织和发展人造原料的生产，作为一种克服轻工业原料困难的辅助办法，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中央关于 1928—29 年度控制数字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只提到关于人造纤维的生产；根据茹柯夫同志的建议，我们扩大了这项任务，并且增加了关于不仅安排纤维的生产，而且也安排人造羊毛、皮革代用品等等生产的指示。用人工合成办法生产轻工业部门的原料，在欧洲和美国已经非常盛行。诚然，这种发展在那里遇到了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引起的特殊困难。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工作，有时受到投入旧技术上的巨额资本的阻碍：不愿冒使这些巨额资本

贬值风险的资本家，经常阻碍在新的技术基础上组织生产。非常有势力的资本家集团为了避免自己的巨额资本受损失，走上了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隐瞒发明等等）的道路，垄断资本主义这种腐朽的例子就不必多列举了。由于社会关系不同，我们不存在这种阻碍势力。我国社会制度在技术革命方面的潜力比资本主义国家大得无法比拟。即使在化学工业方面，我们也没有遇到固定资本贬值的危险，我们是生活在商品荒十分严重的环境中，另一方面，对于安排人造纤维的生产来说，我们原料的前景非常广阔。尽管这类生产的发展十分重要，但我们在这方面遇到了我们的无能、没有文化，以及缺乏善于安排人造原料生产的专家这一类困难。我们的人墨守成规、笨头笨脑，在这方面同样也起着不小的作用。我们在去年已经开始组织生产人造丝的工作，并且决定在今年以更大规模继续进行。我们在你们列宁格勒这里正在兴建第一座工厂。这项工作本来以前就可以并且应该做到的。对这个问题目前应该更加予以注意。

基本建设费用，成本，合理化

在目前这个时期即改造时期，基本建设费用的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最近三年来，我们用在工业基本建设的资金数字如下：1925—26 年度为八亿一千一百万卢布，1926—27 年度为十亿九千万卢布，1927—28 年度为十三亿一千八百万卢布。总共这三年中所用资金约为三十二亿二千万卢布。其中重工业的基本建设费用，1925—26 年度为五亿多一点卢布，去年则为九亿三千九百万卢布；轻工业的基本建设费用，1925—26 年度为二亿九千三百万卢布，去年度为三亿七千八百万卢布。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资金通过预算从我国其他经济部门转移

到工业方面来的数量也增加了。你们知道，工业从国家预算中得到了大量资金，而它只向预算缴纳利润提成和支付捐税。如果把工业从国家预算中得到的钱和它上交预算的钱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这种差数构成了所谓有利于工业的差额。从财政人民委员部送给我的资料看，有利于工业的结算总计的差额（包括军事工业、电气化和出口奖励），1925—26 年度为七千七百三十万卢布；1926—27 年度为三亿一千三百四十万卢布，1927—28 年度为四亿七千七百三十万卢布，1928—29 年度约为八亿一千九百万卢布。这些数字如果算得更准确些可能还有些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会太大。

我们预计 1928—29 年度基本建设费用的数额为十六亿五千九百万卢布，比去年增加三亿四千多万卢布。其中十一亿七千三百万卢布用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总共只有三亿六千五百万卢布用在消费品的生产上。可以看出，工业基本建设费用的绝对数字、这些投资的增长以及资金再分配到工业方面的急剧程度，都是十分巨大的。

现在必须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我不得不多次做报告并在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专门指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质量、关于为了整个国民经济取得最大效果而如何最好地利用这些资金的问题。要知道，同样数量的一笔资金，可以多做一些或少做一些事情，可以把事情做得好或做糟。尽管在建设工程的组织上，计划上，以及在建设新工厂的能力上还存在着重大的缺点，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去年度比前年度错误犯得少一些，建设搞得更好一些。无疑地，本年度我们在新的建设事业上还会克服部分错误和失算，因此，本年度每一个卢布的投资都意味着工程量比去年度更大。由此可见，如果在提高工程质量方面也有这种改进，那么工业化的速度就会比仅仅根据基本建设拨款数字来判断更

加显著。

从投入国民经济的巨额资金中取得最大效果，是目前问题的关键。如果工业基本建设费用接近五十亿卢布的话，那么无论是党还是国家都可以、而且应当向我们的工业提出比以前更加严格的要求。这些费用（五十亿卢布之内）不仅应当表现在商品数量的增加上，而且应当表现在成本的降低和工业内部积累的增长上。

你们大概知道，工业品成本的降低在 1927—28 年度第一次达到约百分之五，但是还大大落后于我们的指示，几乎不能适应投资的数量和我们建设的规模。我们建议 1928—29 年度成本降低必须完成的最低数字不得少于百分之七。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最近一年国家整个经济发展计划将处于危险境地。成本每降低百分之一，就接近一亿卢布或一亿卢布左右。降低百分之七就等于七亿卢布左右。不能完成这百分之七中的百分之一，将给整个经济计划造成一个大漏洞。我们正在使国家工业化，对工业投入了大量资金，目的是想通过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改善生产组织并使其合理化、减少失业现象等等办法使这些投资最快地取得效果。然而，在质量指标方面，我们迄今仍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美洲和欧洲的先进工业国家。只要看一看下面美国在合理化方面所达到的几个例子，便可以知道我们落后得惊人：美国在 1914 年由一百个工人完成的工作，1924 年在化学工业方面由六十五个工人就能完成；在金属加工业方面由五十九个工人就能完成，在运输业方面由三十个工人就能完成；美国的劳动生产率 1925 年比 1919 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九，在个别部门甚至增加得更多，例如，汽车制造业增加百分之一百七十二，石油提炼工业增加百分之八十三。在橡胶工业中生产率增加百分之二百一十一。我担心你们那里的“三人领导小组”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和你们都想要务必做到这一点，即赶上并且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美国暂时比我们

走得更快一些。因此，工作质量的问题便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加快提高质量的进度，加快生产过程和全部工作合理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费用、改善产品质量方面的进度。这一点无论如何都要做到。

在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讨论降低成本问题的时候，许多同志提出了比降低百分之七更高的任务，并且认为这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但是，最后我们大家都同意决定降低百分之七这个幅度，不过这是最低的幅度，是硬性规定的、绝对要遵守而且无论如何必须完成的，就象在战争中完成战斗任务一样。

我们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工业在这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其中主要是：组织技能很差，在实践中不善于采用西欧和美国的技术——这是主要困难之一。结果有时、而且可能经常发生这种现象：机器安装的地方不合适，材料供应组织得不好，厂内运输情况更是不值一评，——总而言之，就在这种虽说是不完善的技术和设备的范围内，仍然没有把合理化工作的巨大潜力充分加以利用。我应当在这里着重指出问题的另一方面，这就是合理化和降低成本的任务是同坚决加强工厂的纪律性以及同旷工、玩忽职守等等作风作坚决斗争分不开的，是同与各种事故（即使不常发生）作坚决长期的斗争分不开的，而这些事故是工人、专家和行政当局之间关系不正常的表现。

合理化和充分利用工作日的过程正是在我们发现沙赫特案件和其他许多案件的时期中进行的。这一点在个别、诚然是罕见的情况下引起了敌视非党专家的情绪的爆发，有的地方甚至对我们党员经济工作者的工作也造成不很有利的局面。这种不良现象无论如何必须杜绝。我们这里缺少专家已经达到不可容忍的地步。从工人和农民中培养新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干部要许多年才能成长起来，我们正在增加拨款并采取措施来培养红色专家，这样做是

正确的。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来扩大这些措施，但是我们现在仅仅培养出第一批红色专家，要使他们成为优秀的工程师和技术熟练的专家，还需经过多年的实践。当然，我们始终要采取各种手段和办法同那些从事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专家进行斗争。但是，应该使那些和我们一起忠实工作的专家生活在没有敌视专家气氛的环境中，如果象我上面说过的那样，我们在增产生铁、增产人造纤维以及我国轻工业的其他各种人造原料这样一些极端重要、对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方面遇到技术上的困难，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或许甚至在决定性的程度上表明，我们这里缺少必要的、熟悉自己业务的、技术高明而有主动精神的专家和行政组织人材。

专家的问题，挑选组织者和行政干部以及提高经济领导干部的问题，把对他们工作的监督同让他们在业务工作上有很大独立性、同发挥和鼓励个人首创精神、同允许在采取新设施时有一定犯错误的权利结合起来的问题，在当前发展阶段即改造经济和生产合理化的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工业发展方面、在技术非常复杂的新的生产的安排和发展方面、在总产量的增长方面、在我们整个前进速度方面能够获得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问题的顺利解决。全体工人、直到最落后的季节工人和刚进厂办学校的工人都应当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那些证明经济工作人员工作环境不顺利的情况，即使是不多的罕见情况，都应当使之绝迹。党和工人阶级选拔了自己优秀的代表和干部担任经济部门工作人员的职务。经济部门工作人员应当同工程师和技术员一起，首先在实践上解决合理化的任务，而象在“快步”制鞋厂中发生的事件，那怕是仅仅发生一次或是不多的几次，都是不能容忍的。必须尽最大努力来造成这样一种环境，

它既能完全适应顺利解决生产合理化方面最困难的任务，又能保证无论直接是工人群众、工会还是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专家都能在这方面积极工作，只有依靠自我批评、加强生产会议的工作、更加细心和积极地对待一切群众组织的经济问题、把优秀工人提拔到经济工作岗位上等办法，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我们不但不能根除令人发指的官僚主义，而且还会助长官僚主义；不但不能纠正错误，而且还会增加错误。

从我就工业的谈话中可以得出下面一个总的结论。工业正在急剧增长，目前工业的发展已超过我们计划的设想。上一年度的实际产量超过了控制数字。目前我们工业生产的水平高于两三年前我们所预期的水平。我们尚有个别未完成计划的现象（如生铁，建筑材料，成本降低不够，同技术落后现象作斗争的进展缓慢），但是这不能改变我们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突飞猛进的总的情况。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权利说，我们在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中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我们是在资源和资金不足、技术和文化落后、经验缺乏以及显然缺少专家和一般技术力量的情况下取得这些成就的。我们将依靠这些辉煌的成就满怀信心地前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曾经大力捍卫的电气化计划现在正在顺利实现，而实际上，我们不仅没有落后于这个计划，而且还可能超过这一计划。即使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工作进展得多么快。要知道，当这个计划刚刚产生的时候，许多人曾对它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它。

农业和粮食问题

工业化计划的进一步发展和顺利实现有赖于一个根本问题、即农业问题的解决。中央全会关于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决议全文，

起码有一半是专讲农业问题的，这并非偶然。十六项任务中至少有一半是谈论农业问题的。

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总路线改变了，而是因为在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是，除了在工业方面取得最大的成就外，农业的状况已成为国家工业化和工业进一步发展的极限。如果我们最近不能在这个经济部门中取得巨大成就，那么，迄今我们看到的那种工业发展速度就不能保持下去。

这一思想既反映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中，也反映在最近几次中央全会的决议中。这一思想在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决议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这项决议规定：“农业是工业的基地，农业的发展也就是工业化的粮食基地和原料基地的发展。如果没有农业的相应增长，工业化的持久发展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黑体字是决议中原有的）

这一段话说明了国家当前整个经济形势的一个基本问题。因此，我要在报告中稍微详细地谈谈农业问题。

我先从粮食谈起，粮食问题在今年将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这首先是由于收成所造成的。今年全部粮食的总收获量比去年增加七千一百四十万普特，但是，主要粮食作物黑麦和小麦的收获量比去年减少二亿一千二百万普特。你们大家都知道今年歉收的一些原因，——顺便说说，这是由于乌克兰草原地带和北高加索个别地区的秋播作物和部分春播作物颗粒不收的缘故。

这种情况也预先决定了我们的粮食收购计划。我们打算收购六亿普特的粮食，而去年度实际收购的粮食是六亿二千七百万普特，也就是说用于集中供应的收购计划低于去年度的计划。但是这些数字不能作为标志，因为除了集中供应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有计划的、但是称作分散的供应。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把两年粮食收购计划加以对照就会出现下面的情况：本年度我们打算

收购的粮食是七亿普特，比去年度实际收购的六亿八千万普特略多一些，也就是说我们打算比去年度多收购二千万普特。

怎样进行收购呢？我们到10月底止收购了（通过集中收购机关）二亿三千六百万普特，而去年度则收购了二亿二千四百万普特，即比去年同期略多一些。

这一相当顺利的收购进程同中央七月全会的决议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些决议决定从所谓非常的收购方法改为正常的市场方法，并决定提高粮价。这就大大改善了我们同农村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由于受非常措施的影响有些地方曾经显著恶化。

目前粮食市场的状况如何？如果用“加权平均”的指标来说明它就错了。有的地区存在自由价格，即私人出卖时的市场价格，这种价格同国家的收购价格几乎没有差别，或差别很小。

整个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部分区域都是属于这类地区。然而也有这样一些区域，在那里我们的收购价格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很大。例如，有些地区私人出售粮食的价格比国家收购价格贵一个半到两个卢布（比去年度贵二十五到三十戈比）。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是因为本年度对粮食的需求大大增长了。

在粮食不能自给的地区，尤其是在你们的西北省，粮食比去年度少收近八千万普特。象乌克兰和北高加索这样的地区发生歉收，给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在若干地区已经发生了对粮食进行投机倒把的活动。

最近五天来，我们发现粮食收购的数量减少了。部分原因是由于道路泥泞。然而，仅仅道路泥泞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粮食收购数量减少的原因。显然，在这里一定有许多别的原因。必须注意，9、10两月粮食收购数字很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贫农、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部分中农订了运输粮食的合同。现在，大部分农民赚到工资后已从城市返回农村（特别是由于建筑工程竣

工)，因此，他们能够用现金交清税收。也应当看到，越往后，农业税对刺激出售粮食的作用就会越低，因为到目前为止农业税大部分已交完。另一方面，目前农村市场上能够加强提供粮食的一些商品感到不足。当然，富农就利用这种情况鼓动不要出售粮食。这些原因和别的许多原因加在一起，便开始阻碍粮食收购工作，使粮食收购进展缓慢。因此，有必要采取一系列能够保证加快粮食收购进度的措施。这些措施是：从城市增运商品下乡，把粮食从边远地区运出来，及时收税，同可恶的投机倒把行为作斗争；主要的措施是：检查和改进全部基层收购网，合作社和我们收购机关的工作，加紧在贫农和中农中进行社会政治工作和反富农的工作。

本年度的粮食供应按季度分配比较平均：我们在本年度10月至12月预计供应一亿四千二百万普特。去年度同期消费一亿四千一百万普特。1月至3月预定供应一亿五千万普特，而去年度同期则消费一亿九千七百万普特。4月至6月我们计划消费一亿四千二百五十万普特，而去年度同期则消费一亿零四百万普特，这就是说本年度的情况略有改善。去年7至9月，供应量下降到七千三百五十万普特，这是大幅度的下降。今年，我们将避免去年发生的按季供应的这种大幅度波动。如果我们能够消除去年发生的从第三季度供应一亿九千八百万普特下降到供应七千三百万普特（7月至8月）的那种波动现象，我们就能够避免去年城市市场上出现的那种恐慌情绪，那时一个月中粮食消费过多，而另一个月则按大大缩减的标准供应。

对粮食的需求增长得比农业生产快。除了人口的总增长自然会提高对粮食的需求而外，今年由于个别地区（即使你们这个地区也好）的歉收也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我国每年人口增长的数量相当于两个有三百多万人口的列宁格勒这样的城市。如果用

“欧洲的尺度”来衡量我国人口的增长量，那么我国每年增长的人口等于丹麦全国的人口，超过挪威全国的人口，接近瑞士全国的人口。

同志们，人口的逐年增加无疑会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我所以向你们提供这些数字，是由于我在不久前曾不得不同对农业的估计持“乐观主义的人”进行一场辩论。这些人认为目前农业的缓慢发展没有什么特别坏处，以为这是正常的。我对他们说：确实，农产品的数量是在日益增加，确实，农业方面开始出现了很好的、进步的生产过程，但是，如果比方说，一个两口人的家庭后来增加到五口人，而同时所得到的粮食只比以前多一倍，那么这个家庭的日子会过得好一些吗？我认为，会过得坏一些。农业正在增长，但是它的增长大大落后于人口增长和国家需要增长的速度。因此，尽管农业逐年增长，但它无论在去年度或本年度都成了我国工业化发展的极限和障碍。

在工业化的国家每年人口迅速增长的条件下，农业、特别是它的谷物业近两年来的发展速度是很不够的。最近一次中央全会的决议就毅然决然地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因此，播种面积的变化是工业化的谷物基地的发展和国家整个粮食供应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标志。在每俄亩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缓慢的条件下，——而在这方面，我们目前还没有显著的成绩足以自夸，——播种面积的扩大，是当前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的最主要标志。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变化如下：1926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一，1927年增长百分之一点九（人口增长百分二点三），1928年由于气候条件，播种面积下降百分之二点六。如果1913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按一百计算，那么1926—27年度的播种面积则为百分之九十点八；1927—28年度为百分之九十二点五；1928—29年度为百分之九十点一。如果把这些数字改按人口计算的话，那么

现在按人口计算谷物的播种只有百分之八十二点七。全国粮食总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1925—26年度为三十二点四普特，1926—27年度为三十三点三普特；本年度只有三十点六普特。战前最后五年的平均产量，按人口计算每人为三十八普特，而当时农村的消费水平肯定比现在低一些。要知道沙皇时代农村广大居民群众都是吃不饱的。因此，在旧俄才这样流行败血病，农民才吃槟藜，农村才经常发生饥荒。要知道，农村最广大的居民群众只是在革命之后才开始吃得稍微好点，因此，我国的粮食消费量大大增长了，而粮食产量的增长按人口计算却下降了。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市场和我国农业不稳定的危机现象的根源。

单位面积产量的情况如下：每俄亩的粮食产量1924年平均为四十普特；1925年（丰收的一年）为五十六点二普特；1926年为五十五普特；1927年为五十点八普特；今年为五十二点九普特。这五年的平均数为五十一点二普特，而1909到1913年这五年的平均数则为五十四点九普特，因此，我们即使在单位面积产量方面也没有达到战前水平。

播种面积没有达到1913年的水平，粮食作物平均差百分之十，全部作物平均差百分之三点四。在下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这样的一些产粮区，落后于战前水平的现象更为严重（比战前落后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这些材料证明农业发展的缓慢是在恢复过程尚未结束的条件下发生的。

由此可见，在工业已远远超过战前水平、城市人口数量每年都增加百分之四以上、农村粮食的消费量自然迅猛增长的情况下，农业即使在增长，但增长得很缓慢，以致不能满足国家对粮食的需求和工业对原料的需求。由此，产生了农业和工业脱节的危险，产生了整个工业化事业的危险。中央全会的决议已对这种危险作了十分确切的说明。决议写道：“谷物生产指标对于整个农业有决

定性的意义，农业发展的极端落后特别是谷物业的落后，会使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遭到失败。”

如果看一看农业状况的其他指标，例如，看一看畜牧业或技术作物，情况就要好得多了。我们在技术作物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比战前增加百分之五十八点五。然而，技术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仍然很低，显然不如战前本来就很低的水平。

除了农村中主要牵引力马匹之外，我们在牲口的数量方面也超过了战前。我们在役用马匹的数量方面约落后于战前百分之十三。

这就是农业的基本材料，这些材料促使中央全会在决议中考虑全面提出农业问题，并且坚决地着重指出：“工业的发展和农业基地的发展之间的脱节现象的进一步扩大，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我们报纸发表了许多文章讨论中央全会的总结的问题，我应当说，并不是所有文章都充分清楚地、突出地反映了中央全会决议的这种思想。全体党员都应当十分明确地认识到，国家的工业化由于农业及其发展速度不够快而开始面临的巨大危险。因此，中央全会才发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的十分严厉的指示。中央全会的指示要求在最近一年内把播种面积扩大百分之七，把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百分之三。根据我们的计算，这是我们需要的最低指标。只有这样才能改善全国的粮食供应情况。

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和条件来加速农业的提高过程，并使农业的发展速度能促进工业高速发展，能保持工业化的现有速度。

农业高涨的途径

我认为，农业本身具有足够的前提在一定条件下贯彻全会关于在本年度就扩大播种面积和提高产量的指示。近来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出现的一些先进操作就是如此。

我现在就来说明先进操作中最主要的一些方面。在提高产量上有很大优点的秋耕就属于这种先进操作。1927年秋耕约占全部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九，今年则占百分之三十二。其次就是把三圃轮作制改为多圃轮作制。1926年改为多圃轮作制的是三百六十万公顷，而今年则达九百多万公顷。在农民经济中越来越广泛地使用良种，其播种面积已达二百万公顷。

关于供应农村机器的情况是：1926—27年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农业机器值一亿二千五百万卢布，在1927—28年度为一亿四千八百万卢布，而今年的计划供应则不下于二亿卢布。这已超过战前的水平，超过农村对机器折旧的需要，也就是说，在农业机械的供应上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现在我们在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中使用的拖拉机约为二万八千台，其中所有合作联合组织使用的拖拉机已超过二万五千五百台。今年我们继续采取各种办法在农业上推广使用人造肥料，并为此拨出专款。

我们的土地规划也必然会对提高农业生产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合作社现在正日益成为农村中的这样一种组织，它将在农业生产的合理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考虑到这一切因素，考虑到农民对生产工具的需要越来越有保证；考虑到对农村机械供应的扩大、农民经济牵引力的增

加、合作社正通过各种渠道联合千百万农民群众，并开始把他们引上按社会主义方式扩大农业和生产规模的方向；如果考虑到现在已经找到并在实践上受到检验的象订购这样一类的形式，如果注意到现在农民已经有文化多了，向往于一切技术改革；如果考虑到这一切，那就必须承认现在为使农业产生必要的转变已经具备了一切前提，而且不是在什么遥远的将来，也不是一般地提高农业，而是在今年一年之内立即在提高产量上，首先是在提高农业的谷物产量上取得显著的成就。

为了解决所有这些与农艺、技术和农业改造有关的问题，需要朝哪个方向努力呢？如果大家问我促使农业高涨的途径是什么，也就是说，是扩大播种面积还是提高产量，那么我的回答是：这两者我们都需要。如果问我，这些途径中到底哪一个是主要的，我说提高产量和使整个农业合理化的途径是主要的。采取扩大播种面积的粗放的办法来发展农业，对于有限的某些地区（西伯利亚、伏尔加流域中部等地区）来讲，是可行的。而对于拥有大量过剩人口的其他许多农业地区，就很少具备采取这种发展形式的条件。向新区移民，在最近几年也不可能是一条出路，因为移民的费用太高（一户约需二千卢布），而大规模地采取这种办法，既浪费时日，又需大量资金。即使在可以采用粗放方式扩大生产的那些地区，我们也应尽可能地加快发展速度，而且这种粗放发展本身也不能建立在原始耕犁的基础之上。在我们的条件下，要使粗放发展取得成效，首先也得要有拖拉机，也需使全部经营管理合理化。因此，全会所作的关于加强农业机器制造业，其中包括加速建设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和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的指示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们正在筹建新的国营农场和建立新的集体农庄，这就在组织农村公有化的大型经济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而在一个长时期里，

发展农业的一个基本的革命方法，就是把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生产改造成为公有化的、合理安排的、在技术手段上依靠大工业的生产。

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不仅要求在城市，而且也要求在农村组织公有化的大型经济。如果我们在建设国营农场和组织集体农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成就，并从而扩大农业生产的规模——这种扩大即使从单纯生产的角度来说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分散的小农经济是农业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那么这就将意味着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已经解决了十分之九，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但是，要组织集体农庄，我们就应该首先提供拖拉机。而为了生产拖拉机，就必须供应工人以口粮，可是现在粮食还掌握在占压倒多数的个体农民手里，并不在集体农庄手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在工业的帮助下对农业实行改造，但是工业需要粮食，而粮食现在主要还是由个体生产者生产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口号应是：“要全力发展并改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要用一切办法推动这一建设事业的前进，要研究这方面的一切成绩和缺点；但同时要记住，在一段时间里提供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主要将仍然是个体生产者。不要忘记他们，要仔细地研究小商品生产者的经营条件。这种个体生产者在提供十分之九以上的粮食。”

我们在控制数字中规定要对农村的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增加拨款：我们给集体农庄拨款七千五百万卢布，而去年是六千二百万卢布；拨给国营农场的将超过一亿零五百万卢布，而去年是四千万卢布多一点。

我们在财政计划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增加的这笔拨款，是完全必要的，它对于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力。

我们通过提供农艺指导、土地规划、信贷、供应机器和良种，以及同破坏分子进行斗争等办法来帮助全体基本农民群众——贫农和中农，自然，特别是和主要是帮助贫民。但是，不管国家的帮助有多么大，比起农民自身的资源来，国家的帮助还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例如，比较一下去年春播运动中我们所支援的种子（大约三千万普特种子）和农民一年撒到地里的八亿普特的种子；比较一下我们集中收购的六亿普特粮食和农民经济本身所消费和留下的约四十亿普特粮食，你们就会看到，发展农业的主要资源还是农民自己的资金。所以决不能忽视我们现在是同二千五百万至二千七百万农户在打交道。每个农户积累一点，拿这一点乘二千七百万，那就会得出一个庞大的数字。在个别地区遭到歉收或者颗粒不收的情况下，我们的支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如果认为靠国家、靠国家的资金就可以把整个农业搞上去，那完全是幻想。必须清楚地看到，国家的因素和国家给予个体农民经济的帮助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国家）只能推动这种高涨的过程，给个体农民经济指出一定的方向并把它组织起来。国家的帮助对于促进合作社的发展起着极大的作用，在组织社会主义形式的大型农业生产（国营农场、集体农庄）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对个体经济成分的作用在于，用它的政策刺激农民尽最大可能利用他们自己的积累来解决生产上的需要，并把农业引上我们所希望的发展方向。

在所有提高贫农和中农个体生产者的生产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把个体商品生产者的利益同公有的、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同国家的监督结合起来，同跟富农剥削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

农业发展缓慢这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农的主动性、

他们对经济的关心，以及在追求扩大耕种面积上都表现得不积极，没有被激发到应有的程度。必须提高中农对经济利益的关心，必须用我们在农业技术方面的改造工作，用我们的农艺学和我们在土地规划方面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去刺激广大农民基本群众（中农和贫农）发展经济，扩大耕种面积和提高产量。

如果认为现在农民已完全丧失扩大播种面积和发展其经济的刺激，我们的农业在退化、倒退，那就错了。谁要这样想，谁就错了，就跟弗鲁姆金同志在这个问题上错了一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消除了对农民的经济刺激，那就意味着工农联盟的彻底破裂，那就会出现与我们当前全然不同的另一种政治局面和经济局面。因此，那种认为我们的政策取消了对农民发展经济的刺激，是不正确的。

但同时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刺激削弱了，而我们可以也应该加强它。这方面的不顺利的情况是存在的。去年采取的非常措施和今年实行的征收单一农业税的做法也挫伤了中农。中农所具备的扩大经济的潜力，超过他们实际上加以利用的程度。中农、贫农基本群众现有的牵引力增加了，种子也有了，机器的数量也在增多，然而从生产潜力来看，播种面积却增长得比较缓慢。这就是说，有某种东西阻碍着农民发展他们的经济，这也就是说，农民的兴趣还不高。我曾试图弄到一些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的数字，但只弄到一个材料，即所谓中央统计局的春季调查表。这张表有很大的相对性，很不详尽。尽管这张调查表上的统计数字有很大的相对性，它所包括的农民经济很不完全，但是照我看来，它毕竟还是反映了总的的趋势。这些数字说明，贫农正在迅速扩大播种面积，在总的耕种面积还保持在原有水平，或者甚至还有所减少的地区，他们的耕种面积在增长。下中农也是如此。可是在一些地区拥有两匹马以上的那些农民或另一些地区拥有三匹马以上的

那些农民，其播种面积不是保持原状，就是还在缩小。

除去这好的一面之外，调查表也指出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这就是中农已不再把经济扩大到我们所需要的规模。所以，我们在发展农业方面的全部措施取得成功的主要前提之一就是，不仅要尽量少挫伤中农，如无十分重大的理由就根本不要挫伤，而且还要激发他们从经济利益去关心经济的发展。为此，比方说，我们就必须保证我们的农村政策有更大的稳定性，因为中农——我们农业上的中心人物——只有在他们对于今天和明天充满信心的情况下，才会在现在和将来去发展他们自己的经济。如果我们大家年复一年地完全改变有关中农的法令，他们就会丧失这种信心。我不必列举这方面的很多过火的例子。大家知道，在最近征收农业税方面，这样的例子就多得不胜枚举，其结果是我们不是照 1928—29 年度的预算所作的那样征收四亿卢布，而是将征收大概不下于（如果不是高于）四亿三千万卢布的农业税。主要搞过了头的，就是按照那个所谓的个别课税法来征收农业税。为了了解目前在征收农业税上已经暴露出来的那种胡作非为和破坏革命法制的实际情况，只消把实行个别课税法的那些特征摆出来就行了。我手头有一份财政人民委员部关于今年征收农业税运动的实际情况汇报材料。被列入“个别户”的，亦即被列入上层富农阶层一类的，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些特征：生产值钱的农作物，拥有大量的幼林，有新的住宅，制做并向本村的人出售收音机，拥有良种牲畜，土地经营得法，从前使用过雇工，自己拥有农具，不是今年，也不是去年，而是曾经一度做过生意，等等，等等。

一方面，我们在中央这里和同志们在地方上谈论文明耕作、提高农业技术和提高文化，而另一方面，却把有收音机的人划为富农。如果有收音机就得划为富农，那么有缝纫机或留声机的人就得划为地主了。既然把那些从全家共用一个汤钵、木勺改用铁

勺的农民划为富农，就用不着为提高农村的文化而斗争了，而现在就存在着这种情况。如果有一个农民采用优良的耕作方法，并不剥削别的农民，但也要对他实行个别课税，今后谁还会好好地去种地呢？明明知道这样做就会对他们实行个别课税，会把他们的子女赶出学校，并且还会剥夺他们本人的选举权，谁还会去干这样的事，我认为是不会有这种白痴的。我们的实际工作应该从这点出发：一个农民家庭的文化的提高和土地耕作得好等等，并不是富农经济的特征。

要知道富农是什么？是剥削者。因此，确定一个富农，必须根据他对别的农民的态度，根据剥削别的农民的因素，例如，根据他剥削劳动力、出租机器、按照盘剥性的条件出卖粮食等等。所以，那种因“剥削”^①缝纫机或收音机，或因靠自己的力量经营得法而被划为富农，那真是荒谬到了极点。如果由于在农业上采取某种形式的合理化而增了产，如果这种合理化和增产又与剥削无关，——如果在任何此类形式中居然发现了资本主义因素，那就根本谈不上保证中农和贫农经济的高涨了。

就是这些对待中农的过火的、反常的做法，至今仍在对扩大农业的刺激起着破坏作用，并大大地阻碍着这个扩大农业的过程。我们必须把你没有剥削，你就不是富农的这个道理，坚定不移地灌输到每个工作人员的头脑里去，贯彻到全部实际工作中去。姑且假设这种种过火的做法现在还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如果根据上述的特征之一，即庄稼种得好，或者拥有缝纫机，即使在三个村子里只是把一个农户划成了富农，而别的农民不也会把这看作是对他们的一种威胁吗？在一、二百户人家中哪怕对一户未曾雇工，也未出租土地，而采取先进耕作制度的中农实行个别课税法，

① 双关语，“ЭКСПЛОАТАЦИЯ”又作“使用”解。——编者注

实质上也就意味着反对先进的农业。这种情况使全会必须在决议中就所谓刺激问题写上专门的一节。决议说：“中央全会着重指出，在刺激个体农民经济的发展方面，党和苏维埃机关远未采取一切可以保证基本农民经济大大提高的措施。”在另一个地方，还以另外的形式重申了这一思想。决议说：“虽然各种耕作技术和动物饲养术都很重要，但同时必须着重指出，适当的技术措施，只有受到农民本身经济利益的推动时，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这项指示是否在原则上有什么新的东西呢？没有。它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七月全会的决议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由于实际情况同这些基本原则的矛盾有时变得尖锐起来，才使最近召开的中央全会不得不十分坚决明确地再次对这些基本原则加以肯定。

当然，这里所谈的加强对个体农民经济发展的刺激，以及使农民本身为经济利益而行动，都是指中农和贫农这一部分农民而言。对于富农阶层，我们的政策还是过去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应一如既往地加强对富农的进攻，并限制其剥削倾向。我们应该象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所说的那样，“利用经济机关的全部力量、仍旧依靠贫农、中农群众来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并能采取各种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办法而引导农民经济走向社会主义”。

在保护农村贫农阶层的利益方面，当前的实际措施之一，就是必须颁布一项规定劳动法规适用于富农经济的法律。

商品荒、规定农业税的轻重和原则，以及革命法制等问题，都同刺激个体农民经济的问题有最密切的关系。

在商品荒问题上，有时不得不同这类意见发生冲突，即认为目前商品市场上的紧张状况是十分自然而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当然，就是在今后，我们也还会发生商品荒的现象，不过，应该使这种现象有所缓和。

目前所存在的工业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也影响到粮食收购。为了让农民生产粮食和向市场抛出粮食，就得使他相信，他能用这些粮食换回机器、肥料、布匹，总之，换回他所必需的东西。如果他没有这种信心，他就会限制粮食生产。不管生产粮食的是集体农庄还是个体农户，都有这种情况，因为组织到集体农庄里的农民也同样希望应该用粮食来换回机器、上衣和裤子等等。所以，与发展农业有关的问题之一，就是缓和工业品欠缺的问题。我们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要经过许多年，想在最近期间消灭商品荒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但是，应该使之缓和。为什么不能把克服商品荒作为最近几年间的一项任务提出来呢？在我看来，只消指出我国国民经济投资的构成情况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现在把十多亿卢布用于重工业的基本建设，这十亿卢布现时不会使商品量有所增加，但是这十亿卢布的大部分表现为对生产资料的大量需求，并通过工人工资的形式现在就已提出对消费品的需求了。

关于进口方面的困难以及关于预算，我就不详细地同大家谈了，我想说的只是，我们的困难主要在于粮食、进口、生铁和建筑材料，而进出口方面的困难当然也与粮食有关。粮食已经从我国的出口中消失了，它削减了我国的进口计划，而剩下的某些出口产品是国内也有需求的。现在国外说我国正面临破产前夕，还说我们已无力支付期票，等等，当然，这是明显的谎言。我们过去如期履行了，今后仍将如期履行我们的一切义务。我国的敌人故意在这方面散布谎言。由于我们现在正同德国进行谈判，于是国外就编造出种种谎言。有时居然报道说，好象我们正在对我国的对外政策作出某些根本性的改变。自然，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问题。

苏德谈判的任务是要完全根据拉帕洛条约来明确我们同德国在贸易和经济上的某些问题。

我国经济建设中最严重的情况之一是后备问题。在当前农业、商品供应和预算紧张的情况下，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建立后备就意味着当前不给市场提供一定数量的棉花、羊毛、通货、有色金属等等，而市场关系是不许可这样做的。因此，要为本年度建立后备在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如果我们已经有了后备。那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例如，为了改善我们同农村的商品流转，拨出即使是一部分后备也是好的。

如果我们能在今年为来年建立后备作好准备，也就是说，首先缩小供求之间的悬殊，从而缓和市场的紧张状态，那就好了。但是，决不能以我们不需要后备为由回避后备问题，也不得以此勾销我党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现在就存在例如这样的托词：“不过，党知道还有另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最复杂艰巨的任务。党正在发掘其他的‘后备’。这首先就是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一后备。这种后备应是同另外的一种‘后备’，即同反面意义上的‘后备’，也就是同那种因循守旧、消极无为和松松垮垮的巨大后备联系着的。”^① 这种词藻的喧嚷声除了令人扑朔迷离之外，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这些就是我国目前经济状况的主要问题。大家看到，其中有很多的一面；已经编制出来的经济计划，是在工业化和提高我国生产力方面、在提高整个农业和扩大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方面的一个大发展的计划，它作出了大步向前迈进的安排。我们就想以这种前进的步伐来缓和当前的，并保证为将来彻底根除由于农业生产的极度落后所产生的种种困难。1928—29 年度的经济计划要求我们高度紧张起来。但是这个计划的实现将使我们有可

① 见列昂节夫发表在 1928 年 11 月 4 日《真理报》上的文章。

能在下一个年度在更加广阔的基础上，不仅在粮食战线，而且在生铁、建筑材料战线以及我国经济的其他“薄弱环节”继续开展经济建设。

中央全会之所以批准 1928—29 年度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因为尽管还是高度紧张，但它是一个力所能及的计划。不过，我们只有具备了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即在改善我们全部工作的质量，尤其是工业和农业战线上的工作质量方面能取得决定性的成就，我们才能实现这个前进的计划。这就不仅对我们所有的经济机关，而且对各级党组织，对苏维埃和工会，特别是对与农村工作有关的所有单位，提出了比前几年还要高得多的要求。

阶级力量的配置

上述的经济进展还掩盖着某些变化——在各阶级相互关系配置上的动乱、变动和演变。同前几年一样，本年度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有巨大的增长，工人阶级在壮大，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在加强；我们在组织农村农业生产的社会主义成分方面，正开始大踏步地前进。

极其重要的是，必须用尽可能精确的材料和数字来阐明在农村各个阶层中产生的那些现象。很遗憾，我们手头根本没有可以用来说明这个问题的任何精确详尽的可靠数字。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部的《1928—29 年度农业和林业控制数字》里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统计。

这个材料的第三十三页上写道：“拥有大量生产资料并经常雇工（在五十天以上）的最上层的富农户，占户数的百分之二点一。此外，既经营农业又兼营工业的企业主类型的户数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一点三，而属于这样企业主类型但不经营农业的户数占百分

之零点八。由此可见，在苏联富农集团平均占户数的百分之四点二，而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则为百分之三点八。”这个数字恐怕有点偏小。实际上可能要大一些。但是不管怎样，即使实际的数字比这个大，也根本不足以证明由于农村富农阶层的增长即数量的增长而使国家面临真正的威胁。但毫无疑问，目前农村富农阶层的活跃性和组织力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农村的阶级斗争也急剧地尖锐起来了。

国家计划委员会预计，1927—28年度私营商品流转量的比重虽由百分之十七下降到百分之十五，但按绝对数字计算仍然未变。实际上私营成分已由百分之十七降到了百分之九点三。

去年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成分在许多方面展开了激烈的切实的进攻。我们也加强了对农村富农阶层的切实的进攻。私商成分已经大大地缩小。沙赫特案件和其他许多案件揭露了某些阶层的技术知识分子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并促使我们在这方面也采取一系列措施。

这一切当然引起了我们所进攻的那些阶级、阶层和个人的反抗与不满，因此，农村中富农阶层积极活动起来了，国内反革命分子也有些活跃起来了。

所有这些居民集团和阶层都想利用我们今年和去年工作中的困难、暂时的缺点和麻烦来从事其反苏维埃和反共的勾当。

供应计划的不足、商品荒的尖锐化、在业工人人数增长缓慢及失业人数的不断增长等等，都涉及到各阶层居民的利益。目前经历的这个时期的各种困难，增加了居民中中间阶级的个别阶层动摇的可能性。例如，在你们那个边区，在收获之前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农民要购买粮食。而且有的人在冬季就在想尽办法购买粮食，另一些人则在夏季这样做。我们正竭力向消费地区和灾区农民尽量多地供应粮食，但是，我们的能力受到粮食收购和供应的

限制。我们尽量设法保障贫农的利益；由于必须扩大亚麻种植，我们将供应你们这些地区的农民，然而，我们还不能如愿地充分保证消费地区所有中农和贫农基本群众的利益。

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将利用这些来进行煽动。这一切会在某种情况下使居民中的有些中间阶层发生动摇。

党内状况问题

这种状况不能不对我们党内的某些人发生影响，它无疑会助长党内各种倾向的抬头。党内存在的各种各样倾向就是我国现在所发生的这些情况的反映。

这些倾向就其内容来说只能是右倾。

我们党内存在各种倾向决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知道，1918年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党在列宁领导下就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过斗争；在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同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和“工人真理派”集团进行过斗争。在从恢复时期向改造时期过渡时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就对付过两种倾向：所谓的新反对派和右派集团，例如鲍古舍夫斯基—沙宁右派集团。这个时期最大的危险就是以当时的新反对派为代表的那一种倾向。

联系到我国所发生的这一切情况，当前最大的危险是右倾，这倒不是因为右倾比托洛茨基主义坏一点或者好一点，——第一，两者都坏；第二，它们实质上都是右的，——而是因为党在同托洛茨基主义的争论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粉碎了它的思想体系。

全会的决议对右倾作了如下的说明：

“这种倾向表现在企图降低大工业的建设速度并阻止它的进展，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抱着轻视或否定的态度，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对同富农的斗争估计不足并企图抹杀这种斗

争，对群众的需要采取官僚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忽视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忽视战争的危险等等。”

由于存在着种种我们必须加以克服的困难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种倾向就有可能得到加强。

为了说明右倾的思想体系会达到什么样的地步，我曾在中央全会上摘引过一个原托洛茨基信徒的一封信。这封信并不是一般右倾的典型。可是，它却是右倾的极右翼（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典型。

这就是那个同志写的：

“上升运动的速度和下降运动的速度是不同的。只有使用现成的东西，并且只有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才能作出奇迹。巨大的改革要求有现成的材料，并且一旦新东西开始有机地增长，改革也就结束了。”

信里接着写道：

“结合常年受到破坏。军队是庄稼人的军队。国家是庄稼人的国家。集体化成了获取贷款的幌子。工业化要花几个世纪的时间。”

这封信里所表现的是向困难彻底投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毫无信心。

这种倾向以较为和缓的形式，带着各种各样的色调和中间环节，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右倾。右倾现在还没有在多少系统化的和完备的纲领上表现出来。也不存在右倾的组织形态，但是它正在而且将通过大量的不同形式的渠道在我党的各个环节上表现出来。

在紧张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在对资本主义成分的一切表现进行猛烈进攻的情况下，这种右倾实质上是中间阶层的恐惧和动摇情绪在党内的反映，这种恐惧和动摇的情绪在我们正紧张

地进行工作和克服巨大困难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不仅是某些政策，并且连生活实际都在患右倾病，而后者病得比前者还重。

在我们向农村的资本主义阶层进攻的时候，右倾就在诸如这样一些事情上表现出来：对于在很多区里发生的那种暗地里或者半合法地买卖土地的现象，采取几乎是中立的或者无所谓的态度。然而，这种买卖土地的现象就是农村资本主义倾向发展的最鲜明的表现之一。

右倾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对党施加压力的反映。我再说一遍，在处于当前困难的情况下，同这一类倾向进行坚决斗争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对于右倾的解释，无论如何也不能象《共青团真理报》那样去解释，它这样写道：

“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同右倾作斗争，同那些把我们拉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复辟道路上去的分子作斗争。”

那些把我们拉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复辟道路上去的人，就是反革命分子，而党内当然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人的。

我们所说的党内的倾向，指的是这样一些有微小差别的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在基本原则问题上，是同党、党的纲领、党的决议一致的，是站在党性立场上并遵守党的纪律的，不但在目前所处的这个时期的这一些或另一些问题上，这些意见偏离了党的基本路线，主要是低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对私人资本主义成分进攻的可能性。

在谈到右倾时，指的是在现阶段必须采取思想斗争来加以克服的那种党内的倾向。当然，这并不排斥，相反，倒是意味着今后会对其采取另外的斗争手段，如果右倾形成为一个思想体系，

并且违背了绝对服从党的决议和党的纪律的话。

托洛茨基主义基本上被粉碎了，我们已经赢得了对它的决定性的思想胜利。但是，如果认为托洛茨基主义已不再是思想上的一种危险，那就错了。一部分还留在党内或又重新入了党的原托洛茨基分子继续以某种形式推行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党外的托派残余分子还企图继续干他们的勾当。他们利用我们的困难而提出来的那些口号，有可能使无产阶级中比较落后的分子受到蒙蔽。所以，虽然我们在决议中说，对于右倾的危险，应主要采取思想斗争，而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则应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斗争，但绝不能把这理解成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斗争已经结束了。我们不仅要在思想上，而且还要采取其他的手段来同现在正在激烈反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当然，这并不排斥应随时随地都把思想斗争放在第一位。在现阶段还没有必要对于右倾——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采取驱除和开除出党的措施，可是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议：坚持托洛茨基主义观点是同党籍不相容的。这个决议现在仍然有效。

我不详细地来谈调和主义了，因为很清楚，如果必须同那些倾向作斗争，那就不能同它们搞调和。调和主义的根源就在于在当前复杂的情况下低估了旗帜鲜明的政治路线的意义，就在于极其无原则的实用主义，还在于既在政治宣传方面，也在实际工作中对偏离党的路线的倾向采取庸俗的宽容态度。

我预见到，大概会递条子就政治局内有意见分歧的谣言来向我提问。不仅在外国报刊上，而且在我们党的某些阶层中，现在都盛传着这类谣言。对于这些谣言，我要坚决予以驳斥。无论是在政治局的委员会里，还是在政治局本身和在中央全会上，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

不用说，对于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经济、文化等建设的某些

具体问题，我们是有争论的。

但政治局的工作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让我们讨论问题、争论问题，并通过交换意见作出决定。

如果说既无争论，也不讨论；如果我们所有的人，就象一个人似的，想的“完全一样”，那才不可理解，那才是荒谬之极和咄咄怪事了。就是伊里奇在世时，在他参加的情况下，我们彼此也是有争论的，但这种争论只有好处，毫无坏处。我们在制定某个决定时，当然不是马上，而是经过一定的交换意见等等之后，才通过的。如果政治局的成员只要相互看一眼，他们就会在一切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那政治局也就不成其为党的领导机关了。

大家把我们选进了中央，我们又被选进了政治局，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要我们进行讨论、争论和作出决定。但是，如果把一切争论都看成是倾向的话，那就干脆摆上些玩偶和木头人好了。可是那时有谁来替这些木头人思考呢？（掌声）

关于全会议程问题的一切决议，我们不论是在政治局讨论还是在全会上讨论，都是一致通过的。但如果说我们即使还有某些实际上的分歧的话，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一旦弄出两条相互竞争的政治路线，并按这两条路线在党内分派，那就不好而且有害了。如果把事情搞成这样，那才是不幸。党应该讨论并决定一切，我们有权也有义务进行讨论和争论。

在政治方针和政治路线方面，以及在对待决议的态度上，我们在政治局里没有任何分歧。（经久不息的掌声）谁要是否认这一点，那就是在撒谎。但是，如果散布这一切谣言，利用这些谣言进行投机，希望并力图把观点上的每一个微小的差别，有时甚至把同样思想的不同表述统统看成是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那就是一种最有害的倾向。

在我们党内就有人，固然是个别的极少数的人，从这种倾向

出发，力图把某些决议说成是妥协的结果，于是在工作中就有意不以全会的全部决议，而只以决议的某一部分作为他们工作的指针。这也是一种最有害的倾向。中央全会所持的（而且不能不如此）出发点是，只有其全部决议的总和才能表达党的路线；每个党员都必需以遵行全会的全部决议（连同这些决议的一切具体表述）为自己的出发点。

最后，请允许我扼要地谈谈全会上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关于调整党的成分问题。在我们党的成分中，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现在约占百分之四十强。就全体党员来说，尤其是在当前对于觉悟程度、团结精神和改善党的队伍的社会成分的要求都提高了的情况下，决不能认为这样一个百分比就够了。近几年工人党员人数的增长还不到一倍，而农民及其他阶层出身的党员人数则增加了近一倍。

合作社机关、国家机关以及那些必须经常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不能不起腐蚀作用）打交道的其他组织中的党员的工作，造成了一种环境，使那些最不坚定的党员开始官僚化，脱离群众，蜕化变质，“烂掉”。这就要求必须改善党员的社会成分。

我已经指出，在党的队伍中我们只有百分之四十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

在农村党组织中我们的状况是这样的，例如，拥有总值八百到一千六百卢布生产资料的农民占居民总数的百分之十三，而在党组织里他们则占到百分之二十。每户拥有一千六百卢布以上生产资料的最上层集团，占农民总人数的百分之三，而在党组织内他们则占百分之八。

为了保证党的阶级路线，我认为必须提高党的基本核心即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比重，而且必须同时不仅把农村党组织，也

要把城市党组织中的那些腐化堕落分子清除出党。因为我们不仅是现在，而且将来还会越来越尖锐地每年都遇到这样一个主要的问题：这就是严肃认真地改造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问题，使它们更接近劳动群众的问题，即不惜任何代价来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使我们整个工作系统发生根本的质变问题。这一切只有把大批无产者即工厂中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吸收入党，通过他们使党能同广大工农群众更紧密地保持联系的情况下，才能做到。例如，为什么至今我们党的成分里没有或差不多没有雇农，而妇女也很少呢？这就说明我们不善于发现我们最需要的人，也许是不重视通过宣传鼓动和生动活泼的系统的工作，把这些人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我们的触角已经不灵敏了。我们坐在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关里进行管理，等等，并且有一部分党员对于群众的生活疾苦漠不关心。必须克服这种明显地脱离群众的现象。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增强党的无产阶级成分，把那些恶劣分子清除出党，使党最大限度地接近广大工农群众。

同志们，1928—29年度将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年度。要实现我们制定的经济计划，就必须把我们党的全部力量和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都动员起来。全会的决议特别强调指出，必须使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即我们的党极端注意经济建设的问题，必须深思熟虑地对待这些问题，绝不可光讲大话或者官僚主义地粉饰困难，也不可危言耸听地夸大困难。把党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动员起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就得具备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必须在我们的队伍中大力开展自我批评和大力发扬党内民主。如果我们不及时地肃清某些地方和某些人“乱扣”左倾和右倾的帽子的倾向，以及把任何一种独立思考也当作什么倾向，那么开展自我批评和发扬党内民主就不可能得到保证。

我们必须寸步不离我们的原则性的政治纲领，即在第十五次

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和最近几次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所透彻说明的那个纲领，寸步不离这一纲领，在明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上保证全党对我国经济和政治形势进行最广泛和最全面的讨论。

只有在这种讨论的基础上，我们才会实现高涨，才会把全党和整个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从上到下地调动起来，依靠这一切，我们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我们就会实现这个不仅从今年总结的角度看，而且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的前景来看都具有巨大意义的经济计划。（经久不息的掌声）

译自《真理报》1928年12月4日。

在全俄农艺师第二次代表 大会上的讲话*

(1929年2月1日)

今年2月1日，李可夫同志在农艺师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代表政府和党向代表大会表示了祝贺。李可夫同志登上讲台时，受到长时间的鼓掌欢迎。

李可夫同志指出，他不得不在代表大会完成大部分工作以后才来讲话，然后谈了有关农业的几个最重要问题。农业所承担的最重要任务可用下列数字来说明：今年的播种面积要扩大百分之七，单位面积产量要增加百分之三，而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单位面积产量要增加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五。在确定这些数字的时候，情况表明，有一些计划工作人员对于它们能否实现，表示怀疑。李可夫同志说，在我看来，那些人认为这些数字不能实现，用我国农业的增长速度同革命前俄国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速度进行对比的方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就是说：他们拿不能对比的东西来进行对比。

在十月革命以后所形成的农业制度和条件与过去根本不同。在人类历史上，迄今还没有过象我国这样最彻底实现土地国有化的国家。历史上未曾有过生产者自己组成苏维埃制度，掌握政权，而政权竭尽全力来最充分地发展生产力的先例。迄今未曾有过一

* 本篇是报纸报导。——编者注

个国家的合作社在农业中起着象在我国所起的那种作用。未曾有过一个国家对农业采取由于实行统一经济计划而产生的积极政策，具备着象苏维埃共和国拥有的那样对实现这种计划产生强大影响的力量。你们只要把私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同苏维埃制度下的可能性加以对比，就会看出巨大的差别。李可夫同志说，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要试行全面土地规划，都会发现，土地私有制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十月革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从而排除了在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和运用科学的基础上组织农业的最大障碍。分散的和个体的农民经济确实是合理组织农业生产的障碍；只有使生产过程完全社会化，即在农业方面有计划地组织劳动，才能把农业提高到和大工业相同的水平。但是，在苏维埃国家的条件下，甚至小生产者比在其他国家有大得多的发展自己经济的可能性。十月革命所带来的这种变化，可以通过工业中正在发生的情况看得特别清楚。比方说，在十月革命以前，巴库石油区被一些互相竞争的私有主所占有，因此，不可能根据石油蕴藏的各种自然条件合理地开发经营这个地区。再举一个例子。我国的电气化是在与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实现的。在资产阶级国家中，甚至连架设输电线都要同各个私有主签订合同。

我们制度的这些积极因素和优越性，在某些情况下却由于我们保守落后、工作无能和我们在计划中有时所犯的一系列错误而抵消。但是，新的制度所特有的客观条件为发展农业和在农业领域运用科学成就正在创造巨大的可能性，这是不能抹煞的。

当然，农艺师的一切发明和建议要能顺利地被农民采用，就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这些农艺措施得具有使农民本人得到经济利益这样一个适当条件。李可夫同志说，不管你怎样向农民说明，例如，说用新法（科学方法）种小麦和黑麦比旧法好，如果这样播种对农民根本无利，农民也不会干。农民的这种物质利益

现在受到政策的限制。

农业的状况在这方面由什么来决定呢？李可夫同志指出，粮价和税收在这里是最重要的因素，他接着说，我们今年提高了粮价，大大缩小了粮食价格和工业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今年确定的粮价明年仍应保持不变。

过去几年的经验暴露了我们税收政策上的许多缺点。最近几天即将颁布一项关于统一农业税的新法令，这项法令将使中农群众获得很多优待。今年农业税的实际收入约为四亿二千万至四亿三千万卢布。如果不是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一些地区歉收，这些收入本来还可以增加二千万至三千万卢布。

我们规定明年的农业税收为三亿七千五百万卢布，这就是说，尽管农业增产，税收却大大降低。

此外，凡按播种面积征税的地区，新增播种面积免税两年。当然，这些优待办法不适用于明显的富农户，他们的新增播种面积必须纳税。修改的法令规定，凡采取法令中列举的增产措施的农户可以少纳税。油脂制造区乳畜的纳税将比去年少得多。新法令规定大大稳定税率，三年固定不变。这就是税收政策的主要变化，目的在于提高中农发展自己经济的兴趣。当然，贫农象以前一样，一律免税。这些优待都是为了刺激农业的主要人物——中农的经济活动。法令对集体农庄和合作社没有规定新的优待，因为以前的优待足够保证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足以引起农民对这个运动的关心。

李可夫同志说，最近几年集体农庄运动的情况表明，它在今后也能顺利发展。不必讳言，当最初提出加强集体农庄运动的主张的时候，有些科学工作人员和一部分农艺师对这个未经检验的新事物抱着某种怀疑的态度。现在，这种动摇和怀疑已经消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建设社会主义如果只在城市进行，而不

吸引农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那是不可能成功的。不能设想，社会主义城市和社会主义工业周围尽是沿着资本主义轨道发展的农村。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因为农业是工业的原料和粮食基地，又是工业品的销售市场。但是，社会主义的农业组织工作意味着对农业进行改造，使农业在有计划地、合理地组织劳动的基础上，减少开支，生产更多的粮食。农业分散经营是其落后的原因之一。通过合作社、集体农庄等等来加强农业生产，能使农业摆脱这种困境，并使它具有大生产的一切优点。因此，合作化和集体化的方针就是从农业技术的角度来看，也是进步的和革命的方针。但这并不是说，现在的小的个体经济就没有任何发展前途了。农民经济是如此落后，以致每个小的个体经济都有自己发展的巨大可能性。因此，也必须帮助个体经济。个体经济之所以需要帮助，是因为最近几年它在粮食总产量和向国家供应方面仍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接着，李可夫同志说，本届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的形势特点是，全体农艺师都不是被迫，而是自觉地遵照政府和共产党的政策努力进行组织新社会的工作。毫无疑义，用新的方法改造农业，没有农艺师是不行的。因此，全体农艺师在为改造经济，为社会主义建设而积极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成就。

李可夫同志说，不但我们国家，而且所有西欧国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请你们看一看吧。新的科学发明不胜枚举，新的生产组织方法层出不穷，以致工业在新的技术基础上不断进行改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农业也是如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应该具有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无与伦比的胆量，来运用能使人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的一切科学成就。因此，我们的科学家、农艺师、工程师和技术员在实现最伟大的技术经济革命中起着非

常特殊的作用。把科学引进生产的人首先是工程师和农艺师，而农艺师的工作与工程师的工作有许多共同点，也许前者更困难些。当工程师在纺织厂安装新机器或新车床的时候，他要同相当熟练的工人们打交道，因而工厂生产中采用科学工作法的可能性要比在农业中大得多。李可夫同志接着说，为了改造农民经济，你们必须改造农民本身，通过实际向他们证明某种经营农业的方法或某些改进农业生产的方法的优越性。如果你们组织集体农庄，为此就必须说服农民怎样去组织集体农庄的生产，以便使大家看到比个体小经济优越的地方。这是一种困难得多、重要得多的社会工作。因此，现在全体农艺师开始和我们有了共同语言，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农艺师人数很少，他们工作有困难。但值得注意的是，农艺师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谈了很多他们工作中的困难，要求保证供给他们交通工具、适当的仪器和实验室，而关于工资却谈得很少或几乎完全没有谈到。这一事实说明，我们所接触的这类干部，都是重视自己的工作和埋头工作的人。

农艺师从前是同个体农民一起工作，推行个别措施。但是，农艺师这种分散的工作不可能使农业的发展发生迅速的根本变化。所谓农业生产领域的革命，只是在千百万农民生产者行动起来的时候才开始的。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即基本农民群众正在开始行动起来，而农艺师最近则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从完成各种细小的偶然性的任务转而承担越来越宏伟的任务，承担为参加人数日益增多的贫农和中农群众运动服务的任务，承担改造农业生产的任务以及承担按新原则建设农业的任务。我们愈往前迈进，群众激发出来的热情愈高涨，这股巨流就愈益把农艺师吸引进来。我们人民特别渴望克服本身的落后和愚昧，我们迫切需要知识分子，但是，我们缺乏资金，不能充分满足这种渴望。要保证农业的改造，要克服农业的落后，要按科学原则组织农业，

要摆脱农村还存在的不文明状况，要消灭贫困，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就在于农艺师要同目前在农民中间开展的波澜壮阔的运动结合起来。如果三年前提出农村能不能出现自觉可靠的积极分子来支持农艺师的工作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未必能够得到完全断然肯定的回答。现在，这在某些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在另一些情况下，积极分子则形成为一些特殊的生产会议和许多其他机构。农村开始出现自己的欢迎农艺师的积极分子，他们充分认识到改造农业生产的必要性，他们会支持农艺师的困难工作。

李可夫同志在结束讲话时说：同志们，我党最近一次中央全会在其决议中强调指出，对于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保证工业化必要的速度来说，危险的是农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今天的主要问题是无论如何必须消除这种落后状态，因为这种状态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在其他一切部门就无法实现我们的各项任务。现阶段的农业发展是决定整个经济发展的起码条件。因此，必须千方百计把农业搞上去、特别是谷物部门，必须把我国从今年和去年缺粮的国家变为对外出口数亿普特粮食的国家。农艺师们应当在实现这项任务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代表政府保证全力支持这届代表大会，全力支持农艺师们的困难、光荣和有益的工作。

译自《真理报》1929年2月3日。

在政府专门委员会讨论五年 计划时的讲话*（摘录）

（1929年4月）

阿·伊·李可夫同志在发言中首先评价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工作。

李可夫同志说：我没料到工作搞得竟会象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出色。我想，如果说我们面前只有两种选择或者不加修改地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计划草案，或者再用半年时间改进这个草案，那我倒主张批准这个草案。

五年计划草案反映了计划工作的重大成绩。正在讨论的计划草案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不同，后者不是按日程制定的计划，而且没有包括整个经济。编制五年计划需要大得多的准确性，需要更广泛地把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切因素都考虑在内。

当前的计划在执行中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要对五年计划规定的基本建设工程付出大量开支，而在于确定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中的正确比例。

我们是在各经济部门发展悬殊而造成的缺点表现得极为突出的时候讨论五年计划的。商品和粮食的危机就是这种悬殊的结果。因此，五年计划的头两、三年是最困难的年头。主要危险就在于这种悬殊。

* 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李可夫同志说：因此，似乎可以把五年计划中凡是能保证消除这种悬殊的主要部分加以突出（假定说，为了消除农业发展和国家需求不相适应的现象，订出一个最近两年的工作计划），并以特别有利的条件来完成五年计划的这一部分。我认为应当这样做，因为现在遭受的困难虽然通常叫做“暂时性的”，但这些困难涉及的不是一年，而是若干年。前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工业的急剧增长经常超过计划的设想，而农业的发展在最近几年却很落后。工业生产的曲线一直在十分稳定地上升，而农业方面的曲线却纹丝不动。

这两种曲线的对比也就决定了去年和今年经济的困难，如果不充分贯彻政府的指示，下一年还会产生某些困难。因此，五年计划的头两年之所以将最困难，不仅仅是因为五年计划开始时需要大力增加投资的缘故。

苏联国家计委在解决加强发展农业和改造农业的根本任务方面提出了十分正确的方针。从这一观点出发建立拖拉机站的主张，应当得到全力支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的时候，我们在多次会议上都讨论过电犁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电犁是把新的动力技术引入我国落后农业的一种手段，而我们现在（国家计委在这里仍然十分正确）已找到了行之有效的改变农业动力基础的新办法，这就是在农业中使用拖拉机，特别是通过建立机器拖拉机站的途径。因此，在这个五年中，必须修建第二个拖拉机厂。

李可夫同志认为，有些同志坚持必须采取两种计划方案的主张是没有根据的。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可能由于歉收而改变整个计划。

然而，五年计划中是可能会有一年遇上歉收的。如果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恰巧出现顺利的年景，那我们就按照最高方案开始进行工作。可是，如果以后发生歉收和整个情况恶化，那怎么办：

难道停止已经开始的工程？

对于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部门，必须采取最高方案。对于与土地有关的一切，最高方案是绝对必需的。这是从所谓“暂时性的”困难得出的结论。这里包括对农业首先是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拨款计划，矿肥、机器制造、拖拉机制造等等工程的详细规划。燃料、化学、建筑材料计划，可能还有冶金计划，也必须按照最高方案实现，因为就两种方案看来，这些工业部门都是亏损的，这些决定性经济部门的亏损，除了影响粮食以外，还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此外，在技术干部的培养方面，也必须采取最高方案，虽说最高方案对于所有经济部门都是必要的，但是应当承认，对于其他较次要的经济部门来说，实行最高方案的必要性就小一些，这多半要视每年的情况而定。

其次，李可夫同志谈到了供求问题。

李可夫同志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注意得不够。供求平衡的主要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在改造初期，我们在基建和固定资本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可是收效很慢。这些资金有很大一部分用在工资上面，这就增加了需求。而由于工程建筑的长期性，供应将不会得到足够的增长。由此产生的需求紧张要得到缓和就要等到五年计划末期而不是在五年计划初期。斯特鲁米林同志断言供求始终能够平衡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必须尽一切可能来改善商品流转，并且减少供求之间现有的脱节现象。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更多地注意市场关系问题。即使集体农庄运动组织得再好，也不能取消商品流转问题，因为粮食我们要向集体农庄购买。

今年作了两件最重大的事情：完成了国家的区划的工作和编制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我觉得，如果认为在这些条件下管理和领导体制可以仍然保持象在区划工作和五年计划制定以前

一样，那是不正确的。我们的工作特点在于，我们不仅集中了调节的职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了业务职能。这是因为，在我们资源缺乏、没有周密的长期计划的情况下，如果中央机关的作用削弱，资金就会很难避免分散和使用不当，忽视总的和最重要的经济需要。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应使我们能够让中央机关摆脱大量业务职能。在我国条件下，特别是有了五年计划，国家的区划一定会在整个管理方面以及经济领导方面提供很大的便利，使加盟共和国机关和中央一级的机关不仅摆脱琐碎的事务，而且摆脱颇大一部分业务职能。

最后，李可夫同志谈到辩论中涉及的某些问题：燃料节约问题、工业分区的一些问题以及苏联文化的发展问题。他特别注意最后一个问题是。李可夫同志说：没有文化的高度发展，我们就无法实现这一整个计划。

译自《真理报》1929年4月6日。

在莫斯科省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摘录)

(1929年4月)

计划工作的成就和“五年计划”

据我看，过去几年的建设经验不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实践表明我们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而且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即尽管我们的组织程度相当差，我们的工作中存在无数缺点，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以及我国技术和文化不能令人容忍的落后，但是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终究还是保证了异常快的速度。这个经验可以使我们对自己提出更大的建设任务，并在组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方面取得比过去远为巨大的成果。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是一个规定我们继续前进的主要途径的具体纲领。如果低估了制定五年计划这一事实本身的重大意义，那是不对的。为了认清现在制订出的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是我国经济计划领导中的一个多么巨大的成就，这里不妨回忆一下过去的情况：我们仅仅是在1925年才开始制定（而且制定得很不好！）年度经济计划的第一批控制数字，并从这个时候起我们才着手加紧扩大和改进计划工作的，而正是这些计划工作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完整的年度控制数字和许多种“五年计划”的初步方案。

当然，不能把为计划而斗争简单地理解为力图制出一份很好

的统计表或写出一篇经济题材的学术论文。把计划的原则贯彻到我们的经济中来，这才是斗争要解决的问题。为计划性、为更好地组织经济、为扩大社会主义成分、为使社会主义成分最适当和最有效地影响个体经济而进行的斗争，为总结经验和计算经济实力（这可以使我们及时预见明天并保证我们不仅在今天而且在明天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就）而进行的斗争，——这一切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五年计划，这就意味着前进了一大步。诚然，我们以前也有过由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的、伊里奇称之为党的第二个纲领的电气化计划。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所拟定的内容相比，五年计划并没有在整个经济的技术改造方面提出崭新的方针。但它还是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有所不同，它是一个充满实际内容的更具体的计划。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草案只提到实现所拟定的计划的[大致的期限](#)（十至十五年），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计划草案则包括整个经济，并规定了完成计划的确定的——五年的期限。

为了说明这个计划，我举几个有关拟定的发展速度和有关实现五年计划时将有变动的数字：工业生产在五年内按最低方案应增长百分之一百十五，按最高方案应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五；农业总产值应分别增长百分之四十二和百分之五十四；工业的基本建设费规定为一百一十亿——一百四十亿卢布，而农业为二百二十八亿——二百四十亿卢布（这里也包括个体生产者的投资，而从国家预算中规定拨出的经费为五十五亿卢布）。

可见，数字规定得是很可观的。当人们初次看到这些数字时就不禁要问：这些数字规定得多不多？我们能不能完成这个计划？今年，我们投入工业的资金（连同电气化和其他一些支出）大约是二十亿卢布。如果在五年内逐年以同样不变的数额向工业投资，那么我们在五年内将有一百亿的投资。因此，我不认为“五年计

划”中拟定的投资数字是太大的。我个人也不认为，在这方面，即在筹措这笔投资方面会在实行五年计划时碰到最主要的困难。由于这些投资而将要取得的进展是特别大的。

除了规定的投资额以外，五年计划还要依靠拟定的巨大质量指标：例如，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按最低方案应增长百分之九十五，按最高方案应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产品成本将分别降低百分之三十一——三十五；单位产品的燃料消耗量将降低百分之三十。

能否达到这些质量指标呢？据我看，基本建设投资的数额是达到这些指标的必要性的依据。达到上述质量指标的可能性决定于用计划规定的大量投资来重新装备我国的经济。

对于我国的全体工人和农民来说，五年计划在提高他们的福利水平方面将做些什么呢？

它向每个工人和农民表明，如果全体工人和农民都做好某些经济工作，那就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工资将增长百分之五十六，农民的收入将增长百分之四十六点一）。

对这个计划的宣传要比我们过去对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的宣传更加广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主张把电气化计划作为每个学校的教材。

必须使每个工人，每个农民——中农和贫农都知道：如果他们想提高自己的生活，想在同贫困、落后和不文明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一定的成就，那他们就得用自己的工作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自己的工作质量、实现经济集体化和组织合作社等等方面取得相应的成就。必须使这个计划成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财富，我们应当使千百万工农群众都关心这个计划的胜利完成。

五年计划，当前的困难和粮食问题

计划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据我看，困难并不在于它需要大量的投资和需要筹措巨额资金，——当然，这里有困难，但主要的困难不在这里。

执行计划当中的主要困难和危险在于象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关于1928—29年度的控制数字的决议中所确认的那样，即：“农业的特别是谷物部门的极低的水平包含着使社会主义的城市和小农的农村发生破裂的危险，因而也包含着使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条件遭到破坏的危险。”今年即执行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是面临着最大困难和危机现象的一年。十一月全会曾在它的决议中指出：“谷物问题、黑色金属和建筑材料的极度缺乏、普遍的商品荒、后备问题、出口的极端落后（主要是由于没有粮食出口而造成的）和因此而引起的进口的落后，以及币制巩固问题，所有这些都是经济战线上必须特别注意的重要问题。”我的任务并不在于阐明当前国民经济形势的这一切问题。其中主要的是粮食和食品问题，我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只是因为居民的食品供应存在着困难和实行了配给证的缘故。

为什么苏联政府和地方苏维埃在这个时期要实行配给办法呢？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在普遍缺乏某些产品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首先要保障劳动人民的利益，保障工人和贫苦农民阶层的利益。在我国发生这类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保障工人阶级和农村贫苦阶层的利益。我们采用配给证是出于农业、首先是它的谷物部门发展得不够的需要。在大家都缺乏食品的情况下，这种配给证正是保障劳动居民阶层利益的一种措施。今年，无论是莫斯科苏维埃或地方苏维埃都必须考虑到粮食还会发生困难。

我所以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可能有人由于某些居民阶层明显的粮食供应不足而要在这次会议上诉苦。过去和现在我对这个问题的答复都是，我们今年还不能给大家提供不限量的粮食。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善于从农村取得粮食，而是因为我国粮食生产得不多。

最近几年，工业生产的曲线总是不断上升，有时还超过我们的计划。然而，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却在沿着一条叫作静止的曲线，也就是缓慢的速度发展。1926—27 年度的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五点四，1927—28 年度又减少了百分之一点一，今年将增加百分之四点多。但是，这个增长率主要是靠一些技术作物（其播种面积大约比战前多百分之五十）的加速发展而达到的，虽然一些主要技术作物的总产量有的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如亚麻纤维和甜菜），有的只稍稍超过战前水平（如棉花）。可是，如果看看谷物的情况，那么它在 1913 年是八千一百六十万吨，1925—26 年度是七千四百五十万吨，1926—27 年度是七千八百三十万吨，1927—28 年度是七千三百六十万吨。可见，我们的谷物产量是大致围绕着同一的水平摆动的。我们的谷物产量基本上多年以来原封未动。可是 1928—29 年度，人口已达一亿五千四百万左右，而 1913 年只是一亿四千万。而且，由于下层贫农人数的增长，农村的粮食消费量增加了，商品粮的数量减少了。

由于许多自然方面的原因，困难更增加了，例如，今年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庄稼歉收，结果总产量大约减少了两亿普特，要不然商品粮就会增加数千万普特。

这些自然方面的现象使农业中延续了数年的这个进程更加复杂化了。所以据我看，解决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着重提出的竭力促进农业发展的任务，是执行五年计划的一个关键因素。

无论从建立各经济部门发展的协调关系、扩大城乡间的正常的商品流转和保证工业原料供应等等角度来看，还是从对工业化的主要——我国工人的粮食供应的角度来看，情况都是如此，这一点必须明确起来。胜利解决增加粮食和食品资源的任务，对于以最快速度完成我国的工业化计划来说是一个最起码的先决条件。

农业中新的动力技术

计划规定到五年计划结束时要大量出口粮食。但这是以农业的高涨为前提的。而要达到这样的高涨，只有在对落后的农民经济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的一个特点是，从农业和工业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解决问题。农业要增加它的产量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主要的是需要牵引力。没有工业，增加牵引力的可能性就得完全决定于耕畜的自然增加。但这种增加有它的不可逾越的生理上的界限。工业在这方面又能为农业提供什么新东西呢？它能提供的新东西就是机器、拖拉机和机械动力。拖拉机是不取决于自然繁殖条件、而完全取决于我国工业实力的一种“牵引”力。机械动力能够克服耕畜受自然繁殖条件限制的狭隘性。我们常常说工业是主导。在五年计划中，“主导”这个一般名词被分解成若干这样的具体要素，其中每一个要素都可以直接摸得着看得见，根据其中每个要素都可以十分准确地说明，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会给农业带来多么大的好处和多么美好的前景。没有这个基础，不在农业中采用新的动力技术，我们就不能解决农业改造的问题。直到现在，我们连一个真正的拖拉机厂都还没有，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落后的。所以，从今天的实际情况来看，从我们存在的非常可怕的落

后性来看，现在所采取的速度并不算太高，因为如果只依靠马，只依靠它的自然繁殖，那么不仅在一个五年计划期内，而且在几个五年计划期内，都未必能达到我们所需要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个体经济

此外，在农业中广泛采用新的动力技术，广泛使用拖拉机和复杂机器，从中世纪的耕作法过渡到科学的有组织的耕作法，——这一切都是以大生产为前提的。所以，在五年计划中把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置于突出地位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新的动力技术的采用可以给农业社会化政策奠定广泛的技术基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速度规定得本来已经相当高了，但到五年计划结束时，个体农民经济仍将在商品粮的产量中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在农业总产值中则大约占百分之九十。但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的百分之四十的商品粮将有可能对整个农业发生这样的影响，并在农村中起这样的组织作用，以致整个力量的布局，整个工作情况，农村中的以及农村与城市间的一切关系，都将因此而发生极大的变化。不过这是五年计划结束时的情况。而最近的几年由于农业基础落后，将是整个五年中最困难的年代。

因此，显而易见，千方百计地鼓励个体商品生产者发展生产，大力协助中农、贫农基本群众的个体经济，不仅在现在，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也都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在坚持农村集体化这一坚定不移的方针和积极促进农业社会主义成分的发展的同时，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要解决当前的困难，就要牢固地确保我们在农业采用新技术、生产资料供应（机器、种子和肥料）、安排农业

设施和扩大播种面积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能够相应地提高农民即中农和贫农本身的经营兴趣。只有这样把我们对农民的援助以及我们为扩大农业中公有成分而进行的斗争同个体商品生产者（农民）的经营兴趣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巩固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从而使我们更加有可能最迅速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在大规模集体生产的基础上最迅速地改造农业，并胜利地向富农、资本主义分子发动进攻。为了改善农业战线的状况，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在去年秋天提高了粮价，颁布了关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法令和关于农业税的新法令。

表明我们现在的农业状况，特别是播种面积状况的指标如何呢？按照中央统计局的统计，秋播地比上年几乎缩减百分之三，在那些收成低于中等水平的地区，缩减的百分比还要大得多。例如在北高加索，个体农户的播种面积几乎缩减百分之十五，在乌克兰缩减百分之十一。这些地区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播种面积大大增加了（北高加索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乌克兰增加百分之四十六），但这个增加额并抵销不了个体农户播种面积的缩减额：按个体农户和公有成分平均，北高加索缩减了百分之十点六，乌克兰缩减百分之十点四。由于歉收而造成的饲料短缺，这些地区发生了大量宰杀牲畜的现象。

明年的前景要取决于我们在春播运动中取得的成就。今年，在春播运动时政府拨发了种子四千万普特，即比去年多一千万普特。供应农村的农业机器也增加得很多。我们现在遇到的一切严重困难，必须在最短时期内加以铲除，因为它们会给整个商品流转和整个经济造成很大压力。因此，正在进行的春播运动应当具有怎样的战斗性，是显而易见的。

有关当前经济困难的问题是很尖锐的，但这决不能因此而使我们哪怕片刻地忽视关于农业生产社会化的长远性任务。

五年计划把我已经谈过的发展农业方面的方针同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化联系起来，而且也不能不这样地联系起来。在我报告的开始部分曾谈到国际形势，并把当前的形势同两年前加以比较。如果把现在对农村问题的提法同几年前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加以比较，那么谁都能看出是有巨大区别的。

主要的区别在于：当时，人们在谈论扩大农业和采用集体耕作方法的时候，在这方面还没有多少经验。那时，这一切还没有经受考验，还没有得到农民本身的完全赞同，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吸引广大农民阶层组织起来去实行集体耕作。最近两年，关于在社会化基础上扩大农业的问题实际上已经从理论和决议的领域转到已经不是个人而是千百万人参加的群众性实践的领域了。国家计委依靠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新的动力技术日益增长的作用，计划把这种公有化部分加以扩大，以便使我们能够对我国非常落后的农村的经济、社会阶级关系和日常生活发生更大的改造作用。

译自《真理报》1929年4月13日。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1929年4月23日在联共(布)第十六次
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同志们，我竭力使自己的报告不超过所规定的时间，尽管这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题目非常大。除我之外，还将有另外两个人报告五年计划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报告人节约时间，自然也就不能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把所有的问题都谈完。

我的报告的题目是五年计划的概况。

一、五年计划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今天是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因为今天全苏党代表会议有可能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即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工作的计划。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非常紧张的卓有成效的经济和文化工作，但是，三、四年前，我们连“控制数字”也没有，就是说连一个基本上一致的年度经济计划也没有。几年前，连我国固定的年度预算都没有；我们是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地编制国家财政计划的。现在，我们有可能讨论连续五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了。严格地说，只是从制定五年计划时起，我们才真正开始深入进行计划工作。在此之前，我们有过电气化计划中阐明了的并经苏维

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批准了的总方针，我们有过一些年度的经济工作计划纲要，有时我们也为某些工业部门制定过若干年的工作计划。但是，所有这些工作都难以开展，这首先是因为我们不能在时间上把我们的工作充分精确地协调起来。每年都决定着下一年，可是我们往往没有可能认真地展望下一年的情况。发展的每一年，都使经济和阶级力量发生巨大变化，但是我们却不能从精确的长远方针去看这些变化，不能认真估量这些变化的意义和很好地利用它们来组织新社会。由于有了五年计划，这个缺点就可以清除。

我在说明五年计划的意义时特别请你们注意的是，它在动员群众去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方面所应当起的作用。要知道，组织新社会，同时也就是组织工人阶级和贫农、中农群众自觉地、积极地直接参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广大工农群众组织得越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就越顺利，我们在工业化道路上即在变我国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上前进得就越快。五年计划在组织工人阶级、贫农和中农群众方面具有巨大意义，它可以具体而明确地表明，工人阶级、农村中的贫农和中农通过自己的努力会在明年或两、三年后得到些什么。五年计划是具体的，在时间上、每年的工作成果上都有规定，所以它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去组织新社会的最好的工具。

当初我们讨论我国电气化计划的时候，列宁曾坚决主张要通俗易懂地对广大群众说明电气化计划，并认为电气化计划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强大杠杆。五年计划比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更能起这样的动员作用，因为后者虽然有十分特殊的种种优点，但也有不足之处，即不能在一定期限的固定时期内展现出它在电气化基础上所开辟的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新前景。而五年计划就有可能使每个了解这一计划的人在任何群众会议上说明和充分精确地指出：五年内社会主义建设会推进多远，工人阶级

的状况会得到怎样的改善，农民的状况会得到怎样的改善，这五年内为克服和消灭资本主义关系的残余而进行的斗争会获得多大的胜利。

但是，这些成就的大小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取决于是否善于组织科学技术力量，能否成功地解决巨大的具有革命规模的技术任务，能否顺利地组织农村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斗争，等等，——换句话说，取决于工作质量指标的提高。所有这些问题在计划中不是作为一般理论性指令提出来的，而是以具体数字表现出来的，这些数字表明了劳动强度、质量指标同工农在发展工农业和改善工人农民物质与文化状况方面将获得的成果之间的依从关系。必须使五年计划的一切主要细节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工人所深入了解，以便使他们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出他努力的程度同这种努力所获得的成果之间的这种依从关系，使每一个人都能象农民那样做到心中有数：我若这样播种；我若这样改善经营，我若这样有效地劳动，我就能收获这么多的粮食，获得这么多的收入。工人阶级作为建设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人，作为新社会的组织者，通过这个五年计划就能够而且必须了解、研究和估量在最近五年期间的，能把这巨大经济的建设和改进工作向前推进多远和如何推进，并把这种估计作为把我国无产阶级和中农、贫农群众最广泛地组织起来的根据。

二、五年计划的基本要点

同志们！如果不超出议事规程的范围，我就连最重要的数字都不能加以说明。这些数字在提请你们注意的中央委员会的提纲中已经有了。我现在请你们注意的只是，如果我们实现了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那么从我们同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速度的竞

赛这一观点来看，将发生巨大的变动，而苏联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将比其他一些国家上升到更高的地位。例如，在作为经济的工业发展决定性指标之一的生铁方面，我们现在占第六位，到五年计划末，我们将上升到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在煤的开采量方面，到五年计划末，我们将从第五位上升到第四位，仅次于美国、英国和德国。

在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任务（在技术—经济方面赶上和超过一些先进国家）方面要取得这种巨大成就，必须以我们在最近五年内规定的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的大量增长为基础。例如，五年内拟定对计划建立的工业的投资为一百六十五亿卢布，而前一个五年为四十四亿卢布。与此同时，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其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所谓固定资产也将大幅度地增加。工业的固定资产将达到二百五十八亿卢布，而现在只有八十六亿卢布；电气化的固定资产将达到五十亿卢布，现在只有九亿三千万卢布，铁路运输的固定资产将达到一百八十二亿卢布，现在只有一百零八亿卢布。农业的固定资产将从二百八十七亿卢布增加到三百八十九亿卢布。工业和电气化的固定资产现在比农业少三分之二。在五年计划末，这个比例将发生巨大变化，即工业和电气化的固定资产（约三百一十亿卢布）仅稍少于农业的固定资产（三百八十九亿卢布）。

根据这种情况，整个国民经济的产值也将急剧增长——增长一倍多，特别是五年内增加的工业产值将达一倍半以上。可见，五年计划拟定的不仅是国民经济生产力的增长，而且是使我国朝着由农业工业国变为工业农业国的方向发展。

随着这些物质上的变化，社会将发生重大变动，社会主义成分的固定资产（即国家和合作社的资产）所占的比重，将从现在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七增加到1932—33年度的百分之六十八点九。

这大体上就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两个方案（所谓最低方案和最高方案）提出的这一计划具有的特殊意义。这两个方案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政府的意见拟定的，为的是使我们有可能更精确地估计执行五年计划的条件，并使我们确定能不能保证拥有这些条件。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五年计划时，我们一致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批准的不是两个方案，而只是一个方案，即预计能取得巨大成就的那个最高方案。

而且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农业方面或某些工业部门方面都必须把这个最高方案再加以扩大。在农业方面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在东部一些地区，现在的播种面积还大大低于战前的规模——有时只是战前的百分之十五多一点。根据五年计划对播种面积的增长速度所作的规定，到1932—33年度，某些地区的播种面积只能勉强达到战前的水平。在苏联人民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认为可以而且必须在扩大播种面积方面采取更快的速度，所以相应地扩大了计划的任务。第二个重大修正涉及到提高国营谷物农场的产量。

我们发现，可以而且必须扩大谷物托拉斯各国营农场的谷物生产计划。此外，由于现在农业产量增长的速度太慢，所以我们决定在五年计划的头几年增加矿肥和农业机器的生产。例如，我们认为必须在1929—30年度就把磷钙石这种肥料的生产发展到五十万吨。我们也同样地扩大了电气化方面的任务，其中包括下诺夫哥罗德区的电气化。由于建设最大的自动化工厂的建筑工地（一俟制定出该厂的设计图纸就必须立即开工）问题而出现了新的情况，所以我们又选择了下诺夫哥罗德。

其次，我们扩大了燃料生产的任务。五年计划的特点之一，是要求燃料的燃烧要充分合理，这种办法将使单位产品的燃料消耗量比现在降低百分之三十。但是，这还不能保证我国燃料平衡

的稳定性。我们认为必须扩大包括库兹涅茨克矿区在内的燃料开采计划，并争取在利用地方燃料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我们苏联的燃料经济基本上是以顿涅茨和库兹涅茨克矿区为基础的，但大家都知道，它们是远离象列宁格勒和中部工业地区这样一些我国的工业中心的。燃料的长距离运输需要大量开支。因此，关于利用地方燃料，尤其是借助于电气化利用地方燃料的问题，对中部工业区这样一些地区就尤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当今在利用地方燃料方面已取得了种种巨大的成就，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五年计划草案，几乎还是要求把从顿巴斯运到中部工业区去的燃料增加一倍。这促使我们决定更多地利用莫斯科附近的煤和更广泛地开采泥炭。我们指示要在五年内使莫斯科附近的煤的开采量增加四倍，泥炭的开采量增加两倍。我们担心如果不这样做，燃料运输的大量增长就要我们支出更多的经费去额外敷设连接工业区和南部燃料产区的铁路干线。这就是补充到五年计划中的一项最重要决定。

其他许多补充或修正部分，例如有关扩大石油开采任务和扩大科学的研究工作等等，我就不再列举了。我要谈的只是，所有这些修正和补充部分并不会使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的五年计划草案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计划的各个项目之间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关系仍按国家计划委员会所拟定的那样保留下来。

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我们从其他各国发展史中所知道的速度，这样高的速度是否可能达到、是否切合实际呢？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工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七至十就算是很高的速度了。按照五年计划，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作了计划的工业，年产值的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二十左右。五年计划规定，作了计划的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逐年增长的百分比是：加百分之二十六，加百分之二十五，加百分之十五，加百分之十

二，加百分之九；到1932—33年度，这种投资将超过1927—28年度投资的一倍左右。我认为这样的速度我们是能够保持的。我们今年已经向工业和电气化方面投入大约二十亿卢布。假如我们今后也逐年投入象今年这样的数额，那么，五年内就可以达到一百亿卢布。同时，我国的经济将一年比一年强大，这样也就更有可能抽出资金用于基本建设。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在由所谓恢复时期到改造时期的时候，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速度会显著降低，而且将会比最近几年实际达到的速度降低得多。在恢复时期，扩大生产的任务归结为利用现有的设备和现有的工厂，并不需要花多少基本建设费用。因此，在恢复工作有成效的那几年，我国工业的总产值达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逐年递增。但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当我们拥有的工厂已达到饱和点的时候，只有在建立新工厂和根本改装现有工厂的基础上才能使工业进一步发展。当我们开始进入这一转变关头时，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认为，我们不仅不能象以前那样非常迅速地前进，而且甚至连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这样的速度也未必能够保证。那时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只希望达到百分之十至二十。然而，今年和去年一样，我国工业的产值增长额还是百分之二十左右。我认为，今后几年达到这个比率的可能性不是更小，而是更大。请不要忘记，我们今年和去年在工业改建和建立新工厂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而在今年，这些改建和新建的工厂已部分投产，明年还将有更多的工厂投产。与此同时，也更有可能加快建设速度和资金周转。大家都知道，直到目前为止，在建设工作中还存在很多错误、缺点和漏洞。但同时也不能否认，我们现在的建设工作还是做得比前两三年好，做到了又省又快。这就为加速资金周转创造了前提，这一点是具有巨大意义的。在五年计划中，我们的出发点是在三年内能够建立象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和帖利别斯这样一类

大冶金工厂。这样的建设速度不低于欧洲，但我们有理由要求我国经济机关依靠到现在为止在新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来达到这样的速度。五年计划的出发点就是要加快这样的建设速度，例如，应当在半年内建成地区蒸气供应站。在妥善组织建设工作和利用建筑业的现代技术成就的条件下，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五年计划不仅对一切经济机构的工作质量提出高要求，而且它的出发点是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多。这自然不是说，应当把劳动强度即人在劳动中付出的能量提高一倍。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我们用于改造工业和使生产合理化的大量投资。但是，如果认为在当前所特有的那种劳动纪律的状况下，新的机器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生产率，那是错误的。只有在执行政府最近颁布的关于巩固劳动纪律的法律的情况下，只有迅速克服最近在这方面发生的那些缺点（相当高的缺勤率等等）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五年计划中所拟定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和根据劳动生产率而拟定的扩大生产的速度。工人实际工资的增加额规定为百分之七十，但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工资的这种提高直接决定于整个计划、特别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决定性环节的执行情况。工人阶级是苏维埃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国家是工人的，政权也是工人的，改善工人阶级、农民贫苦阶层和一切劳动人民物质和文化状况的全部事业，都是工人阶级、贫农、中农群众的事业，一定要在他们广泛的参加下，才能保证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妥善的组织工作和提高其他质量指标。

在这个计划的五年内，定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将占更重大的地位。工业在国家的净产值中所占比重以不变价格计算，将从1927—28年度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增加到1932—33年度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工业在固定资产中所占比重将从1927—28年度的百分之十四增加到1932—33年度的百分之二

十二点八，同时电气化将从百分之十五点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七点一。

这也意味着国内阶级的巨大变动。工人阶级的比重和作用将相应地发生变化。根据五年计划规定：注册工业的工人人数1927—28年度为二百七十五万人，到五年计划结束时，将达到三百六十三万一千人。全国雇佣劳动的总人数将从1927—28年度的一千一百三十五万人增加到1932—33年度的一千五百七十二万四千人。

随着上述工业的增长和国民经济的普遍高涨，五年计划规定大量减少失业人数。我在这里不准备列举有关减少失业人数的数字材料，因为我认为，现在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计算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随着既定经济计划的实现，失业人数是肯定要减少的。

只有在大大提高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五年计划。五年计划规定对社会文化建设进行大量投资。为了保证尽快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这些投资是必要的。在这五年内，打算把社会文化需要方面的开支从1927—28年度的二十四亿卢布增加到1932—33年度的五十九亿卢布。在整个五年内，用于社会文化部门的开支将达到二百一十四亿卢布。

用于文化需要的这些巨大开支只能保证文化革命的初步发展。今后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上的日益提高。我国劳动人民的文化的提高，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最重要条件，是同我们国家机关工作中的缺点、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等等进行坚决斗争的最重要条件，也是改造我国经济的最重要条件。因此，在文化需要方面的支出是五年计划和过渡时期我国整个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毫不怀疑，我们一定能胜利地担负起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任

务，一定能保证按五年计划规定的数字实现对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投资。在实现五年计划的过程中，我担心的是一系列有关我国技术和技术干部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些资金和用这些资金来完成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各项工作？换句话说，我们是否解决得了有关组织人、组织科学技术干部和熟练劳动力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利用现代技术提供的巨大发展潜力？这是关键问题。五年计划是一个巨大的力量。这是一个革命的计划，这不仅因为它本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飞跃，而且因为它将是在技术、在实际应用最新技术方面进行的一次完整的革命。要知道，有一系列生产部门我们几乎得从头建立。但是，为了新的建设，我们仅具有可能拨出的资金和建筑材料还不够，除此以外，我们在这里还需要有人，即需要有能够而且善于执行广泛建设计划、组织新企业和新生产部门的技术干部和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所以，决不能把干部问题，即妥善培养相应数量和质量的人材（从熟练工人到高度熟练的工程师）的问题，看成是五年计划的某种不重要的“附带”问题，或甚至是次要的问题。相反，干部问题是五年计划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解决这个问题是十分迫切的和第一位的工作。否则，我们就不能按五年计划的一系列项目胜利完成我们面临的最重大的国民经济任务。既然我们现在要尽最大努力来掌握欧美的技术（并非没有成就），那么利用外国科学技术的经验就应当在五年期间内达到空前规模。这里往往根本搞不清吸收外国的技术到底应当是采取多大的规模。当我们的新干部已及时培养出来（培养他们的工作应当尽量加速和改进）的时候，我们需要聘请的外国专家（工程师和技术员等）的人数自然就要减少。但是现在，当我们准备在我国技术方面进行大规模革命的时候，象只聘请一两百名外国专家这样的措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例如，拿生产人造丝这样一个部门

来说吧，它无疑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部门。我们虽然在这方面不懈地奋斗，但我们还是不能很好地进行设计，也不能对设计作出明确的鉴定。而在外国，尽管那里存在经济生活中的私有制障碍，但这个工业部门还是非常迅速地发展着。我们本来能够以空前快的速度来发展这个部门，然而我们在这方面却表现得象小孩一样软弱无力。如果只依靠我国现有的干部，我们就未必能在各方面做很多工作。这就再次引起我们注意，我们在这一点上还没有夺得必要的阵地。

把这个草案同以前的所有草案加以对比，就能看出这个五年计划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正确而显著地规定了农业的高涨和改造的前景。五年计划对农业的规划同当时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规划原则上是相同的，因为它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在新的动力技术基础上使农业社会化（通过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合作化）的问题。我现在回想起列宁当时非常注意在农业中应用电犁的情景。虽然这项发明是一件没有把握的新事物，而且缺乏检验电犁的丰富经验，但列宁还是尽最大的努力来抓这个问题，希望能从中找到一种技术和生产的杠杆，以便我们借助于它来实现农业社会化的事业。电犁没有成功。也许今后电学方面的新发明和电气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会给我们开辟从来没有的新前景。在当前条件下，必须从解决牵引力方面的问题入手来根本改变农村的技术经济结构。新五年计划的最大成就是它第一次规定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办法，它对农业提出了类似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所拟定的计划。以机械动力代替畜力将引起农业生产本身的一次技术革命，同时将成为农村社会关系巨大变化的基础。我们是在第一次认真地从事农业的社会化，以社会主义方法改造个体农民经济，采取各种技术措施把我们在农村的工作做得扎实而富有成效，并能为农民所乐于接受，以便保证我们的

原则方针的实现。特别是村际农业机器站定将对整个农业的高涨起很大作用，并成为农业中的公有部分同个体部分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纽带。最后，除了拖拉机和农业的机器供应以外，增加化肥的生产也是农业高涨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正是考虑到五年计划的这种意义，我们决定建立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以外的第二个拖拉机厂。（斯克雷普尼克插话：“在乌克兰。”）也许在乌克兰建立。实现五年计划的结果，将把两千万农民组织到集体农庄中来，使一百万农业工人在国营农场就业，——这是农村中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

为农业生产奠定新的社会和技术基础的五年计划这个总方针，决不能使我们忘记个体中农、贫农户所具有的意义。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到五年计划末，公有化部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的商品粮只能占百分之四十，其余百分之六十还要靠个体农户提供。不能认为农业公有化的任务同关心贫农、中农经济的发展是相互矛盾的。相反，只有把这两项任务正确结合起来，才能顺利解决整个农业高涨和改造的问题。因此，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决议自然有效，该决议特别强调，必须在大力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和进一步向富农进攻的情况下，竭力推动个体中农、贫农经济的高涨。五年计划中拟定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总方针，党应当根据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决议采取一切措施，使个体贫农、中农都能从经济上关心按上述方针为农业的高涨和改造创造物质技术前提的工作。对这些农户采取的鼓励政策，对于真正有效地使用国家和社会主义工业投入农业的几十亿卢布（即机器，拖拉机和肥料等等）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现在提出的这个五年计划是否完善，是否各方面都考虑得周全，是否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得很正确呢？到目前为止，在我们执

行我国的年度预算和经济计划时总会出现许多缺点和漏洞。在每个年度内，都会出现年度计划以外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重大任务。当然，在执行这个五年计划时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因为这个五年计划是拟定这类计划的初步尝试。但如果因此而拒不审查和批准这个计划，那是根本错误的。从总的方面来看，这个五年计划就其一些最重要的方面来说，即就其几个重要经济部门——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情况来说，是正确的，即使从社会阶级的观点来看，这个计划也是正确的，因为它可以保证整个经济中公有化部分的迅速发展，在城市是如此，在农村也是如此。

这个计划制订得很详细，它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我们一切实际工作的基础。今后应当作些什么样的修正和补充，将由经验和实践来说明。订计划就是要考虑到这些修正和补充的可能性，这里不仅要靠人力和财力的重新调配，而且要靠按照计划所必须建立的后备力量。

三、本经济年度

在讨论提交代表会议审议的五年计划草案时，不应忘记本经济年度是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即占全部计划时间的五分之一。从本年度的情况对以后几年的影响和从五年计划的可行性来看，我们今年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我想简要地向大家谈谈今年的经济工作中出现的一些主要情况。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经过党的中央委员会决议强调指出的一个最尖锐和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加强发展农业，以便在最短时间内摆脱国民经济主要部门——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中出现的失调的威胁。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出发点是，工业的发展速度应继续高于农业，因为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意味

着不是国家的工业化，而是国家的农业化。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农业在发展速度上一般地落后于工业，而是在于这种落后过于严重。农业的发展落后到如此地步，已经对工业本身的发展造成了威胁。大营工业就是在从恢复时期到改造时期以后也在年复一年地证明，生产的发展情况是相当好的，每年的增长速度在百分之二十左右。这真是好极了！根据国家计委的材料，最近几年来农业的总产值增长情况如下：

	比上一年增加的百分比
1926—27 年度	+ 5.4
1927—28 年度	- 1.1
1928—29 年度	(估计) + 4.4 ^①

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发展技术作物获得的。现在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比战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尽管象亚麻和甜菜这样一些技术作物的总产量尚未达到战前水平。技术作物增长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我们必须继续实行大力发展技术作物的政策，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更加重视谷物产地的情况，谷物产地如果不景气或生产下降，就不可避免地会使技术作物、使整个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遭受打击。我们的谷物生产情况不及技术作物的生产情况。谷物播种面积的变动是说明谷物经济情况的一个最重要指标。如果战前谷物的播种面积为一百，那么后来的情况则为：

1926—27 年度	- 92.9
1927—28 年度	- 94.6
1928—29 年度	- 92.2 ^②

① 见 1928—29 年控制数字 398—399 页。

② 同上，第 412—413 页。

按人口计算，现在谷物播种面积只占战前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三点八。现在再来看看粮食总收获量的情况。

粮食总收获量(百万吨)

1913年.....	- 96.6 ^①
1925—26 年度.....	- 74.5
1926—27 年度.....	- 78.3
1927—28 年度.....	- 73.6
1928—29 年度.....(估计)	- 73.3 ^②

其中主要的粮食作物即黑麦和小麦的产量为：

黑麦和小麦的播种面积和收获量

年 度	黑 麦		小 麦	
	播种面积 (百万公顷)	收获量 (百万吨)	播种面积 (百万公顷)	收获量 (百万吨)
1925—26 年度.....	29.2	23.0	25.5	21.2
1926—27 年度.....	28.8	23.9	29.9	24.8
同上年的百分比相比.....	- 1.4	+ 3.9	+ 17.2	+ 18.0
1927—28 年度.....	28.4	24.4	32.0	21.1
同上年的百分比相比.....	- 1.4	+ 1.6	+ 7.0	- 15.0
1928—29 年度(估计).....	26.1	19.6	28.4	19.9
同上年的百分比相比.....	- 8.1	- 19.7	- 11.3	- 5.3

粮食作物的生产情况就是如此。这种情况是由一系列我们大家熟知的现象决定的。

农业、特别是它的谷物业存在着这种情况使我们不得不在今年大力扩大播种面积。但是秋播工作并没有达到我们所预期的结果，秋播的土地面积不仅没有扩大，而且在全国普遍减少了将近

① 1913 年指的是实际收获量。如果按平均产量来计算这一年的产量，那么 1913 年的总收获量则为八千一百六十万吨。见 1928—29 年度控制数字第 408—409 页。

② 根据中央统计局最近的材料。

百分之三，这里的部分原因是遇到了不利的气候条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粮食作物（黑麦和小麦）是秋播作物中最主要的作物，而这些作物恰恰在我们的粮食、饲料平衡中是一个最薄弱的环节。所有参加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同志都应该认清春播工作在这些事实面前所具有的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弥补秋播作物的不足和完成扩大播种面积的控制数字，必须把春播的面积扩大百分之七以上。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在个体贫农和中农经济中，还是在作用日益扩大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我们在扩大播种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取得的每一个百分数对我们说来都是一个很大的正数。由于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粮食的总收获量普遍减少，加上庄稼的地理分布不合理和某些地区（乌克兰和南高加索草原）遭到破坏，今年的粮食收购工作处在停滞状态。于是就造成了粮食供应紧张。

从粮食市场的粮食收购价格和自由价格之间的差距也可以看出一些粮食困难的景象，这里经常可以看到投机倒把的情况，这样也就为采购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因此，在一些最主要的粮食收购地区，对农村中一些囤积粮食的富农阶层采取了社会强制的办法。针对现存的粮食状况，我们不得不实行配给制度。不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粮食不足为投机倒把活动提供了条件。在实行首先保证大城市的供应计划时，在城市里无限量地销售粮食就不能不成为投机倒把进一步发展的源泉。象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样一些大城市已成为这种投机倒把活动的中心。深受其害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因此，为了节约粮食消耗，为了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以及保障工人阶级与农村贫农阶层的利益，我们就实行了所谓配给制度，当然，不能说这是一种什么福利。在现有的条件下，这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

如果我们将对粮食问题的紧张情况不能加以消除，那它就不能

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其他方面。

今年也有做得很好的一面，即工业的总产值提高得很快（增加百分之二十左右），工业大规模基建的准备工作搞得比前几年好，任务完成得很顺利。

工业发展的不足之处就是工业的产品成本计划没有完成。规定降低成本百分之七的任务，到目前为止仅仅降低了百分之二。这个成绩不大。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十，而任务规定是提高百分之十七。

预算收入情况良好。上半年的收入为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六，这比去年同期完成的比例要高。但是我们感到预算有些紧张。紧张的原因就是工业成本降低的速度不够快。非常明显，如果成本的降低少于规定，如果靠成本的这种降低所得到的内部积累很少而工作量却仍和过去一样，那么对预算拨款和信用系统的压力就必然会加大。为了缓和预算的紧张情况，我们设法提高了酒和酒类制品的消费税。我们甚至没收了，或者更确切些说，仍在继续没收交通运输业的额外收入，这种收入能达到数千万卢布。我们的运输业工作者强烈地反对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不这样做。此外，我们通过了决议，决定把工业和运输业的资源动员出来，这样今年就能提供大约二亿五千万卢布。这里指的是要为运输业和工业中作为“死资本”积压下来的剩余材料和半成品找到销路。这种情况也会对地方和共和国的预算造成一定的压力。

同志们，五年计划实施第一年我国经济情况所表现出的不足和最尖锐的一面就是这样。

尽管有这样一些困难，但是总的来说，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计划是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完成的。

计划在执行中虽然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的关系到发展我国经济建设的决定性因素——工业方面，计

划执行得基本上是顺利的，运输业的工作和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同样也很顺利。

如果把春播搞好并因此使明年国家的粮食供应情况得到改善，那么如今经济情况中的很大一部分由于粮食不足而产生的弱点就可以得到克服。但是应该清楚地看到，我们在农业方面的任务不仅限于扩大今年春播的播种面积，我们的任务还要广泛得多。五年计划规定要逐年解决这一任务，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到五年计划的后半期，在粮食方面我们不仅要保证国内的利益，而且也要使粮食在出口中占据重要位置。今年的困难表明，必须特别注意五年计划当中的这一部分计划的实现，当然，这一部分同整个五年计划都联系在一起，尤其要依靠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

四、管理体制的改变

同志们，根据议事规程所给予我的四十五分钟时间已经过去了，因此我只能简要地谈谈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同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当我在阅读各地区和国民经济各工作部门五年计划的材料时，我在想，如果我们在执行这个五年计划时仍然依靠过去那套组织和工作方法，这样做是否正确。在我看来，这样做未必是正确的。两大事即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区域划分工作的完成也不能不反映到我们的体制和工作方法中来。地方机关至今还在对经济管理过分集中提出正当的抱怨意见。由于管理过分集中，甚至往往连各共和国或其他机关的宪法权力都遭到了侵犯。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确有这样的弊病，即把这样一个巨大的拥有一亿四千多万人和广大领土的国家的行政业务工作都集中在“塔楼”里，集中在少数机关的手中。

这些机关的少数领导者力图把大量行政业务性质的工作都抓在自己手里。我认为，在批准了五年计划和建立起州级机关以后，可以在管理体制上作一些大的改变。要知道，过去在业务工作上集中制之所以非常盛行，是因为州级组织没有远景规划，所以自然就会把钱都用在从整个经济的全局利益看来算不上头等重要的工作上来。我可以给大家举出大量例子来证明这种情况。这种情况甚至在莫斯科也可以看到，例如，在莫斯科新建了皮革厂，可是在外地已经有了一些皮革厂，由于缺乏原料，这些工厂都未能充分开工。又例如，几乎每一个城市都力图筹建自己的被服厂。显然，所有这些都需要花钱，而这些钱本来是应当用于从全国的观点看属于最重要的建设项目。现在我们有了详细的五年计划，何时何地搞什么样的建设，计划中都有全面安排。这样就可以减少业务领导上过分集中的倾向和加强地方机关执行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工作的权力。计划领导和总的调节应该集中于中央，这方面的工作应当改进和加强，但是业务工作应当尽量交给地方。

五年计划要求对大量物资进行大规模调配。它规定要在社会阶级关系上进行大的改革，就是说要大大加强社会主义成分，它意味着对我国城乡的整个经济进行技术改造的一次巨大的革命过程。依我看，如果认为依靠过去建立的那套机构和使用从前的那套工作方法就能完成所有这些工作，那是错误的。

* * *

我的发言就讲到这里，我想把这个发言作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问题的开场白。具体计划将由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古比雪夫同志来向大家报告。最后我只想强调一下我开头时所指出的那个思想。我相信，无论是对经济工作还是对整个党的工作，五年计划都将带来巨大的活力。这个计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计划所需要的资金我们筹集得出，而且我们在国内就可以解决。

只要鼓足干劲，只要把无产阶级、技术人员和所有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力量广泛动员起来，只要把贫农、中农群众动员起来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团结他们同富农进行斗争，这个计划在所有其他各个方面都是可以完成的。

我们的建设时刻都在进行，而且是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在现阶段，阶级斗争很尖锐。五年计划是无产阶级向城乡资产阶级残余实行大规模进攻的计划。与此同时，这个计划也是开始用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办法对贫农和中农经济实行广泛的真正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五年计划中所包含的物质和组织前提，这一计划在工人和农民面前所展现出的前景，——所有这一切都必将成为组织工农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遇到的困难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因素。同时，所有这一切也一定会消除工人阶级和党的队伍中由于这些困难而显露出的紧张心理甚至惊慌失措情绪。五年计划是我们党前一段时间出色工作的结果，它也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和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绘出了广阔的前景，它定将成为团结党和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沿着建成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道路前进的基础。

译自《真理报》1929年4月26日。

在苏联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 政府工作报告

(1929年5月20日)

国内政策问题

同志们，昨天政府对外政策工作报告占用的时间已经很多了，但是我还要尽量简要地谈谈与我们的国内政策有关的问题。我之所以要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对国内政策问题可以少花些精力，而是因为最近时期在各地苏维埃选举和这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中，这些问题已经进行过非常详细的讨论。

当前形势的特点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中，首先看到的最突出的和最令人注目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从表面上看来，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存在一系列矛盾着的经济事实。一方面，我们正在建设第聂伯水电站，在电站附近建立由几个大型钢铁厂和化工厂组成的巨大联合企业；我们正在建设技术上第一流的巨大联合企业；我们正在农村采用成千上万的拖拉机；在农村本身，我们正在取得农业生产技术上的巨大进步——发展多圃轮作制，精选种籽，组织大量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等。另一方面，与此同时，在我们的现实中，还存在着粮食困难和诸如配给证之类的事。今年在政府会议的议事日程上

经常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如增加农机生产的措施问题，引进拖拉机的问题，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工厂的建设问题，以及额外寻求数百万普特粮食或饲料来保证森林采伐工作的需要问题。

以上我所谈的经济形势的情况，表明自前几届代表大会到本届代表大会以来我国经济和生活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展。

上面我所指出的经济形势中的矛盾情况和在十月革命以后我们所经历的前几年的情况是否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呢？我认为没有；那时的困难是在原有的技术水平上和在另一种社会关系的条件下恢复经济时期的困难。谁若试图把从前的困难摆出来加以类推，从而找出解决现在的困难的办法，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当前形势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国家的经济生活已经达到了在十月革命后的年代里所不曾有过的水平：整个工业生产已超过了战前水平将近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工人阶级和中农，特别是贫农阶层的组织性、积极性和自觉性提高了；文化领域里出现巨大的进展；公有化的生产和公有化的流通现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大家还记得从前一个国营企业同另一个国营企业进行交换还得经过私人中间商的情景。现在，私商已经完全彻底地被排挤出商品批发领域，而且他们在零售商业中的地位也已微乎其微了。在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积极性还保持着，甚至还有所加强；尽管如此，但是他们在这里所处的时代和条件不同了，无论公有化的商品流转还是公有化的生产，都能与资本主义因素相抗衡，其规模之大、力量之强，是过去所不曾有过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比三、四年前大大提高了。因此，我们现在同经济困难作斗争时，不仅可以采取更加有力的手段，而且可以采取一些新的方法。

上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了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方针，把工业化作为加快整个苏联经济发展速度的最巨大的因素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的决定性环节。

在这个时期里，国家的工业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过去我们所完全估计不到的成就。从前我国冶金业的地位很差，例如，1926—27年度的生产产量只及战前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但是今年我们在这一方面也可能达到战前水平，在整个黑色冶金方面甚至可能超过战前水平。现在的农机产量几乎超过了战前的两倍；巨大的拖拉机厂已着手建设；新的、管理处在萌芽状态的工业部门——化学工业，包括矿物肥料的生产，正在建立起来。经济改造时期当然并不是从今年才开始的，但是现在的改造工程的规模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正是这一点对整个经济生活的性质产生着影响，甚至在农村也是一样。

从阶级的意义来看，苏联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意味着消灭我们国内资产阶级残余的阵线已经全面展开。从人民财富和广大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角度看，它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大大增加产量为前提的，而这就意味着劳动者的福利在最近几年就将会有很大的提高，我们消灭我国文化落后状态等等的能力也将会得到加强。尽管前三年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现在仍处在这样一种经济建设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一工作虽然已经大规模开始和广泛开展起来，可是还未能在每一个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中产生明显的成果。在农业里，新型的大规模的公有化生产只是刚开始广泛展开，农业的发展还严重地停留在旧的形式里，这就造成了两年来我们所经受的困难。

从以上我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和建设所作的说明里，可以十分清楚看出，尽管出现困难已经是第二年，但是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在为这些困难的根本解决提供有效的手段。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和五年计划

我们已进入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不仅对个别生产单位，而且对

经济生活的广大阶层进行根本改造的时代，是一个对社会各阶级即成百万的人实行文化改造和社会变革的时代，如果说这个时代的性质真正是这样的，那么，很明显，只有靠改进经济建设的计划领导来进行妥善管理的办法才能实现这一相互有远见的巨大工程。

在这之前，我们年复一年地过着没有具体明确经济建设目标的日子。我们年年都制订控制数字。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我们的日常开支绝大多数都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为以后的年代作准备。

我们不妨以生铁生产为例。为了增加生铁产量，我们从今年起已经在开始新建一系列大型的需要四年以后才可以出铁的工厂。但是，生铁生产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于矿石的生产，并同机器制造业、运输以及整个经济部门都有联系。所有经济部门的发展必须彼此结合起来，照顾到以后若干年的需要。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建设阶段，计划工作以一年为期，时间太短，是不够用的。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有多年的远景规划。国家计委制订的五年计划经国民经济委员会讨论、补充和批准后已提交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审查。这个计划最鲜明地说明了我们面临的各项新任务和社会主义建设向我们每一个人提出的各种新要求。

历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这样的庞大计划。根据伊里奇的提议，早在第八次代表大会时就讨论过电气化计划。当时这是在总结我们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应采取的方法上所作的第一次尝试。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对电气化计划作了如下的评价：“我认为，我不难使你们相信这本书的特殊意义”，他指着这本包含着电气化计划内容的六、七百页的“书”说，

“在我看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党纲”。^①

他指出，共产党的纲领应当用第二个党纲，即恢复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来补充。“没有电气化计划，我们就不能进行真正的建设……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②

1920年，即帝国主义和国内战争之后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这个计划被提交讨论。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就此作出如下决议：

“代表大会认为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提议制订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是伟大经济创举的第一步。

代表大会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以及其他各级人民委员会完成对这一计划的研究，并予以批准，同时必须在最短期间做到这一点。

代表大会还责成政府和要求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尽一切办法来广泛深入地宣传这一计划，使城乡广大群众都能了解……代表大会坚信，所有苏维埃机关、所有苏维埃代表、所有工人和劳动农民，为了俄国电气化计划的实现，将拿出全部力量，不惜作出任何牺牲，排除一切障碍。”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担负着实现我们提交给这次代表大会审议的五年计划的任务。国家电气化的动力基础也仍将是五年计划中发展工业的基础。但是，在五年计划中，我们将比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所要求的走得更远。

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出发点是，在十至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们一定要建成三十座新的区域发电站，发电总量在一百五十万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467、468页。——编者注

瓦以上（准确地说是一百七十五万瓦）。事情进行得怎样呢？在这三十座电站中，有七座现在已经在送电，有八座正在建设，有五座正在设计。已投入运转的区电站的发电量约有五十万瓦。今年秋天还将有十万瓦的机组投入使用。五年计划预计五年中建成的新的区域电站将不是三十座，而是四十座，发电量将不是象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计划所规定的一百七十五万瓦，而是三百多万瓦。由此可见，五年计划比起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跃进。

无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还是世界工业发展的经验都充分地证明，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出发点是正确的，这就是说，借助于发展区电站来实行电气化是经济的技术改造的核心。在我国条件下，即在公有化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电气化比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和作用，因为我们的区电站同时也是区域工业组织的动力机构。由于考虑到远距离送电的极大方便，工厂企业现在已经在拆除自己的动力设备，把自己的动力机构迁出厂外，把它们集中到区电站。在我国条件下，对广大地区采取集中供电的办法可以使电力得到进一步的利用，不仅对工业和城市居民是这样，而且对农业和农业居民也是这样，同时对手工业劳动显然也有影响。所以五年计划规定要大力发展电力，并通过发展电力来建立新形式的工业和劳动组织。

经济改造的物质前提

苏维埃代表大会将要对五年计划和我们现已达到的、作为计划的起点的经济水平作出详细的报告。因此，我只想在自己的报告里谈谈现在的一些最主要的部门。关于工业的情况，我首先要谈的是生铁、化工和机器制造业。

我已经说过，在黑色冶金方面，我们今年已经达到了战前水

平，并在今年为该部门拨出二亿三千五百万卢布的基本建设投资。生铁和机器制造业在我国的工业建设中还将长期被放在突出的地位。我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行。任何技术改造，包括改进农业生产，在新的技术和社会基础上组织农业生产，以及任何生产的任何合理组织，都离不开生产工具和制造工具用的生铁。可以说，生铁是国家工业化主要的基本材料。这一点也决定着黑色冶金在新建设中的巨大地位。我们今年要着手，更精确些说已经在着手建设乌拉尔的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工厂、西伯利亚的库兹涅茨克工厂和乌克兰的克里沃罗日耶工厂。生铁的产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现在我国的生铁产量占世界第六位。到五年计划期末，如果美国和德国的发展速度仍保持在最近几年的水平，我们就将占世界第三位。不能说这对于我们国家已经够了，因为到那时我国人口大概达到一亿七千万，也就是说，等于好几个德国的人口，而我们的生铁产量却仍然落在德国后面。

第二个对于经济改造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业部门是化学工业。到现在为止，特别是在农民中，对化学工业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和意义并不十分清楚。但是，恰恰是化学工业这一国民经济部门最能向每个农民证明，国家的工业化不仅是工人的事情，而且也是农民的事情。德国农民在每一单位面积收获的粮食要多一至二倍。为什么？首先是由于化学工业为农民提供了化肥。比方说，在农业运用科学的工作中，也可以看出化学对提高土地产量的作用，一吨氮肥可以额外多提供三吨粮食，或者半吨棉花，或者十三吨甜菜。要额外多得到这么多的农产品，那就只有在苏联发展化学工业。我认为，通过这个例子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如果农民要想很快地提高自己的单位面积产量，那他们就必须帮助建设化工厂。消灭病虫害的斗争同样也完全取决于化工厂和化学工业，至于农民所需要的其他许多方面的生产，那就更不必

说了。

据一些科学家统计，由于化学工业的发展和在农业中的广泛运用，西欧现在增产的粮食比战前它从美国和沙皇俄国输入的粮食还多。但是化学工业在苏联还完全是一门新工业。老实说，在革命前，化学工业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现在只能是从头做起。大家可以从下面的数字看出这一点：1913年，过磷酸钙的产量总共为五万五千吨；现在我们已经能生产二十一万五千吨；而五年计划规定要把产量增加到几乎三百五十万吨。发展化学工业要求有巨大的投资；例如，顿巴斯矿区的矿肥厂将需要有大约二亿卢布的投资，乌拉尔的别列兹尼柯夫斯克化工联合企业需要三千六百万卢布投资，等等。

农民们有时问我，为什么那么重视重工业，给的投资那样多，而给农业的投资却又那么少，人们对农业也很少议论和考虑。其实大家对农业的议论相当多，首先，说我们给农业的投资少，那是根本不对的，第二（而强调指出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农业发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重工业。要想在农业中取得成就和对农业的技术落后进行坚决的斗争，就需要为农民提供良好的生产工具：犁、播种机、脱粒机、拖拉机；需要为他们提供化肥，帮助他们消灭病虫害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恰恰要靠重工业提供。

按照战前的（价目表的）价格计算，今年我们将生产出二亿一千万卢布的农业机器，而到五年计划期末，这种生产将达到六亿一千万卢布。如果我们不发展农机制造业，农民就必须或者在铁匠铺里自己来组织生产质量低劣的工具，或者用木制的工具去挖地。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有农业的大发展。所以说我们需要制造农业机器和建设农机厂，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摆脱落后状况。但是，农机制造业的发展又同用来制造农机用的生铁的生

产联系在一起，即同重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我们已在着手建设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之类的“纯农民”工厂，按照原来的计划，给该厂的投资为八千万卢布，可是实践证明，造价肯定还要高，但是究竟需要多少，我也说不清。这个工厂每年将生产五万台拖拉机。罗斯托夫农机厂需要四千六百万卢布投资。该厂的一个车间今年已经开始投产。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为农业带来直接影响和带领农业前进的工业部门的巨大发展。在战前，沙皇俄国农机生产的产值只有六千七百万卢布；而我们正如我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现在生产的农机产值为二亿一千万战前卢布，而到五年计划期末，将达到六亿一千万卢布。

这些数字证明了国家工业化将给农村带来的巨大的技术进步，它将使农村的贫农（通过信贷等等）更有可能富足起来。

轻工业和商品荒

现在简短地谈谈轻工业问题。如果说农业既是重工业的市场，即消费重工业生产的农机、肥料、拖拉机、钢铁等等制品，同时又是重工业中工人所需粮食的供应者，那么农业对轻工业说来，除了是粮食的供应者以外，同时还是原料的供应者。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因为轻工业加工不了农业为它提供的原料而抱怨。五年计划规定对轻工业进行相当大规模的改造，但是不应忽视，轻工业发展的规模不仅决定于改造的规模，而且决定于农业所能为轻工业提供的原料的数量。

因此，我要回答一下最近时期人们在各种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业产量大大超过了战前水平，而在城市合作社和农村却没有工业品，商品荒的情况至今也没有好转？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我们苏联的需求量的增长不是低于，而往往是高于

生产的增长。最近几年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广大居民在自己的物质状况上已经属于较有保证的阶层，而且一年比一年提高并不断得到改善。我们有一亿五千万人口。比方说，每一个家庭（大概共有四千万个家庭）一年中多购买二十五卢布的东西，即每月多支出两个多卢布。这样一年的需求量就将增加十亿卢布。但是要知道，生活的改善虽然不十分明显，即每个家庭每月只不过多消费一两个卢布，但是在我们这里这种情况涉及的面很广，包括好几千万人。由于境况得到改善的人很多，每个人的需求稍有提高，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全面需求量增长的数字。需求方面的变化，对于在自己的需求量上增加不太多的贫农来说，有时甚至是觉察不到的，可是把数千万人的需求加到一起，就会对工业多提出很大的一个需求量。

这种过程还将持续很久，因为在沙皇垮台以后，我们是把人民的各阶层和人民的需要从深渊里拉上来的，因为起点非常低，当时甚至连居民最起码的和最切身的需要都满足不了，当时在工人的预算里，在所谓文化开支上勉勉强强只能拿出个把卢布来，而在农民的预算里，还几乎一个钱也拿不出来。在现阶段我国经济的发展中，生产落后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的需求的情况，原因还在于我们一方面要拿出数十亿卢布的基本建设投资，另一方面我们从正在建设的工厂里又得不到相应的产品，而与此同时，这数十亿卢布又产生了新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包括生产资料，而且包括那些新参加暂时还不能出产品的工厂的工人的生活资料。今年，我们前几年开始建设的一部分工厂将开始投产，五年计划期末，这方面的情况将会根本好转。五年计划规定，到五年计划期末，新企业提供产值将在总产值中占百分之三十。这意味着补充产品将会大量增加。我们现在投到基本建设中的大量资金正在开始越来越快地周转，并使商品量增加。

速度是否可行?

在现阶段，工业化速度首先决定于基本建设的规模。今年我们在工业和电气化基本建设上投放了几乎二十亿卢布的资金。

我们从哪儿搞到这笔资金呢？这里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工业本身已开始提供利润；第二，我们狠抓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的一个杠杆，即节约和精打细算的杠杆，也就是说要缩减行政费用，据工农检查院计算，这样可以节约大约三亿卢布。按照国家预算我们把行政管理费的比重由百分之八点七减少到百分之四点九。我担心的是，尽管这是我们在工农检查院的帮助下尽了很大努力和采取断然措施做的一件好事，但是以后我们不致毁掉这件事情，也会放松对这个问题的注意，使之放任自流。基本建设的规模既然很大，就要进一步地全面厉行节约。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给予计划工业工程的投资约为一百六十五亿卢布，加上实行电气化，大约为二百亿卢布（这是按1926—27年度的不变价格计算的，如果按相应年度的价格计算，这个数字一定会变小，因为五年计划规定要大大降低价格）。这一点能否办到呢？过去几年我们实际拿出的基本建设投资比计划规定的略多，所以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我国经济学家的计算表明，只要政策对头和把工作做好，五年计划规定的速度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可能加快。最近两年来，工业的基本投资增加了百分之六十（1926—27年度计划工业工程和电气化的投资为十二亿四千三百八十万卢布，1928—29年度为十九亿七千三百六十万卢布）。如果在整个五年过程中每年都能拿出象去年那么多的资金来，那么五年中的基本费用就可以达到一百亿卢布。五年计划设想的基本投资是这个数目的两倍。但是在支出这些资金的同时，工业产量每年也都在增加，到五年计划期末，将增加到1927—28

年度产量的三倍，而这就意味着折旧费和利润的数量一年比一年急剧增加。

但是，工业的积累速度将高于生产发展的速度，因为积累不仅是依靠提高产量，而且也依靠在新的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产品成本，而成本降低不仅能降低价格和提高工资，而且也能增加积累。我们不是单纯地在建设新的工厂，而是在建设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新工厂，我们不是单纯地在扩大旧的工厂，而是在改造这些工厂，也就是说，在用新的技术基础来代替这些工厂早在几十年前就陈旧了的技术基础，正是工业技术基础的彻底改造这一点使我们有可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工业的内部积累（这是积累的决定性来源），并使五年计划规定的基本投资计划得以实现。

过去几年的经验和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加快证明，这种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有可能达到的。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这种速度是很惊人的。但是这种惊人速度的谜底在于，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都被用于资本家阶级的非生产性消费（例如，在沙皇俄国，据我们某些经济学家的计算，有大约一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白白挥霍掉了）。在我国，不仅非生产阶级以及他们的非生产消费已不复存在，而且一系列非生产性开支也没有了。过去这些非生产性开支是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体制的整个条件和克服土地、森林、矿藏、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造成的障碍相联系的。现在，这一系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开支在我们这里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尽管我们工作中还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在我国经济的计划性和组织性方面比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拥有巨大的优越性。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有很大的可能性来加速经济的发展。

劳动生产率问题和社会主义竞赛

计划的速度是否能够达到，关系到一个基本问题，而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是检验我们是否善于组织新社会的一个试金石。我这里指的是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还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问题的原则意义。什么是组织新社会？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才能把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提上日程？这个问题不是在任何阶段而只有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能被提上日程，这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上，人们的劳动达到了如此的效率和建立起如此的生产形式，以致于能够通过这种劳动生产率和这样的生产形式用社会主义的即有组织的方法来保证满足人类社会的全部需要。

在封建主义时期，即在手工劳动时期，是不可能组织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在自己的技术上和自己的生产效率上继承了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全部掌握了资本主义的一切成果（生产得又多、又快、又省），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达到的技术和组织水平出发，在新的社会劳动组织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产力，把它提高到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所达不到的水平。马克思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其他创始人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由于有了自己的技术，已经能够使一个人的生产满足好多人的需要。业已达到的这种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是组织建设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前提，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全部需要都将得到满足，人们将摆脱对自然力的奴隶依附地位，成为自由的人。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和与此有关的降低成本的问题，即我们的技术和组织成就问题，不是什么次要问题，而是我国经济中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将成为我们卓有成效地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和接着组织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到目前为止，这方面

的情况还不是都那么顺利。今年我们本来计划把成本降低百分之七，而现在只降低了百分之二至三。而成本每降低百分之一，就是一亿卢布左右。成本降低落后于计划的情况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但是对我们说来，尤其重要和尤其危险的是管理和领导工作上存在着缺点，以及劳动纪律松弛。我们开展了同这两种现象的斗争。不久前我们不得不首次颁布劳动纪律的专门法律。引起颁布这一法律的那些不健康现象，即企业劳动纪律松弛的现象，现在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不仅如此，在克服这些不健康现象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些新的力量和象社会主义竞赛这样的争取加强劳动纪律的新的斗争方法。由于竞赛是来自下层，并把广大群众都吸引到经济建设中来，这就可以保证我们的成果得到巩固，使劳动纪律方面的不健康现象迅速彻底地得到根除。

但是，社会主义竞赛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加强劳动纪律的斗争任务。它的意义要广泛得多，它定将成为更广泛和更直接地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手段。例如，工人参加争取降低成本的社会主义竞赛时，就会更仔细地观察整个生产过程的进度情况，把自己本厂的工作情况同竞赛对方的情况进行比较，踊跃地参加生产过程合理化、组织供应以及消灭生产中的各种缺点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积极的工人在争取改进一两个企业的生产的同时，在实践中也会看到这些企业对另一些企业的工作的依赖关系，这就使他们投入到日益广泛的斗争行列，促使他们去激发其他工人、特别是比较落后企业的工人的积极性。因此，社会主义竞赛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它在解决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任务上（加强劳动纪律等等）能取得一定的成果，而且还在乎它是一种活的、实际的（因而也是最可贵的）群众性学习、巩固和提高社会主义劳动文化的学校，这种文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文化，它是建立在个人和社会利益相溶合的基础之上的。

社会主义竞赛绝不是什么一时的运动，它是一种具有巨大原则意义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用特殊的和非官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一运动的组织和领导；这一方法随着群众文化的提高，将越来越牢固地深入工厂企业等等的日常工作中去。

关于工业的情况我就谈这些，下面谈谈农业问题。

农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和贫农、中农经济的高涨

目前农业上既有积极的现象又有消极的现象。积极的现象已经列举得够多了。它们的表现是：发展了多圃轮作制，使用了新的农业机器和化肥，建立了农业生产组织的新形式。这种农业生产组织不仅就它的技术基础来说是新的，就是从它的社会结构来说也是新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农业的发展同工业的增长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农业的发展比工业的发展要缓慢得多，而且大大落后于工业和整个国家生活向它提出的需要的增长。

在技术作物方面，我们在数量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超过战前百分之几十。但是有一些数字使我感到吃惊。某种作物的播种面积超过或者达到了战前水平，人们就把这一点作为一种了不起的成绩向我报告。可是当我问起这些扩大的播种面积的总收获量是多少的时候，往往发现总收获量还不如战前。例如，1928—29年度甜菜的播种面积超过了战前，达到了七十七万一千公顷，而战前是六十二万二千公顷。但是，甜菜的总收获量却略微低于战前。在棉花方面，我们的播种面积超过战前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而棉花的总收获量才勉勉强强超过了战前（1913年是七十四万三千七百吨；1928—29年度是七十八万一千四百吨）。至于亚麻种植业，那么无论是从播种面积或是从单位面积产量来说都不如战前。这一点从下面的资料中就可看出：

	1913 年	1928—29 年度
播种面积（千公顷）	1857	1757
亚麻纤维总产量（千吨）	457.7	345

单位面积产量低，这特别明显地说明我们的技术太落后，农业的规模小而分散，大田三圃轮作制仍然占据统治地位（虽然多圃轮作制最近几年已开始日益推广），技术作物区在矿肥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供应上仍然不足（虽然正在不断增加）。由此可见，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问题，质量问题，在这里也特别尖锐地出现了，并且只有用与国家工业化相联系的一整套措施才能解决。单位面积产量甚至不如战前的水平，更不要说不如西欧国家的水平了，这样低的水平影响到了农业的总产值，延缓了农业发展的速度。

农业的总产值（不包括渔业、狩猎业和林业）1926—27 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五点四，1927—28 年度同上年相比降低了百分之一点一，1928—29 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四点四。^①

谷物生产的情况更糟。它的总收获量在 1926—27 年度是七千八百万吨，1927—28 年度是七千三百六十万吨，1928—29 年度是七千三百三十万吨。

战前全国粮食的总收成是八千一百六十万吨。由此可见，我们在谷物的总收获量方面比战前几乎减少百分之九至百分之十。如果把粮食总收获量的数字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话，那就会出现下面这一系列数字：

① 参看《苏联1928—29年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第398—399页。

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产量^①

年份:	公斤:
1913年	584.1
1926—27年度	532.3
1927—28年度	489.6
1928—29年度	484.4

近几年来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地区粮食总收获量的减少是因为自然灾害的缘故。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象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流域这类地区，播种面积没有完全恢复，比战前少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此外，还有许多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都未达到战前水平。

由于农业经营规模缩小，再加上贫农和大多数中农的粮食消费增加，粮食的商品率更加降低了。

这些情况造成了我们目前在粮食方面所遇到的一些困难。

我们连续两年遇到这些困难。去年，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今年粮食收购方面出现紧张情况，是因为粮食的总收获量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普遍略微减少，加上地理布局情况不利，乌克兰草原地带和北高加索的若干地区部分失收。这种情况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两种措施：一方面限制粮食的消费，节约粮食，通过凭配给证购粮的办法首先保证工人和贫农群众的粮食需要；另一方面使贫农和中农群众对企图利用有利行市捞一把并囤积大量粮食进行投机的富农分子施加社会压力。

粮食产量的不足迫使政府必须采取尽可能坚决的、严厉的措施来首先改善这方面的状况。我们把很大的注意力集中在象播种运动这类运动上。我们通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

^① 参看《苏联 1928—29 年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第 411 页。

家品种种子储备局向今年春播运动发放了一千七百万普特的良种，并发放了三千五百万普特的救济种子（去年国家品种种子储备局发放的良种为七百万普特，救济种子为二千七百万普特），拨给价值几乎达一亿卢布的农业机器（去年是七千五百万卢布），分配了七千五百台拖拉机，大大增加了矿肥的生产。投入春播运动的农业贷款为一亿卢布，签订了预购合同的农田约达一千四百万公顷。这些数字都是很大的。

当然，我们的帮助本身不能决定春播运动的最后结果，因为除了上述我们所发放的那些数量的种子外，农民自己还播种了几亿普特的种子。但是，我们的帮助对于扩大播种面积来说，特别是对于贫农阶层来说，仍不失为一种巨大的帮助。

我在报告的开头已经指出，由于当前的经济局面和我们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能够拿出来的资金数额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了，我们为了消灭农业落后于国家不断增长的需要这类现象而能够和应该采取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也不同了。这一点在目前的具体表现是：生产上的帮助和农业生产的组织在我们的政策中所占据的地位，要比它们过去曾经和可能占据过的地位重要得多。工业的发展破天荒第一次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我指的是组织集体形式的农业生产。

公社和集体农庄差不多在十月革命第一年就已开始组织。它们一直存在下来，但是，它们能够大规模地、稳步地推广开来，那还是因为有了后来的情况，即工业能够为此打下必要的技术基础，即能够提供——或者更确切地说开始提供——拖拉机、复杂机器、化肥等等。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组织起合理安排的大生产，也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公有化部分才能具有普遍的意义，才能进一步成为农业中的决定性因素。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普遍增长使我们有可能认真着手建立大型机耕国营谷物农场。新建的国

营农场应当在五年内把自己的生产提高到能给国家提供一亿多普特商品粮那样的规模。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能增加粮食生产和缓和粮食困难。它还有更重要的原则意义，就是说它使我们第一次有可能用这种方法以空前的规模来实现农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把社会主义组织仅仅设想成城市的社会主义组织。社会主义必须而且不可避免地应当也包括农业生产在内。

区间机器拖拉机站的建立，是农业方面正在发生的新过程的最鲜明的表现。我们关于机器拖拉机站说得和写得都够多了，组织拖拉机站的经验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建设区电站意味着消灭工厂动力设备分散的现象，把全区的工业动力设备都集中在区电站。机器拖拉机站方面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使小农生产者的牵引力突破农户范围，更确切地说突破村的范围，而集中在跨村的即区的拖拉机站。这是我们已经在农村中实际开始进行和实现的那些农业生产革命改造的非常突出的表现。这是我们建设的现阶段同以前阶段极大的不同之处，它最鲜明地表现出这是我们的整个经济在与前不同的高度技术基础上和在农村的社会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进行明显改造的阶段。

如果说以前城市几乎完全是通过商品流转，并且是通过对农村进行消费品的供应而同农村结合起来的话，那么，现在生产资料在商品流转中正开始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更有组织、对生产更有影响的联系形式的作用正在不断提高，这些形式包括：签订预购合同，这种形式往往扩展到整个整个的村庄；发展从集体农庄一直到公社的生产联合组织；发展机器拖拉机站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影响的形式，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方法。

整个说来，这一过程同时也就是对富农的猛烈进攻，不能不

引起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有人认为富农经济就其规模来说是可以利用大生产的一切优越性的一种农业生产类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现代的农业技术要求有一种比富农经济大得多的大生产。说实在的，富农同小农和中农的区别，就好比是小业主同小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的区别一样。但是，这两者距离大工业工厂生产都是很远很远的。我们放松同富农危险进行斗争，让富农经济有“发展的自由”，在目前就意味着使富农从“小业主”发展为工厂主。技术上的需要和最有利地经营农庄的需要，会促使富农迅速地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农庄，也就是说会使他们发展成为地主并盘剥农民，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农庄才能采用复杂的轮作制、拖拉机和其他复杂的机器等等。因此，同富农危险作斗争，是出于十月革命原则的需要，是出于工人、贫农和中农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需要。

正因为如此，在组织大的集体农业生产方面的每一个成就和在这种生产中采用新技术的活动就变得特别可贵，新技术的采用可以使农民的劳动变得比在包括富农经济在内的任何个体经济都更有效率，更合算，更有利。正是这一点使富农的反抗变得十分激烈，并决定了富农的阶级立场。农业集体化从根本上消除了富农的危险，使富农经济在生产技术上成为落后的经济。

由此可见，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对农业进行真正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但是，这完全不排除为发展贫农和中农的个体经济而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其所以不排除这种必要性，是因为无论国营农场、集体农庄还是社会主义工业，在广大居民群众贫困化的基础上是建设不起来的；其次，因为尽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国家的粮食状况不仅在目前，而且就是在五年计划实现之后，还主要取决于农业的中坚——贫农和中农的生产。虽说有五年计划关于农业集体化的宏伟纲领，但个体农业

生产在供应国家粮食方面所占的比重到五年计划结束时仍将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而在供应所有农产品方面所占的比重还要大得多，因为我们初期主要是在谷物业方面实行农业的公有化。

集体农庄建设和国营农场建设的发展速度，完全取决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因为工业通过提供拖拉机、农业机器和化肥等等为大农业生产奠定技术基础。因此，那些说必须收缩工业以便发展农业的人，是啥也不懂的人。即使个体经济用的农业机器、化肥和防治害虫用品也得完全靠工业来满足。需要的不是放慢工业发展的速度，而是尽可能加快工业发展的速度。但是，自然也需要以比过去快得多的速度来加快农业的发展。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例如，从播种面积的增长落后于牲口头数的增长和农业机器的供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1926年到1927年，播种面积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一，牲口头数增加了百分之十，而农业机器的供应增加得更多。这就是说，发展个体经济，扩大劳动的、非富农的亦即贫农和中农的经济的播种面积，是大有潜力的。在播种面积还远远没有达到战前水平的佐沃尔日耶、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我们有扩大播种面积的巨大可能性。全国谷物播种面积为战前的百分之九十二；其中象莫斯科省这些地区和其他一些粮食消费区已把自己的播种面积扩大得超过战前，而在许多产粮区早先的播种面积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还没有开垦出来。中农和贫农的个体农民经济在今后若干年内仍会有很大的发展的可能性，将能象五年计划所规定的那样保证全国粮食和原料供应的增长。政府最近一年来几乎把粮价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并且颁布了两项意义重大的法令：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法和农业税法。两项法令在保持对集体经济实行各种优待的同时，也力求保证贫农和中农的个体经济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去年我们在农业税方面犯了一些错误。我们力求纠正这些错误，力求颁布一项使个体农民即中农和贫农

比过去对扩大播种面积更为关心的法令。我不打算向你们讲述这两项法令的内容。在所有地方的和共和国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都对这两项法令的内容作了详细的报告，并且获得了普遍的赞同。

把农业中贫农和中农的个体部分同农业中的公有部分作为两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对立起来，那是不正确的。当然，它们之间将会进行竞争，但是，公有形式只有在贫农、中农群众的同情支持下，在给予贫困的个体经济以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的情况下，才能成长起来。必须努力使贫农和中农个体部分同公有部分一起共同对富农进行斗争。必须努力对贫农和中农经济进行有步骤的改造。农业的公有部分所以能够影响所有其他的农业生产，首先是因为集体经济的每一个实际的成就都在吸引一批又一批的个体经济参加农业的集体形式。但是，公有经济也通过另一条渠道即生产结合来影响个体经济：组织并从技术上改进中农和贫农的生产。例如，国营农场不仅仅是一个生产的企业，它应当成为新的农艺学的发源地，成为一切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的措施的宣传者，成为贫农、中农经济的助手，成为农业的新形式的组织者。我们应当通过国营农场来影响包括个体农民经济的生产在内的一切农业生产。

工人和农民，城市和农村

同志们，工农业的巨大发展，包括生产和社会的发展在内，是可以、而且必须和能够与提高工农生活水平同时进行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涉及到物和技术过程的问题占有很大的地位，这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不应忘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人而存在。不是人为了工业化，而是工业化为了人——为了工人和农民。在我们苏联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的斗争和我们的建设，唯一的目的就

是要组织起一个能消灭任何奴役、任何剥削、任何贫困、阶级斗争、文化落后和能建立自由人的自由社会的人类社会。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向这个目标每前进一步，工人农民的福利当然就会得到改善，而且最近几年来，也确实是改善了。居民在某些产品的供应上出现的个别问题和个别脱节的现象，丝毫也改变不了劳动者的福利不断提高的局面。这些脱节和困难仅仅是现在发生着的伟大历史过程的暂时现象。

下面我要简短地谈谈关于我们在改善劳动居民一般状况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和关于城乡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将出现的一些变化。我不准备谈近几年来工资的增加情况，因为这些材料是人所共知的。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意义特别大的是实行七小时工作日。这不仅是我国工人阶级生活和苏联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世界工人运动中的一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八小时工作日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能做到。在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工作日到处都在延长。实行七小时工作日是我们的苏维埃制度同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最明显的区别，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合理化、高度的技术等等，首先是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的。它为工人提供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失业现象。

今年的社会保险开支已经达到了十一亿卢布。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宣言里规定要在农村里也实行社会保险。现在我们还未结束对这项法案的审理工作，这项法令将同这次决议一起公布。苏联人民委员会最近将讨论一项法案，计划对没有多少生活来源的老年农民实行保证。由于在这件事情上需要的开支很大，根据需要我们在今年第一年将开始拨出二千多万卢布用于这一事业，保证标准还不是很高，每年定为六十卢布。这样就使城市同农村在社会保险方面接近了一步。城乡之间在这一方面和在所有其他

方面的差别，越往后就会越多地被消灭。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里，工农联盟一定会使这种差别趋于消灭。

我想就这个问题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中抽出几段话来宣读一下，这些话虽然是老早以前说的，然而是非常有意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这个问题写道：

“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 消灭镇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①

恩格斯早在 1866 年^②就这个问题写道：

“我们的出发点是：创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那些力量…… 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也足以在短时间内使比例关系翻转过来，并且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同以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象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欧洲东南部和美洲西部的天然肥沃的极其富饶的地区将以空前巨大的规模进行开发。”^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7 页。——编者注

② 原文有误，应为 1865 年。——编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470—471 页。——编者注

他在这里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已在着手实际实行的工业帮助改造农业的问题。恩格斯在信中所说的欧洲东南部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往那里运拖拉机和正在那里建设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庄的那些农业地区。

列宁也就这个问题写道：

“资本主义彻底割断了农业同工业的联系，但与此同时，它在自己的高度发展中又将准备出这种联系的因素——在自觉运用科学、联合集体劳动和重新移民（既消灭农村的分散性、闭塞性和粗野性，也消灭大量人口过分集中在大城市里的情况）的基础上，把工业同农业联系起来。”

我援引了这些引文是为了说明现在的工农联盟形式和现在的城乡结合形式今后将变成什么样子。这些关系最后一定会导致他们之间的种种差别的消灭。消灭这些差别的过程现在已经开始了，尽管暂时还处于萌芽和很脆弱的状态。农民已经是工人阶级的同事。工业化也象所有组织新社会的工作一样，既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也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同居民中资本主义残余阶层的斗争，同他们的复辟企图的斗争，同农村中的富农阶层和同城市中的耐普曼的斗争，同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所有这些斗争都一定会使工人和贫农—中农群众更加团结起来，使工人阶级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更加巩固。

文化和管理问题

同志们，我不打算多谈我们的工作成果、我们在国家文化发展方面的政策、组织等等问题。当然，大家都明白，发展文化和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组成部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在现阶段就已取决于我们发展文化的速度。所以，国家计委刚在几天前决定在发给大家审阅的五年计划草案里为文

化部门追加十二亿卢布的经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文化问题一向非常重视，而在所有的文化问题中他更为重视的是那些与广大居民群众有关的问题。他在共产国际的一次代表大会上特地强调指出，我们首先必须尽快地教会全体人民读、写和懂得所读的东西，现在对我们说来，在所有的文化任务中，这一任务是主要的任务。我们都清楚地记得“赶上并超过”这个公式，而在文化建设中，这个公式的意义并不次于它在经济建设中的意义，因为在一系列国家里，高等教育早已成为义务教育，在那里，孩子不上学，家长就得按法律治罪。我们在这一方面是非常落后的。

我国的整个文化面貌已经改变，而且还在继续不断改变。但是，我们缺少文化和人民教育方面的落后状态是我们必须迅速发展文化的最严重的障碍。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在中学里、有时甚至在大学里看到有些人写的东西还不是完全没有文法错误。我们学校的设备不值一提，尽管我们实行的新的教育方法是世界上最好的。师资的情况也同样有待于大大改进。我们在这方面尚需付出巨大的劳动，我再说一遍，因为五年计划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事业的发展。

我们五年计划最薄弱的环节是缺乏完成巨大计划任务的技术骨干力量。旧的骨干很少，这是第一，第二，沙赫特事件证明，这些人往往是不可靠的。当然，大多数旧专家都能诚实地和我们一道工作。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有象彼尔姆省索利卡姆斯克矿床或乌拉尔油矿这样一些发现，这两个发现是一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情。在这批作出这些发现的老专家背后，预计可能会出现一大批年轻的专家。因此，对这批诚实的老专家应该特别加以爱护，年轻人应该学习他们的经验和知识。但是，在专家中间也有一些人扮演了沙赫特事件的主角，对这些人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所有的苏维埃专家都应当帮助我们进行这一斗争。解

决培养新的技术骨干问题和尽快培养红色专家问题决定着我国五年计划实现的可能性和完成的速度。因此，不管在五年计划里，还是在政府的各种决议里，我们现在都比过去更加重视文化问题。

同志们，我已经指出过，我们现在已进入的时代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以往的时代，这个时代不能不促使我们必须以新的姿态对待文化和组织干部的问题，不能不促使我们必须以新的姿态提出一系列包括国家管理问题在内的组织问题。我们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方面讲得很多。如果有人问我官僚主义最鲜明的特征表现在哪里，那我就要说它表现在维护和抬高官僚机关的尊严上，表现在对“居民”即普通农民和工人的轻视和不够关心上，可是实际上这些机关本来是为了满足这些农民和工人的需要才建立的。官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们同任何国家的官僚主义者是一样的)认为，他们的机关是很理想的，工作出色，用不着进行任何变动。至于说它的工作有什么缺点，那必定是别的什么人的过错。总是喜欢为自己辩护，总是把过错推给别人，自以为自己的机关是人民需要的最好代表，这种倾向是官僚主义者的一种最有害和最危险的突出特点。我必须指出，沾染这种毛病的不仅是旧官僚和旧专家，而且还有我们新的工作人员中的许多人。本位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打算是官僚主义者多方面表现形式的一种，也是所有官僚主义者的通病，这种情况同滥用行政命令的做法一样，在目前是特别危险的。经济、社会关系和文化上的巨大进步，联系各阶级之间的新方法，提高广大劳动群众积极性的新方法，工人阶级和农民直接参加建设的热情的迅猛提高，——所有这一切不仅要求有新的工作方法，而且也要求有新的组织方法。我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如果我们以为用许多年前产生的和在许多情况下已成为陈规陋习的那些工作方法和组织方法就能完全保证我们现在面临的

各种新任务的顺利实现，那是很荒唐的。我们现在有一系列的新事物：五年计划，国家完备的行政区划，文化革命，工农结合的新方法，商业关系的新形式（私商将很快被排挤掉），文化和社会组织的业已成熟的新的工作内容与工作方法，千百万群众高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在这种条件下，不能把某些时期偶尔逐渐出现和形成的组织认为是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有关组织和工作方法的问题上，我们将不得不进行一些非常重大的变动。

* * *

同志们，新的时期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质量提出了巨大的和高水平的要求，它不仅在国家的管理，而且对工会、合作社组织以及其他群众组织这样一些机构的工作也提出了巨大的和高水平的要求。在关于从一种工作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工作形式和关于必须学会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问题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曾经讲过下面一段话：

“如果把共产党的全部工作比作四年制的最高科学课程，那么我们的情况则可以这样断定：我们正在经受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升级考试；还没有考完，但是根据一切迹象，我们是能经受得住考试的。如果按年级来考虑，那么一年级是从上一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到 1903 年，即从民意党、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初的首创时期。这是一年级。二年级是从 1903 年到 1917 年，这是认真准备革命和 1905 年革命的首次尝试时期。三年级是从 1917 年到 1921 年，这四年在内容上比第一个四十年还要丰富。这是一场非常实在的考验，虽然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但这还不是决定性的考验。如果说我们的歌词里唱‘这是最后的斗争’，那么我必须说，很遗憾，这还不是最后的斗争，如果说得十分准确，这只能是进入最后斗争的前期斗争之一。现在我们正在接受从三年级到

四年级的考试；此后我们还要接受整个四年级的考试，到那时我们才是真正不可战胜的。”

现在我们大家处在哪一年级呢？我们认为我们是处在四年级，我们应当准备接受国家考试，以便领取社会主义社会组织者毕业证书。但是我们这种考试是一种集体性的考试，是数千万人的考试。四年级的课程是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把农民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大经济，而要完成这门课程，就得同千万人站在一起，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参加建设，使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关心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每一个步骤。我在结束我的报告时相信，我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这四年级的课程，并在最后经受住国家的考试。

（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真理报》1929年5月25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李可夫文选

作者 =

页数 = 477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